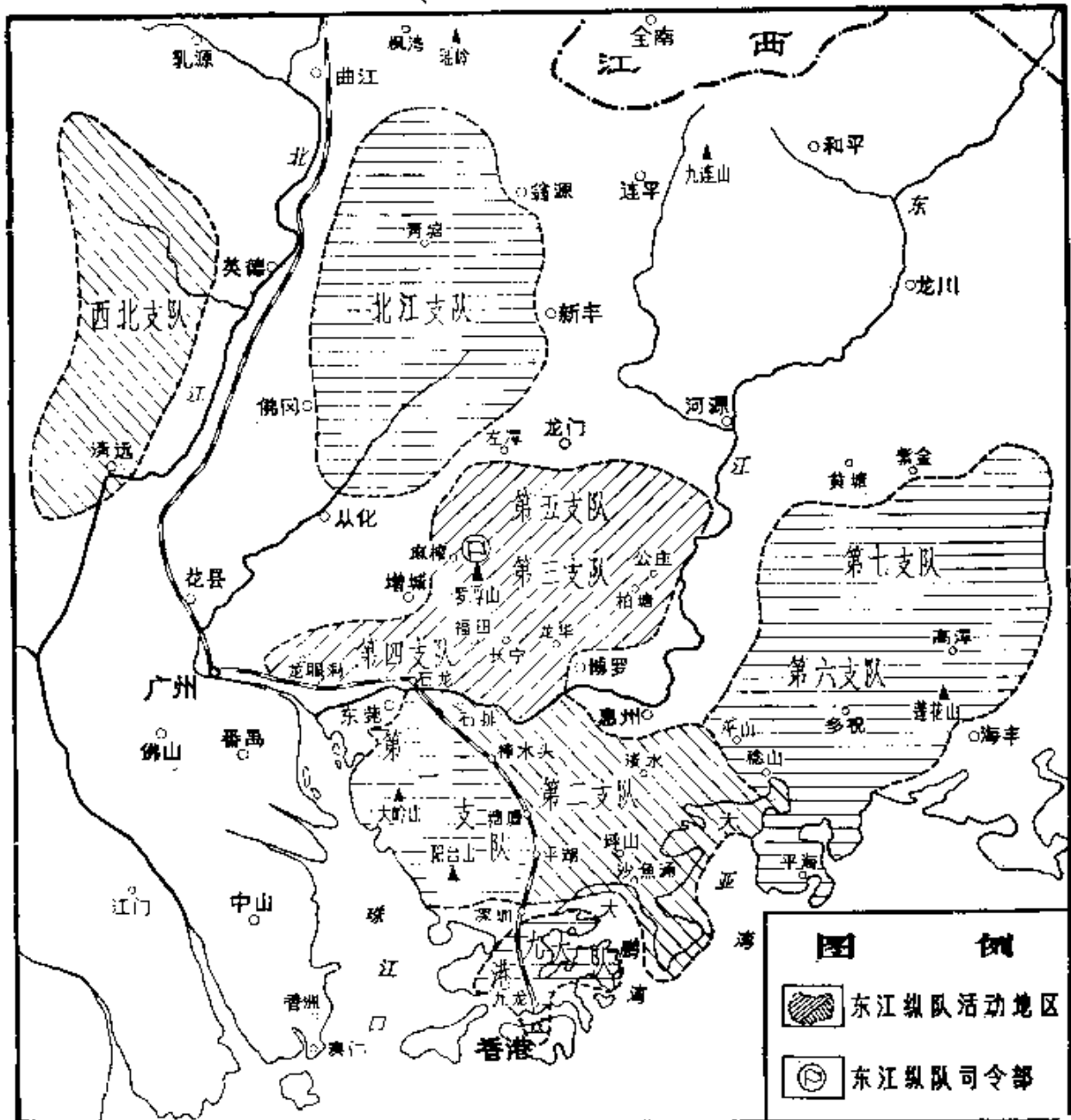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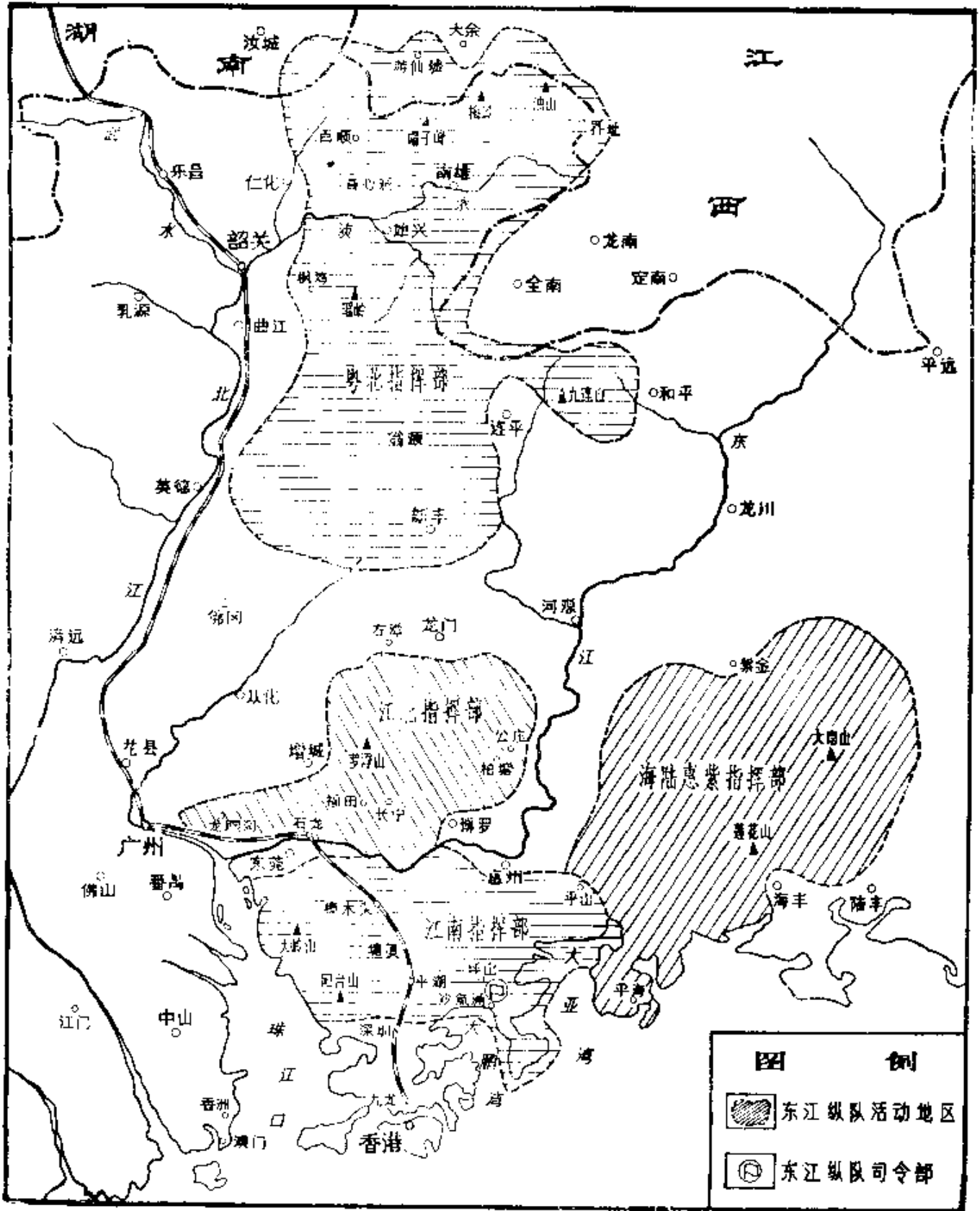
# 抗战胜利时东纵活动区域示意图

(一九四五年八月)





# 东纵北撤前活动区域示意图

(一九四六年六月)



## 图例

-  东江纵队活动地区
-  东江纵队司令部

## 前 言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同志们常常催促我，要我写有关东江纵队革命斗争的回忆录。但是，以前我总认为过去的斗争生活已成陈迹，戎马倥偬的旧事没有重提之必要，故迟迟不想动笔。

在动乱的十年间，林彪、“四人帮”之流把东江纵队诬蔑为“土匪部队”，把各种各样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广大东纵干部的身上，这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否认广东有东江纵队，并把华南所有抗日游击队都说成是“土匪”，如出一辙。在林彪、“四人帮”之流肆虐之下，东江纵队的干部遭到了残酷迫害。过去国民党反动派想办而办不到的事，却让他们办到了。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十年浩劫过去了，东江纵队的名字终于又和我们党的光荣历史联系在一起。

雨过天晴了，但十年的腥风血雨在我心中激荡起的感情波澜却不可抑止。我改变了过去的想法，为了那些浴血沙场、为国捐躯的东纵烈士，为了那些在“四人帮”淫威下坚贞不屈的同志，也为了让年青的一代正确地认识这段历史，我终于拿起笔来，写成此稿。

我之所以称这部小书为《东纵一叶》，意思是指它仅仅记录了我自己所接触到的那一部分，和整个东纵斗争史相比，只是

一叶而已。

愿此一叶，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写作之时，我想力求让史实说话，但因事隔三、四十年，虽然尽力而为，难免有挂一漏万之疏，张冠李戴之误；至于辞不达意的地方，一定不少。望读者们，特别是东纵的同志们不吝指正。

在我回忆和搜集材料过程中，得到许多老战友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作尧**

##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武装起来	1
第 二 章 抗日枪声	18
第 三 章 白沙之战	36
第 四 章 敌后孤军	49
第 五 章 再接再厉	68
第 六 章 收编前后	88
第 七 章 东移受挫	107
第 八 章 重返敌后	139
第 九 章 风云变幻	154
第 十 章 紧急抢救	161
第 十 一 章 犬牙交错	172
第 十 二 章 胜利发展	189
第 十 三 章 东纵战旗	208
第 十 四 章 东江千校	224
第 十 五 章 四海英雄	232
第 十 六 章 抗日盟军	245
第 十 七 章 江北斗争	257
第 十 八 章 挺进粤北	276
第 十 九 章 在粤赣边	288
第 二 十 章 新的航程	302

## 第一章 武装起来

### 一

“当当……当当……”除夕夜，大钟楼的钟声刚刚敲响九下，我乘搭的一艘“花尾渡”<sup>\*</sup>，便拉响了汽笛，在浓雾中缓缓地离开了广州长堤码头。

这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日。我因为在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暴露了共产党员身分，被国民党特务尾追查捕，党组织指示我结束在广州的工作，参加东莞党组织的工作，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花尾渡”在黑夜中破浪前进，哗哗的流水声中，我又想起了几天前与广州市委外县工作委员会领导同志丘萃藻见面的情景。

“作尧同志，”一天傍晚，丘萃藻来到永汉路我居住的一间小阁楼中通知我说，“你在青年会中讲了两次有关游击战的课，国民党特务已经密切注意你，你不能再在广州呆下去了。”

几年来，因为宣传抗日的缘故，我曾经被国民党通缉，不得不东躲西藏，“七·七”事变以后，统一战线形成了，没想到

---

<sup>\*</sup>花尾渡：又称拖渡，一种用小火轮拖航的客船，因船尾漆着红绿花纹而得名。

在全国抗日高潮之中，我还得要离开这里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抗日有罪，真是岂有此理！”我愤愤不平地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到处打击敌人，国民党消极抗日，造成广大国土的丧失和百万大军的大溃退，眼看着日军不断深入，到处杀人放火，大好河山惨遭践踏。华南也将成为前线了……”

“作尧同志，”丘萃藻笑着打断我的话：“别担心，工委正要让你到抗战第一线去。”

“抗战第一线？”

“是的。”丘萃藻点点头，严肃地说：“两广事变后，蒋介石中央势力侵入广东，但广东的实际统治者仍然是余汉谋。他在全国抗战高潮的推动下，曾经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抗日积极性，但是，他仍然坚持片面抗战的方针，把希望寄托在日、英的矛盾上，错误地认为日军不敢南侵。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我们党领导的武装，是刻不容缓的。目前，党正在积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东莞很快就要成立中心县委，现在已经掌握了一些武装，他们要求我们派个军事干部去加强领导。你是军校毕业生，加上又是东莞人，因此我们工委决定派你回去，在中心县委担任武装部长，争取尽快地发展东莞的抗日武装，迎接华南抗战的到来。东莞是广东的门户，作尧同志，这个任务你一定乐意承担吧！”

面临新的任务，我的闷气顿时烟消云散了。当时，我正负责组织一个前线工作队，准备到宝安去，接到新任务后，我便利用春节前的几天，抓紧时间把剩下的工作做完，将组织名单交给接我工作的前线工作队队长王启光同志。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匆匆地赶上了往东莞的客船。

凉风象一把梳子细细地篦着我的思绪，此时此地，我开始慢慢地冷静下来了。考虑得更多的是今后的工作，怎样发展党领导下的武装？怎样才能把乡村用于械斗的武器掌握在我们党的手上？东莞的地形适合于游击战争吗？说实在的，我心中没有底。重担在肩，怎样才能不辜负党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任务？我想得很多很多……

“共产党员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的。”洛川会议\*向全党发出的战斗号召就象是黑夜中的启明星一样，给我指明了方向，使我增添了智慧与力量。

江上的寒夜被抛在前进中的客船后面，短暂的航程迎来了黎明，农历新年到了。

清晨，客船在东莞县城——莞城码头靠岸。

东莞县位于广东省中南部，东江下游，珠江三角洲的东北角。它东南与惠阳、宝安交界；东北接壤博罗；北与增城相邻；西北与广州、番禺、顺德隔江相望；西面的珠江口是祖国南方各地与香港、澳门以及太平洋沿岸国家往来必经之地，也是我国国防的前哨基地。

东莞县一部分处在珠江三角洲中，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到处都是稻海麻田，蕉林蔗地，是一个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

东莞是我的故乡，我的家就在离莞城不远的厚街。对于东

---

\*洛川会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莞，我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我特别喜欢东莞人民那种热情、爽朗的性格和勇敢、勤劳的优秀品质。东莞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有着勇于抵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南宋末年，当元兵南侵之时，有熊飞将军“军门一呼天地动，义士响应多如麻”的壮烈斗争场面；明末清初，东莞各乡纷纷组织起来抵抗清兵，水乡道滘一役，“血染春江半江水，士兵同时俱战亡”，歼灭清兵二千多人；他们气冲牛斗的英雄气概，直接激励了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东莞人民。将近一百年了，太平天国运动留下来的三合会组织在乡间还存在。沿海的虎门，是鸦片战争的战场，销毁鸦片的大池，炮台上的巨炮，都记载下东莞人民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东莞人民用不屈的意志和满腔热血，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一九二五年，中国共产党东莞地方组织成立了，从此，工农群众便以主力军的姿态，出现在反帝反封建的行列之中。

如今，在抗日战争中，我参加了这一英雄人民的战斗行列，心里感到十分激动。

上了码头，我按照指定的接头地点，穿过西城门，往力行小学去找姚永光同志。

暗号对上了，姚永光同志连忙把我领进了宿舍。一进屋，他兴奋地握着我的手，忙不迭地问寒问暖，他说早就知道我这几天要来的了。从他那里，使人感到一股洋溢的热情。

老姚同志是外县工委委员，派到东莞来负责这一带几个县的党的工作。很快，我就从他口中了解到东莞党组织的情况。

我们党在东莞的工作基础是较好的。大革命失败后，东莞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全国人民风起云涌的抗日怒潮，东莞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开展起来。

莞中学生张广业、陈昶、王士钊等进步同学通过《农村战线》小册子的散发，认识了在广州工作的共产党员陈健同志，从而取得了与党的联系。不久，在“中国青年抗日大同盟”广东的负责人王均予同志领导下，于一九三五年六月成立了“中青东莞分盟”，一部分盟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是，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共东莞特别支部正式成立，领导同志为王启光、王士钊、张联等。还有张广业、王河、王鲁明、谢阳光、赵学等一批老党员积极开展工作。一九三七年八月，上级党委派姚永光到东莞，成立了中心支部，姚永光任书记，健全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

这时全县的党员有三十多个，其中有一半在农村，一半在县城。

我来到，加入到中心支部，老姚很高兴。我们分析了当前情况，都认为：要发展东莞地区的革命武装，必须首先尽快地发展、壮大党组织，将自卫团等武装掌握在我们手中，并且成立由党领导的武装小组。于是老姚和我便作出了分工，他留在县城，我先到农村联系。

工作即将开始了。我想，春节前后城乡流动的人多，便于活动，决定不放过这个好机会，立即往农村去。

## 二

乡村有个习惯，旧历年的头两三天，不出门远行。厚街有个支部，要去联系，老姚认为我还是先去厚街为好。一方面免得引起别人怀疑，说我回到家乡也不在家里过年；另一方面，回家看看母亲也是应该的。

年初二清早，我便告辞了老姚，步行二十多里，回到了厚街。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家了。

我家是个封建大家庭，祖父是清朝的武举人，在乡村中横行霸道，算是个“大人物”，乡中总是由他“坐局\*”。在我八岁那年他就死了，家道立即衰落下来。不久，家产就只剩下一座大屋和四、五亩田地。

在这样一个封建没落的大家庭中，起了巨大的分化。我和琪妹以及堂兄启光为了求学，先后离开了家庭。后来，随着“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高涨，一九三五年，我们都在广州参加了革命工作，到一九三六年都先后参加了党。参加革命以后，我和政治上反动的父亲分道扬镳，对于这个封建没落的家庭，没有什么感情，但我常常想念我的母亲和几个弟妹。

母亲原是贫苦人家之女，自幼丧父，我外婆纺麻度日，无法养活她，就把她卖给一个小地主当养女，长大后嫁给我父亲，生了第六个孩子以后，父亲就抛弃了她，跑到外头寻欢作乐去了，她孤零零地带着两个小儿子，纺线维持生活。她日夜操劳，还是欠了满身债。几年前，我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副排长的时候，经常给她寄些钱，脱离军队后，就再也没有钱寄回家了，可想而知，母亲的日子是多么艰辛。

母亲的头发已经开始发白了，额头又添上了几条长长的皱纹。她微笑着看着我，除了高兴以外，没有别的表示。长年的屈辱、孤独的生活使她变成了一个善于掩饰痛苦的人，虽然在她的心灵深处埋藏着多少辛酸的泪。

母亲从不问我们在外头干什么，更不知道我们参加了革

\* 坐局：掌握政权之意。

命，但从她的表情看得出，她对儿子的正派是深信不疑的。

“怎么，大冷天还穿着单衣裤？”母亲看到我穿得少，就翻箱倒篋地给我找衣服，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一件可以保暖的。这时候，伯母在对屋看见了，就把堂兄启光在日本留学时穿的一件呢大衣拿过来给我，红着眼圈说：“拿去穿吧，阿光是不要的了。”

我知道启光哥留学回来后，因为反对父母逼他盲婚，离家出走，临走前留下一张纸条说这辈子再也不回来。看到启光哥这件衣服，我不知说什么好，只好默默地接了过来。

我在家里住了两天，除了接收厚街党支部的组织关系外，也抽出一些时间帮母亲干些活，还给她讲了一些城里的事情。

要走了，我不得不告诉母亲，今后我在莞城教书，钱很少，只能养活自己，还望她多多原谅，以后有空我一定常回来看她。

说实在的，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以后我看她的机会更少了，也正如我跟她说的，不可能给她寄钱了。一路上，我边走边想，什么时候，抗日战争胜利了，母亲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是为一切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而奔忙的，到那时，她就会真正的理解我了。

“抗战刚刚开始，工作还多着呢。”远处，莞城黄旗山的轮廓已隐约可见，我想起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不禁加快步伐，向前走去。

旧历年初四，我回到莞城。年初五清晨，便开始了接收各地党支部和组织武装小组的工作，前往高埗、东坑、大朗、清溪、平湖、山厦等乡村。

高埗在莞城的西北面，是我们在水乡较大的据点。

东莞的水乡占了全县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河网纵横，是“出门见鱼虾”的富饶之地。但是，对我们开展游击战争，它并不是理想的地方。一方面由于土匪恶霸多如牛毛，把水乡分割成一块块的“独立王国”；另一方面，由于交通不便，难以迅速转移。高埗之所以能成为我们的据点，主要是这里群众基础好，一九三六年张广业、陈前、卢克华同志在高埗小学当教员，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他们发展了好几个农民党员，并且用各种名义购买了十几条枪，秘密地组成了武装小组。

我到高埗接收了组织关系，见到了武装小组的陈前同志。

陈前长着黄黄的头发，高高的鼻子，有一双活泼的蓝眼睛，活象个洋人，因此他有一个绰号叫“番鬼陈”。他原来是新会一间师范学校的学生，一九三四年师范学校组织学生到东莞来实习，实习过后，他就留在东坑小学，后来张广业把他介绍到高埗小学。陈前热情、能干，他在一九三七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处处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和过人的才能。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出墙报，演街头剧，深入到农民家中做宣传工作，他利用自卫团的名义参加训练，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是我们党搞武装斗争的好同志。但是，据说他曾经崇拜过无政府主义。我想，革命的武装，必须有铁的纪律，因此，在到高埗的第二天晚上，我便有意识地和陈前单独倾谈。

在熠熠的煤油灯下，陈前显得很兴奋，特意到学校旁的一间小店买来一瓶五加皮酒，一纸包花生，说：“我们躲在乡村什么也不知道，你刚从广州来，今晚就多谈些大城市的救亡运动，好让我见识见识。”我把广州的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向陈前介绍了一番，然后把话题转了过来，向他问道：“陈前同志，听说

你曾经崇拜过无政府主义。”

陈前一怔，但随即诚实地说：“是的，我崇拜过，那是在找到我们党之前。”

我进一步问：“无政府主义对抗日如何看的呢？”

“无政府嘛，信仰也是无政府的，随便！抗日嘛，要抗，因为日本是有政府的，是法西斯政府。国民党吗？他们有个‘国民政府’，也要反对。至于共产党，因为暂时还没有政府，所以暂时不反对。”陈前笑着说。

“如果共产党以后有政府，也反对吗？”

“那——”

“唉——”陈前拿起酒碗，呷了一口，长叹一声说，“正是呢，这个无政府主义真弄得人头昏脑胀，在中国，他们不顾人民疾苦，不管国家危亡，只图绝对自由的痛快，一边要反对日本侵略，一边又反对抗日的力量，真是发疯了。老王，别再提这个无政府主义，我恨透它了。”

“光恨不行呀，”我回答说，“要认识它对革命工作的危害性，更要在工作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老王，我明白了。”陈前激动地说，“我一定注意，今后你多帮助我吧。”

“人家说你很爱玩，好喝酒，有时候还跟一些学生跑到村中的庙里拔神像的胡须，剥菩萨的衣服，是吗？”我笑笑说。

陈前搔搔脑壳，不好意思地笑了。

谈话一直继续到深夜。从这个时候起，陈前同志成为我生死与共的战友。这次谈话有点戏剧色彩，几十年以后，这次夜谈的情景仍牢牢地保留在我的记忆当中。

第二天，我离开了高埗，转到东莞的山区。

东莞的山区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区，山不高，大多是一些平缓的小山。在靠东江河边一带的小山岗，经过千百年的开发耕耘，几乎都给削平了，只留下一些较坚硬的石头山，象大馒头似的孤零零地立在沿江的稻田中。称得起山的是大岭山为中心的铁路以西的山脉，这条山脉从北向南逶迤曲折，其中屹立着几个较大的山峰：水帘山、马山、莲花山、马鞍山、宝山、大坪嶂山。这几个四百到六百多米高的大山，形成一条弧形的山脉，在这条山脉的南面是宝安县的阳台山、鸡公头山和梧桐山，东面是惠阳县的白云嶂、银瓶嘴和飞鹅岭。广东北部的五岭，是东莞这条山脉的来源。在这些大山的四周，则是象鱗鱼触须一样的小山包形成的山梁。山梁与山梁之间往往形成一些狭长的山谷。所以，东莞的山区，虽然不是深山峻岭，但地形复杂，有利于小部队回旋，是我们发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地区。

我到的第一个点是在莞樟公路东面的丘陵地区东坑。

汽车往南开，在寮步下车后，往东走几里路便到达了。

在东坑和贵小学，我与当小学教员的卢仲夫同志接上头。当时，知识分子是开展农村工作的桥梁，东莞党组织的发展，往往开头就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党员到农村去教书，接近农民，引导农民，然后发展其中的先进分子成为党员。东坑一带党组织的发展与卢仲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卢仲夫原不是东坑人，他出身贫苦，小时候被卖到东坑给人做儿子。屈辱的生活，使他自小勤奋好学，立志四方。他先后在东莞望角、黄家山等地教书。“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投笔从戎，在江西寻邬国民党军队中当过文书。后来，在共产党的影响教育下，他提高了觉悟，毅然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回到家乡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起先参加了“东莞中青分盟”，一九三六年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他沉默寡言，深谋远虑，与热情奔放的陈前刚好是鲜明的对比。有他在东坑负责，我们是完全放心的。因此，我与卢仲夫接头后，强调了组织武装的重要性，便离开东坑往大朗。

大朗支部的负责人是叶镜源同志。叶镜源同志对武装工作比较重视，附近乡村用来搞宗族械斗的一些枪支都掌握在他们手上，他们的工作开展得比较好。我帮他们成立了武装小组后，便又赶往清溪。

从大朗往东南走，绕过东莞南部的交通中枢樟木头不远，就是清溪。

清溪乡南接宝安，东南靠惠阳，有几个山坳是三个县的交通要道。它的北面是樟木头到惠州的公路，西面是广(广州)九(九龙)铁路的两个大站：樟木头和塘头厦。东北、东南有数十里连绵不断的山峦，是个理想的游击区。

清溪有三个党员：张里夫、黄万顺和林锦华。张里夫在塘沥当小学校长，黄万顺在磨泥圩当教员，林锦华在清溪当小书店的老板。

我在林锦华的小书店中听了他们的工作汇报，他们说，这一带是客家人和本地人杂居的地方，由于语言、生活习惯、风俗的差异，存在着不少的隔阂，较难在农民中发展党员。

我向他们谈了当前的形势，要求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迅速行动起来，完成三件重要的工作：一是抓紧时机，迅速发展党员；二是积极掌握武装，准备在本地区开展游击战；三是趁东莞军阀张我东正在清溪一带组织自卫团，派党员打进去，争取把自卫团掌握在我们手上。

任务比其它地区都重要，张里夫几位同志表示，一定想法



克服困难，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他们力量比较薄弱，而任务却又多又重。我在清溪呆了好几天，作了一些具体的布置，才到平湖去。

平湖只有一个党员叫刘曼之，工作很难开展，于是我和他一道走到三里外的山厦村。

山厦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立过农会，群众基础较好，村里的农民叶丽钧就是当年平湖农会会员。山厦村没有地主，村中有四条自卫枪都掌握在我党准备发展入党的青年农民手中。山厦的党员邬振祥同志带我与进步青年谈了话。我在山厦住了三天，吸收了六个青年入党，并由他们组成了山厦的武装小组。

至此，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农村中跑了一圈，跟分散在各乡的党员全部接上了头，并组织了几个武装小组。完成了这些工作，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折回莞城。

接着，我又到虎门去，与简易师范的党支部接上关系。

途经大岭山的时候，下起了毛毛小雨，广东的梅雨天到了。在雾雨中往山上望去，只见云烟缭绕，群峰环立，地势险要。村边上，齐刷刷的甘蔗林、婆娑的荔枝树，与满山的苍松接成了密不透风的丛林。山坑里小块小块的稻田，人们开始犁田了。村舍隐没在万绿丛中。多美好的山区啊！我不禁发出内心的赞叹。

大岭山不愧是东莞山区的中心，它虽然没有水乡那么富裕，人口也没有那么稠密，但它三里五里一个村庄，十里八里一个墟镇，村村相望，鸡犬相闻。在山脚下，村庄前，到处都种有浓密的簕竹林和高大的风水树，不走到跟前，是很难看到村庄房屋的。有些村庄甚至是依山傍塘，两侧设有碉楼，对于我们开展游击战，确是一个天然的好阵地。只可惜这一带还没

有建立党的组织，不能马上开展工作。

走上一个小山坡，我又远远看到了与大岭山衣袂相连的水帘山。眼前的大山，使我憧憬着未来的岁月，仿佛自己已经置身于大岭山的环抱之中：在清冽的溪涧旁宿营；在密密的丛林间行军；在岩石旁，伸出一支支乌黑的枪口，警惕地对准了山下的敌人……

啊！大岭山，你将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

### 三

在这段期间，我们党在莞城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是许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对东莞武装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这些同志大部分都在斗争中牺牲了。我永远怀念他们。

东莞城的力行小学，是何与成同志办的，他自己担任校长，目的是为了掩护党的领导机关。当时我和姚永光都住在力行小学，挂名是教员，其实我们都没时间上课。何与成因此得找一些政治可靠的人给我们代课，许多时候还得亲自代课。他呕心沥血，到处张罗，把能拿到的钱都拿来支撑这所学校。

为了广泛和深入地动员群众起来抗日，我们必须掌握舆论工具。当时，东莞有两家报馆，一家是国民党县党部办的《民国日报》，是极端反动的。虽然那时已经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可是它的社论一直都是在骂“异党”，极力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另一家是《东莞新闻》，由何鼎华和他的同学黎协万主办，逢星期三、六出版。何鼎华是何与成的哥哥，在我们党的影响下，通过同志们和何与成的努力，《东莞

新闻》很快就成为进步的报纸，登载本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消息。每周的社论都是县中心支部根据抗战形势和任务撰写的。这样一来，《东莞新闻》销路大增，超过了《民国日报》四、五倍，成为我们党的有力的舆论工具。我们农村的党支部也可以通过《东莞新闻》的社论了解上级的意图。《东莞新闻》后来还办了一个叫《老百姓》的通俗小报，以小学程度的农民为对象，使宣传工作更深入农村。

何与成还通过他的社会关系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他与东莞县社训总队的副队长颜奇有些交情，便努力争取颜奇，这对我们建立武装工作很有作用。颜奇是国民党庐山训练团的毕业生，军衔是少校，他掌握的社训总队是全县性的地方武装，每个区有一个常备中队，乡有一个常备小队，总队部直接掌握一个常备大队。颜奇对何与成很信任，推荐他担任了社训总队的政训员。在何与成的建议下，颜奇接受了我们一些党员同志到社训总队受训。于是，在社训总队中的两个壮丁常备中队里，班长以上的干部都换上我们的同志。

不久，我们分别吸收了何鼎华、何与成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四

东莞在一九三八年初只有三十多个党员，一个中心支部，至四月间党员增加了一倍，并成立了中心县工委，兼管宝安、增城两县的建党工作。省委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成绩，表扬了我们的武装准备工作。

省委的表扬给我们增添了信心和力量，为了赶上组织发展

的要求，我们中心县工委决定举办一个干部训练班。

二月，袁鉴文同志从陕北回来，担任县工委组织部长。他在抗大学习过，马列主义水平较高，训练班里有关政治方面的课程就由他负责。我担任的课程是游击战术，用的是刘伯承同志在江西“红大”的讲义。

不久，省委成立后又派来了黄高阳、祁瑞和、王夫三位同志。这时正值第二期训练班开始，干部训练工作的领导加强了。

干部训练班办了两期，我们的工作骨干经过学习，普遍提高了政治觉悟，获得了军事知识。

那时，国民党驻军一五三师和“东增宝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也有军事训练班，是轮训各乡村的农民的，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便通过一些关系，派了几个党员打进里面去工作。这些同志工作得很出色，“自卫团”中的两个政工队队长职务，都让他们“揽”了过来。陈修业同志担任“自卫团”训练班政治教官，实际上掌握了这个训练班。在训练班里成立了共产党的支部。鲁风、赵笃生、叶刚明等同志，就在这里入了党。于是，我们的农村党员就可以轮流到那里学到点军事常识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利用其中一个政工队，派人进入大岭山地区，开辟了山区工作。

颜奇管的社训总队下属的壮丁常备队，已逐渐由我们党所掌握，共产党员陈昶派去当了中队长。到了日军入侵华南的时候，县委又派了莞城工人支部的书记黄士佳带领一些党员参加进去，在这个中队里建立了党组织。

正当我们有条不紊地建立武装的时候，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于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日军得以长驱直下，直逼武汉，广州危急。

省委指示我们：要紧紧地掌握武装，在日军登陆时把武装队伍集中起来开到河源县的桂山。省委准备以罗浮山和桂山为中心，领导广东东部的抗日力量展开游击战。

七月，根据省委的指示，正式成立了中心县委。姚永光任书记，袁鉴文和我是常委。派出委员张广业同志到宝安去筹备宝安县工委，委员卢仲夫、王鲁明、张里夫分别兼任三个区的区委书记。另外，抽调罗尧担任与省委直接联系的交通员。

正在这时候，传来了清溪张里夫同志被敌机炸死的消息。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我们都十分痛心。清溪是我们准备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地区，我们只好把武装部的黄高阳同志派到那里去。

十月初，局势极度紧张。敌机开始轰炸东、宝、惠三个县的公路交叉点和较大的市镇。十月五日，日本军舰炮击虎门。敌人的炮弹虽然未落到莞城，但空气中仿佛已弥漫着炮火的硝烟。国民党县政府慌乱不堪，党政官员纷纷收拾细软准备逃跑。商店关门，集市空虚。每天，西城门口都聚集了不少探听战事的人们，稍有风吹草动，一传十、十传百，刹那间便传遍整个莞城。于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西门口的“献金台”前，几天前热火朝天，现在突然变得冷冷清清。

这时，姚永光从广州参加省委扩大会议回来，召开中心县委会议，传达说：华南战事迫在眉睫，各地必须立即准备开展武装斗争。中心县委日夜开会，熬得大家的眼睛都布满了红丝。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除了在各区尽快地武装起群众，并派党员充实壮常队之外，由我们直接掌握一支武装队伍是目前的关键。在当前不可能公开亮出党的旗帜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成立一支完全由党领导的队伍；由党员和进步群众组成，利用国民党的番号，取得公开合法的名义，掩护县委独立领导游击战争。

当时，祁锋同志是莞城学生支部书记，县青年救国会负责人，何佳同志负责妇女支部的工作，也是县妇女救国会的负责人。他们反映：莞城青年、妇女迫切要求武装起来抗日，要求县政府发枪。县委决定，立即成立“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由我担任队长，袁鉴文同志任指导员。

十月十日，空气更加紧张了，我和何与成匆匆找到颜奇，决定明天就宣布队伍成立，并且找县长要枪去！

“明天——，明天就是投入武装斗争的关键时刻了。”我忽然想起了十个月前刚刚踏进东莞的情景，心情十分激动。远处，虎门方向传来了一阵阵沉闷的炮响，就象是战鼓之声在频频催征。

## 第二章 抗日枪声

—

十月十一日拂晓，我刚入睡，忽然，“轰”的一声巨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还没等我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又传来了飞机俯冲的尖锐啸声和哒哒哒的机枪扫射声，一阵阵呛人的硝烟从窗外直扑进来。炸弹就落在我住地的附近，我本能地意识到——战争来到了。

我一骨碌从床上跳下来，首先想到的是枪。此时此刻，枪比什么都重要。昨晚，我不是约定颜奇今早向县长要枪吗？颜奇说，县政府仓库里有几十条旧枪。旧枪也好，有枪，能武装抗日啊。想着，我撒腿便去找颜奇。

路上，因为敌机的突然轰炸出现了一片慌乱，人们到处乱跑乱喊。

看到这情景，倒使我冷静过来。我意识到，目前最重要的首先还是人，没有人，怎么跟县长要枪？要了也是白费力气。于是，我掉转头，奔向力行小学去找姚永光和袁鉴文。

老姚和老袁在力行小学正焦急地等着我，我们赶紧商议，决定采取几项紧急的措施：一、按照预定的联系办法，马上通知所有在县城的党员和进步群众到新生小学集合；二、立即派

罗尧同志到广州找省委，请求指示；三、找颜奇到县政府要枪去，然后请他到新生小学，立即宣布成立“抗日模范壮丁队”。

老姚和老袁马上组织人员去了。我找到颜奇，跟他一起带着刚刚集中起来的几十人去找县长要枪。

平日戒备森严的县政府，如今衙门洞开，县长的家属早已搬到香港避难了。

在县长住宅里，连那个留下来的县长、他的一个师爷\*和几个马弁也都无踪无影。空荡荡的衙门内，凌乱不堪，桌歪椅倒，满地尽是破纸残灰。

在衙门侧面的仓库附近，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县长的师爷，他伏在一个土堆旁，正恨没有地洞可钻。

“县长哪去啦？”颜奇高声向师爷吼道。师爷爬起来，看到颜奇盛怒的样子，慌忙说：“刚才飞、飞机轰炸时，县长跳、跳起来就跑，衣服也来不及穿，带着几个马弁，从后门跑出去了，恐怕是跑到东门躲飞机去了。”

“还回不回来？”

“回来的，回来的，县长的东西都在，也没叫我们搬，大概飞机轰炸过后就会回来的。”

听到县长逃得不远，我们才舒了一口气。这时，敌机的轰隆声渐渐地在远处消失了。待师爷喘过气来，颜奇又向他问道：“有什么消息吗？”

“哎，颜总，您还不知道吗？”师爷为了遮掩刚才惊惶失措的狼狈相，装出镇定的神态，张开鹅公喉，演讲似的说道：“刚才自卫团来电话说，日本人在澳头登陆了，我还未来得及问清

---

\*师爷，帮县长出主意、握笔杆的职员。



详细情况，电话就中断了。现在，飞机已经向增城、博罗的方向飞去，看来，日军正在向北推进……”

“虎门那边怎样？”我打断了师爷的话，迫不及待地问道。虎门是珠江的要塞，要是虎门失守，珠江口就掌握在敌人手里了。

“啊，虎门吗？你听，那边不是没有炮声了吗？自卫团说，虎门要塞司令部和守备团，昨晚天一黑就开始撤退，已经退出来啦。”

我和颜奇气得说不出话来。我只觉得心里头一阵阵的绞痛，血往头上涌。我心里直骂那班军阀官僚，什么“焦土抗战”，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一万多正规军镇守的虎门第一线，不击自溃。平日高喊着不怕流血牺牲，誓与国土共存亡，可炮声一响就吓得鸡飞狗走。他们有什么脸见东莞几十万人民！他们哪有一点儿中国人的骨气！

颜奇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他破口骂道：“丢那妈，尽是一些软骨头，他们不敢打，我们敢打！师爷——”他用手指着仓库：“你去把仓库打开，把枪支弹药统统拿出来，我们敢打！我们去打！”

不知是颜奇的声音太大，还是他话中的分量吓倒了师爷，师爷变得口吃起来：“你、你敢打吗？人家数以万计的正规军，加、加上这么多自卫团，都不、不敢打。你有几、几多人？几条枪？连、连条轻机都有……，再、再说，县长又不在，我……”

我想，师爷的确是不敢作主的，现在时间紧迫，许多事情还要办，无谓在这节骨眼上与他白白消耗时间。于是，我对颜奇说：“走吧，过一会我们再回来吧，模范队还得请你宣布成立

呢。再说，全盘工作我们也要布置布置。”

“好吧，”颜奇盯着师爷说：“我们过一会再来，县长回来时你告诉他在这里等我，至紧至紧。传错了话，找你算帐！”说着，我们便抽转身，带着同来的几十个人，一齐奔回新生小学。

学校里面的小操场上，早已挤满了前来集合的人们，他们正在那里三三两两地议论着当前的政局。看见我们来了，大家停止了谈话，“哗”的一声给我们让出一条通道。

台阶上，放着几把椅子，正坐着老姚和老袁，他们在这里等候许久了。

我走上台阶，把院子里的人集合排成方队，就说：“刚才得到消息，敌人已经在澳头登陆了，就是说我们的家乡面临着沦陷的危险了！我们——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只有拿起枪来，和敌人战斗！我们要组织起来，成立一支抗日武装队伍，暂时叫做‘抗日模范壮丁队’。我们正在争取县政府发枪。同志们，愿意参加的举手！”

我的话音刚落，“唰”的一下子，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那样果敢，那样刚劲，就象是一把把刚出鞘的钢刀，真是众志成城！

颜奇看到这场面，显然也很激动，他向大家高声地说：“朋友们，同学们，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抗日的真诚愿望，看到了我们中华民族勇于反抗侵略的不屈性格，我们决不当亡国奴，要誓死保卫祖国！我们的抗日模范壮丁队，要成为全东莞人民的抗日模范。目前，我们的条件还很差，我们原是属县政府管的，县政府可怜得很，仓库里头只有几十条旧步枪，连一条轻机也没有；但我们是正义之师，只要团结一致，鼓足勇气，还是能跟敌人拚个你死我活的！”

在群众的一片欢呼声中，老姚老袁要我宣布注意事项。我首先反复强调了部队纪律的重要性，然后，要求队员们赶快回家，收拾毛毯、床单、衣服等物，每人做一条米袋，有武器、现款和金器的都带上。要求东莞中学的学生回校打开童子军军训室，带上担架、药箱、指北针、水壶等物，晚饭后在莞城东南角的公园集合，再宣布行动方案。

时近中午，烈日当头。东莞县第一支抗日的人民武装就这样在敌人的炮火声中诞生了。

成立了抗日模范壮丁队，我和颜奇顾不上吃饭，又带着几十人到县政府要枪。

县长已经回来了，刚刚换过衣服，穿得格外的齐整，大概是为了掩饰刚才逃跑的狼狈相吧。我们到来，显然使他局促不安，在我这样一个第一次来访的年青人面前，他摆出一副一县之长的尊严架势，板着脸，眉毛向上翘，乜斜着眼睛“审视”着我，但我分明从他脸上看出了余悸未消的神色。

“这是我们说要成立的抗日模范壮丁队的队长王作尧。”颜奇见县长紧盯着我，赶紧介绍说。

“喔、喔，听说过，听说过。”县长稍稍放松了绷紧的脸，紧接着说道：“不过现在敌人已经登陆，县政府已无收入，无法关饷了。”他怕的是我们向他要钱。

颜奇把我们的来意说出来以后，县长才放下心来，但他仍然推托着说：“喔、喔，枪是要发的，不过，队伍刚刚成立，未经训练，能够打仗吗？再说，我们还得商量一下，如今兵慌马乱，县政府不宜设在城里，我们准备搬到水乡，那里四面环水，敌人不易进犯，你们模范队既是属于社训总队，目前还是帮县政府搬家为是。”

县长的一席话，借着模范队的公开身分是守卫县府的，以退为进，倒打一耙，把我们领枪的路堵死了。性子急的颜奇气得涨红了脸，一时搭不上话来；我也急了，赶忙插话说：“县政府搬到水乡去，是准备长期抗战吧？但是县城尚未沦陷，我们怎能将它轻易地拱手送给敌人呢？当前，全城人民斗志正盛，纷纷自动组织起来要求抗战。如果只是在口头上支持他们抗日，却不发给枪枝，恐怕有负众望，冷了众人之心。”

这时候，颜奇也接上我的话说：“县长，他们都是城里的教师、学生，大敌当前，毫不畏惧，一马当先，要求上前线抗战。尽力支持他们，是我们的职责啊！”

我俩的话说得县长语塞了。但他还是不肯让步。双方处在紧张的僵持之中。

忽然，外面一阵喧闹声打破了厅内沉闷的气氛。一个沙哑的鹅公喉说道：“小不忍则乱大谋，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自有大计，我们下面乱打乱抗，搅乱了全盘计划，那怎么了得。”我听得出来，说话的是早上见过的那个师爷。

“好一个全盘计划！”在厅外等着的队员们大声嘲笑着说：“这个计划是一盘散沙，叫做‘不击自溃，乱作一团’。”“敌机声一响，就各跑各路，管他妈的是香港还是臭港，是城门底还是屎槽底，乱钻一气！”“哈哈……哈哈……”几十人的笑声把屋瓦都震动了。

声音传进来，触动了县长今早逃难的难堪之情。他脸上一红，赶忙找下楼的台阶，转移了话题说：“县政府想先移往篁村，与自卫团张我东一起，但是防军\*要自卫团移守东江河畔

---

\*防军：指153师，师部驻厚街。

石龙峡口到茶山一带，我们无兵无将，与张我东团长联合，也无力分担防守任务，恐怕……”

县长这次倒是说出了实话，他自己手下无兵，只有一个半中队的壮丁常备队和几十个县警，平时舍不得拿钱出来扩充武装，现在要与张我东一起，实质上是寄居张我东篱下，而张我东又是受防军控制的，相形之下，县长的地位更是不值一提。县长有这难言之隐，借刚才的话跟我们说，其实是指望我们能单独包下石龙峡口到茶山一带的守卫任务，假如我们真能打上几枪，在他县长脸上也算有光了，日后对防军和自卫团也就有了讨价还价的本钱。此时，他们的明争暗斗，狗咬狗骨，倒是有利于我们争取枪支。于是，我凑近颜奇，低声向他说：“颜副总队长，我们是否可以把峡口方面的防务接受下来呢？”

颜奇明白了我的意思，眼睛霍地一亮，就对县长说道：“县长，这事你就不必担心啦。只要发了枪，我们常备队和模范队担承把守峡口的任务。”

县长这回倒是爽快多了。连忙叫师爷打开仓库，给我们发了四十支枪，每条枪配了十五发子弹，这些枪虽然残旧，生满了锈，回去用油擦擦还是可以用的。大家十分高兴，背起枪，兴冲冲地回到了新生小学。

队员们分得枪支弹药，个个兴高采烈，马上擦枪的擦枪，练刺杀的练刺杀，一片热火朝天。抗日救亡歌声此起彼伏，震撼着每一个战士的心。

## 二

第二天晚饭前，我们中心县委抓紧时间研究了当前的工

作，决定：县委秘密地址暂设在模范队队部，另外以模范队队部的名义在莞城东莞新闻社设立一个“模范队莞城留守处”，由公开身分是东莞新闻社社长的何鼎华同志出面，实际工作由祁锋和卢克敏两同志负责。老姚利用这个机构暂留县城领导工作。派何与成同志专门做颜奇的工作，与“壮常队”陈昶等开赴峡口。我和老袁则带领模范队开进大岭山区，进出莞太线间，设法争取虎门方面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和我们一道打击敌人。我们派出一部分党员到各乡村通知各个支部，除个别同志坚持在原地工作外，其余有枪的带齐枪支，一律到连平、大沙集中。又通知黄高阳同志带领清溪区的武装人员到铁路西白花洞，与党派到宝安工作的张广业同志联系，以便同宝安县的抗日力量汇合，准备在东宝相连的一带地区开展游击战。

同时，我们对模范队也进行了编组：除派出的人外，还有一百二、三十人，编成三个小队。一、二小队各配二十支步枪，第三小队没发枪，主要是做群众工作。队部配一个特务长（即事务长），由何佳担任；另外还有几个交通员和几个女炊事员。有些同志从家里带来几支短枪，我们编了一个短枪组，担任队部的警卫。

吃过晚饭，何与成带领常备队第一中队连夜出发到峡口去了。

颜奇准备待天亮再领些枪，然后率领常备队第二中队和模范队第一小队去增援峡口。我和老袁带领的队伍也准备天亮才动身。因此，我们决定连夜把刚组织起来的模范队训练一下。

天黑以后，队员们都到齐了，我们把模范队的队员全部集合，不分男女混合编队，十二个人编一个班，以稍懂军事常识的队员为班长。训练科目则从立正、稍息、解散、集合、行

进、跪下卧倒、操枪、射击一直到散开前进、攻击、冲锋、利用地形地物等等。我真恨不得一个晚上就把我们的队员训练成熟练军事技术、勇敢善战的战士。

这一夜，莞城街上出奇地静寂，只有从城外东北方向偶尔传来一两声低沉的炮声。但是，钵孟山上下，又是一番不同的天地：在下弦月幽暗的夜色中，公园的草坪上，树荫下，城墙边，到处是我们模范壮丁队战士矫健的身影。扣枪机声、口令声、“杀！杀！”的刺杀声响成一片，真是群情振奋，斗志昂扬，从天黑后一直练到天亮前。这是我们模范队的第一次战斗训练。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全东莞的人民宣誓：我们决心为民族的自由独立而战斗到底！

### 三

十月十四日黎明，训练了一夜的队员刚刚坐下来歇息。突然，东北角天空上火光冲天，紧接着一阵“轰隆”的爆炸声掀动大地，震耳欲聋。“石龙桥炸掉了！”队员们根据爆炸方向推测出来。想不到国民党的陆军不发一枪，它的工兵倒还能起一点儿这样的作用。

炸桥后，天很快就亮了，石龙方向仍不断传来机枪声、炮声。何与成从峡口那边派人来报告说，敌人已经占领了石龙镇。现在的枪炮声是从石龙北面的石滩方向发出的。颜奇到县府又领到一些枪，按计划增援峡口去了。

我回到新生小学和老姚、老袁等开了县委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如果颜奇、何与成在峡口与敌人发生了战斗，我们就要在虎门战线尽一切努力，打响抗日的枪声。果能这样，我们两

支部队就能互相配合，互相依靠，更好地抗击敌人，把人民抗日的情绪大大地提高起来，把国民党的张惶失措的失败情绪压下去。同时，我们模范队的声誉才能建立，党在东莞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才能迅速提高。

虎门的消息不通，敌人是否已经登陆？一五三师、自卫团及虎门守备团的动态怎样？我们还弄不清楚。形势不容我们再等待了。会议结束后，我立即回公园集合队伍，开进大岭山地区，以便开展对虎门前线的工作。

战斗的决心驱散了战士们一夜练兵的疲劳，队伍很快就拉出了莞城，经犬眠岭向大岭山区前进。

我们没有地图，就靠蔡焯这个参加过一九二七年农民暴动的老同志当向导。他比较熟悉这一带的山路，和我一起走在前头。

队伍在弯曲的小道上行进。走着走着，突然后面“砰”的一声枪响，把大家都惊动了。我停下来大声问：“是谁打枪？”有个同志脸红红地赶忙说：“是我，我的枪走火了。”原来有的同志过度紧张，以为此去就会与敌遭遇，早早就把子弹上膛了。我告诉他们这一路上不会碰到敌人，让大家检查武器，枪里面的子弹都要退出来，没有命令不准装子弹。

队伍继续前进，刚过了山门村，忽然后面离我不远的地方又“砰”的一声枪响，我恼火了，象这样下去，未开始战斗就得有伤员。我大喝一声：“谁？怎么又走火？”原来短枪组一个同志，手里拿着一支左轮枪，走着走着打瞌睡，踢在一块石头上，手指往上一扣，就走火了。面对着这支缺乏军事常识的年轻队伍，就象对着一群孩子，我想：带这个队伍真难！但是，我又想到同志们都是带着抗战的满腔热情走到一块来的，这种



精神难能可贵啊！我又详细地向他们解说了一番，要他们把短枪的子弹都退了。

一个问题刚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出发不到一个钟头，人们愈走愈疲劳，队伍愈拖愈长，一百二、三十人的队伍，拖到三、四华里长。这也难怪，这个队伍的成员，各行各业的都有，特别是平日缺乏锻炼的青年学生，背着沉重的大包袱，开始走得很有劲，边走边唱歌、说笑，但是走起山路来，不出十来里，脚就起了泡，一拐一拐的，累得满头大汗。还有几个四、五十岁的女同志，几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在我们部队出发前，吵着闹着，硬要跟我们一块儿去抗日。他们没有经验，什么东西都想带备，包起一个大背包，又没走过这么长的山路，爬山越岭，加上昨晚通宵达旦地训练，现在怎么能走得快呢？时间不容我们拖延了。我把体弱队员的行李作了适当的调整，由几个身体健壮的同志分担。就这样，互相帮助，互相鼓励，艰苦行军四个多小时，才来到了大雁塘村。

大雁塘村处在水帘山北坡，向西南翻过一个山坳就是横岗，从横岗再往西走是莞太路边上的河田。莞太路沿线这一带驻扎着不少国民党的军队，厚街驻有一个师部和一个团，虎门守备团、虎门要塞司令部驻在怀德，而自卫团的司令部则设在石马村。

队伍疲乏了，我和老袁商量后，决定在大雁塘村休息一个晚上，明天再由老袁带队伍转移到东北角的飞鹅岭下的飞鹅村。同时，派人通知寮步、东坑、大朗、山厦几个支部的党员及武装小组也到飞鹅集中，我们准备在飞鹅一带开展群众工作，为今后与敌人长期斗争打好基础。为了尽快开展对太平镇和虎门要塞一带的工作，决定由我带领二十多人，去发动莞太

沿线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抗日。

这时，县委委员王鲁明从省委的干训班学习回来，率领了一个十多人的工作队到虎门守备团做工作，我在横岗遇到了王鲁明。

鲁明同志向我们介绍了情况：十月五日，敌人从舰上炮轰虎门时，虎门要塞司令部及守备团惊慌失措，以为敌人登陆了，要塞里的炮没打过一发，弹药原封不动地摆着就逃跑了。日本海军陆战队约一个营，到了十一日下午才在虎门登陆。

驻在莞太线的国民党正规军一五三师，不让虎门要塞的人退向莞太线，因此，虎门守军只好暂退到虎门东北面十多公里的怀德去，准备再退。另外，一五三师原有一个团驻在溪头至白沙一带，说是准备增援虎门守军的，他们一见守军跑了，急忙拔脚往后收缩，团部缩到厚街，师部更缩到篁村了。于是，虎门周围这一带纵横三几十里，敌人还未登陆，就成了“真空”地带！土匪乘机而起，大肆抢劫、奸淫，当地人民纷纷向大岭山、莲花山一带奔逃。逃不动的穷人，只有拖儿带女，露宿郊野，真是惨不忍睹！

鲁明又说，他们工作了一个星期，当官的不让他们接触士兵，只让他们去找老百姓筹粮。很显然，这样的军队毫无抗日的诚意。国民党军队闻风即逃的不抵抗行为，激起了我们满腔怒火。

我们让鲁明回飞鹅向县委汇报，由黎协万同志留在怀德继续做虎门守备团的工作；我和李达夫带一部分人，在这横岗客家洞一带开展群众工作，作为支援前线的据点。另外，争取张我东的工作，也由我负责，我准备亲自去会见他。

正当我把工作安排就绪，准备去会见张我东的时候，老袁

派人来报告说，情况有了新的变化，通知我返回飞鹅村去。

回到飞鹅，老袁所说的情况变化是这样的：日军以很快的速度向北推进。从增城来的消息说，日军已占领了增城县城。由于飞机轰炸、扫射，水陆交通都已断绝，交通员罗尧无法找到省委。

老姚也派人来说，敌人已经占领了石龙，石龙与石碣之间经常可以看到日本骑兵往来，而峡口颜奇和何与成那里却毫无消息。

难道峡口这个要地已经失守？难道敌人已经抄到我们背后？联系中断，情况不明，实在令人焦急万分！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我们是否按原计划向虎门方向推进？我感到肩上担子确有千斤重。党把几百个同志交给我们，他们相信党，相信我们，把他们的生命和希望都寄托在我们的指挥上，如果我们的工作稍有偏差，就会造成同志们的流血牺牲，造成革命事业的损失。怎么办呢？我和老袁苦苦思索着。我们多么希望听到省委的指示，多么渴望峡口方向传来我们队伍的抗日枪声！

#### 四

早晨，薄雾迷濛，远处传来了阵阵低沉的迫击炮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迫击炮声？东北角？我耳测了炮声的方位，猛地醒悟过来，这正是我们壮丁常备队把守的峡口方向。敌人没遇到抵抗是不会放迫击炮的。这么说，是我们的壮常队跟敌人干起来啦！我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霍地站起来，奔出祠堂，往东北角上张望。

正当这时，从田野里“飒、飒”地迎面走来了一支二、三十

人的队伍，有男有女，还有几个十多岁的小鬼，他们背着枪，扎着裤脚，显得格外的利索。走在前头的是卢仲夫，跟在后面的是张新、黄达民、叶镜源、张惠文、陈怡等。他们的出现使我喜出望外，我赶紧迎上前，紧握着卢仲夫的手问道：“老卢，怎么有这么多人呀？”

卢仲夫抹了一把汗，说：“接到集结命令后，我回到东坑，叶镜源的武装小组正好在那里，三个支部两个武装小组合起来，一共二十八人，十二条枪。”

这时候，同志们闻声都跑出来了。老朋友们见面，紧紧地握着手，互问情况，新同志见面，也是一见如故，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议论起当前的战局。

卢仲夫把我拉到树荫底下，问道：“我们从东坑出发，就听到了枪声，沉寂一会儿后，又听到了炮声，日本机枪声，夹杂着步枪排头火\*声。看方向，是在石龙附近，不知是什么部队跟敌人干起来了！”

“是我们部队！”我高声回答。许多战士都静下来，关心地听着。“从方向和炮声的距离来判断，正是在石碣峡口方向，在那里只有颜奇和何与成带领的常备队，看来是他们在哪里堵上敌人了！”

“那太好了！”卢仲夫激动地说，“我们赶上去吗？”

“仗是一定要打的，但在哪里打还要看情况才能决定。”我回答说，“现在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马上进行整编，挑选战斗力强的组成一支战斗队，其余的同志编成民运分队，马上投入战斗准备！”接着，我和老袁简单交换了意见，又说：“老卢，

---

\* 排头火：即齐放。

战斗队的小队长就由你担任。”同志们听说要挑选人编成战斗队，个个都把腰板挺直，抬起头，目光炯炯，精神奕奕。卢仲夫同志真够眼力，挑选出来的都是精明壮健的男同志，女同志当中他只挑了三个。

未被挑选的同志，特别是女同志，显然都不高兴了，一个叫小林的女同志，唰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说：“报告队长，我抗议，为什么不把女同志编到战斗队去，这是轻视女同志！”

“我也抗议！”“我同意小林的意见！”许多女同志接二连三地呼应起来，把我和老袁、卢仲夫包围住了。

多好的同志呀！我心里又欢喜又为难。为了战斗的需要，我和老袁不得不费尽唇舌，说服他们留在民运分队，编成宣传小组，分头到各村去宣传、演剧。

时近中午，往峡口探听消息的交通员罗尧回来了，他身背大刀，刀把上的红绸带在他身后飘动着，显得异常耀眼，他边跑边气喘吁吁地喊：“打响了，打响了，壮常队打响了！”

果真是我们的队伍跟日本侵略军干起来了。队员们一听到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纷纷把罗尧围起来，争先恐后地探问战斗的经过。罗尧绘声绘色地讲了首战峡口的情况，大家都听得入了迷。

……

原来，当日军占领了石龙，就派出一支搜索部队渡东江河，何与成和颜奇带着壮常队第一、二中队与模范队第一小队飞速赶到峡口一带。而敌军选择的渡口正是江面较窄的石碣过峡口一段。

峡口是距莞城十四里的一群小山岗，由龙、虎、兔、狮、

龟五个小山组成，靠江的龙山高二十丈，周围三里，俯瞰着沿江一带的冲积小平原。这龙山，是宋朝末年民族英雄熊飞将军“慷慨义旗夜半起”兴兵勤王之地，在这里曾经大败元兵，山顶上有一座榴花塔，山脚下有一间熊飞庙，据说是明朝时东莞人民为纪念熊飞所建。榴花塔高高地屹立，就象古代英雄把宝剑插在东江河畔，那剑柄高高地竖立在龙山之上。

如今，我们革命的队伍在东江河畔榴花塔下，打响了抗日的枪声。

十五日清晨，薄雾刚散，颜奇站在江边一个小山坡上，用望远镜一望，只见对岸停泊着几条空木船，河岸上朦朦胧胧的，挤着一堆穿黄衣服的士兵，敌人开始行动了。颜奇想，队员们从未打过仗，如果战斗开始后，各打各的，火力分散，就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于是，他命令全体战士各就各位，听命令后齐放“排头火”。

队员们听说战斗要开始了，忘记了一夜露宿山头的疲劳，个个精神奕奕，哗啦哗啦地装上子弹，伏在阵地上紧盯着江面。

江面上，五、六十个敌人分乘着几条船，叽哩呱啦地吆喝着，大摇大摆地划过来了。这时候，何与成在棱线\*后面的队伍之间奔走，压低嗓门喊道：“同志们要沉住气，手指别放在扳机上，一定要听口令才射击，注意，一定要听口令！”

敌人划到江心，距河岸只有一百米左右。第三小队的位置在前面河堤阵地，距离敌人最近，其中有个队员眼看敌人逐渐逼近，心一慌，“砰”的一声，子弹便脱膛而出了。中队长陈昶

---

\* 沿着山顶最高的线。

恼火地喊，“嘿！怎么搞的！”颜奇随机应变，赶紧下达了射击命令：“瞄准——放！”“瞄准——放！”一连打出了几次“排头火”。在我们当时没有机枪的情况下，一百几十条枪一齐射击，威力的确不下于几挺机枪。打出五、六次“排头火”后，只见敌船上的敌人象狗吃屎似的扑在船旁，有的卜咚卜咚地滚进江中。

我们的同志都是第一次上阵，有的还是第一次打枪，但是大家都满心高兴，也不去想怕还是不怕。特别是模范队的王雅宜等女战士，觉得卧着打枪不方便，索性坐在棱线后面，肘弯支在膝盖上，瞄得准准的才扣扳机。

敌人遭此一击，似乎不甘失败，在机枪的掩护下，呱呱叫着继续往前冲来。这时候，有的队员也着慌了，顾不得听口令就“砰砰嘭嘭”地乱放枪。

“投弹！”何与成冲上前沿阵地，奋力投出了第一颗手榴弹。

“轰”的一声，手榴弹在敌船旁爆炸了，冲起一股水柱，敌船象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

前沿阵地的战士镇定下来，跟着投出了一阵手榴弹，侵略者的污血流进了滔滔的东江之中。

敌人吃够了苦头，只得退回对岸，用猛烈的炮火向我们轰击。一时烈焰腾空，飞沙走石。颜奇命令全体队员退到山背，只留下两个队员监视敌人的行动。在敌人的炮火声中，何与成指挥队员们高唱起抗日救亡歌曲，气得敌人有气无处泄，炮打得更密了。但是，炮火越密，我们的歌声越嘹亮。

敌军气炸了，又发起了第二次强行渡江，但刚过江心，我们的“排头火”和手榴弹又发挥作用，敌船始终不能靠岸。太阳

偏西了，日本兵在河对岸眼睁睁地瞪着屹立在霞光中的榴花塔，象一群受伤的野兽一样嗷嗷乱叫。

……

“王队长，”罗尧同志向大家汇报了峡口战斗的经过后，对我说：“榴花塔战斗把敌人打退了，我们只伤了两个队员。战斗胜利后，附近乡村的老百姓高兴地说，模范队果然名不虚传，你猜他们叫我们什么？叫‘老模’！”

“打响了！”我听完罗尧的一番描述，心里十分激动，我们这支年轻的抗战队伍，在武器简陋、战斗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凭着一股大无畏的勇气，终于将凶焰正炽的敌人击退了。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东江人民抗日的枪声！我深信，这枪声必将很快就响彻整个东莞。



### 第三章 白沙之战

—

峡口之战打响以后，我们派万明、李友来两位同志到那里去，继续了解情况，每天派人回来报告。把交通员罗尧留下来，帮助卢仲夫加强战斗分队的训练，准备必要时前往增援。

万明、李友来出发后，我和袁鉴文同志研究了当前的情况，一致认为：峡口战斗打响第一枪，主要是为了推动广大人民群众以及有正义感的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应该建立持久战的观念，准备在东莞大岭山周围建立根据地，不要死守峡口和敌人硬拼。为此，我和老袁便分别写信给姚永光和何与成，主张老姚离开莞城，到飞鹅岭来主持全盘工作；要求何与成动员颜奇，除留下一些监视部队在峡口外，把队伍集中到寮步整训，使我们这支队伍成为既能打仗又能做政治工作的游击队。我自己则到虎门前线去做张我东的工作。

黄昏时候，刚吃过晚饭，忽然，前往峡口探听消息的万明、李友来风尘仆仆地赶来了。

“有什么情况吗？”我看见他俩急匆匆的样子，担心地问。

“到前面那小土包上谈吧。”万明神色有点紧张地说。

来到僻静的小土包上，万明说出了我正在担心的事：“峡  
口出事啦。”

“今天中午，”万明说：“我们刚赶到榴花塔下的熊飞庙指  
挥所，就听见河对岸打响了。”

“河对岸？怎么会在河对岸打响呢？”我着急地打断了他的  
话。

“是颜奇指挥的。”

“何与成同意吗？”

“同意的，他俩都过去了。”

听到颜奇和何与成也过江了，我稍稍放心，听万明继续往  
下说。

“昨天下午，敌人过江给打退以后，就不敢再来了。同志  
们议论纷纷，提出要打过江去。他们说，我们虽然打退了敌  
人，可是一条枪也没缴到，一点便宜也没捞着，太吃亏了。大  
家又说，敌军每天来到石碣一带的搜索部队也不过是几十个  
人，我们也过去几十个人，埋伏在对岸的竹林里，待他来到跟  
前，一轮‘排头火’，起码可以打倒十个八个，跟着再冲出去，  
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他们七嘴八舌，把颜奇、何与成都说动了。于是连夜布  
置，让一中队第三小队执行任务，并把模范队王尚谦的一个班  
补充进去，共有四十多人，大家情绪都很高涨。颜奇、何与成  
不放心，也跟着过去，让陈昶中队长在这边都进入阵地准备掩  
护。”

“当时还出了个难题，这些人当中有两个女的，一个是颜  
奇的文书陈福媛，一个是模范队王尚谦班的梁霞冰，颜奇不让  
她们过江。她们却非去不可，说她们都有工作岗位，不能临战

把她们撤下来。颜奇说不过她们，也就让她俩一起去了。

“他们从寒溪水找到两条木船，一晃一晃的就把五十人摇过江。对岸是一条叫刘屋的小村，村边有一片密密的竹林。战士们钻进竹林，以竹头为掩护，卧倒在地上，两个班面向东，一个班面向西。布置好以后，颜奇、何与成带着几个宣传员就到村里去做宣传工作了。

“事情出得真怪，两天来，敌人是从刘屋背后方向来的，今天这背后一点动静也没有，偏偏从东面石碣方向窜来一队骑兵。他们沿着河堤跑来，因为沿堤有竹林遮蔽，到发现时已经很近了。面向东面石龙这个班急得齐声大喊：‘骑兵——骑兵——！’边喊边开枪射击，面向西方那两个班想掉转身来，但是，来不及了，转眼间敌人骑兵已冲到跟前，三十多名敌骑兵，一面策马奔跑一面用冲锋枪扫射，一下子就打倒了我们好几个同志。

“颜奇、何与成听见枪声赶快从村里跑出来，敌骑已经跑远了。

“颜奇检查伤亡情况，发现王尚谦整个班都倒在血泊中，唯有梁霞冰身后恰巧是一堆竹子挡着，没有中弹。王尚谦腹部受重伤，他看见颜奇，用右手艰难地撑起上身说：‘骑兵，快撤退。’陈福媛满眼泪花，弯下身把王尚谦背起来，一直背上了船。这个弱小的姑娘不知哪来这样大的力气，把一个彪形大汉背起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可惜得很，王尚谦伤得太重了，一上船就闭上了眼睛。”

“一共牺牲了多少人？”我问。

“十一人，朱小队长、王尚谦、樊炳坤、谢灵、谭炳焯……”

大部分都是我们模范队的同志，我心里一阵剧痛。

我们的四周已围上了好些同志，他们咬着嘴唇，默默地忍受着内心的悲痛。

我强忍着泪水问：“牺牲同志的遗体运回来了吗？”

“已经往东莞城运，这时恐怕也到了。何与成跟着回去，说明天在东莞公园召开追悼会。”

“追悼会。”我自言自语地说。这时候，我眼前蓦地出现了一个悲壮的局面：莞城中山公园内，气氛肃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臂带黑纱，在烈士遗体前宣誓，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血气方刚的青年，抬起了烈士的棺木，走在莞城的大街上，逐渐形成了抗日示威的大游行……

我想，峡口的战斗，必将激起人们抗战的斗志，但从中也可以看到我们力量的不足。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必须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以我为主，团结各阶层各党派共同抗日的方针，组织起千千万万的民众，才能筑起一道民族解放战争的长城！

想到这里，更增加了我迫切打好虎门前线一仗的决心。我向沉浸于悲痛中的同志们说：“同志们！在抗战的最前线，我们十一位英雄，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们要为牺牲的同志报仇！继承烈士的遗志，发动起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掀起一场浩浩荡荡的人民战争！目前，虎门前线有着数以万计的国防军按兵不动，我们要向士兵们呼吁，向有血性的军人呼吁：是时候了，向侵略者开枪吧！”

## 二

同志们分头开展群众工作，这时候，我决定去说服自卫团

的头子张我东。

张我东的司令部驻扎在石马村的一座祠堂内，远离虎门前线，但是，张我东的家乡却是在离虎门较近的龙眼村。自从虎门失守以后，日军的海军陆战队在虎门附近的乡村抢粮，龙眼村虽未被抢，但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我想，张我东现在虽然驻在石马村，但敌人大举骚扰到他的本土，这个身为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主任的“大人物”，没有点表示是说不过去的。假如他无动于衷，他那块“抗日自卫团”的招牌就会给人抹上牛屎。所以，只要有人肯支持他，他是会打几枪的。他的枪一响，就有可能引起国民党正规军的连锁反应，和我们一起抗日。于是，我通过我们在自卫团领导机关工作的老陈的关系，第二天便去石马村会见张我东。

当我跨进祠堂的大厅时，只见有十几个人正围着张我东争论什么问题。这些人国难不忘发财，都在争肥地盘，闹着要钱要粮。

张我东长得肥头大耳，牛高马大，是个典型的军阀兼官僚。这个人刚愎自用，目中无人。这时他坐在一张“太师椅”上，神气十足，俨然一副一方之主唯我独尊的模样。虽然还有驻地的“国防军”骑在他的头上，可是外来的强龙还是要依靠地头蛇，在这一带说话算数的仍是张我东。

我大步走进去，张我东显然知道我是什么人了，他一动也不动，只用那小眼睛乜斜了我一眼，慢悠悠地说道：“你是县政府的人呀，唔——，你们县政府太不象话了，只顾自家逃命，不积极支持我们自卫团抗日，使我们陷入困境，几乎没饭吃。你赶快回去，想办法筹备军粮军饷交给我们。”说着，鼻孔“唔”了一声，板起了面孔。

我没想到张我东来这一手，刚见面就向我将了一军，我一把火冲上脑门，把原先准备好的几句客套话都压下去了，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主任先生，你弄错了，我不是代表县长来的。我们模范队是一班不甘心当亡国奴的青年自动组织起来的一支队伍，在敌人登陆当天，才向县长请愿领到几十条枪。政府没发粮支持你们抗日，也没有发饷支持我们，我们都是从家中带钱带粮来参加抗日的。”顶了他几句以后，我笑笑说：“至于你张主任，众所周知，家财万贯，当然慷慨大度，国难当头，难道还斤斤计较吗？小弟我今天正是代表附近老百姓，来向张主任请教抗日之计的，望张主任多多指教。”

我这一番带刺的话，使张我东脸红耳赤，但又不好发作，只好顺势来一个转弯。他双手抱拳，也是连笑带刺地说：“佩服！佩服！从来革命都有学生军，孙中山先生东征、北伐靠的就是学生军。老兄热心抗日，将来一定大有可为！党国幸甚！社稷幸甚！常言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兄弟我岂甘落后！不过话说回来，无粮难养兵，要士兵打仗总得吃饱才行啊。目前既无粮又无饷，再过几天要是还不能解决问题，不但不能打仗，恐怕军纪也难以维持，自卫团也得要解散呢。至于说到兄弟家财，集一人之身可谓富足，倘作千万人之军饷，恐怕一日也难以维持。唉——，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张我东不愧老奸巨滑，他猜出我的来意，话中透露出讨价还价的意思。

面对着这个把民族利益作为交易的“奸商”，我真有说不出的厌恶，但为了大局，我只好作出一些让步。我说：“张主任，军纪么，当然要严明，难道还能骚扰老百姓？何况自卫团都是家乡子弟，激怒了人民还能有好日子过吗？至于军粮一事，以

小弟之见，东莞是鱼米之乡，民间历来富足，况且现在又值秋收。目前百姓灾难深重，恨敌极深，盼望军队能够抗敌卫国，贵部在虎门前线抗击日军的枪声一响，百姓一定乐意支援，军粮是不会短缺的。”

“你能包吗？”张我东霍地坐起来，露出贪婪的笑容。

“这本来不关小弟的事，不过，张主任有心抗日，当前缺粮，我能解决！张主任放心好了！”我把“放心”两字加重了语气。“抗日是目前大势所趋，就是军队不打，老百姓也会打的。现在我们正在各乡村组织‘联防护乡队’，莞太线一带民间至少有几千条枪，都拿出来，就是千军万马啦。顺便告诉张主任一个消息，我们社训总队的一个常备中队和模范队一个小队，昨天在峡口榴花塔一带，阻击企图渡河之敌，把敌人打回去了。”

“听说了，听说了。榴花塔那是天险啊，宋朝熊飞将军就在那儿阻击金兵达三个多月。我们东莞人当然会继承这种精神啦。至于小弟所部，当然决不后人。”张我东慷慨激昂，但言下之意，是说假如他守榴花塔，也是能取胜的。

再谈了一阵，我见张我东的态度已表明朗，就起来告辞：“张主任，事情就这样吧，我衷心希望你能带头抗战。至于粮食，我可以送到各部队。现我还得到‘国军’那里商议商议，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虎门那几百个日军，我们是完全对付得了的。”说着，我便告辞了。

回到横岗，各个分队的负责人都在等着我。几个方面的工作也进行得比较顺利。我们的队员深入到农村中发动劳军和借粮，群众的情绪很高，纷纷把自己收藏的粮食捐借出来。他们说，与其让敌人抢去，不如捐给自己的军队吃。在组织上，我

们把各护乡队的队长集中起来，规定了以鸣鼓为号，不论哪一条村发现敌情，就立即擂鼓报讯，鼓声一响，各护乡队马上出动参加战斗。过去各村由于地主用封建宗族观念愚弄，长期械斗，向来有红旗白旗之分，现在为了表示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我们把红旗白旗混合使用，并且划分好各护乡队出动守卫的山头。

一切准备就绪，就在我见过张我东的第二天，北栅龙眼村那边果然打响了。

盘踞虎门的敌人前两次出来抢粮都很顺利，这次便毫不介意，只派了三十多人，把枪扛在肩上，大摇大摆地朝龙眼村进发。虎门到龙眼村之间是一片平原，护乡队的岗哨远远看到敌人，有人领头说打，护乡队员就赶快回村取枪。龙眼村驻有张我东自卫团一个中队，这时也迎上去在田埂上散开，作好了射击准备。村中老人妇幼牵牛挑担，往北面山上转移。

这一带的联防护乡队是我们刚刚组织的，参加战斗的人不很多，只有三、四十人，但是，加上自卫团的一个中队，与这一小队敌人相对来说，也可以说是优势了。因此，当龙眼村的枪声一响，敌人看到四面受敌，占不到便宜，就胡乱地还击了几枪，逃之夭夭了。挨了打的敌人好几天龟缩在虎门没敢出动。

### 三

驻在虎门的日军是海军陆战队，总共只有四、五百人，他们的粮食是由海军供给的，舰上粮食有限，要靠他们自己就地“征发”。开始，他们为了作出个“皇道乐土”的模样来笼络民心，对虎门附近的几条村是不抢的，但在龙眼村抢粮碰壁后，他们不得不在“皇道乐土”前面撕下脸皮了。



大凡外敌入侵，总有一些人卖身投敌，充当汉奸。这时候，也出现了一些中华民族的败类，他们向日军献策说，虎门北面的白沙乡，家家户户金谷满仓，是真正的鱼米之乡，直说得日军垂涎三尺。就在北栅龙眼之战过后不到一个星期，在虎门的一百多个日军，领着强征而来的三十多个民伕，往北向白沙开发了。

白沙座落在一条红砂土的光秃秃的山脉的北面，这山虽然不高，但重重叠叠，连绵不断。它的东北部起于大岭山莲花山，西部伸到珠江边上，南面的两三个小山紧挨着虎门。山上还留有鸦片战争寨墙的残垣，沿着棱线延伸到江边，那是用黄土、沙子、鹅卵石、黄糖加上糯米混合而成的五合土修筑的。一八四〇年，林则徐曾在这里抵御过英兵的军舰。这一山脉的两边，山南山北的村民，深受封建宗族观念的影响，不知从哪个朝代开始，就互相仇视，争土地，争山头，争水源，甚至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是争夺的对象。有时双方的小孩在山上割草打起架来，回去一喊，大人就拿上刀枪拉队而来。他们把这种械斗叫做“出家伙”。一“出家伙”，就常常打死人，地主恶霸乘机煽动，借口筹款买武器，大量搜刮民脂，从中渔利。自从日军入侵后，在我们模范队的发动下，各村才结束了世代冤仇，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参加了联防自卫。几天来，乡亲们都很认真准备，每条村子都派出了望哨，每组三人，日夜轮班，青壮年磨刀擦枪，严阵以待。

日军扛着太阳旗，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坳，正要翻出最后一个山坳时，被我们的了望哨发现了。哨所响起的鼓声一下子便传到了白沙乡，联防队马上纷纷出动，在模范队队员的带领下，赶到了前沿阵地。

日军转出了山坳，离白沙仅五、六百米了。这时，我们一

声号令，更多的大鼓便擂起来，有如旱天雷一样。鼓声把日军震怔了。他们抬头看到前面旌旗招展，山头村边都是人，正在犹豫不决是进是退的时候，联防队的枪就“砰砰嘭嘭”地在他们头上响了起来，日军“哗”的一声散开，拚命进行还击。这时候，忽然从白沙村旁窜出一股浓烟，接着“轰”的一声巨响，把日军吓得赶紧把头伏在地面。这是日军登陆以来第一次听到还击的炮声呢！他们摸不着我们的底细，心慌意乱，爬起来就呱呱乱叫地逃跑了。殊不知，吓跑他们的只是清朝时抗英的前膛炮，用铁丸和锁链作炮弹的。土炮一响，轰走了日本鬼子，一时引为佳话。胜利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似的，飞过一村又一村，飞到了横岗，飞到了飞鹅，飞到了莞城。

白沙这一次战斗，没有国民党的军队参加，原因是原驻守白沙村的一五三师某营奉命“缩短防线”，几天前已经退到白濠村后面去了。我们估计日军不会罢休，必定会来反扑，便趁着胜利的时机，组织了白沙的父老乡亲，带上礼品、粮食前往白濠村去劳军，其实是以白沙人民的名义请他们开回村里去。这个营的营长姓刘，我们曾经派人去做过他的工作。这一次，刘营长了解到虎门之敌不过是四、五百人的海军陆战队时，胆子才大了一点，加上在众目睽睽之下，碍于面子上过不去，于是答应连夜开回白沙。

在白沙，我们与刘营长约定，军队担任正面阵地的防守，以两个步兵连及重机连配备，在白沙前面组成一片交叉火力网，留一个连为预备队，驻在白沙村内；模范队带着联防队移守两翼，把各村的前膛炮、松树炮、抬枪\*等等“重武器”，都搬

---

\*抬枪：鸦片战争时使用的一种武器，是两个人抬着打的一种火药枪。

到左面位置较高的红土山上，加强左翼的火力；模范队派出女同志负责组织各村的妇女送茶送饭，救护伤员。

离上次战斗三天之后，清晨，虎门日军除了几十人留守之外，倾巢而出，并照例强征了百多名民伕在后面跟着。

这一次，敌人学乖了，进入山地以后，就不走大路，把旗子卷起来，一个排一个排并列着，一座山一座山地翻过来，敌人的行动虽然诡谲，逃不过我们机警的哨兵。他们发现了敌情，用旗号一站一站地往下传，只可惜敌人在山上，隐蔽物多，不容易看清他们究竟来了多少。

我和刘营长闻讯跑到白沙村前面的小山上，果然看见敌人步步为营，来势汹汹。我跟刘营长商议道：“刘营长，最好是等敌人下了山，走到前面开阔地中间才打。”

刘营长瞟了我一眼，毫无表情地说：“敌人火力比我们强，训练又好，如果离得太近，一下子冲过来怎么办？”

“那你赶快向团长报告，请求增援吧。”我不但希望这次战斗取得重大的战果，而且希望能够动员更多的“国军”参加。

刘营长依旧是淡漠的表情：“报告是要报告，但是他们不会增援的。”

我沉默不语了，心头只觉得一阵隐痛。这位刘营长，也有民族观念，愿意打击敌人，可是他想的和我们不一样。在关键的时刻，他想的是如何保存实力，好向上交差。我为我们党在东莞还没有一支强大的武装而深感着急。

敌人刚下到半山腰，我们的枪便“砰砰嘭嘭”地打响了。敌人听见枪响，并不卧倒，也不后退，而是一齐猛地冲下山来。山脚下到处是灌木草丛，是高高低低的起伏地，敌人钻进去，我们就找不到射击目标了。

过了一会，敌人从草丛中轰轰地向我们打来了几发炮弹，落到我们阵地前面几十米远的山脚下。敌人打的是轻迫击炮，当时中国军队还没有这种“新式武器”，思想上未有准备，炮一响就慌了，有几个没打过仗的国民党新兵收起枪就要往后跑。我火了，大声喊道：“不要怕，弹着点在前面，还远得很！”

营长看到他的兵后退，有点不好意思，也连忙大声喝道：“谁也不准后退！目标——前面山麓，重机枪捕捉目标射击！”

我们的火力加强了，敌人的气焰就低了一些。趁着这个机会，我跟刘营长打个招呼，便往左面红土山跑去，我叫擂鼓手赶快擂鼓，召集各乡的联防队，准备向敌人发起冲锋。

鼓声隆隆地响起来，传到十多里外的桥头、河田一带。白濠的联防队闻讯首先赶来，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

敌人很顽固，继续向前推进，妄想炮火的掩护下，向我们发起冲击，一下子把我们冲垮。他们冲到离我们约三百米的时候，正好进入了我们的火力网，我们的重机枪、轻机枪发挥了威力，地形开阔，射界良好，密集的火力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日军队长拿着指挥刀，呱呱地叫唤着，发起了几次冲锋，但在我们密集的火力下，不得不缩回山脚下的灌木丛中。

敌人的冲锋失败了，接着炮火也减弱了，看来日军正处在进退维谷的犹豫之中，我想，这正是我们发动进攻的好时机。我马上找到刘营长，说：“打了这半天，敌人没有增援，说明虎门就是这么些敌人，能来的都来了。我们抓紧时机组织反击，一定能获全胜！”

刘营长正用望远镜望着对山，听到我的话，他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回答说：“古语云：‘穷寇勿追’，何况我们地形不利，战士很疲劳，又饿了。我看，还是等吃过午饭再说吧。”

我正要反驳，这时候，后面传来了妇女们的声音：“饭熟了，猪肉煮酸菜，每班一大盘。”原来是妇女们送饭送水到阵地上来了。我想，部队确实是饿了，吃饱了再冲锋也好。

刘营长这个营过去驻在白沙，老百姓看见他们远远就躲开，他们要买米也买不到。如今，老百姓对他们另眼看待，冒着头上嗖嗖的子弹给他们送水送饭，使他们很受感动，都说：吃饱了，要多打几个日本仔。

饭后，我们联防队的战士个个如虎添翼，反攻开始了！所有的鼓都擂响起来。鼓声响处，旌旗招展，涌出了一队队愤怒的天兵天将。“冲啊！”“杀啊”的喊声与隆隆鼓声汇成一片，压倒了枪声、炮声，左右两翼的队伍，就象两股愤怒的山洪，向敌人猛冲下去。

敌人赶忙从灌木丛中钻出来，用两个连的兵力交叉掩护，从大路上匆匆逃窜。

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漫山遍野都飘扬着我们的旗帜。这时候，根本用不着指挥，也无法统一指挥了。旗助鼓威，鼓助人势，就象一百年前鸦片战争中英雄的虎门人民追歼英国侵略军的场面一样。我站在小山顶，俯瞰着这一派壮丽的场面，不禁激动得流下泪来。我恍然领会到毛泽东同志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伟大意义。这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啊！

傍晚，一天的战斗胜利结束了。虽然由于刘营在总攻时按兵不动，影响了我们扩大战果，但我们毕竟把四、五百敌人打败了！

夕阳慢慢地西沉，散发着它绚烂的余辉，白沙一片连绵起伏的红土山上，镶起了一条耀眼的金边，犹如胜利者披上了一条巨大而华丽的绸带。

## 第四章 敌后孤军

### 一

从澳头登陆的日军，取道惠州、博罗、增城，直逼广州。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敌人唾手而得了华南的重要城市——广州。

从广州沦陷开始到十一月下旬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是一段使我难于忘怀的漫长日子。这时，东莞西北面的广州、东面的惠州、西南面的虎门要塞，都已陷入敌手，我们已处于敌军三面包围之中。敌人不会忘记这三角地带里，还有数万中国军队，他们只要稳住阵脚，就会从北、东、西三面围歼我们，肃清广州外围以巩固对广州的侵占。这时省委已经撤离广州，我们得不到上级党委的指示，我们今后如何抗战呢？我们这支队伍名义上是属于国民党县政府的，现在是拖出来还是继续“统一”下去？如果拖出来单独活动，以后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将怎样对待我们？一股股的土匪集团、各大宗族的地主武装将怎样对待我们？我们是在山乡还是在水乡活动为好？还有，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我们用什么办法去解决粮食、武器、弹药、被服等补给问题？一大堆问题出现在面前，使人伤透脑筋。我们虽然打了两次小仗，起到了动员东莞人民起来抗战的作用，但

是，对于今后如何长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我们还心中无数。

我们多么急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啊！

在得不到省委指示的情况下，县委决定，把全体党员、武装队伍都集中到飞鹅，准备重新布置全盘工作和重新编组武装队伍。

我带着横岗的队伍到达了飞鹅，随后不到两天工夫，姚永光带领莞城的党员、各支部武装小组来到了，颜奇、何与成的队伍也陆续来到了。除了铁路以东的桥头、清溪两地的党员因路远没有来到，派到水乡联系的同志未回来以外，东莞的党员、人民武装第一次云集飞鹅。同志们高兴得又唱又跳，特别是峡口和横岗的同志，一见面就互相问起榴花塔和白沙之战的情况。机灵的罗尧跑到一些武装小组中，又作起了“峡口之战”的精彩报告。三百多同志的喧闹声响彻飞鹅，我也和他们一道，陶醉在这幸福的会师之中。

县委的扩大会议，不便让颜奇参加，正好让他到县政府和自卫团去争取再弄些子弹和军饷。

会议开始了，问题一个一个地分开来进行讨论。

三百多人的吃饭问题，大家认为在目前还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是颜奇还可以继续向县政府领社训总队部和壮丁常备队的经费，虽然县政府总是推三推四的，只给一部分，也可以暂时维持；另一方面是我们模范队成立的时候，许多同志都从家里带来现款或金器，献给了部队。此外，我们在峡口和虎门两次战斗中，附近各乡募捐支援的粮食，还剩下五百担谷子存放在连平、飞鹅一带。两个月之内的经费和粮食还能够支持。至于以后怎么办，大家认为，在游击战争中，只要我们充分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粮食供给还是可以解决的。

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部队的组织问题。有的人认为，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时候，应该分散活动，把部队分散到各个有群众基础的乡村，小部队容易隐蔽，以后再从小到大，慢慢发展。但是更多的同志认为，省委在华南抗战之前曾经指示我们要把部队集中，准备到河源桂山去开展游击战争，如果队伍分散了，要迅速集中是不可能的，而且分散成小部队，也很容易让土匪吞并，还是把全部武装集中组成一个总队为好。大家的意见是以颜奇的总队部为基础，编成三个中队（相当于连），这样既可以马上参加打仗，又怕土匪来吞并。为了保存这支武装队伍，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只好“白皮红心”，用县政府属下的名义掩饰掩饰。我们相信，只要坚持抗日，群众是会了解我们，支持我们的。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重新安排地方党的地下工作问题。这比较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见。广州已经沦陷，我们处在敌后，不管我们这支队伍拉走也好，留在东莞坚持游击战争也好，都必须坚持发展党的组织，团结广大农民，领导他们对敌人作斗争，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至于工作布置，由于我们原来就是地下组织，这方面比较有经验，就照原来的组织系统，还是把东莞分为六个区，每个区都派一批党员回去，并派出一些同志，到群众基础较差的山区去开展工作。

讨论中最难办的问题是：日军已经三面包围了我们，我们究竟是自己独立行动，还是继续跟国民党军队一起行动？

不久前，我们在训练班学习过《论持久战》的基本精神，是要求我们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争。就我们目前的情况来说，跟着国民党军队撤退吗？根据一个多月来的经验，我们知道，在日军进攻中跟着他们只有一是被俘，二是被消灭，三是逃跑，肯定是没有前途的。但是，有的同志却认为，我们独立自



主也不见得能够生存，我们人少，武器少，跟敌人打不了大仗，敌人三面夹击，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围绕着这个问题，我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直争得脸红耳赤，久久相持不下。

会议从早上开始，就因为争论这个问题，到上灯的时候还未结束，直到晚上颜奇从县政府和自卫团回来，我们才暂停了这场争论。

颜奇说，敌人从石龙大规模渡过东江，直逼莞城，虎门的敌军也源源不断地增加。现在东莞城内一片混乱，县长也沿铁路向香港方向逃走了。树倒猢猻散，县政府的人都各散东西。军饷是没法领到了，倒是自卫团主任张我东答应在天亮前给我们五千发子弹。颜奇还说，敌人在莞龙线（东莞至石龙）、莞樟线（东莞至樟木头）都已驻扎重兵，到处拉伕，日夜不停地搜集粮食，看来很快就要开始扫荡。

东莞城离飞鹅只有三十华里，眼看着敌人就要开始残暴的扫荡了，而我们的争论还没有结果，还未作出决议。我们真象是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寻找不到方向了。

## 二

十一月二十五日，日军从莞城、石龙、虎门三路向南并进，一场残酷的扫荡开始了。

逃难的人流从北面向飞鹅涌来，又从飞鹅向南涌去。这些人当中，有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职员、军官、士兵，有自卫团，土匪，地主、地主的保镖，也有普通老百姓和一些帮助别人逃难的穷人。大路、小路上，挤满了坐轿的，挑担的，背着孩子的人们，哭声、喊声混成一片。路边，经常可以看到病

倒的、饿坏的人躺在那里，奄奄一息，伸出无力的手向人们求援，而逃难的人谁也顾不了谁，同情者也只能投以怜悯的一瞥，或者放下一、两个炒米饼之类的食物，就又匆匆地赶自己的路了。

人们为什么都向南逃呢？我们找了几个路人问情况，问得的结果并不比我们所知的多，他们也不知敌人从何而来，也不知自己要往何处而去。他们只是听到敌人扫荡的风声，据说只有南面暂时没有敌人，就不约而同地往南走了。

怎么办呢？留在飞鹅和敌人拼吗？以弱敌强，势必导致部队的严重损失。走吗？跟上自卫团走吗？走到哪里去呢？

这时，颜奇来催促说，我们必须追上自卫团，否则他们答应给我们的五千发子弹就要落空了。此时此地，我们都拿不定主意，只好留下一部分做地下工作的党员，就拉上部队立即行动，边走边见机行事。

我们往南走了二十里，天黑前来到一条叫犀牛陂的村庄。在这里，我们赶上了自卫团。听他们说，张我东很快就会到达，准备在这里歇息歇息，集结好部队才走。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如果不马上离开这股向南涌去的人流，是很危险的，最好先找一个地方避开敌人扫荡的锋芒，保存好队伍，然后再计议下一步工作。从地图上看，犀牛陂东面二十多里有屏山、水口两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南靠东山，东面通大朗，是个偏僻险要的地方。老同志蔡焯也说，那地方地形很好，二七年农民暴动时曾在那里集合过，估计敌人不会扫荡到那里去。因此，我们决定离开自卫团往东走，奔赴屏山水口。

我建议马上把部队拉走，可是老姚坚持要等领到自卫团的子弹才走。颜奇也说，估计张我东不会做假，连日来抓来挑子

弹的挑夫一路走一路逃，子弹也就成了张我东的负担，他会乐得分一部分给我们。各人都有各人的道理，最后，只好采取折衷的办法，由我和老袁、卢仲夫带着几个武装小组以及伤病员、女同志一共六十多人，先向屏山、水口进发，老姚和何与成带大部分队员，等领到子弹后再追赶我们。我估计不会出什么问题，因此就与老姚分手先行了。

我和蔡焯走在队伍前面，老袁带几个同志断后。这一夜，是上弦时候，又是阴天，天黑得很，在树林里走真是伸手不见五指，隔四、五尺远只能模模糊糊看见前面队员身边挂着的白色毛巾。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我把大朗的邝耀水同志叫来，他是屏山村人，是个壮健精明的小伙子，我吩咐他走快些，先到村中了解情况再回来接应队伍。

队伍在黑暗中前进，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了。老袁带着几个病号，没有赶上来。

水口村前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我们钻进树林里，坐下来等候老袁他们，也等候进村侦察的小邝。

“啪——吱”“啪——吱”忽然，从犀牛陂方向，传来了一阵“三八”式步枪声，我一怔，马上想起了老姚与颜奇他们。他们究竟离开犀牛陂没有？现在离我们有多远？听到枪声，真令人担心，要是他们还未出发，被日军撵着追，那就糟透了。必须找一个熟悉地形而又善于走夜路的同志去接应他们。

“我去吧！”我刚说出要派人去，一个名叫卢杰的小鬼出现在我们面前。卢杰是东莞中学的学生，个子长得很矮，已经十八岁了，看上去还象个十四、五岁的小孩，他虽然生长在县城，认路却有一套特别的本领，据他自己说，这套本领是小时候练出来的。他小时候很顽皮，经常到附近乡村去捉麻雀，偷

荔枝，偷龙眼。干这种事，必须要记牢每一条路通往什么地方，有大人来时该朝哪个方向跑，怎样绕弯子才走得脱。从那时起他就养成了一种边走路边认路的习惯，只要是走过的路，他都能认，不管有多少岔路，他都能根据周围的树木、地物作出准确的判断。卢杰正因为有这套好本领，加入模范队以来，一直担任我们的交通联络员，并且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看到这样一个精明小伙子，还能挑剔什么呢？我和蔡焯都满意地笑了。卢杰接受任务后，招呼一个叫罗仔的交通员上前来，两个人就象两只小黄猿似的钻出黝黑的树林。

卢杰刚走，小邝急喘喘地回来了，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水口村里已经驻扎着袁虾九的土匪队伍，把房子、禾堂\*都占满了，现在他们正在赌牌九\*，抽大烟，大吃大喝。

“袁虾九？”听到这个名字，我心里直冒火，可是，我却立刻忍住了。

在东莞的土地上，由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到处都流窜着大股小股的土匪。这些土匪和大地主、恶霸勾结在一起，各占地盘，欺压百姓，肆意横行，简直就象“土皇帝”。最大的“土皇帝”就是袁虾九，是号称有千把人的土匪集团的头头。他横行于东莞、增城、博罗、宝安和九龙新界，国民党军队见他也要让三分。袁虾九这个乖戾成性，变幻无常，凶狠残暴的恶魔，提起他的名字，没有一个人不切齿痛恨。没想到，在我们部队转移的节骨眼上，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却遇上了这帮大土匪。

---

\* 禾堂：晒谷场。

\* 牌九：一种赌博的木牌。

我赶忙派人找蔡焯同志。

“有！”蔡焯应声就到。

“你熟悉这一带，现在屏山水口让袁虾九占领了，我们往哪里去好？”我问。

蔡焯想了一想说：“屏山附近有个东山庙，二七年农民暴动时我们就在那小庙里集会。现在我忘记该怎样走了。”

“我知道。”这时，小邝走上前来说，“靠山南边有一条小路，可以不进水口村和屏山村，我们沿着这小路走，袁虾九他们是发现不了的。”

我把转移到东山庙的命令下达以后，就对卢仲夫、蔡焯、罗尧说：“你们留下一个人等老袁，部队住到东山庙去。天亮以后，袁虾九就会发现我们，如果不跟他们打个招呼，怕他们动起手来，我们要吃亏。我想由你们带队去东山庙，我去见一见袁虾九。”

“干嘛要见他？”好胜的罗尧嚷起来，“他敢打，我们也敢打，凭我一把大刀，也能砍他们十个八个贼脑袋。”

卢仲夫却担心地说：“那行吗？土匪无法无天，你跑进虎口去，他手一挥就可叫人把你干掉。”

我说：“要是他们硬要打，我们当然不能让步，但是能够不打还是不打好。为了抗日，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土匪也在内，只要他们能够抗日，我们还是要团结，要争取，逐渐改造他们。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况我们并不是去捉他的‘虎子’，只是借借路而已。”我又接着解释道：“袁虾九的左先锋\*王永春是与我同村同姓的叔辈，绰号叫‘置家

---

\*左先锋：相当于参谋长。

仔’，我先找王永春，相信会马到功成，大家放心吧。”

“噢，真巧！”大家舒了一口气。

为了使同志们放心让我前去见袁虾九，我又说道：“这个蛋家仔，十多岁时因为打架打死了人，就跑到袁虾九处当土匪。二十多年后，当上了袁虾九的左先锋。去年，党组织考虑过我与他同乡同姓的宗族关系，曾经布置我通过他的介绍，去乳源和湖南宜章交界处的八字岭煤矿工作，争取那个矿警队。为了这件事，去年我找过他，与他有了一面之交。这次我去，估计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不过，”蔡焯谨慎地说：“为了防备万一，我看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好。”

“不必了，”我答道：“人多反而会引起怀疑，我和小邝去就行了。我们还是赶快分头行动吧。”

临行，我握着卢仲夫的手说：“如果你们听见枪声，那你们就不要管我，马上拉队到宝安白花洞，与张广业他们汇合，再设法找省委。”

“不！”罗尧激动地说：“我们等你！……”

告别同志们后，我和小邝摸黑往村里走，路上没有碰到过一个哨兵。当时我心里直纳闷，这么多人在村里，村外怎么没一个岗哨？我把这问题告诉小邝，问他的看法。

“各人有各人的打算。”想不到小邝竟回答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看到我把脸转向他，他才笑着补充说：“袁虾九斗胆包天，他肯定是估计日本人不会到这里来，而这时除了日本人，谁又敢动他们一下？就是国民党军队也奈何他不得呢。”

小邝的判断是正确的，既然袁虾九如此满不在乎，我们也不必如临大敌，我把短枪解下来，递给小邝：“你把我的枪收起

来，我们要摆出毫无敌意的样子。到了门口，你不要进去，在外边等我，枪也不要拔出来，别人要是发问，你就说我是左先锋的侄子，从乡下来找他的。”

说着，不知不觉已经走近了村中的祠堂。祠堂前面睡满了袁虾九的“弟兄”，当中只留出—条刚可以行走的通道。我们从通道上走过，他们也不介意，大概认为我们是新入伙的“弟兄”吧。我们—面走—面口里说“借光”、“借光”，避免踢着他们而惹起争执。到了祠堂门口，我向—个手拿驳壳枪的门岗笑笑说：“兄弟，永春叔在吗？麻烦你通报—声。”

“你是什么人？”

“我是他的侄子。”

岗哨忙用手向—指。

顺着岗哨手指的方向，我独自走进了祠堂的后座。后座天井中间摆着—张床板，床板上横躺着两个人。昏暗的油灯下，只见左边的—个很瘦小，蜷缩着腿，在“巴次巴次”地抽着鸦片烟。右边—个身材高大些，正就着烟灯在搓鸦片枣子。我认出了右边的—个正是左先锋，就大声说道：“永春叔！你好。”

王永春抬起头来，露出—双乌溜溜的眼睛，大概他还认不出我。我赶忙又说道：“我是作尧，特意前来拜候！”

王永春“啊”了—声，用手支撑着身子坐起来，然后把我向左边的人介绍说：“九爷，这是我的侄儿王作尧。”

左边瘦小的身子没动—下，只睁开那半死不活的眼皮瞟了我—眼，随即又合上了。接着鼻孔里“唔”的—声窜出两股浓浓的烟柱。

我暗自纳闷，想不到传说中的绿林好汉竟是个干瘦得象猴子—样又黑又矮小的烟鬼。我脑子里关于袁虾九的传闻，—刹

那间打上许多问号，难道这就是百步穿杨的神枪手？难道他能一纵身跃上墙头？

“请坐吧。”王永春指着床前唯一的一张条凳让我坐下，接着就一连串地发问：“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日本人不是在大扫荡吗？”

“永春叔，在这里见到你完全是偶然的，正因为敌人大扫荡，我才会到这里来。听到九爷在这里就知道你在这里了。”说完这话，我看见袁虾九的眼皮又张了一下，但马上又闭上了。

“去年自你从乳源回来以后，就不知道你的去向了，现在在哪里做事呢？你是一个人到这里来吗？”

“不，我们有三百多人，我是先来致意，队伍还在后头呢。”

袁虾九的眼皮又张了张，飞快地瞟了我一眼。

“有枪吗？”王永春显得有些紧张了。

我想：不把牌摊出来，不拿出几张王牌给他们瞧瞧，压压他们的气焰，下面就不好讲话。而且，如果不拿话刺刺那猫躺在床上的袁虾九，他就一直闭着眼睛，到我离开时还撬不开他的嘴巴。于是，我爽快地回答说：“有，不知道永春叔有没有听说过在峡口和白沙跟日本仔打仗的模范队？”

“听说，听说。你就在模范队吗？”

“是的，我是模范队队长。”

这时候，袁虾九才睁开了眼，吃惊地问：“啊，你是在县政府做事啦？”

“不，”我笑着回答：“我是莞城力行小学的教员，敌人来了，莞城的中小学教员和学生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这个队伍。县政府见我们坚决抗日，就给了我们一个番号，叫‘模范



壮丁队’……”

“县政府来了吗？”袁虾九“唰”地坐起来，一双阴森森的眼睛紧盯着我。

看到袁虾九起来答话，我想第一个目的达到了，我微笑着，慢悠悠地说道：“哪能来呢？他们拖男带女都朝香港那边跑了。我们学生军，只图抗日，想打日本仔解解恨，才跑到这里来了。”

“老弟，”袁虾九见我不是官方的人，对他们不存在威胁，才放下心，却又摆出神气十足的样子给我讲起他的生意经来：“你出来捞世界，的确要醒水些。抗日嘛，当然，日本人来了，我们是要抗的，但是不要让人利用。这些事我经历得多了，什么东征啊，北伐呀，都说要收编我，收个屁！什么发饷呀，发子弹呀，都是钓饵，无非是想我去打头阵，我才不上这个当呢！国民党也是骗人的，你千万不要上当。你自己打日本人可以，但千万不要跟国民党靠在一起。老弟，当心啊！”

“侄哥，这是九爷的肺腑之言，你要记住啊。”王永春接着袁虾九的话，半是恭维袁虾九，半是教训我。

我心里揣摸着袁虾九这番话的意思，从他的态度来看，争取他们不打我们的目的是达到了，我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我是初出茅庐的学生，只凭抗日的大道理办事罢了。两位还有什么指教吗？”

袁虾九已经闭上眼睛了。这时候，王永春也表明态度说道：“我们九爷是有胆有识的英雄，肚里能撑船的豪杰，你今后遇到困难尽管来找我们，九爷是不会亏待你的。”

听王永春的口气，有“送客”的意思，我赶忙起身道：“九爷、永春叔，后会有期，今后还望多多关照。告辞了。”说着，

我退出祠堂，和小邝一道沿着原路走出了水口村。

天已透亮，从东山庙派来的一个联络员在水口村前的树林里正等着。他带着我们沿着山边往南走，走进了一片茂密的松林。在松林里，我们只能低着头、弓着腰往前走，因为横七竖八的松枝经常拂面而过，一不小心就会扫着眼睛。

穿过松林，前面出现了一座小山。透过早晨薄薄的迷雾，我们看见了山腰上的东山庙。

刚走近小庙，卢仲夫、蔡焯、罗尧等十几个同志蜂涌而出。显然，我这一去让他们担心了。

“老姚、老袁他们呢？”我顾不上讲述见袁虾九之事就急急发问，因为最令人担心的还是老姚带领的大队伍。

大家沉默不语，一丝笑容从同志们的脸上隐去。从眼色看也就明白了，老姚他们至今还没有踪影。

突然小邝手指着西面山下说：“卢杰回来啦！”

十几双眼睛朝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大家都希望看到卢杰身后跟着的是老姚、颜奇、何与成带领的一支二百多人的长长队伍……

但是，我们失望了。卢杰气喘喘地跑到我眼前，断断续续地报告：“没有找到，我昨晚走到犀牛陂，别说部队，差不多连个人影也没有了。我赶忙向南追，一直追到杨屋村，也没见人，我问老百姓，他们都说所有部队在半天前已经离开了……。我想，怎么也追不上他们了，我又怕追远了回来找不着你们，就回来了。刚才回到犀牛陂，日军的部队已经到了。”

要找到老姚他们，重新集结起兵力，一时是不可能的了，怎么办？为此，我们开了个会，决定派出六个人，分成三个小组，分头到杨屋村、莲花山、大岭山以及白花洞一带去寻找他

们，还派两个人到大朗去侦察敌情。假如找不到他们，我们再计议是否转移到宝安的白花洞去。

第二天早上，有两个小组的同志回来了，他们说，从常平到公明圩的公路已经被日军封锁，大朗也驻扎了日军，根本无法寻找老姚他们。又过一天，另一个小组也回来了，消息同样令人失望。

入冬了，南方却仍然这么热，中午的太阳蒸烤着东山庙前长满荒草的碎砖石道，散发出一阵阵闷热，令人心烦。

### 三

入夜，沉寂的空气象凝固了一般。间中只有哨兵的草鞋踢动碎石的声音。月挂中天，投下了一片冷淡的清光，象一片白纱，轻轻地披盖在沉睡的战士们身上。

几天来没好好地休息，我也很想歇一会了。不知是夜晚的寒意还是明月的清光惹起我的思绪，我躺在稻草铺上，眼睁睁地望着窗外天空上的浮云，心儿也随着浮云慢慢地飘着，飘着：

“老姚和颜奇他们到哪里去呢？还跟着国民党军队往南走吗？为什么不往东来呢？往南走……跟着国民党军队……日军从东、西、北三面压下来……”我猛然醒悟了，睡意全消。看来敌人这次扫荡是采用“网开一面”的毒辣战术，由东到西拉开一个大网，从北面一直向南席卷而下，而独独放开南面通往九龙边界的一条生路，企图把国民党的军队以及我们的部队全赶到海边，然后聚歼。国民党军队正是往九龙方向走的，老姚他们会不会也跟着上当呢？他们会在往南走的时候向东拐个弯，走到白花洞，与在宝安的张广业联系上，避开敌人扫荡的锋芒

吗？

“现在东山庙的六十多个同志中，有十多个是伤病员，壮常队第一中队长陈昶同志在峡口战斗中扭伤了腰，至今未好，又加上发疟疾。有几个女同志在一个多月的战斗生活中，证明是不适宜跟随部队行动的，又该往哪里安置呢？”

“敌人扫荡过后，国民党军队一旦真的被全歼，单剩下我们几十人，该怎样坚持抗日呢？宝安那边情况不明。我们到底往哪里去？……”

“如果能得到省委的指示，那该多好！”

我漫无边际地想着，想着，一堆堆难题苦恼着我。我辗转反侧，弄得身下稻草吱吱作响。

“老王，睡不着吗？”睡在我身旁的老卢轻声问道，显然他也睡不着。

我回答说：“是啊，得不到省委的指示，老姚他们的情况又不明，心里虚得很哪。”

“老王，越是困难越需要冷静，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看，我们就把情况向全体同志摆明，让大家一齐想办法，我看是有希望的，你说好吗？”

“啊，好。”听了这一番话，我很高兴。反正是睡不着了，我便披上件衣服步出东山庙外。

半边残月，已躲进灰蒙蒙的山后去了，蓝黑的天空上繁星闪烁。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可能胜利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静夜里，我忽然想起了前些时读到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很重要的两句话，不禁豁然开朗：“兵民是胜利之本。

对！回到大岭山去！”我心里酝酿了一个方案，先把部队拉回大岭山去，那里是游击活动的好地方，也是我们群众基础最好的地方。只要在群众中生根，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就能生存、发展。

“王同志。”后面传来了一声呼唤，我扭头望去，只见罗尧正披着一件外衣向我走来。

“你一个人跑出来想什么？深更半夜的。”罗尧还未走近来，就用责怪的口吻对我说。

“没什么，没什么。”我笑着回答。

罗尧脸上忽然显出一种异样的神情，他拉着我的手说：“来，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说着，便把我带到东山庙前面的一堵矮墙下，“看到没有？过去农会的标语！”

在这朦胧残月之下，墙上竟然隐约地显出了字迹，依稀可以辨认出上面一条标语是：“打土豪，分田地！”下面一条是“中国共产党万岁！”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剥落了小庙的瓦面、雕梁，却未洗脱这两条土地革命时留下的标语。

我很激动，抚摸着字迹上的黄泥。远远的山村传来了一声鸡鸣，天将晓了。

#### 四

同志们在小庙里学习《论持久战》，认真地讨论着。

我们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决定由县委组织干事祁瑞和同志到白花洞去，与张广业取得联系，并设法打听老姚的消息。由我带东山庙的这些人员回到大岭山地区去，一方面安排伤病员，收容一些来不及跟随部队走的同志。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准备在那里开辟一个游击战争的根据地。

离开东山庙前，我们安排陈昶、刘暖、小邝和一个小同志留下来，一面养病一面在屏山水口建立我们东莞和宝安中间的第一个交通站。

十二月初，我们回到了大岭山区。

在大岭山的大公岭村，我们见到大岭山区的党支部书记张英同志。他是一个矮矮胖胖的粗眉大眼的青年，从小失去父亲，靠母亲替财主家做帮工，半饥不饱地把他拉扯大。他在三八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英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峡口、虎门打击了日军时，大岭山区的群众抗日情绪非常高涨，各个村庄都成立了“兄弟抗日救国会”和“姐妹抗日救国会”，帮助我们做宣传工作，募集粮食和慰劳品。敌人扫荡开始后，国民党顽固派和一些军队曾经集中在这一带，他们抢东西，拉夫挑担，甚至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跟日本鬼子没有两样。日军来了，国民党拼命地逃跑，我们的队伍也离开了大岭山，人心就涣散了，就再也不提抗日了。

我们的同志也纷纷反映这样的情况：附近村子里的老百姓见到我们都不爱搭话了，别说象以前那样又是歌声又是笑声，一个劲地请我们到家中喝茶了，就连偶然在路上碰到，也装做没看见，扭头就走。干完农活就回家关上门煮饭，对我们就象对陌生人似的。

我们原来在这一带募集收藏的粮食，足有五百担谷子，也给以李积仓为首的几个大地主抢走了。

回来之前，我原想这里抗日情绪很高，群众会热情欢迎我们。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真好象给我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困难又出现了，怎么办？县委只有我和卢仲夫在这里，几十双眼睛都在望着我们。

这时候，我眼前又出现了东山庙的两条黄泥标语，它们仿佛在告诉我，贫苦农民是最愿意革命的，只要我们引导他们，使他们相信我们，他们是能够跟我们走到一块来的，暂时的误会一定会消除，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和人民本来就是一家人啊。

我们开展了助民劳动和家庭访问，又开了一个座谈会，特别邀请了村中一些父老和进步群众来参加。会上，同志们发言，从对形势的认识，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到如何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向群众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表白了我们抗战的决心。

我提议开一个向群众宣传的文艺晚会，大家兴高采烈地赞同了，并且踊跃地自报了许多节目。

晚饭后，汽灯点起来了。“枪口对外，齐步向前……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合唱的歌声响起来了，抗战的歌声飞过松树梢，飞进了家家户户。多么亲切，多么熟悉，多么鼓舞人心的战斗歌声啊！儿童们先跑出来了，老大爷、老婆婆扶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出了门口，小伙子们和姑娘们也围上来，跟着我们唱了起来。

观众陆续增多，晚会正式开始了。首先是罗尧的抡大刀表演，他光着膀子，左劈右砍，龙腾虎跃，把大刀抡得真是水泼不进，箭射不入。他精湛的武艺博得了一片喝彩之声。

接着是女同志的独唱与合唱，她们合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由一个女同志向听众讲解。凄婉的歌声震动了人们的心弦，妇女们不时用手指抹去眼角的泪水。

我们演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自编的活报剧《追》，李

达夫、刘青和我参加了两个剧的演出。

我们的文艺晚会告诉了群众：老模回来了，与人民同心同德，决心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

宣传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群众了解到日军扫荡时，我们因为人少才暂时撤退，敌人一过去，我们又回来了，回来将组织更大的力量抗击日本仔。同时他们也明白，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低着头，忍气吞声当亡国奴；另一条是和敌人斗争，把敌人赶出中国去。要和敌人斗，就只有在坚持抗日的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文艺晚会的歌声传遍了附近的村庄，把人民群众心头中的抗日火种重新点燃起来。我们和群众之间的隔阂消除了，我们的工作也顺利地开展起来了。

在敌人疯狂扫荡的日子里，我们这支年轻的抗日游击队，就象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在狂风暴雨的猛烈冲击下遭受了损失，部队从三百多人缩小到几十人。但是，在党的人民战争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这叶小舟，穿过了惊涛骇浪。如今，我们又在大岭山立足下来了。



## 第五章 再接再厉

### 一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祁瑞和从宝安回到大岭山，通知说已经在白花洞附近的章阁找到了张广业，并且说袁鉴文已经到张广业那里，现在找省委联系去了。我安排了一下大岭山的工作，就带着模范队剩下来的四十多位同志，立即出发，踏上往宝安的征途。

宝安县位于珠江出口的沿海地区，是我国的南大门，它东起大亚湾，西至珠江口，北与东莞为邻，东与惠阳接壤，南面毗邻香港。广九铁路贯穿南北，铁路以西，岗峦起伏，阳台山突起于龙华、乌石岩之间，山下，果园连绵不绝，西部边缘是珠江沿岸，这一带水稻田、甘蔗地连成一片，还盛产鲜蚝、鱼、虾、蟹，无愧为鱼米之乡；铁路以东，丘陵坡地，绿水长流，荔枝林、沙梨园比比皆是。山川秀丽，气候宜人，是个美好的地方。

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着辛勤、朴实的人民，他们不屈不挠地反抗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华民族反抗压迫与侵略的史册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宝安的松岗，曾经是明朝黄箫养起义军追歼水师总兵官张安之地。锦田、粉岭、元朗一带，

曾经燃烧过反抗英帝国主义侵略的熊熊烈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宝安人民反压迫、反侵略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在一九二五年支援东征军，罗湖桥头示威和声援省港大罢工的历次斗争中，都表现了无畏的革命精神。

如今，这光荣的传统，又激励着宝安人民前赴后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斗争。

宝安县的党组织，和东莞一样，在大革命失败以后都被破坏了。一九三七年春，上级党组织委派黄木芬同志到宝安进行工作。一九三八年，王启光同志以合法的身份率领一个十多人的工作队来到宝安活动。以后东莞中心县委派张广业、钟达之等率一个工作队，在章阁、白花洞一带开展工作，与王启光、黄木芬、黄高阳等会合，建立了东宝边区区委，由张广业同志任书记。日军进攻广州的时候，驻宝安的国民党张瑞贵部所属的九一三团军心浮动，纪律松散，眼看一触即垮，活动在宝安的共产党员为了团结抗日，经上级同意，积极地做好对九一三团的宣传鼓动工作，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支援他们，争取他们抗击日军。为此，王启光当了该团临时政治部主任，又以黄木芬为首成立了政治大队。不久，九一三团调去河源，我们的政治大队留下来，组织了三、四十人的武装队伍，取得了国民党承认的合法地位，番号是东宝惠边游击大队。

宝安虽然只有二十几个党员，但他们与群众关系密切，实际上掌握了有二百人枪的群众武装。在敌人大扫荡的时候，他们隐蔽在宝安东莞交界的章阁村和白花洞一带，保存了自己。在国民党军队的散兵逃跑时，还拾得一些丢弃的枪支、弹药充实了自己。

章阁村、白花洞都是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这一带

是一列绵亘数十里的山地。山不高，树木也不密，但地形复杂，有许多迂回的山沟，便于隐蔽和活动。

朔风扑去了我们身上的征尘，吹开了我们脸上的笑容，我们汇合到一起啦！同志们的心里都是热呼呼的。我紧握着张广业、黄木芬的手，顿时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是的，两支队伍联合起来，已经有六十多名武装人员，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党员，有两挺机枪和四十多条步枪，只要稍加以军事训练，就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又可以驰骋于东宝地区了。

这时候东宝地区的形势是：铁路线上，由于路基已经破坏，路轨拆除，交通不便，日军只占领沿九龙边界线（沙头角、深圳至南头这条线）及珠江边的宝太线（宝安至太平）、莞太线（东莞至太平）、莞龙线（东莞至石龙）地区。国民党军队已退到惠阳以东和东江以北，整个东宝地区都没有国民党部队，形势对我们很有利。

当天晚上，我和张广业、黄木芬等同志在村头的一间小泥屋中，商议今后的工作。大家认为，我们必须使自己的武装队伍立足在东宝地区，稳定沦陷之后的混乱局面，承担起领导人民起来抗日的任务。我们决定：第一，部队仍用东宝惠边游击大队的名义，由我担任大队长，马上开展活动，积极向人民宣传，使人民知道我们是抗日的游击队，迅速扩大影响。第二，必须设法取得与上级党的联系，只有找到了上级党，我们才能在十分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采取正确的行动。

张广业负责派人去找上级党联系，并到香港向一些开明绅士借粮，筹办部队的供给。

在全体大会上，由我宣布“抗日模范壮丁队”这个番号已经

不适用，模范队与黄木芬的队伍并为一个更加旗帜鲜明的抗日队伍——东宝惠边区抗日游击大队，立即开往龙华、乌石岩一带展开抗日宣传活动。

## 二

“老王，省委派人来了，老张叫你赶快把部队带回去。”正当我们在龙华的工作有了开展的时候，一天，张广业派人来把这令人兴奋的消息告诉我。

从龙华到章阁村有二十多里路，但令人高兴的消息象给我们这支队伍增添了翅膀，我们象飞一样地急奔章阁村。

在村口，张广业、黄木芬、黄高阳、陈坤、王月娥等同志正等着我们。我迎上去，张广业兴冲冲地说：“老王，老王，看谁来啦！”话声刚落，他身边忽然闪出一个矮个子，笑眯着双小眼睛望着我：“怎么？连Q哥都不认识了？”“啊，Q哥。”我恍然大悟，面前站着的就是绰号叫“Q哥”的温焯华同志。我们是在一九三六年认识的，想不到省委这次派来联系的人就是他！我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说：“原来是你！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战争嘛，想不到的事情多着呢！”老温略带诙谐地说。

他的话，勾起我心中的恻痛，我想起了在敌人大扫荡中我们的损失，不禁感慨地说：“是啊，真想不到，战争打响了，谁也料不到会出现什么情况。在这次敌人扫荡中，有许多老同志、老朋友，恐怕很难再见到面了。”我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跟我们一起的老姚和一大班人马，也不知生死存亡，现在，我们只剩下几十位同志，几十条枪。”

“啊，老王，”Q哥紧接着我的话说：“这次你又想不到了，

你找不到的人却让我找到啦！”

“真的，在哪？”我惊喜地问。

“在九龙那边。”

“开玩笑，他们怎么会跑到九龙去呢？”

“真的，人都在，姚永光、何与成同志我都见到了。要不是他们说你们可能在白花洞一带，我还不知到哪里去找你们呢。”老温还象以前一样，说话慢条斯理，拉家常似的。

我心里着急得很，又追问道：“那些枪呢？丢了吗？还是给英军缴了？”

“不要急嘛，我们到屋里慢慢谈吧。同志们的行李还未放，大寒天跑得满头大汗，该让大家进‘客栈’歇一歇啦。”

老温风趣的话，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我回头一看，周围一大堆人，其中还有老百姓，我们站在村边谈起来，确实很不得体。我拍拍自己的脑门，连忙叫卢仲夫去安排部队住地，然后才和温焯华一道，走进村子，来到张广业、黄木芬他们住的房子里。说是房子，其实是一座两层的炮楼\*。攀上一把小木梯，我们上到八尺见方的二楼。楼上没有桌椅，只铺着一层厚厚的稻草，我们席地而坐，背靠着墙，围成一个方阵，又继续刚才的谈话。

老温说，老姚他们随着颜奇往南走，是从上埗一带过河到新界去的。过河之前，将枪分散埋藏起来了。至于同志们，过了河就走散了。老姚、老何他们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汇报了情况，领导同志派老姚、何与成会同颜奇通过一些东莞同乡的关

---

\* 炮楼：在东莞、宝安一带较大的村庄，村头一般都有高高的碉堡，有的高达四、五层，四周墙壁开有枪孔。是地主修筑用以保护家财的。

系，把失散的同志们收容起来，现在已经组织起大部分的人；那些枪，已经找到一半。

这消息令人又难过又高兴，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曾经打响了抗日枪声的队伍，在敌人的大扫荡中，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的同志还在，我们的枪还在，还能重新回到抗日前线来。我想起了还未听Q哥传达省委的指示，便向他问道：“你这钦差大臣还未向我传达省委的指示呢。”

“对了。”Q哥笑咪咪地说，“我还未跟你说呢，省委已经安全转移到韶关。为了今后领导的方便，已经成立了东南特委，统一领导珠江口两岸各县的工作。”

“东南特委！”我听到这新上级的名称，想起今后将在东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心里踏实得多了。我接着问道：“当前特委有什么指示吗？”

“这说来话就长啦。首先得从国际形势谈起。”Q哥回答说，“现在，全面的世界大战为期不远了。在欧洲，虽然还未打起来，但法西斯的轴心已经形成，希特勒的势力一天天扩张，而实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却在一天天退让。各国都在边界陈兵，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中国，武汉和广州是差不多同时失守的，日本侵略军从北到南划了一条线，号称占领了东部半个中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敌人的战线拖得太长了，兵力不足，已经不可能再作大规模的进攻。在敌人的后方将有广阔的地区，是敌人无法占领的。这对我们开展游击战极为有利。你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这个报告吗？”

“你又来了，我们在这山沟里怎么会知道呢？”

看到我们都摇头，Q哥便接下去说道：“毛泽东同志的报告”

说，假若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后，就再也无力向前作战略上的进攻了。虽然敌人当前还是要向西安、宜昌、长沙、衡阳、梧州、南昌、汕头、福州等地进攻，但已是强弩之末了。这样，敌人就不得不转为保守其占领地，不再向前进攻。而当前我们的力量还很弱，也未能反攻，就形成相持的局面，这就是《论持久战》中说的‘相持阶段’。目前正是过渡到相持阶段的‘过渡阶段’。毛泽东同志把它叫做‘新阶段’。”

“新阶段？”我们感到十分新鲜。

“是的，我们当前正处在这个过渡时期，省委号召我们所有共产党员，积极地发展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广阔的敌后战场把日本侵略军这条凶狗拖住，一直拖到它精疲力尽，然后进入反攻阶段，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Q哥的话令人精神为之一振，但我想到广东的局势，便说：“可惜我们广东的力量太薄弱了，要组织一支强大的武装极不容易。而广东的国民党当局，在敌人扫荡时十万大军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我们应该有信心。敌人登陆的时候，在香港负责八路军办事处的廖承志同志已经派了曾生、周伯明、郑天宝等同志回到惠阳、宝安交界地区组织武装，成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在坪山一带搞得很活跃。省委也派了林锵云等同志在顺德、南海组织武装。听廖公\*说，中央应省委的要求，正不断派军事干部来加强华南的武装呢。虽然这些都是星星之火，但我们只要紧密地依靠群众，就可以点燃起华南抗日的燎原大火。”

啊！广东的武装斗争将要全面开展了，日夜盼望的局面将

---

\*廖公，指廖承志同志，抗战初期他在香港负责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

要形成了。我痛快地笑了起来。可是，我又想起我们队伍的挫折，感到辜负了党的期望，辜负了大好的形势，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大概Q哥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不要这样，省委认为东莞的武装斗争还是搞得挺不错的，你们一开始就能够掌握几百人，打响了抗日的枪声，的确很简单。目前虽说受了一些挫折，但只要把老姚那许多人接回来，再发展发展，你们将又是一支坚强有力的抗日队伍。”

Q哥就是这样一个人。

晚饭后，直到万籁俱寂的深夜，我们和Q哥都在一起促膝交谈。我们从国际形势谈到国内形势，从中央精神谈到省委指示，从全省谈到惠东宝边区，从如何组织武装谈到如何筹备部队的一粮一饷。末后，我们还追忆起一九三六年在广州一道搞地下工作的情景，谈到我们过去在一起的同志的近况，真恨不得一夜之间，把肚里所有的话都倒出来。

月亮偏西了，我们才在亲切的絮絮交谈声中朦胧地进入梦乡。

### 三

俗话说，“双喜临门”，有时候事情就这么巧，第二天早上，温焯华同志刚走，不久前出发去找省委的袁鉴文同志就回来了，他从东南特委带来一个更加令人兴奋的消息：叶挺将军回到广东来了，担任“东路守备区游击指挥部”司令，在深圳设立指挥部。目前特委已经派了一些干部去办公，组织了武装队伍担任警卫。这个指挥部不但统一领导曾生同志和我们这边两支队伍，还将把东江一带各方面的武装统统管起来，用于抗日战



争。

我们这一辈人，只要稍为关心时局，谁不知道叶挺将军的大名？他是北伐时铁军的名将，破敌如摧枯拉朽的常胜将军。抗战开始，他担任了新四军的军长。如今，在华南局势紧张的时刻，他回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家乡——东江地区。可以设想，凭他的威望，一定能够带动各方面的抗日力量，他振臂一呼，富有革命传统的东江人民，必然会奋起响应，踊跃相随，组成一支强大的敌后游击大军——一支新的铁军。

老袁又告诉我们，敌人扫荡时撤退到九龙去的人员，已经由姚永光、何与成、李燮邦带领，回到深圳整编，担负警卫指挥部的任务。这支队伍虽然经受了一些损失，但是，蔡国梁同志从香港带领了几十位工人回来参加武装斗争，和他们合在一起，已经有一百多人了。

我们中心县委和边区区委几个同志商量决定，立即派交通员通知各地支部，十天后全部到清溪苦草洞集中进行整训。我们的目的有三：一，将武装人员整编及进行军政训练。二，健全党的组织，布置地方党的工作。三，组织一个宣传队，跟随部队出发，继续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武装。

我们选择苦草洞这个地方整训，是因为它处在东、宝、惠三个县的交界。苦草洞背靠大山，地形隐蔽，它的东北面是白云峰、银瓶嘴和延伸到惠州附近飞鹅岭一带的山脉。整个地区没有国民党军队，只有些小帮土匪在活动，而这些土匪是不敢对我们怎样的。

未到集结的日期，我带了一支小分队从章阁村出发，取道白花洞、乌石岩、龙华，东出观澜，又北转大坪、长山口、上下流洞，然后再从西北折出楼村、梅塘，又东转塘头厦返回苦

草洞。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宣传发动群众，扩大影响，使老百姓知道我们这支抗日游击队仍在坚持斗争。另外，我也想趁此机会，察看一下地形。

从白花洞翻过石坳，往西走十二、三里便是乌石岩。从乌石岩起一路上都是重重叠叠的山地。梅塘到长山口一段，中间有一座大山，叫做宝山，有六、七百米高。山脚下长长的小径，弯弯曲曲，何止九曲十三弯，故取名长山口。宝山是东莞八景之一，“宝山石瓮出芙蓉”，就是指宝山上有一瀑布飞流直下，冲起层层浪花，象一朵出水的大芙蓉花。一路上，我还看到了许多连绵起伏的山岗，曲折迂回的山沟，这些有利于游击战的地形，我都一一记在心里。

十天的行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我们足迹所至，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他们看到我们是有高度纪律性的，买卖公平、不损害群众一针一线的抗日队伍，都亲切地称我们为“同志”，而把国民党军队、散兵游勇一律称之为“呵呵鸡”<sup>\*</sup>，说我们与他们相比，完全两样。老百姓们都把挽救国家危亡、保卫家乡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在大坪乡一带，我们还吸收了几个农民青年参加部队。父老兄弟给他们送行的时候，一点也没有舍不得的样子，都说：“好好学本领，多杀几个日本鬼！”

正当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回到苦草洞的时候，Q哥和王鲁明又从特委来了。这次他们带来的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消息：蒋介石害怕叶挺回到广东，共产党势力会兴旺起来，就歇斯底里地限令叶挺立即回新四军去……为了顾全大局，维持统一战线，叶挺将军只好回去了。临走时，叶挺将军解下他的“白朗

<sup>\*</sup>呵呵鸡：意为发瘟鸡，会吃不会啼。

宁”牌手枪由吴有恒转交曾生同志，表示了他对东江游击战争的关心和期望。

特委通知我们准备在东、增、宝三县坚持游击战争。现在深圳由姚永光、何与成、李燮邦带领的武装队伍，拨给曾生同志领导，在惠阳、宝安交界的坪山、龙岗一带进行活动。今后，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我们两支部队各自独立活动，两队之间保持秘密联系。特委要我抽时间与曾生同志见面，以便今后更好地合作行动。中央要派军事干部来，准备在这两支部队成立一个统一的军事委员会。

这时候，摆在我们面前急待解决的有四个问题：一是人；二是活动地区（即有利地形）；三是枪；四是钱（活动经费、部队供给）。由于我们处在新区，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决。在这个发展武装、壮大力量的过程中，宝安地区的党员和进步群众协助我们发动青年参加部队，搜集民间枪支，筹备钱、粮保障部队供给，做了大量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曾鸿文（曾带）同志。他在宝安、九龙一带有一定的威望。他原来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绿林豪杰”，年轻的时候，由于不满豺狼当道、贫富悬殊，自己拉了人马，走梁山好汉劫富济贫的道路。在新界、九龙一带的豪富们眼中，他是一个神通广大的“响马”，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他则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传说：“曾带武艺高强，十八般武器都能用，短枪尤其使得好，双枪在手，百步穿杨，弹不虚发。他还能飞檐走壁，行进中的火车，他能一跃而上，往来于广九线上畅通无阻。”当抗战开始时，他已经四十开外，头发斑白，满脸皱纹，眼睛也不太好，早就不干“那一行”了，但他还是个精力充沛、聪明强干的人。民族的正

义感，激起了他胸中的豪气，在黄木芬等同志引导下，他毅然加入了我们抗日的行列。我见他在地形熟悉，在这一带地方有号召力，对我们开展游击战争大有作用，所以经常留他在身边一起行动。事实也是这样，通过他，我们认识了当地许多头面人物，熟悉了许多复杂的地形，还动员了不少青年参加部队。

又如周吉同志，他在大革命时期加入过宝安县共青团，我们通过他的关系去做开明士绅张仁寿的工作，经过一番说服，张仁寿把十几条枪交给了我们，还借出了一些钱和几十担谷子，应了我们扩大部队之急。

就这样，在多方面的配合下，我们信心百倍，重整武装。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下旬，我们“各路兵马”云集苦草洞。这时，水乡高埗和江城洲的黎崇勋、李南、李植光等同志，设法打听到部队的消息，赶到苦草洞来集中。我们又派李植光回去将钟达之、陈前、莫浩波、黄嘉以及“莫氏四姐妹”带来了，一共有十六个人。大岭山张英也带来了二十多人枪。苦草洞这个仅有三十来户人家的山沟里，一下子聚集了将近二百人，真是空前的盛况。

这时，杨步尧从增城赶来了，报告我们一个喜讯：阮海天同志在增城用统一战线的方式成立了一支有一百人的武装队伍，有两挺轻机枪，东南特委决定让他们开到宝安来，和我们合在一起战斗。

接着，何与成带着几个干部也从曾生那里赶来了，他是奉特委的命令前来当大队政训员的。敌人大扫荡后，我一直未见过他，此时此地相逢，真是喜上加喜。他告诉我，姚永光调到他家乡南路工作去了。

何与成带来一个新的消息，著名民主人士李章达先生，可

能接替叶挺将军担任东路守备区游击指挥部的司令。李章达先生是东莞人，对我们很关心，送了八百元光洋给我们，表示支持我们抗日。

一九三九年元旦那天，整训开始了。在二百多人中，我们挑选了一百一十人左右成立了一支战斗队，由我任队长，何与成任政训员，卢仲夫任队副。我们虽然称为东宝惠边区抗日游击大队，由于人少，只编了三个小队，小队长是鲁风、罗尧、叶镜源，事务长是王永祥。

经过初步的军事训练以后，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我就把部队带出苦草洞，翻过白云嶂，到东莞、惠阳交界的黎村一带开展工作，此后又到桥头、石排、中坑一带，在石龙周围开展工作。

日军占领石龙将近两个月了，已经成立了维持会，到处收买汉奸。我们根据老百姓的报告，抓到了两个作恶多端的维持会长，立即当众枪毙。我们还夜袭了只有二、三十个日本兵据守的茶山，撤退前，在阵地上散发了不少传单。

这些行动，锻炼了部队，也提高了人民群众抗战的情绪。我们活动到哪里，哪里就有许多青壮年要求参加部队，我们遭受挫折的游击队又重新抖擞精神，象疾风中的劲草，挺立在东江河畔。

张广业同志接替姚永光担任东莞中心县委书记。不久，按照东南特委的决定，为了使部队行动更方便，使地方党保持其秘密性，部队党委与地方党委分开，我退出了县委，专门负责部队的工作。

#### 四

我一直渴望和曾生同志见面。这时候，我和何与成按照特委的指示，去到惠阳坪山。同行的还有陈前和卢杰。

惠阳县主要的区域在东江以南，东西长一百多里，东邻海丰，西接东莞，西南连宝安。正南方是宽长的海岸线，大亚湾上的澳头是一个著名深水港，日军侵占华南就是从这里登陆的。惠州以南四十多里，是一片平坦的平原，坪山、龙岗、淡水，都包括在这平原之内。这平原的四周都是大山，南面的大山有：梧桐山、洲田、马栏头、梅沙尖等高八、九百米的大山。其它三面也都是大山包围着，最高的是东面的田头山。坪山处在这四面大山包围的平原中心，是一个富裕的山乡。在历史上，这个地区曾有过多次的农民起义，出现过不少名垂青史的风流人物。

活跃在坪山、淡水一带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是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时，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同志经过党中央同意后派曾生等回来组织的。这支队伍由当地农民和南洋、香港、广州回乡抗日的海员工人、华侨、学生等组成。刚成立时，只有七、八十人，二十几支枪。那时候，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逃，我们的同志却捡起他们丢掉的枪支，把队伍全部武装起来，抗击日本侵略军。他们解放了淡水，成立了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淡水区人民行政委员会。到年底，部队已经有二百多人，组织了民兵、自卫队四、五千人，活跃在淡水、坪山至大鹏湾一带有二十多万人口的地区。

我们到达坪山，已是中午时分。坪山镇内，到处是标语、

墙报和歌声，一派新鲜热火的革命根据地景象。

热心的农民把我们带到坪山石灰碑曾生的家。曾生同志大步迎出来，热情地说：“作尧同志，我盼望很久了！”

我打量着眼前这位惠宝人民游击队的队长。他中等身材，长得很结实，四方脸，浓眉大眼，眉宇之间，透出一股英武的气概。早就听说他曾经是广州学生运动的领袖、香港中共海员委员会书记，如今看他却是一副革命军人风度，质朴爽朗，就象我们在书刊上看到的延安干部那样。

我说：“曾生同志，我们是一家人，要请你多多帮助。”

“哪里，哪里，你们的模范队搞得不错，刚成立就打了胜仗，我应该向你们学习才是呢！”曾生同志说话粗中带细，满怀豪爽之气。和他见面倾谈，我感到满心欢喜，对今后与他在东江共同战斗充满了信心。

我们喝着茶，正要商量今后的工作。曾生爽朗地笑道：“我先带你们到队部去见见刚从延安来的同志。”

从他家里出来，约莫走了十分钟，来到一条叫竹园的小村，队部就设置在村头一间破旧的炮楼里。走进队部，立即有两位同志迎上来与我们握手，矮个子梁广同志我是认识的，他是省港大罢工时的老同志，现在是东南特委书记。梁广同志向我介绍他身旁带北方口音的同志，说：“他叫梁鸿钧，是广西左右江起义时的老同志，来这里之前是陕甘宁警备区的参谋长。”看到上级党委派来富有斗争经验的老干部，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走进炮楼，我们愉快地交谈着。梁广同志传达了省委最新指示：成立军事委员会和以群众武装的面目去争取国民党的番号。

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共五人：梁广、林平、梁鸿钧、曾生和我。由梁广任书记，梁鸿钧是军事指挥员，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林平是东江特委书记，也参加这个军事委员会。

梁广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省委指示我们采用“白皮红心”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他说：“目前，我们的力量还很小，不能过早暴露党的面目。象当前八路军、新四军那样以党的武装公开争取国民党的番号，对我们来说，目前还不合适。一方面，国民党看见我们力量太小，会看不起我们，未必能接受我们要求合作的主张；另一方面，我们的面目暴露了，国民党害怕我们发展、壮大，就会趁我们弱小之时消灭我们。因此，以抗日青年的自发组织的面目出现，去争取国民党番号，是我们当前开展斗争的正确途径。”

大家一致赞同梁广的意见。还决定了今后曾生与我们两支部队以秘密的方式联系，指定卢杰担任交通联络员。

坪山会见之后，惠阳和东莞的两支抗日武装，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紧密地携起手来，以新的斗争姿态，出现在东江河畔。

遵照这次会见的精神，张广业同志通过第四游击纵队参谋长何家瑞的关系，使我们与纵队司令王若周取得联系。经过谈判，我们在保持部队的独立性的原则下，接受了国民党的番号，称为“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挺进指挥部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曾生同志也与第三游击纵队司令骆风翔谈判，取得番号，称为“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老百姓热爱我们的游击队，都不称我们新接受的国民党番号，叫曾生同志带领的部队为“曾生大队”或“新编大队”，对我们则称“王作尧大队”或者干脆仍旧叫“老模”。



取得了公开的合法地位，我们的活动范围增大了，两支部队东西呼应，就象两条刚劲有力的铁臂，不断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 五

一九三九年初夏，华南的日军基本上停止了战役性的进攻，改为分散兵力，巩固占领区，加强外围防御，组织伪军，建立伪政权。在宝安一带，他们控制着宝太线，在南头、西乡、沙井等地建立据点，扼守交通要道。

部队经过补充和整顿，加上阮海天中队已从增城开来，我们的力量比前些时候强得多了。为了打击日军，提高部队的威信，我们决定深入到宝太沿线活动。

王若周同意了我们的行动，因为他指挥不动袁虾九、刘发如等刚收编的土匪部队，要打日本仔，给他脸上增添点光彩，就只有依靠我们了。

在一个蛙声咯咯的夜晚，我们这支游击队迎着扑面的轻风，悄悄地逼近了宝太线。夏夜的天气晴雨无常，说变就变，刚刚还是皎月当空，一下子便乌云密布，狂风四起，随即便下起了哗啦啦大雨，把我们遍身淋得湿透。但是，同志们反觉得神清气爽。几个月来驻在天堂围，受国民党的管束，不能自由行动，如今走了出来，真有那“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感觉。

在群众的掩护下，我们首先给敌人来个“骚扰战”。夜里，我们摸近日军的据点，一排枪把敌人从梦中打醒。当敌人闻声而动，全部戒严，四面射击，如临大敌之时，我们却悄悄地撤出战斗。如此往返几次，使日军提心吊胆，疲倦不堪，但又不知

道我们在哪里，只好对着茫茫黑夜，无可奈何地呱呱乱叫。这种骚扰战，使日军大伤脑筋。我们就在这骚扰战的掩护下，袭击了宝深线上的大涌桥。

大涌桥，是宝深线上的一座公路木桥，距南头约莫七、八里地，是南头至深圳的要道。前不久，通车了，日军就防范得更加严密，桥梁两端筑了碉堡，日夜派人监护。我们决定要破坏大涌桥，把敌人的交通要道摧毁。没有炸药炸桥，我们决定用火烧。

在一个下弦月的晚上，担任烧桥任务的几个战士带着一桶煤油，在黑暗中爬进了大涌桥下。夜，鸦雀无声，静极了，我们伏在桥侧面的土坡上，紧张地注视着桥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们期待的心也“扑、扑”地猛跳，忽然，黑暗中“喇”地亮起了一点火光，我们的战士开始点火啦！但正在这一瞬间，敌人从碉堡里“嘭嘭”打了两枪，点火的战士身一歪，手一抖，火柴掉下，火没点着。

目标暴露了，桥下的同志十分危险！这时，我们当机立断，马上采取了第二个措施——强攻！土坡上的两挺机关枪愤怒地吼叫起来，密集的子弹飞向碉堡上的枪眼。在一片枪林弹雨中，桥下负了伤的同志，果断地拔了一把草，点着火往桥上一丢！

浇了煤油的木桥墩，熊熊地燃烧起来，火趁风威，风助火势，大涌桥一下子烧得呼呼作响。借着火光，我们的机枪把企图出来救火的日本兵打得缩了回去，我们用全部火力封锁住敌人炮楼的门口和枪眼，敌人无法出来救火。直烧到大涌桥的几根大柱摇摇欲坠了，我们才带着胜利的喜悦迅速地撤出了阵地。

火烧大涌桥之后，我们逐渐逼近南头，大规模地破坏敌人的电话线，不断伏击来往的车辆，使据点里的日军孤立无援，惶惶不可终日。

敌军发怒了，开始了一次扫荡。王若周听说日军要扫荡，害怕得要命，马上下令把我们调回他身边“保驾”。这时候，同志们士气正高，准备在日军出来扫荡时，袭击他们的后方，没想到王若周要我们撤退，大家都很气恼。罗尧抽出大刀，“啪”的一声劈在树干上，嘴巴鼓得象个皮球。没办法，我们的行动受到限制，只好服从命令，退回铁路线上的天堂围。我想，等敌人扫荡后再作计议吧。

日军扫荡到龙华、乌石岩一带，没碰到我们，烧了几间民房，又缩回南头去了。这时已是秋风起的时节，日军抽兵进攻韶关，以解除国民党军队可能对广州的威胁。这一来，东莞宝安这一带日军的兵力就很薄弱。南头之敌，只图固守，不敢妄动。我们又进至南头附近，继续与敌周旋，还对南头进行了经济封锁，限制粮食、猪肉、腊味运进敌占区去，把敌人围在孤城之中。王若周看到我们的斗争开展得顺利，胆子也大了些，亲自布置了一次向宝深线、宝太线日军全面出击的行动。

十一月末，一个晚上，正当我们准备向南头城发起攻击的时候，老百姓跑到大涌来向我们报告说，南头的鬼子闻风而遁，开始从水路撤退了。听到这消息，我们十分兴奋，立即兵分两路：我带卢仲夫的中队直插蛇口，追击逃敌。何与成带阮海天的中队占领南头城。

当我们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追击逃敌至蛇口时，传来了何与成他们已经进驻南头的喜讯，同志们立即欢呼起来，庆贺我们首次解放县城的胜利。

在我们取得了节节胜利的同时，曾生同志的队伍在路东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九月十二日，他们在葵涌、沙鱼涌夜袭敌人，缴获军用物资一批，作战地图一担，子弹、炮弹若干，收复了这两个要地。随后，又在盐田截击进犯沙鱼涌、葵涌的敌人，把敌人堵回去，保护了这个内地与香港联系的咽喉地带。十二月，当日军一个大队袭击了国民党军驻樟木头的的一个团获胜回师时，曾生的一个中队在龙岗鸡心石布置了一场伏击战，打死打伤日军三十余人，击毙战马三匹。

我们打开了东江抗日游击战的新局面，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纷纷报名参加我们的队伍。抗战事迹传到海外，受到华侨同胞的热烈赞扬，他们从各方面支援我们，一九三九年三月，以叶锋同志为团长，组成了东江华侨服务团，后来又相继组织了新加坡、吉隆坡、暹罗等地的有志青年回乡参加我们的队伍。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到一九四〇年初，新编大队发展到五百余人，二大队发展到二百余人。东江南岸，时常可以听到军民同声合唱抗日救亡歌曲：

“河里水，黄又黄，  
东洋鬼子太猖狂，  
昨天烧了黄家寨哟，  
今天又烧张家庄。

……………

大家齐心团结紧哟，  
拿起刀枪保家乡！”

## 第六章 收编前后

### 一

我们是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取得国民党的正式番号的。

我第一次与王若周见面，是在那年的初春。我和黄木芬来到了王若周的驻地——清溪鹿鸣学校。通报了姓名后，王若周就满脸堆笑地从屋里迎出来，连声称道：“大家兄弟，大家兄弟。”边说边把我请到大厅里坐下，又是烟又是茶的。王若周对我这般热情，其中原因之一是我跟他同姓同宗。他是东莞南栅人，南栅与我家乡厚街有着血缘关系，因此他就跟我以兄弟相称了。我觉得这对工作有利，也就说：“岂敢，岂敢，世伯是老军人了，能回来领导我们抗日，不胜荣幸。”

王若周年过五旬，长着一双长长的眉毛，说话斯斯文文的，表面上看来，是个比较温和的人。据说他在北洋军阀部队中当过师长，北洋军阀垮台后，他一直在香港作寓公。抗战爆发后，才“重操旧业”，拿起枪杆，还算是一位较开明的人士。

当王若周把现时当了副司令的张我东和政训室主任苏某（后来我们知道他是一位民主人士）向我作了介绍之后，就谈到收编的番号问题。

王若周不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他看了看张我东，说：“由

张副司令决定吧！”张我东主张我们作为一个中队收编，我坚决地反对了。因为在王若周收编的队伍中，除了我们这支共产党队伍以外，其它如袁虾九、刘发如等都是土匪的队伍，他们两股大的土匪已取得支队和大队的番号，如果我们编制太小，就有被编到土匪队伍里去的危险。因此，我坚持要编成一个大队。“那你们有多少人？够编大队？”张我东咄咄逼人地向我发问。我说，现在我带着一个中队，清溪地区即将可以编成一个中队，而在增城那边，已有一个由阮海天带领的成百人的武装，总计起来可以编为三个中队。此外，还有黄木芬的近百人的政工队，算起来我们够一个大队还有多呢。张我东却坚持武装归武装，政工人员要另行计算。

谈判僵持了许久，这时候我才算领略到张我东的阴险狡猾。开始时他说：“那你们等增城的中队过来再说吧。”这显然是给我出难题，后来他干脆说：“我知道，你们是死鸡撑饭盖——硬撑，其实你们在清溪的中队有个影子没有？你和阮海天那个中队合起来只有一百五、六十人，差点还未够两个中队，怎么能编一个大队呢？”张我东的态度甚为强硬，而我也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王若周显然左右为难了。

经过反复的争执，最后王若周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决定让我们部队到天堂围集中，等候他派人去点名后才决定编成大队还是中队。黄木芬带领的非武装人员另编成政工队，编制属政训室。

我想，在王若周点名以前，只要我们想法凑够两个各一百人的中队，就不怕他们不给一个大队的编制了。于是，我同意了王若周的提议。

在清溪一带，以前曾有三个自卫大队，蔡子培大队、张松

鹤大队，另外一个地主武装，我们指挥不了。这三个大队在日军扫荡时，曾经集结起来，力图保卫家乡，但在扫荡的风暴过后，基本上都散了。蔡子培跟王启光到国民党九一三团政治部工作去了，张松鹤则回清溪“鹿鸣学校”当教员，在地方做工作。剩下的一些武装人员主要由蔡子培大队的副队长赖锦章负责带领，我们跟他谈，希望他整顿部队，跟我们共同抗日，保卫家乡。并且说，如果有困难，我们可以派些干部去帮助他解决。赖锦章答应了，不久，我们就在清溪组织起了几十人的武装。在王若周派人来点名之前，我们再发动了一些青年参加队伍，收集起一些土枪，总算补够了一个中队的实足人数和武器，加上原先由我带领的一个中队，刚好够两个中队。

三月的一个早上，王若周和张我东骑马到天堂围来了。

他们刚下马，我们二百名战士已迅速地排成两个中队的队形，战士们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当张我东挺着大肚皮，开始点名的时候，同志们一边大声应着“到”，一边大跨步上前三步。宏亮的应到声，沉实的脚步声，俨然是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的样子。

王若周乐呵呵的，十分满意。张我东呢，这时候也不得不流露出钦羨的神情。点完了名，照例请王若周讲话，王若周点点头对张我东说：“你讲吧！”张我东就把肚皮挺得更高，摆正了要训话的架式，清清喉咙提高声调说：“弟兄们，你们的精神很好，看来就象一支八路军的队伍。八路军的确是好纪律好政治的，啊——，毛泽东有本事！啊——”他把声音拖得老长老长，句与句之间插了不少“这这、啊啊”的字眼，似乎不这样就无法显示他长官的职务。“我是个行伍出身，不懂政治，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现在不分党派了，全国一起抗日，蒋委员

长是中国抗战的领袖，我们就必须服从蒋委员长。共产党八路军也不例外。毛泽东提出的‘十六字诀’很好。不过，我有一个字不赞成。‘敌进我退’不行！敌进我们也要进，不应该退。今后你们编在第四游击纵队，就得有这种精神，敌进我进，一往无前，英勇杀敌！”他滔滔不绝地说着，眉飞色舞，口沫横飞，肚子也越挺越高。他的话音未落，我们的队伍里就发出了窃窃的笑声。谁都知道，日军扫荡时，他是第一个带着老婆家眷逃窜的。罗尧附在卢仲夫的耳边说：“敌进我进，张我东一进去就进到香港了。”

张我东看到大家吱吱喳喳地交头接耳，大概也猜到大家说他什么了，就愣住不讲，面红耳赤。我见他不好下台，赶忙叫了声立正，向他敬个礼，请示他是否训话完毕，是否把队伍解散，他赶忙点头称是。就这样他好不容易找个台阶下了台。

队伍解散后，我走上前去，跟王若周谈编制的事。王若周至此也承认我们有两个中队，答应供给粮饷，指定我们到天堂围车站驻扎。但编大队的事，他仍然拖着，说整个“四游”的编制还未定，等等再说。

斗争的第一回合算是暂时胜利了，但新的问题又马上出现。

我们在天堂围刚驻下几天，王若周就派人来找我，说有急事，要我马上去司令部商议。司令部在平湖，当我跟来人到达那里时，来人却秘密地把我带到王若周的房间。王若周早已在等候，他屏退左右，说要把一个任务交给我。原来，最近在凤岗小学校里住了一帮土匪，是从增城那边流窜过来的，约有四、五十人，他们向王若周要番号，而且声明要一个大队的番



号。王若周说，这帮土匪名声很臭，头子是作恶多端的陈渠。他的意思是“解决”他们算了。这个“解决”他们的任务就交给我，并嘱咐我要秘密行事，不要走漏风声。

王若周此举令人费踌躇，他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是想试试我们的战斗力呢？还是想借土匪的力量来削弱我们呢？我们知道，这是一股杀人不眨眼的惯匪，他们有两挺机枪，曾经在石滩、石龙一带横行无忌，残害人民。从地形上看，凤岗学校三面环山，地势较低，只有一条大路打校门前通过，这种地形是不宜从山上往下攻的。要是他们固守学校还击，我们不但难以取胜，而且将会有较大的伤亡。

我和何与成、卢仲夫商量，认为王若周的动机不良，但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办这件事是为人民除害，是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我们决定不用硬攻，而用智取，尽可能快速解决战斗，使自己免受损失。为此，我们派出陈前和卢克华随卢仲夫前去拜访陈渠，目的有二：一，详细侦察地形，二，稳住土匪，跟他们说，我们经过这里，本想到这里宿营，现在只好到前面找住地了，特来打个招呼。

当日黄昏，夕阳已经隐到山背后了，炊烟从山坳中飘起来，悠悠然地消散在晚霞中。晚归的农民扛着锄头，挑着担子，陆陆续续地回村去。有人还唱起了客家山歌，歌声在山谷中飘荡，乡村显得格外的闲静。

一、二小队肩着枪，从大路上走来，他们成两路纵队，操着整齐的步伐，唱着歌，前头没有尖兵，俨然一副执勤路过的样子。

“一二一，一二一，”随着口令声，队伍愈来愈走近凤岗学校了。这时，我带着的一个小队，正面埋伏在离学校三百米的

一座小山头上，密切注视着前面的行动，以防万一情况不佳，好马上接应。

“立——定！”队伍走到学校门口，看样子好象要休息一下。这时，带队的卢仲夫突然喊了一声代替战斗命令的口令。五十几个战士就象天兵天将一样，一声呐喊，猛虎一般地冲进学校。这时候，土匪们正准备开饭，这一下真是打个措手不及。土匪头子霍地从凳子上跳起来，正欲拔枪，卢仲夫眼急手快，向他“啪”的一枪，枪声起处，土匪头子应声倒地。黄介的轻机枪跟着扫倒了几个企图反抗的匪徒，几十条乌黑的枪也一起对准了那帮失魂落魄的土匪。与此同时，陈前带着的短枪组迅速占领了校门旁的炮楼，堵截了土匪们要窜上山去顽抗的路，土匪们看到头子已被击毙，去路被断绝，只好都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这一仗速战速决，只打了十几枪就取得了胜利。当我跑到司令部去见王若周时，他还以为我来要求什么呢？我说：“全部解决了，只开了几枪，把陈渠打死了，土匪也死了几个，俘虏和缴获的枪支正候定夺。”王若周又高兴又吃惊地呆住了，半晌，才回答说：“那，那好，把枪交到司令部来吧！”

这一仗，提高了我们的威信。王若周认为我们能打仗，是信得过的队伍。当日军有什么动静，他总是急急忙忙地把我们调回他的身边，保护司令部。我趁着王若周比较信任我们，当阮海天带一个中队从增城过来的时候，我又提出要编大队的事。这一趟，王若周很爽快就答应下来，把我们编为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简称“二大”。

俗话说，“针无两头利”。我们这一仗，取得了王若周的信任，但却使其它收编的土匪对我们存了戒心。

凤岗学校一仗以后，在我们自己队伍里又出现新的问题。赖锦章率领的第二中队基本上都是清溪附近人，家庭观念很重，不习惯老是远离家乡在外地过游动生活，不久之后，就陆续地跑回家去了。王若周知道了这情况，就把陈禄(绰号“大鸡六”)这一股土匪编成一个中队补充给我。他们躲在水乡马嘶一带，一直不敢开出来。我派人与陈禄联系，叫他归还建制整顿一下，并且说，我准备去看看。陈禄一听说我要去，慌忙跑来找我，对我说：“不用您去了，我这就来联系，一切听从大队长的指挥。我们这个队都是当地人，离不开家乡，请大队长恕罪。”队伍还是始终不露面。

## 二

“王司令，给我们补充些子弹吧。”

“王司令，该给我们发粮饷了。”

自从编入王若周部队后，每当我们提出些要求时，他总是支支吾吾地回答说：“好，好，好的，应该，应该的。不过，唉！困难啊，上面一直不发饷不发子弹，我只有卖田了。我的田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啊！”说了一大串以后，总是没有下文。因此有人背地里给他起个绰号叫“好好先生”。

“好好先生”表面上对我们是比较好的，伙食按时发，也发过一些子弹给我们。但是，我心里明白自己的处境如何，尽管王若周的态度温和一些，而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始终是仇恨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王若周的司令部在清溪附近，我就把队伍驻到天堂围附近。他们移驻平湖来了，我们就请求到龙华、乌石岩一带活动，总之，不跟他们在一起。而且，到了晚

上，我都规定部队不在驻地宿营，经常一入夜就把部队拉到山上露宿，第二天早晨才返回来。有时一夜之间我们转移两三次。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锻炼夜行军。

“好好先生”对我们部队的活动不大出面过问，可是张我东却时时都强调要统一行动，我们每次出外活动寻找袭击敌人的机会，都要征得他的同意。他看到我们对她有所戒备，很不高兴，就挖空心思地要把我们控制在手。在我们编了大队以后不久，他就派副职干部来我们部队，名义上是协助我们工作，实际上是要搞特务活动，想弄清我们内部情况，并挑拨我们内部的关系，企图分裂瓦解我们。

怎样对待国民党耍弄的这套手腕呢？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时候，态度过于强硬是不利于统一战线的。于是，我亲自去见王若周，对他说：“我们部队有中队副，而且我们的中队长都懂军事，安插这么多干部来是无用的，因此我们决定把中队副都退回来。”看到王若周面有愠色，我又补充说：“至于大队副王汉光，我们可以接受下来，有他在就够顶用的了。”王汉光是王若周的同村人，据说还有些叔侄之类的亲属关系。我们考虑到全部推却可能不好，要留点面子给王若周，就提出接受王汉光。对我们来说，接受一个大队副比接受一个中队副要好，大队副掌握不了实权，实际上是个空头的职务。况且，他是王若周的亲戚，以后我们有什么事要到司令部，可以推他出面，他去是不会“撞板”的。王若周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是做对了，王汉光来到我们部队以后，并没有给我们添多少麻烦，相反，我们利用他，还让他做了些有利于我们部队的事。

后来又派了两个指导员来，我们使他们无事可做，无从插

手工作。这两个指导员，自讨没趣，借故走了。

春天在“淅沥淅沥”的细雨声中过去了，紧接着迎来的是一个闷热的夏天。

张我东调走了，换来一个叫翟荣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当副司令和东莞县长。这是一个更加反动的家伙。这姓翟的整日板着脸孔对我们，把我们视为眼中钉。

翟荣基到任不久，就召集我们各大队长开了一次会，在会上，他大谈“三民主义”，叫喊“坚决拥护蒋委员长”，拚命强调要服从命令，却只字不提抗日，话中透露出他对共产党的轻视和仇恨。他把司令部里跟我们关系较好的政训室主任苏某换掉，换上了一个中统特务。在第三、第四游击区也都安插上国民党的嫡系人物，随后还要派政工人员、指导员来我们部队，派政工队来做我们部队的“思想工作”。

对于这反革命的一手，我们同样是还以革命的一手。我们避免了与派来的政工人员和指导员接触，但是，我们又有选择地接待了丘琮带领前来慰问的政工队。

据我们了解，丘琮的父亲丘逢甲是一位有民族意识、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清朝武官。李鸿章出卖台湾时，丘逢甲曾与民族英雄刘永福等一起领导过农民起义，抵抗日本侵占台湾。起义失败后，他回到大陆，就把儿子丘琮改字为“念台”，表示了对台湾归还祖国的坚强信念。丘琮本人是国民党少将，但他领导的“广东民众抗日自卫队东区服务队”容纳了不少进步青年，其中一部分是共产党员。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接受了这个政工队，并派蔡子培同志参加这个政工队，跟着丘琮一起到我们部队来。蔡子培在延安“抗大”学习时与丘琮有一面之交，我们派他参加这个队的目的

是争取丘琮。

这个政工队在我们部队住了几天，每天和我们部队一起做群众工作。多数人对我们产生了好感，临别时，我们还特地开了一个联欢会。

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本性是改不了的。丘琮的政工队走后，姓翟的更加处处防备我们，处心积虑地不让我们扩大力量和掌握地方政权，对我们越抓越紧。我们的处境困难，不得不加紧防范。我们差不多得每天变换一个住地，同志们为此愤愤不平，每当遇上大雨倾盆，天黑路滑，他们就一个劲地把“呵呵鸡”骂开了。说实在的，我心里何尝不气？大敌当前，国民党不顾国家安危，不顾民族利益，不把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却处处与我们过不去，这是为什么！

### 三

到了晚稻扬花吐穗的季节，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了。李章达到东江游击指挥部就任的消息早已告吹了。指挥部改成指挥所，指挥所主任是反动透顶的香翰屏。

香翰屏素以诡计多端著称，他很受广东军阀陈济棠赏识，曾任陈济棠的第二军军长。这位“师爷”表面上温文尔雅，舞文弄墨，到处吟诗作对，题字留名，一派斯文的样子，实质心怀叵测，口蜜腹剑。他的队伍平日最善于走私赚钱，腐化不堪，在日本军队面前象兔子一样，畏敌如虎，但对人民的抗日武装，却凶神恶煞，视如眼中钉。

香翰屏上任不久，立即把国民党独立二十旅从粤北调来，以增强东江地区的反动力量。六、七月间，他在惠州找曾生谈

话，卑鄙地恐吓道：“你们到底是走共产党的路线，还是走我的路线？”曾生回答说：“我们都是爱国的人，走的是真正抗日的路线！”香翰屏对部下大发雷霆说：“惠阳的共产党满天飞了，五十条麻绳也捆不尽。”

随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高潮，香翰屏也加紧对我们的迫害。现在，他前脚踏出了惠州，后脚就跨到东莞，派人来通知我，要我到惠阳与东莞交界的约场去见他。

这狡诈的豺狼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呢？我该不该去见他呢？不去会作违反命令论，去又十分冒险。这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八路军不断制造摩擦，一个反共的高潮逐渐在形成。六月间，湖南发生了平江惨案，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秘密派兵包围了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地区的后方办事处，惨杀了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位同志。北方吹来的冷风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我派人去征求梁鸿钧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他派人回来说：这时候不去不利于统一战线，主张我还是去，但必须提高警惕，讲究策略，注意安全。

我们出发了。

我把部队从龙华拉到清溪，陈兵于接近约场的地方，加强戒备。派卢仲夫带一个小队，潜入约场西面的一个小树林中隐蔽起来，以防不测。我和何与成带着陈前和卢克华，挂起“四游”的臂章，慢步踱进香翰屏的临时司令部驻地。到了门口，我把陈前和卢克华留下，然后跟哨兵打个招呼就和何与成进去了。

这是一间三进的大祠堂，有左右两厢，第一进和第二进中间有个屏风隔着。当我们踏进门正想寻找香翰屏的时候，左厢内走出一个汉子，这是王若周司令部新到任的政训室主任关

巩，我跟他见过面，知道他是军统人物。我对他应酬了两句，把他介绍给何与成。他乐呵呵地对何与成说：“久仰久仰！我们是同行，我正想找你研究研究政治工作呢。”说罢，又哈哈地笑了起来。

笑声刚落，香翰屏从屏风后走了出来。满脸堆笑，一边叫侍卫沏茶送烟，一边就夸奖起我们：“两位劳苦功高，带领的弟兄们纪律好，作战能力强，你们年青有为，真是前途无限啊！”接着，就与我们谈起榴花塔几场战斗，对我们卖弄辞令地夸奖了一番。

香翰屏中等个子，穿着一件长衫，瘦骨嶙峋，马脸，四肢很长。他未言先笑，说话时斯斯文文的，乍接触会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很难想象这就是个著名的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听着香翰屏的夸奖，我和何与成不言不笑，听得不耐烦时就把眼光移向关巩，单等香翰屏这开场白过后，看他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

香翰屏皮笑肉不笑，一时把眼镜带上，一会又拿下来两手弄着眼镜把子，他这些开场白分明是另有意图的，很快就要言归正传的了。

果然，香翰屏把话头一转，就跟我们谈起政治来了，说什么“一个政府”啦，“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啦，“国民党是唯一的救国政党”等等。跟着就问我们加入了国民党没有？何与成机灵，他接过话头不慌不忙地答道：“蒋委员长说过：一旦抗战开始，就万众一心，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党派，同心同德，抗战到底。我们是按蒋委员长这个号召起来抗日的。至于参加什么党派，待抗战胜利以后再说吧。”何与成的话刚停，我又接着说：“我们都是这样想的，现在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争取胜



利，分什么党派呢！只要精诚团结，齐心抗战就是。”我俩一席话，说得香翰屏哑口无言，又不能发作，因为他一向是要摆他的书生气派的。

该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我们提出告辞，香翰屏却坚持要我们留下吃饭。他说：“两位难得来一次，在这里吃餐便饭，多叙谈叙谈。”

午饭是一席丰盛的小酒席，据说香翰屏最喜欢吃鸭，桌面上油光闪闪的菜肴都是“白切鸭”、“酸梅鸭”、“油炆鸭”、“陈皮鸭”等等。也不知道香翰屏从哪里找来了两三个女学生来陪我们吃饭，频频地向我们敬酒。此时此景，真使人想起楚汉相争时的鸿门宴。

我向何与成送去一个眼色，意思是说，不知香翰屏还要使什么鬼，我们要尽快离开“鸿门宴”。何与成心领神会，跟我同一口径，都推说不会喝酒，大口地扒完了几碗饭，就说要回去。香翰屏不死心，又叫那几个女学生陪我们打麻将，那些女学生配合得也够默契的了，我们还未来得及说个“不”字，她们就把麻将牌倒在桌面上，“哗啦哗啦”地拨弄起来。我们说不会打，那些女学生就柔声柔气地说道：“不会，我们教你嘛。”正在为难之时，幸好陈前走到门外喊了声“报告”，说是回去路还远，要走上几个小时，催促我们动身起程。我和何与成连忙趁机向女学生说声：“失陪了。”一边向香翰屏敬个礼，赶忙退出重围。

走出香翰屏的大门，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究竟香翰屏后头还有什么戏未唱？我们都不知道。迎面吹来了一阵风，凉飕飕的，何与成打了一个寒颤说：“啊，秋凉了。”真的，如果不是在香翰屏那里急出的一身冷汗作怪，那就是一九三九年的秋风

刮得太早了。

卢仲夫他们从树丛里钻出来迎接我们，大家都为我们的安全捏了一把汗。同志们说，豺狼始终是豺狼，它是不会改变吃人的本性的。是的，不管香翰屏用硬的手段对付曾生他们，或是用软的手段来对付我们，他最终的目的，都是想腐蚀、瓦解以至消灭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伍。

一九三九年冬天，日本侵略军为了引诱国民党投降，放松了军事压迫。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在日本人暂时停止对他们进攻的时候，马上掉转枪口，向我们共产党的部队猛扑过来。

一股侵人肌骨的寒流从北方一个劲地向南袭来。

一九四〇年元旦刚过，翟荣基发出命令要我们到惠州集中整训，美其名曰：“为了提高战斗力”。在这之前，就整训的问题，曾生曾到惠州与香翰屏谈判，提出不能去整训的三个理由：一、日军有进攻的动向，部队不能离开前线。二、当地群众怕日军骚扰，强烈要求部队不要离开。三、如要整训，可派人来就地进行。那次，曾生的部队没有去，这一次，香翰屏气急败坏，要以“军令如山”的理由，强迫我们部队就范。

听到整训，收编的土匪部队悄悄地溜掉了。刘发如把第三大队拉回他的老地盘道滘，躲进了水乡；袁虾九则是以进为退，从千把人的队伍中挑了几十个不三不四的没有战斗力的人前去集训，而他自己也就高居深山，以观动静。

当时，我们还不希望与香翰屏闹翻，想尽量拖长合作的局面。就派周伯明同志到惠州与香翰屏再作“谈判”。周伯明到达后，发现集训的地点是在惠州西湖中心的一个小岛上，岛上只有一间残墙破壁的小庙，空空荡荡，四周湖水茫茫，只有一条

狭长的小道通到岸边，要是用一挺机枪封住小道，要离开小岛就只有跳进西湖了。从这个整训地点的选择来看，国民党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

正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党秘密派到香翰屏的指挥所担任作战科长的李一之同志派人来了，带来了紧急的通知：香翰屏准备以集训为名，一举围歼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两支部队。

曾生同志以答应一次去小部分人员轮流集训的条件，继续派人与香翰屏周旋。趁着来回谈判扯皮的机会，我把部队带到南头周围，远远地离开司令部，利用国民党部队不敢接近日军据点这个弱点，使自己处于较为安全的地带。

香翰屏三令五申，见我们不肯答应前去集训，就使出新的一招：停止给我们发饷。

一九四〇年元旦前一天，我们已有两个月没领到伙食费了，我派那个大队副王汉光去司令部找王若周，问他为什么不发饷，同时，也想知道他在此时对我们是怎样的态度。

天黑了，王汉光空手而回，我问他，王若周对我们目前的处境有什么看法。王汉光支支吾吾地搪塞着，问得紧了，他才吐出真情：“王司令不管事了，他有病，明天就去香港养病了。”

这消息来得突然。王若周在国民党当中，还算是较开明的，他一走，由谁来接替呢？是东江保安副司令翟荣基吗？为了把情况弄得更清楚些，我决定在王若周走之前去见见他。

连夜到南头借了两部自行车，第二天天刚亮，我和卢克华两人骑车奔往深圳。王若周从平湖到香港，必沿铁路走来，我们到了深圳，就在铁路旁的一间小学等他。

下午两点多钟，王若周坐着轿子来了，我赶忙上前把他拦住，请他到学校里休息、喝茶，然后说：“司令的身体怎样？”

听汉光说你要到香港治病，所以特地赶来看望您。”

“唉，是呀，百病缠身，这里无医无药，只能到香港去治了。”王若周若有所思地回答，他的神情，使我想到他说的病是心病而不是其它。我试探着问：“司令还回来吗？盼望您早日治好病，回来继续带领我们抗日。”

“回，回来，……不过，这里有翟副司令，啊，现在他是代司令了。唉，回不回来都一样了，翟司令也很有魄力。”王若周的回答，隐隐透露出他心中的不愉快。

想不到真的让翟荣基代司令了，我不禁愤愤然地说：“啊，他代司令了，怪不得我们连伙食费也领不到了。”

“……”王若周望着我，欲言又止。

我想从王若周口中知道更多点东西，就进一步说：“司令，你走了，我们饭也吃不上，饿着肚子抗日，叫我怎么办？”

王若周沉思着，有点动感情了，他对我说：“你加入国民党吧，你加入国民党就好办了，我也好替你说话。”

我想不到王若周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不禁怔了一怔。他见我没回答，又继续说道：“世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呀，你出来‘捞’了这么久，也该懂得点处世之道。俗语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不能逆时务而行呀。你带的部队政治好，但正因为这样，别人就越怀疑你，你的处境就越来越险恶了。”

“人民拥护我们，我们怎么会孤立呢？”我有意激他再透露点东西，说，“国民党就应该政治不好吗？要是这样，我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呢？其实，我在军校时就参加过，为什么现在我又非参加不可呢！现在不是不分党派团结抗日吗？”

“你以前参加的国民党，叫新国民党，是反蒋的，蒋介石不承认。你要是再这样固执，我就没话说了，到时候你就后悔

莫及了。”王若周见我劝说无效，有点火了。

一切都明白了，王若周的意思是暗示说，如果我再不听他的话，那新上任的翟荣基就不会象他那样手软，也就是说，国民党反动派已悄悄地拔出刺刀了。

这时，王若周的副官已办好过界的手续。我见此行的目的已达到，就与王若周道别说：“世伯，承蒙您关心，不胜感激。此事以后谈吧，祝您早日恢复健康，他日回来继续领导我们抗日。”说罢，我和卢克华便骑上自行车，飞快地返回南头。

#### 四

形势越来越紧张了。三月一日，梁广同志派人通知我和何与成立即到坪山商议军情。

傍晚，我和何与成赶到了坪山竹园村。

在竹园村的一间小屋里，梁广、梁鸿钧、曾生同志都在那里。他们的眼睛布满了红丝。显然，为了部队的安危，他们连日来费尽心力了。

形势危急逼人！香翰屏从粤北调来了一八六师，还纠集了保安第六团、东江地区的保八团、梁桂平支队、罗坤支队和潮汕的李坤支队，以十倍于我的兵力，正准备从北面和东面向坪山和乌石岩压过来。西面是珠江河，南面是九龙边界，没有退路，我们面临着敌人重兵包围的威胁。

部队开往何方？我们在紧急的军事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有人提议往东莞大岭山区去，但是大岭山区太窄，两支部队集中到那里就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如果国民党大兵四面一

压，到头来损失就太大了。

有的同志又提出到东莞水乡，理由是交通不便，国民党大部队不容易进去。但是，这对于我们部队活动和发展也是不利的条件。加上水乡是刘发如的大本营，土匪特别多，我们将难以立足。

再一个方案是往海陆丰去，重新开辟根据地。这个方案，过去曾经研究过，但没有肯定下来。

不同的方案，各有其利弊。大敌当前，我们都有一点焦躁，不够冷静，争论也就越来越激烈了。

一声声鸡鸣迎来了第二天的晨曦。白天过去了，夜幕又降临，时间就在紧张的争论中飞快地流逝。

直到第三天，我们才基本上统一了意见。

我们估计当时的形势，认为国民党变本加厉地搞摩擦，统一战线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了。发展下去，必然是第三次国内战争，全面打起内战，到那时，就没有什么前线后方之分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转移往海陆丰较为有利。因为海陆丰是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地方，广州公社暴动后是往海陆丰撤退的，南昌起义也是向那里撤退的。那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彭桂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就一直坚持到一九三四年。海陆丰地形也好，靠海，有高山密林，便于开展游击战争。

东南特委在不久之前，已经派出了一些党员到海陆丰高潭一带开展工作了。

重要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曾生那边抽出姚华等两位同志给我们当向导。

何与成先回乌石岩，在附近的罗祖村秘密地召集部队里的

党员，开一个党内的紧急动员会，然后派一个班到龙华接我。我则先到龙华，在那里把藏在山洞里的一挺重机枪和一些步枪取出来试枪，拣出好的带走。三月八日，当我在龙华正准备就绪的时候，黄布带领着黄锡良的一个班的同志接我来了，我就把这个班编为重机枪班，然后和他们一道扛起枪支、弹药赶回乌石岩。

何与成找到东莞县委，谈了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和部队准备行动的问题，叫县委通知一些比较暴露的同志撤退和隐蔽起来。我们还派人通知已编给王若周政工队的黄木芬和东江华侨服务团东宝队的王启光他们，要他们提高警惕，见机行事，该撤退的时候就立即撤退。

## 第七章 东移受挫

我们行动之前，国民党军队已在周围增添了兵力，形成对我们的包围。保安第八团调到了梅塘，袁虾九部进驻观澜，其中一部分已进驻乌石岩圩，距离我们部队驻地罗祖村只有两里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开始东移，挨着观澜的边缘穿过封锁线。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路线，是估计驻观澜的袁虾九部不会主动出击我们。在国民党逼迫之下，他可能会敷衍一下，但不会死心塌地为国民党效劳。他们也曾被香翰屏压着要到惠州“整训”，消灭了我们，对袁虾九没有什么好处，他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不会不懂得这其中的利害。

三月九日晚，我们开始行动了。我先派人将大队副王汉光看住，这时候，不能叫他走，怕他泄露我们的行动，只好带着他一起行动了。

队伍集合了，我作了一个动员讲话，对同志们说，国民党已经作好准备要消灭我们，我们不得不离开他们而独立活动。为了安全起见，我不宣布要去什么地方，并且要求每个同志经过村庄，那怕是自己的家乡，都不要说出我们行动的目的和方向。



月黑风高，我们一百八十多个游击队员，全副武装，踏着黝黑的树影，悄悄地离开了乌石岩，踏上了向东突围的征途。

大约五更时分，我们绕过了龙华圩，经过石坳到大坪村隐蔽了一天，清理行装，寄存书籍和文件。第二天晚上，当村子关门闭户的时候，我们才又扎上裤脚，摸黑继续前进，经磨泥圩、新圩，穿过惠淡公路，天亮时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黄巢山。黄巢山，相传是唐朝时广东响应黄巢起义军的集结地，曾在这里组织过兵力向广州进攻。我们就在山后只有几户人家的野猪坑上休息，然后派叶昌、何通到沙坑一带去找曾生的部队联系。

天渐渐地阴下来，下起了毛毛细雨，真倒霉，华南地区阴雨连绵的季节又开始了。

下午，叶昌和何通带着满头雨粉跑回来报告说：周田、沙坑一带，驻了很多穿黄衣服的国民党兵，老百姓说，国民党军队昨天就到了，说是来打曾生游击队的。

一个交通员回来了，带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又一个交通员回来了，同样毫无音讯。第三天了，所有派出的同志都已经回来，都说没有找到曾生的部队。

这时，我们偶然碰到一个过路的老百姓，他对我们说：“曾生那支部队，已经从坪山往东走了，国民党部队在后面追赶着他们，说是追击叛军呢。”

看来，曾生他们已经东移了。刻不容缓，我们也应该马上向东挺进。

经过了双田、大小牛，前面横着的淡水河，叫人费踌躇。过河必须要找到桥或船，向老百姓借船也不容易，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不了解，我们穿着便衣，老百姓会误认为是土匪，就

不会把藏起来的船借给我们。搞不好，还会惹起麻烦来。第四天，叶昌在永湖找到了一座浮桥，我们便决定冒险把“四游”的臂章戴起来，作为正式部队白天开到河边，从浮桥过了河。

但是这么一来，我们的身份就暴露了。戴着第四游击区的臂章进入了第三游击区。国民党很快就知道是我们了。他们马上四处通电话，刹那间，惠阳县内，到处都接到了截击“王作尧叛军”的通知，所有交通要道都封锁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改变路线往南折，绕过白芒花圩，然后沿海边的大山再向东往海丰去。

我们一天没有吃饭，但还是要加快行军速度，半行半跑地前进。天黑时，好不容易到达了距离白芒花南面七八里的一条村子。因为累，也因为过河耽误了时间，这一天只行了大约一百里。

从乌石岩出来，连续走了好几天，同志们又累又饿，急需歇息歇息，吃上一顿饱饭。但是，附近的老百姓不明真相，怕遭兵燹，大都锁上门，扶老携幼逃离村庄。村里剩下的老百姓，有的是逃不动的，有的是一贫如洗，再没有什么东西怕被人抢去的。我们的同志在村子里转了一圈，一粒米也没买到。后来只好逐家逐户地向贫苦的农民解释，说明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才总算买得一箩谷子。

把谷壳磨掉，却又到处找不到筛子、碓子，没办法，只好用风柜风了一下，就着一半谷壳一半米粒煮好了“沙谷饭”。这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没有菜下饭，沙谷米又扎痛咽喉，实在难以下咽，可是，我们饥寒交迫，也就顾不了这些，都狼吞虎咽地咀嚼起来。

“砰，砰！”“吱，吱——”突然，一阵枪响，一排排子弹从

我们头顶上飞掠而过。我赶紧抬头一看，不好！村外四周的小山头，都给敌人占领了。他们居高临下，正向我们喷射着可恨的火舌。

这只能怪我少了一个心眼，在休息做饭的时候，我只派了警戒，却没有派人去占领四周的小山。山虽然离村子远，敌人在黑夜里打不准，但乱枪流弹也很容易伤人。必须马上撤出村子！我命令大家不要慌乱，迅速把火扑灭，每人装上一口盅“沙谷饭”，然后向村外突围。

趁着浓浓的夜色，我带着部队迂回地穿过了白云圩的一条公路，甩脱了敌人，走上了崎岖不平的山路。黎明前，到了惠阳与海丰交界的一座高山下。

白天，我们隐蔽在山谷里，派人到附近的小村庄买几十斤米做了一顿饭吃。挨晚，冒着那烦人的细雨，跟着向导姚华同志，又继续朝东进发。

下一个目的地是海丰境内的大安洞。从这里到大安洞，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下山到海边，经平政、鹅埠圩附近；另一条是直接翻过禾镰石那座山。我们选择了后一条路，因为平政、鹅埠是两条大乡，说不定会有国民党部队和地主武装。

禾镰石山不高，但很陡，加上遍山都是碎石头，很不好走，一不小心，脚一滑，碎石就顺势滚滚而下，山谷下不时传来沉闷的声音，辨不清是石头还是连人带石滚下山崖，直叫人提心吊胆。

我们成一路纵队，都把白手巾披在颈后，以便在黑暗中看得见，一个跟着一个往上攀登。刚开始，坡不陡，走起来还算顺利，快到半山腰时，忽然一阵风把乌云吹到头顶，我们简直象钻进了黑布袋中一样，每往上一步都非常艰难。快到山顶

时，风刮得很猛，早春时候，这种大西北风是罕见的。阴风怒吼，飞沙走石，直刮得我们睁不开眼，直不起腰。我们只好走一会歇一会，走三步退两步地贴着山石往上爬。

刚跨上棱线，风转了向，变成猛烈的东北风。这时，前面突然传来一个女同志的惊叫声，紧接着又传来什么东西滚下山去的轰隆隆声。我的心一紧，赶忙奔前去察看。一问，原来是一个女炊事员，背着一口煮饭的行军锅，刚爬上棱线就给风刮得站不住了。眼看着要连人带锅被刮下山去，幸亏她机灵，迅速解开身上背锅的绳子，正想把锅放下来，说时迟，那时快，一瞬间，行军锅象一顶大帽子似的给刮到山脚下去了。我们仅有的两口行军锅就这样损失了一口，不过，总算没出人命，我也就松了一口气。我看风确实太大了，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事故，就叫同志们退回棱线后的山背面休息，等天亮时风小些再走。这时已是三月十五日凌晨了，大家又饥饿又疲劳，刚坐下来就斜躺在山坡上睡着了，一直睡到太阳出来。

走下禾镰石就是大安洞，这是一个很宽的山谷，里面约有十多条村子，彭湃领导农民暴动的时候，这里是一个苏维埃地区，暴动失败后，彭桂领导的游击队也是在这一带活动。这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地区，但是当我们到达大安洞时，看到的却是被破坏后的一片荒芜、惨淡的景象。到处是断壁颓垣，乱石碎瓦，荒草丛中只有稀稀疏疏几间用石块垒墙壁，用茅草搭屋顶的烂屋仔。这就是大革命失败时，国民党犯下滔天罪行的痕迹！他们一把火一把火地把十多条村子烧成了平地，把这一带的革命者和无辜的老百姓几乎砍尽杀绝了。这一片萧瑟凄凉的景象，激起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深仇大恨。

因为情况不明，我们不便进村，就退回山坑，待侦察一下

再走。这时，忽然从另一个村子里走来两个四、五十岁的人，自称是农民，说曾在大革命时加入过农会，参加过暴动。他们说，大革命失败后，很久没见过红军了，现在我们来了，他们非常高兴。又说，在三、四天前这里也有一队红军走过，现在到了布仔洞，正在动员各村农会，准备攻打海丰城。他们提议我们也配合行动，并且毛遂自荐地说愿意当向导和承担串连附近各乡村农会的工作。

我打量着这两位不速之客，说话举止不象农民的模样，他们说的话中也露了不少破绽。我们知道，大革命失败后这一带就没有农会了。他们说有一支要去攻打海丰城的红军，意思是指曾生他们，但曾生大队决不会在目前敌我悬殊，完全不了解当地情况之下，轻率地攻打国民党重兵驻守的县城的。这两个人的来由不能不引起我的怀疑。于是我盘问道：“你们有没有带来地方党的介绍信？”“地方党哪个领导同志派你们来的？”他们支支吾吾，转弯抹角地回答，半天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这两个假冒的家伙不上两、三个回合，就破绽百出了。我不动声色地叫人带他们去吃饭休息，然后和何与成等几个干部商量对策。

有的同志提议把这两个家伙就地处决；有的同志提议干脆利用他们一下，叫他们到各乡去，搜集一些粮食，以解决我们当务之急的问题。我和何与成觉得这两种做法都不好。前者，把他们杀了，如果他们不是国民党派来的，那就会给老百姓造成一种恐怖，不利于我们接近群众。后者的做法，容易暴露自己，说不定正好上了敌人的当。于是我把那两个人软禁了一天，第二天，当姚华同志顺利地买到米和油盐回来的时候，我就把那两个家伙放了。我故意对他们说：“配合攻打海丰城的时

间，我们研究以后再通知你们，你们先回去做准备，过一、两天我们就到你们村去。”

当他们如脱笼之鸟般离去，我们就马上拔寨转移了。

往东去，只要穿过布仔洞，翻过莲花山，再经过一片平原就可以到达目的地高潭了。姚华同志的家乡就在大安洞南面的一条小村上。而且，他已经联系上过去地下党的联络站，找到了给我们带路的交通员。

当年彭桂在海丰领导游击队的时候，这一带每条村都设有一个负责转送文件和人员的交通站，每个交通站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当有任务时，前一个交通员带着暗号来到下一个交通站，敲门说：“哎，××哥呀，××弟来了，你带他到××地方去吧。”下一个交通员就不用多问，即使是半夜也爬起来带着来人到再下一站。就这样一站一站地往下带。这些交通站，在过去游击战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革命失败后，虽然有很多同志牺牲了，但仍有许多交通站秘密地保存了下来，他们象野火烧过后深埋在地下的草种，分布在各个乡村。一有机会，他们又活动起来了。

在这些联络员的带领下，我们穿幽谷，涉溪流，钻丛林，攀小道，行进的速度增加了。三月十七日晚这一夜，月明星稀，清风送爽，天气特别好。近下半夜，我们爬上了八、九百米高的斜障坳，站在山头上往东望去，布仔洞隐隐可见，莲花山也遥遥在望了。

## 二

队伍爬上了斜障坳，联络员突然不走了，他对卢仲夫说：“下山就是布仔洞了，不用带路，你们也可以走到的。”卢仲夫

跟他说，我们不熟悉地形，下一个交通站也要他联络，可是他又说家中老母有病，说什么也不肯再往前带路。卢仲夫见说服不了他，就从前头跑到队伍中间来，向我报告了这件事。我一听，觉得有点蹊跷，这一站的联络员确实有值得怀疑的地方，我们在北山交通站时，他接受了任务，但不马上带我们走，而是借故出去了一趟，让我们等了近一个小时。这个人会不会是个叛徒，把我们的行踪报告了国民党，在我们前头设下“陷井”呢？现在快到“陷井”了，他就想借故脱身！想到这里，我心里叫了声“有问题！”马上对卢仲夫说：“赶快抓住那个人，不能让他走掉。”

可是，已经晚了。那个联络员趁卢仲夫找我那一阵子，说要大便，钻进山坑的草丛中，溜掉了。

我急得直跺脚，这只能怪我们当领导的同志少了一个心眼。我们没有考虑到，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些联络站、交通员的情况已经变得相当复杂。有的交通员牺牲了，有的躲开了敌人的锋芒，隐蔽起来，有的则当了叛徒。在他们当中，谁是同志，谁是叛徒，很难分清，在这方面，我们实在麻痹大意。

我把姚华找来，询问进退的路径。姚华说，进退就只这条路，没别的路可走。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还是继续往前进，反正进退都有可能遇到国民党的部队，我们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打就是了。

刚下到山脚，天上轰隆的几声雷鸣，接着“哗哗”地下起大雨来。我们躲避了一阵子，只见天简直就象捅穿了个大洞，雨越下越大。为了赶时间，我们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只好冒着大雨赶路。大雨倾盆，铺天盖地而来，山路泥泞，把我们弄得一身泥一身水，冷得直打颤。

雨未停，天却亮了。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片狭长的小平原。这是往莲花山去路程最短的路。如果走山路，从山上绕过去，则要多走六十多里。为了抢时间，我们决定出敌人意料之外，趁着大雨滂沱，白天通过这片平原。我们处在敌人包围追截之中，只有这样与敌人斗智了。

在山脚下的小村庄里，炊事员们很快地做好饭，洒上两把盐，让大家吃了。按照习惯，大家把预备下一顿的饭装在口盅里，带在身上，然后冒着大雨又出发了。

大雨还在不停地倾泻，天空跟原野连成灰蒙蒙的一片，十多米以外什么都看不见。这倒有利于我们隐蔽行动。我们挨着山脚，走了一个多小时，还未发现有什么情况，眼看着不用多久就可以穿过这片平原了。

正在这时，我忽然看见与我们平行的右边道上，有一排黑蒙蒙的奇怪的树影，说它是树吧？它整齐得出奇，说它是屋舍？它又显得太矮。这一排影子距我们只有二十来米，我警惕起来，连忙站住脚，睁大眼睛仔细察看。

“树动了！”我不禁从心里惊叫了一声，这下看清楚了，分明是一队穿着雨衣的国民党兵！

我赶紧压低声音传令：“队伍悄悄地往左面山上移，迅速占领有利地形！”

在我们左边是三个较低的山包，而在国民党军队的右边是一条小河。当我们两个中队迅速散开，占领了那几个小山头以后，我下令架起四挺机关枪，一齐向敌人猛烈扫射。

“哒哒——哒哒——”枪弹穿过雨层，直飞向河边的敌人，敌人还未来得及卧倒，就接二连三地中弹滚进小河，溅起半人多高的水花。



敌人万万没想到在这里会遇到我们，大概他们刚在我们歇息的小村庄扑了个空，估计我们已过布仔洞，正走在往莲花山的山道上，于是走大路向莲花山追赶我们。他们只顾埋头往前赶，走着走着就和我们并排了。他们更没料到，被追赶的我们占领了有利地形先发制人，在这里一下子报销了他们几十人。

这一下打得敌人蒙头转向，他们抱头鼠窜，象一群青蛙似的“卜通卜通”地跳进小河中，只有几个伏在河堤上，向我们回射零零星星的几枪。

我一见截击成功了，便立即指挥撤退，爬上了与莲花山相连的一条长山脉，把敌人远远地甩到了脑后。

事后，我才知道，国民党出动了一八六师一个团约一千人追击我们。团长姓凌，故称“凌团”。与我们在布仔洞平原上遭遇的是凌团的一个营。

出发以来，第一次克敌制胜，同志们的情绪高涨了许多。在山顶棱线上，我们歇息了一会，下午出发的时候大家更感到浑身添劲，脚下生风，赶路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十九日黎明前，我们到达了莲花山。

莲花山是许多山峰围起来的一个山群，从山下往上看，许多山峰围抱一团，极象一朵初放的莲花。莲花山下是一片大约三十里的平川，平川的东面，在一群山峦围绕的中间就是目的地高潭了。在莲花山上，我们为了慎重起见，先后派出卢杰、叶昌两位同志下山到高潭找曾生大队，待侦察好情况我们才把大部队拉去。

叶昌在离高潭十里的一个小村里见到曾生那边的蔡国梁、卢伟良等同志。他回来汇报情况后，我们又派总支书记黄高阳与他一起再去联系，确定会合的地点。

黄高阳、叶昌出发后，我们研究了一下出发以来的情况，目前急需要解决的是粮、钱问题。我们走了一个多星期，带的钱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在大安洞买的两担米，这一两天也快吃完了，从地图看，山下有一个公平圩，是一个较大的圩镇，卢仲夫提出要下山袭击圩镇里的土豪劣绅，无论如何搞点钱和粮食，否则，我们饿着肚子，将很难应付新的情况。我们同意了卢仲夫的提议，并决定由他率领第一中队在黄昏后下山，晚上行动。

中午时分，当我们正在研究袭击公平圩的方案时，梁广同志从特委派来找我们的张建南来到了。他说，昨天听到布仔洞有枪响，估计是我们与国民党军队遭遇了，他预计我们今天到达莲花山，就抄小路上山来了。张建南是参加过海陆丰暴动的同志，有游击战争的经验。在我们处于千难万险、出生入死的关头，他居然能穿过重重障碍，翻越崇山峻岭，找到我们，真令我感动。

张建南告诉我们，高潭有敌人重兵驻守。梁广叫我们暂时在布仔洞、大安洞一带活动，行动计划待以后再通知。

张建南还说，他上山时没发现山下有国民党的大部队，我们在这里停一、两天不会有大问题。

张建南要走了，为了安全起见，我没有写复信，只吩咐他把我们的情况口头转告梁广。

根据张建南带来的情况，我决定停止袭击公平圩的行动。

从三月九日出发以来，已经半个多月了，这些天来我是想一直往前赶，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管敌情怎么样，目标是高潭。罗尧曾经对我说：“大队长，我不知道你要去什么地方，只有你和何与成同志知道，这是应该保密的，我也不想知

道。但是我相信你，同志们相信你。这几天来，你在敌人重重拦截之下都能够指挥我们巧妙地穿过去，一直向前。可是，现在原计划被打乱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带着沉重的心情分配了住地和警戒：第一中队和大队部住在庙里；第三中队驻到斜对面最高的一个山峰上，由黄布带一个班扼守住由海丰城方向上山来的大路；庙侧一个山包，由罗尧带叶镜源小队放一个排哨。安排好以后，我和何与成商量，准备等黄高阳同志回来才开始下一步行动。但是究竟怎样行动呢？我们彻夜苦思仍得不出一个理想的方案。

我拖着疲倦的躯体，不觉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朦胧中醒来，天还未亮，山间大雾弥漫，二十米以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心里揣摸着，得马上多派出警戒，以免国民党军队乘着大雾偷袭上山来。

可是，国民党军队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当我们正在吃饭，准备加派警戒时，敌人的机枪便“哒哒哒”地响起来，子弹打在庙前的石头上，溅起了一片沙石。敌人的火力很猛，大概是一个重机枪连，以六挺机关枪从三百米外向我们扫射。敌人只隔我们一条山坑，从正面向我们进攻了。

“卢仲夫！派沈鸿光带第三小队从正门冲出去，把敌人压住，其余的准备突围！”我大声下达了突围的命令。

沈鸿光把饭盘往身上一挂，对着第一中队的第三小队喊：“第七班占领大门两侧，立即猛烈射击！”话声刚落，我们的轻机枪、步枪“哒哒哒”地响了。沈鸿光接着喊：“第八班冲出去！”第八班长陈飞龙大喊一声：“第八班跟我来！”随即带头冲了出去。但是，敌人的火力太猛了，他刚冲出去，就不得不赶快卧倒在地上，而在陈飞龙卧倒的一瞬间，跟在他后面的几个

战士躲闪不及，中弹倒在庙门前。卫生员张惠文一看红了眼，立即奋不顾身地爬上去抢救伤员，但已经晚了，五、六位战士都身中数弹，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张惠文只带了两支步枪，含着眼泪慢慢地爬了回来。

卢仲夫急得牙齿咬得咯咯响，我看敌人的火力这样强，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就立即命令他停止冲出，派两挺机关枪交叉向敌人射击，阻止敌人爬上来，其余的同志全部撤到后殿，打开瓦面爬墙跳出去。这庙没有侧门、后门，只能用这样的办法了。我的命令下达后，陈前等几个人立即跳上供桌，踩在菩萨的头上，用枪托劈哩啪啦地把庙顶的瓦面撞破，打开了一个“天窗”，他们纵身跃上“天窗”，回头喊了一声“跟我来！”我们便鱼贯而上，从这天窗爬了出去。

我们从庙里撤出之前，还是何与成细心，他问我：“王若周派来的那个‘大队副’王汉光怎么办？”我们匆忙商议了一下，都说，人家本来就不愿意跟我们走的，一路上就够别扭了，就让他留下吧！我们跳上房顶，也没有招呼他，就这样让他离开了。

这时，庙旁的小山头上响起了罗尧他们的枪声。罗尧在阵前督战，他虚张声势，扯开喉咙大声喊道：“三排占领左边山头！”“一排占领右边阵地！”“射击！”接着集中最强的火力，向敌人机枪阵地发起了猛烈的射击。双方对打起来，顿时，子弹的“砰砰”声、机枪“哒哒”声响成一片。鏖战正浓。罗尧打得兴起，就放开嗓子高声唱起《大刀进行曲》。接着一个排的同志也应声唱了起来。歌声在山谷中回音很大，刹时间就象有千军万马在奔腾一样。战斗的歌声响彻山谷，不由得敌人不心寒！过了一会，阵地中间忽然飘来了一阵浓雾，双方都看不见目标，

枪声渐渐停了下来。

我们守着云雾上的几个莲花瓣，敌人不能上来。坚持到将近中午，敌人往山下退去。我们也把队伍收集回来，准备撤离莲花山。

沿着山脉棱线朝着布仔洞方向往回走了两个小时。一路上，明显地感觉到同志们意气萧索，我心里一阵阵的内疚。我和何与成召集干部开了个会。我们都认为现在必须把这次部队东移的意图向同志们说清楚了，不然同志们在往回走的时候，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猜测，以致军心动摇。于是我和何与成都在全体同志面前讲了话，说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脱离国民党的控制，突围出来，为什么到了这里又要往回走？要求大家在这艰难的时刻必须坚决服从领导，加强团结。经过动员，同志们的情绪开始好转，又继续前进了。

同志们走在弯弯曲曲荆棘丛生的山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感到无比艰辛，因为这时候大部分同志的鞋都烂了，两脚划满了道道血痕。加上早上只吃了一顿饭，山顶上又没有水喝，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真是又累又饿又渴，同志们拿破布缠在脚上，沿路摘些油柑籽树叶、酸甜籽等解渴，顽强地前进着，但是行进速度十分慢，走一会，歇一会，整整一天才沿着斜障坳折向多祝的方向，爬上了白马山。

翻过白马山就是大安洞了。这时候，我们已经走了足足一天半。沿途中，牙齿没沾到半粒米，部队疲乏不堪，不得不停止行进了。

吸取在莲花山的经验，我除了派队员在白马山警戒外，还把卢仲夫的第一中队派到大安洞与布仔洞交界的地方进行警戒。

我们在白马山山坑下的一间庙里休息，姚华和另一位当地的同志忍着饥饿，四出奔走，千方百计给我们弄了一箩米饭回来。当我们狼吞虎咽地填塞着肚子的时候，我望着他俩那疲倦的笑容，打心底里感激曾生同志给我们派来的好向导。

下午，卢仲夫带了一个戴一顶大竹笠、当地农民打扮的人来见我。那人有四十多岁了，他说是地方党派来的，卢仲夫问他有什么事，他不肯回答，说要见到我才能说。见到我以后，他说名叫黄成，是这个地区的区委书记，身上带有海丰县委给我的信。说着，他从贴身的裤腰上取出一条比一根火柴大不了多少的纸卷给我，信上说，梁广已回特委。曾生大队受到损失，已分散隐蔽，待机再作行动。

想不到曾生同志他们处境也同样险恶。这时候该怎么办呢？部队无立足之地，没粮没钱没子弹。同志们疲劳不堪。周围是穷凶极恶的国民党部队，前堵后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各自行动，将容易被各个击破，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我对黄成说：“我一定要见到曾生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受到损失，只有联合起来行动，才好对付国民党的围剿。你想法帮助我们找到曾生他们吧。另外，希望你告诉县委，想办法给我们弄些粮食和草鞋来，不然，部队要行动和作战都很困难了。”

黄成同志提议我们转移到斜障山半山腰的黄沙坑去，他说那里是彭桂游击队的一个据点，地形很好，我们可以在那里休息两三天，待他把粮食、草鞋收集起来送到那里。我们同意后，他就立即给我们找向导去了。

黄成同志走后，我把卢仲夫的队伍调了回来，给大家作了一次克服困难继续行动的讲话。我说，由于我们不了解情况，到这里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现在我们找到当地的群众带

路，找个地方暂时休息。在这个地方有革命的力量帮助我们，只要大家鼓足勇气，天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

黄成来过以后，大家的情绪重新振作起来。黄昏时候，带路的向导来了，我们又继续行军。

顺着田基小路往南走，绕过了好几个村庄，更深夜静的时候，我们到达了与黄成约定的地点——斜障山黄沙坑。

### 三

我们第一次过斜障坳时，由于遇上了混进地方党联络站的坏人，致使暴露了我们的行踪，发生了布仔洞的遭遇战。

想不到我们第二次绕道斜障山时，事情又败在这些一站一站频繁换人的交通站上。

黄成带给我们的交通员，到了第二站时换了一个，到了第三站又换了一个，这些交通站之间，相隔都不远，一夜之间，竟换了好几个交通员，换得多了，我们也记不清带路的姓甚名谁，是哪条村子的了。加上一些当地交通员有一个坏习惯，他们凡到十字路口，必然要向路旁的小土地庙（社坛）拜几拜，磕几个头，以求保佑。这种迷信习惯，不管是可靠的交通员，还是混进地方党的坏人都一模一样，叫人真假难辨。而且，这样走法，弄到经过的村庄人人皆知，等于向敌人公开了我们的行动方向。

果然，四月十九日，当天色大亮，我们到达黄沙坑，刚刚派出警戒，正要休息做饭的时候，一阵枪声传来，国民党军队尾追我们而来了。究竟是哪一站的交通员出卖了我们？我们没法知道。现在，我们的情况十分不妙，敌人是在明里布置，跟着我们后面行动，而我们是在黑里瞎跑，给带进了敌人的圈套。

幸好，村前只有一条小路，两旁都是高山，何与成和卢仲夫立即带两个小队封住进村的隘路口，由我带着队伍往后山上撤退。

斜障山海拔九百多米，山势险峻，奇峰刺天。我们爬的是一座秃石山，满山尽是碎石、沙子，十分难攀。直到天大亮，我们才爬到半山腰一小块比较平坦的地方，坡地上有不少锈成绿色的弹壳，估计这是彭桂游击队与敌人激战过的阵地。

俯瞰整个战场，我发现地形对我们还是有利的。我们已经抢占了制高点，而且封住了村前的小道，敌人虽然人多势大，要攻进来是不容易的。于是我叫炊事班就在这里做饭，这时要赢得时间吃一顿饭比什么都重要。

山下，我们的部队还是按老习惯，边放枪边唱歌，歌停了，就向国民党兵喊口号：“大家团结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一回想不到的是，国民党军队中也传来回应的喊声：“不要误会，都是自己人！”“大家来谈判吧！”

口号声此起彼伏，压过了枪声。不久，枪声停止了，口号声也停止了，山下变得一片寂静。

我马上派人下山去了解情况。派去的人不久就回来说，国民党军队派人来找到何与成，要和我们谈判。

又过了一会，大约上午十时左右，何与成爬上山来，对我说：“山下是国民党凌团的部队，他们的代表想直接跟你谈判呢。”

我对何与成说：“他们在我们没走出来之前要消灭我们，现在我们冲出包围了，他们是什么用意呢？我看这谈判是一个阴谋。”

我想，我们必须向后山撤出才能甩脱敌人。但是，现在时



正中午，如果向山上爬，敌人看得清清楚楚，还会掌握我们的去向，在前面截击我们。必须等到天黑以后才能冲得出去。想了一下，我就向何与成说：“谈判也可以，不过要提高警惕。这样吧，你派人通知国民党的代表，我下半山，他上半山，我们就在小半山腰上谈判。”末后，我强调地向何与成说明，我们谈判只是一种拖延时间的手段，天黑以后务必要撤出。何与成同意我的意见。

在小半山腰，我与国民党的代表见面了。那是一个高高瘦瘦的政工人员，他说我们跑到海陆丰是出于误会，希望我们回去，等等。此人能说会道，尽讲好话，可以看出，是一个十分滑头的家伙。

我对他说：“重新合作可以，为了共同抗日嘛。但要我们回去，没有条件是不行的。”我向他提出了几个条件：第一，追兵必须退出十里之外；第二，如果要我们回东宝地区也可以，但必须要划定一个地区作为我们的防地，别的军队不得擅自进入；第三，要确保我们的安全，而且要发给枪支、弹药和粮饷。我尽量把条件提得高一些，以争取磨嘴皮把谈判拖到晚上。

想不到瘦高个子满口答应道：“这是应该的，应该的，我们应该支持，待我回去与长官们研究研究，再答复你吧。”

瘦高个走了以后，我把中队干部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我们谈判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拖延时间，争取天黑时撤出。无论如何也要冲出去，这是不能动摇的！”接着，我布置了行动方案：“一中队的一、二小队由卢仲夫、罗尧率领断后，待八点钟后才走。我带大队部、一中队的三小队和中队部以及第三中队往后山撤出。山后东北面十多里的地方有一片茂密的树林，

我们就在那里等候断后的同志们。”我指着远处的一片密林给大家看。

何与成说要和卢仲夫他们一起负责断后。散会后，何与成他们下山了。

天刚蒙蒙黑，我们开始行动了。顺着光秃秃的六十度以上的斜坡往上爬，真是件不容易的事。越往上，山越陡，脚下又滑，石头是松动的，脚一踩石头就隆隆地往下滚，人随时都会有滚下去或者被石头打中的危险。短枪队的罗新和炊事员林桂枝就是在这次行军中滚下山去被石头打伤的。后来，我叫队伍停下来，召集干部讲了一下爬石山的要领：要横着走，斜着上，不要直往上爬。也不要急着走，要先用脚去试一试脚下的石头结实不结实。这样一传下去就好些了，再没有伤人了。

上了山顶就比较好走，山背后有草有树丛，下山的路虽然也陡，但碎石头不多，我们可以“坐飞机”向下滑一段走一段。越往下走，路越平，草木也越来越多了。天快亮时，我们终于离开了斜障山，来到了山东北面的一片密密的树林中。

我把部队安顿在树林深处，就带着警卫员何通——何与成的弟弟，离开队伍走向两、三里，在树林边等候何与成他们。我们密切注视前边的情况。

太阳从莲花山背后爬上来，拖着缓慢的步子，渐渐地爬到当空。几个小时在焦急的等待中过去了，前头一直没有枪响，这更令人不安。谁知道国民党在耍什么新花招呢？

将近中午，还是何通眼尖，他高兴地喊了一声：“来了！”我手搭凉棚望去，几百步远外，果然是何与成瘦长的身影，正大步跨向前走来。

但是，何与成身后只有传令兵莫芬扬。我的心一下子抽紧

了，预感到出问题了，就赶忙奔前去，向何与成大声喊道：“老何——，同志们呢？”

何与成走近了，说：“你们刚走，凌团的人又来谈判，一时派人挑了饭送来，一时又派人来请我们下山参加联欢，死命拖住我们部队。我和小莫赶来，是要告诉你们不要等我们了。赶快离开这里，到大安洞去吧！我们甩掉他们就来。”我一听，心里十分着急。就对他说：“你马上回去带队伍准备突围，我和同志们去接应你们。”

何与成沉默了一会，说：“你不用去接我们了，那样更危险。我一定遵照你的命令，不管有多困难，立即将队伍带出来，到大安洞的北山见你！”说完，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本笔记本和一包钱交给我，说：“这是我的笔记本，这是同志们的党费，请你保管。”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又说：“老王，你好好保重，在艰难的日子里，你的担子更重了。”说完，他的眼眶红了，连忙转过身，朝原路回去。何通送了他一段，我远远看见何通把一件上衣除下来，披在何与成身上。

我手里捏着的一包党费，何与成用了好几层纸包着，最里头还垫了一块布，保管得十分好。

下午，没听到什么动静，我就集合起部队翻过白马山北山，在大安洞北坑等候何与成突围的部队。

从傍晚等到深夜，从深夜又等到天亮，这是多么漫长的时间啊！我一夜未合眼，等待着、盼望着何与成和同志们一个不少地跑到我们面前来……可千万千万别让国民党的阴谋得逞啊。

最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第二天上午，姚华和一个同志出去侦察，回来向我们报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有一队人在黄沙坑被国民党缴械了。现在大安洞已驻满国民党军

队，戒备森严，有风声说，他们要“一网打尽”，准备搜索附近一带的山林。

这是我们东移途中的惨重挫折，卢仲夫中队的两个主力小队损失殆尽！

三个多月以后，在我们开回东宝惠的途中，打听到被捕的同志已被押到惠州。我们派人潜入惠州城，打听何与成他们的下落。后来，我们才逐渐了解到：原来，在何与成出来找我的时候，敌人已经动手了，卢仲夫带的两个小队被缴械，何与成刚回去，也掉进了虎口。我们的同志被俘后，被敌人捆绑押解，曾经企图暴动未成，被解到惠州城，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派面前坚贞不屈，表现了无产阶级战士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小部分干部象黎崇勋、黄布、卢克华以及曾生大队的陈一民等同志，隐蔽了身份，与其他战士一起，作为一般战士被判了半年徒刑。何与成、卢仲夫、罗尧、罗振辉、叶镜源五位已暴露了身份的同志，壮志不移，宁死不屈，于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被敌人枪杀。五位烈士在刑场上，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气冲霄汉。

在此之前，曾生大队的副官李燮邦同志，也壮烈牺牲。我们地下党打进香翰屏部当作战科长的李一之同志，偷偷地把烈士的尸体掩埋了，把李燮邦同志就义前亲笔疾书的“侠骨长存”四个字刻在墓碑上。

六位烈士的英雄形象与东江大地共存，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 四

大安洞北山，山高林密，春寒料峭。我们损兵绝粮，在这

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几乎陷入了绝境。

三天了，我们不敢乱走，等着黄成和地下党同志的到来。国民党封锁得紧，他们不容易进来，这样，我们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

炊事员不止一次地向我请示：“没粮食了，该怎么办？山果野菜也会吃尽的，而且，盐……”

一排晾在树枝上的干瘪的粮袋映入眼帘，使我回想起一路上艰苦的生活。前几天，我们在斜障山等候何与成的时候，在一个炭窖旁的小茅棚里翻出了一瓦罐长满蛆的咸菜。大家如获至宝，用小竹子把蠕动着蛆挑出来，炒一炒就这么吃了。炒之前，也没洗一遍，生怕洗掉了咸味。意外的收获，真叫人怀念呢。现在也难让同志们吃上一顿那么好吃的咸菜了。小时候，我看过一本小说，里面记载了一个十分饥饿的人抓到一只小兔子，他饥饿难熬，迫不及待地把小兔子连毛吞进肚子了。这夸张的故事，过去我是不相信的，现在看起来也不足为怪了。此时，如果有一只小兔子给我吃，我也是会迫不及待地茹毛饮血，大块塞进口里去的。那肚皮贴着脊梁骨的难受劲，同志们是靠了多大的毅力忍受下来的啊。

一棵棵大树底下，同志们躺在潮湿的树叶堆上，显得那样疲乏不堪。饥饿在折磨他们的躯体，而何与成等同志的被捕，使他们感到心情十分沉重。同志们中间，蔓延起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说实在的，对于何与成他们的损失，我比同志们更难受，因为这主要是我的过错。每当我闭起眼睛，眼前就出现了何与成颀长的身影，出现了他在收复南头的时候，把地主递给他的鸦片烟枣打到地上，义正词严地痛斥想腐蚀他的那一帮土豪劣绅的情景，风声呼啸，我象看见罗尧手舞红绸大刀，风随

刀响，正在英勇杀敌；月色明媚，树影拂地，我又好象看见卢仲夫在救亡宣传晚会上抱南拳、飞北腿……他们是党的好干部，忠诚善战的勇士，这样重大的损失怎不令人心痛！

作为一个指挥员，要把这悲伤埋藏在心底，要负起鼓舞战士化悲痛为力量的责任。我真感到肩上责任重千斤。越是担子重，也就越怀念何与成、卢仲夫、罗尧……。

前路尚遥。面对着敌人的包围，饥饿的威胁，失望情绪的侵蚀，我更应该振奋精神，带好队伍，方能对得起为革命贡献出一切的英雄们！

“队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卫生员张惠文走到我身边，把一个口盅塞到我手里，关切地说：“你把饭吃了吧。”

我一看，是一口盅有点馊臭的饭。我觉得奇怪，一问，才知道是小张在斜障山时留下来的，一直舍不得吃。我想，在斜障山战斗时，她忙于照顾伤病员，也许连一盅饭也没有吃，她比我更饿！我看着小张瘦棱棱的脸，心里很感动，便要把饭还给她。谁知道我刚伸出手，她就拦住我，一溜烟地跑走了。

我没有把部队带好，却依然得到了同志们的信任，此时此地，我真是问心有愧，说什么也不能把小张的饭吃了。

正当我拿着这盅饭百感交集的时候，有几个同志吵吵嚷嚷地搀扶着小鬼谢德照从树林里走来，旁边还扛了一条一丈多长、碗口般粗的大蟒蛇。一个同志高兴地大声喊着：“德仔智擒大蛇，今晚加菜罗！”

饥饿的同志们马上从地上爬起来，围观德仔的战绩。原来，德仔出去采野菜，回来的路上走过一片低洼地，忽然看见一条碗口粗的大蛇盘卷在草丛中，竖起头，双目眈眈地向着他。德仔登时一怔，想躲开，但他立即想起饿得面黄饥瘦的同

志们，心想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勇敢地与大蛇展开了搏斗。附近没有石头，也来不及折树枝，他急中生智，脱下衣服，张成网状，蒙在蛇头上，双手紧紧地捏住蛇颈。一场紧张的搏斗开始了：蟒蛇发怒了，拼死地挣扎着，丈多长的身子把德仔紧紧地缠住。蛇越缠越紧，德仔更是死劲卡住蛇颈不放。他和那大蛇一起在草地上翻滚着，周围的草丛都被压平了。渐渐地，德仔感到呼吸困难，力不能支了，他快要昏过去的时候，大蟒蛇却被他卡断了气。

炊烟升起来了，煮着野菜、野百合的汤水里，浮起了一块块蛇肉，阵阵诱人的鲜香味扑鼻而来，同志们兴高采烈地拥到大锅旁，打趣地问炊事员：“这回是先开菜，后开饭吧？”

我老远大声地代炊事员回答：“今天是饭菜一齐开！”说着，把张惠文送给我的那一口盅饭拿上前去，倒进了稠稠的蛇汤里。

这一夜，我们七十多位饿得发昏的同志享受了自认为是最美味的一顿晚餐。

饭后，大家围着篝火闲谈起来。我把话题扯到部队向何处去的时候，同志们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陈前说：“我们不如二、三人为一组，分散撤回东莞、宝安，然后再集合起来吧。”有的人说：“不如出香港去，再作计议吧。”也有的人不发表意见，只叹了几声气。这种悲观情绪在困难的时候是很危险的，要是蔓延下去，会动摇同志们继续革命的信心。于是，我叫大家坐近一点，向他们说道：“当前，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我们由于缺乏警惕性，使部队遭受了损失，增加了我们处境的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红军长征中的困难比我们多多少少？他们爬雪山、过草地、吃野菜、煮皮带，终于完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只要有红军的坚强意志，眼前这

些困难又算什么？我们不应该悲观失望，更不应该在革命的中途退却。我们受到了挫折，只剩下几十个人了，但这几十个人就是几十颗红色的种子。我们吸取了教训，积累了经验，就能以一当十，在部队的发展中就能起到核心骨干的作用。”接着，我给同志们讲了小说《铁流》的故事。《铁流》中苏联一支小部队所经历的困难，跟我们是这样的相似，只不过他们是在冰天雪地中，而我们是在春雨泥泞中罢了。

我又给同志们讲起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事。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打江山，失败了好几次。在一次战斗中，只剩了他一个人。他逃进一间破庙里，正在为失败哀叹不已，忽然发现墙头有一只蜘蛛在织网，织着织着，一阵风吹来，把网吹破了，但那蜘蛛毫不气馁，网破了又从头织起。一次又一次，终于网织好了。朱元璋看到这情景，深受启发，重新鼓起勇气去斗争，后来东山再起，终于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政权。我说：“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军尚且能够百折不挠，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难道不能够吗？”

“能！”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表示了他们的决心。

加上了几把树枝，篝火哗哗卜卜地越烧越旺。同志们精神抖擞起来了。许多人把唯一的毛巾拿出来，包在烂了的脚上，有的用毛巾打成了绑腿。大家又把枪拆开，细细地拭擦着。不知谁用口哨轻轻吹起了《游击队之歌》，不一会，同志们都压低嗓门跟着哼起来：

.....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  
我们就和他拚到底！

篝火的火舌随着歌曲的节奏在跳动着，给每个同志瘦削的脸上镀上了一层红光。雄浑的歌声随着擦枪的节奏在飘荡着，给寂静的山林增添了生气。歌声掠过树梢，飞向那无边无际的夜空。

## 五

我们准备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正在这时，黄成又找到我们了。他对我说：“现在外头的局势很紧，国民党军队在到处搜索你们。何与成他们已经被重兵押送往惠州城。我收集好的草鞋也无法送来。现在你们最好不要到处乱撞，我的意见是分散到海边渔村去，打扮成当地的农民、渔民，暂时隐蔽起来，待过了这个风头，找到曾生的部队再走下一步棋吧。”

我看见同志们经过长途跋涉和几次战斗，面黄肌瘦，衣服、裤子都让荆棘扯破了，脚上只穿一双烂草鞋，很多同志的脚都烂了，走一步都十分困难。加上子弹快打光了，现在要想打一次胜仗，缴获一些弹药物资补充补充，也不容易办到，于是同意了黄成的意见。

我的脚当时也烂得厉害，有的同志提议要找副担架抬着我

走。这怎么行呢？我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咬紧牙，带着陈前等几个比较精干的同志，走在队伍的前面。

这一夜，月光皎洁，大概是农历十四、五的时候。我们这支遭到挫折的队伍，每个人都手拿着枪，子弹上膛，踏着如水的月色，绕山边，过田基，一路上避开所有的乡村，向南面海边转移。

往南，往南，当看见水天一色的茫茫大海的时候，我们已经脚踏在海丰南面一个叫骆坑的小村庄的海滩上了。

我审视这藏身之地，发觉附近一带的小渔村十分分散，每条村只有十户八户人家。我们这支七十多人的队伍假如在这里隐蔽，将会拉得很散，不好联系，因而会完全丧失战斗力。因此，我便把三十几个武装人员编成四个班，由阮海天负责，带到骆坑东面当年红军活动过的一个山洞中隐蔽，借此保持一支战斗分队。其余的人则分散在十几个小渔村中。

区委认为我在这些小村中隐蔽不太合适，就提出把我安置到骆坑西面的鹅埠小镇中。原来在附近有党的一些外围组织，其中有一个叫吴更的同志与鹅埠镇一个姓叶的老渔霸的儿子关系很好。他们说，可以通过吴更，把我隐蔽在渔霸的家里。开渔栏是有钱人家，便于躲过敌人耳目。

我接受了区委的意见，就带着卢克敏、陈前，到了鹅埠姓叶的家中。他把我和卢克敏安置在他家外头的一间书房里，把陈前安置在渔栏。

从表面上看来，这姓叶的对我们是蛮好的，吃得好，招待得很细心。但是，我对于这样的处境，总不免有点担忧。姓叶的虽然不很清楚我们的面目，但他会看得出我是部队的负责人。我总认为他也离不开生意人唯利是图的宗旨。我们寄居在

他那里，就象是渔栏水池中的几尾活鱼，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他觉得手中的鱼能换来一大把叮当响的银元，就把我们捞起来，卖出去呢？几天后，出现了一件偶然的事，就更促使我决心离开姓叶的家。

姓叶的跟我说，老是这么秘密地住着没必要，他要我跟他到外面走一走。他说：“你不用怕碰到人，就说你是我的朋友，从香港回来做生意的就行了。”

我回答说：“不要去吧，这样容易暴露。而且我对香港做生意的事一点也不熟，说话间难免会露出破绽。”姓叶的坚持要和我出去走走，我想，不出去也并不安全，出去了解了解这地方的情况，也好作打算，就答应了他。我打扮成一个香港商人的模样，穿着长衫，戴着毡帽，游游逛逛地跟姓叶的走到大街上。

谁料在茶居上饮茶的时候，就碰到警察所的警长。姓叶的跟警长挺熟，主动地跟他打招呼，让他坐到我身边来。向他介绍说：“这是我香港回来的朋友，现在香港的生意很淡，回来这边看有什么可捞一捞。”

这一来，弄得我很尴尬。只好搭讪道：“初到贵境，望多多包涵。”我也不知道说话象不象生意人。

应酬间，警长不断送来审视的目光，使我如坐针毡。幸亏第一次出来，可以仗着与人不熟，尽量少说话。要是警长追问起生意经来，那可真要露馅了。

回来后，抹了一把汗。我认为这样下去，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便叫卢克敏把这里的情况告诉黄成，并转达我希望换一个住地的意见。

几天以后，我们几个人转移到了距鹅埠约三十里的鲟门，

吴更同志的家就在那里。他家是一户小地主，但由于吴更在大革命时参加过共青团，到香港做过抗日救亡的工作，见过大世面，因此他在当地的青年人中有较高的威信，我们就住在他家一间家祠的阁楼上，白天可以到海边溜达溜达，跟当地渔民一起干点零碎活，比在鹅埠的情况要好得多。

其他的同志也都隐蔽得较好，在骆坑的同志们换上了渔民的衣服，白天跟渔民一起出海、拉大网，有的还能学上好几句当地话。在这些日子里，国民党也曾派人到海边搜索，我们在地方党和渔民们的大力协助下，都逃避开敌人的追捕，安全地隐蔽起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部队的情绪就稳定下来，相反，在激烈的战斗中没有出现的情况，在平静的环境下倒出现了。

国民党搜索不到我们的踪迹，就四处放出风声说：“曾生、王作尧的叛军已经全部剿灭，王作尧被打死了。”由于我们隐蔽的地方太散，不便联系，对一些传闻不容易辨别真假，有些意志不够坚定的人便动摇起来，陆陆续续地跑了十多个干部和战士。

十多个同志逃离了队伍以后，部队的情绪受到很大的影响。正当我们为此事大伤脑筋的时候，幸好黄成找到了撤退到汕尾的曾生大队。汕尾离鲙门有七、八十里路。我决定赶快与曾生见面，商议大计。

## 六

我和曾生相约在海丰县工委书记老郑家中见面，他家在汕尾。

沿着海边的沙滩，抄直路走，四十多里外就是汕尾，只是中途要渡过马宫湾。过渡的船是一条小帆船，这天风大浪高，船要斜兜着风走之字形才能前进。小船上坐了廿多人，船家说恐怕今天要担点风险啦。

一阵阵横浪向小船扑来，船身颠簸得非常厉害。浪花打进船舱，许多人被溅得一身是水，船舱里也灌满了水，大家就不约而同地用手把水泼向船外，却不顶事。划到离岸仅几米的浅水地方，船就沉了下去。我们爬上岸时，浑身上下水淋淋。

陈前显得有点懊丧，嘟囔着说这样坐船太危险，早先还不如绕过马宫湾，多走二十里路。由翻船我想到了队伍的损兵折将，我苦苦地想，党把这支队伍交给了我，我却没带好，怎样才能不辜负党的期望？该怎样才能重振旗鼓，“驾长风，破万里浪”呢？

与曾生同志会面于败军之际，我们真是悲喜交集，互相叙述着东移以来的情况，诉说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暴行，抑制不住心头的深仇大恨。

原来，国民党军队是首先向曾生他们下手的：

三月八日晚上，曾生他们正在坪山镇举行“三八”妇女节纪念会，接到侦察报告，国民党军队已从龙岗、坑梓、淡水三个方向逼来，便衣队已经接近坪山镇。第二天，曾生他们四个连队、训练班、政工队、大队部共五百余人，在坪山竹坑集中，安置好伤病员、杀掉两个特务奸细，到了晚上，在夜色的掩护下，穿过敌人的包围，经石井、田头岭向东突围。曾生大队本来扩展得很快，其中有不少是华侨和女同志，基层军事干部较少，缺少夜行军的经验，行进速度慢，走了一夜，才进入淡水地界。

一路上，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处于半饥饿的状态。部队

又累又饿，加上天气一直阴雨连绵，处境是相当困难的。

十三日，他们东行到稔山附近的斧头山，给罗坤部追上来，前面沈荣部又拦住了去路，他们登山应战，部队遭到了损失，好不容易摆脱了敌人，转入了高潭。

他们刚刚在高潭驻下，国民党一八六师又追了过来，借着哗哗大雨，猝不及防地包围了第三中队，一个小队受损失；第二中队在撤退中和大队部失去联系，遭到敌人一个营的袭击，中队长牺牲，指导员负了伤。高潭战斗之后，部队重新整编，编成了一个手枪队和长枪队，一些非武装人员和伤病号就地疏散，部队只剩下一百多人，然后继续向东南移动，折入汕尾矿区，部队减员的情况很严重。

东移的损失，是我们部队的一次沉痛的历史教训！

当时我们缺乏斗争经验，对在日军占领区的后方建立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这一战略思想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在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围歼我们的情况下，以为双方已经全面分裂，东移海陆丰便可以保存革命力量，因而把部队拉到国民党的后方去了，既离开了抗日的战场，又钻进了顽固派的势力范围之中，却没有想尽一切办法留在惠、东、宝敌后地区和日军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周旋，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这次转移，选择的方向是错误的。

部队遭受这样大的损失之后，开往何处？武器、人员、给养问题如何解决？如何打开目前这种困难局面？

正在这危急的关头，梁鸿钧从特委带来了中央给我们的一封电报。电报大意是：曾、王两部东移海陆丰的行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军事上也必然会失败。部队应回到东宝惠地区，在敌占区与国民党占领区之间立足，大胆开展和坚持敌后抗日游

击战，同时不怕国民党打摩擦仗，才能生存与发展。电报并且指出了回防前应注意作好政治动员，整顿内部，加强团结，在有胜利把握的条件下，对阻击的顽固力量坚决消灭之，并注意取得地方党的帮助，积极进行统战工作等。

党中央的来电，象在黑夜中燃起了一盏明灯，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 第八章 重返敌后

### 一

在海丰，我们如饥似渴地读着从延安发来的电报，就象那经霜的花朵得到了阳光。

党中央的电报在五月八日就发出来了，但是我们部队没有电台，不能与党中央或东南特委直接联系，加上战斗频繁，驻地不定，所以迟了将近两个月才见到电文。由于我们领导的错误，使许多同志牺牲了，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想到这一点，我们都感到十分痛心。

党中央的指示，擦亮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决定立即返回敌后。梁鸿钧、曾生和我商量，确定了部队返回东宝地区的具体办法：两支队伍在鲮门集中，找一个隐蔽的地点作短暂的休整，然后由我和周伯明、邬强等同志负责带回宝安。曾生则去香港筹备款项以及鞋、衣服等军需品，直接到坪山往西的三洲田与我们会合。为了行动安全和保守秘密，梁鸿钧、卢伟良带两个同志先行，沿途设法与地方党联系，布置部队的行军路线和掩蔽地点。

几天以后，两支部队在鲮门集中了。幸好干部还保存得比较多，象邬强、卢伟良、周伯明、彭沃、蔡国梁、阮海天、鲁



风、翟信等同志都还在。

黑夜里，我们把部队带到了大安洞北山。第二天，在山上隐蔽的地方搭起了十几个小草棚，在这里休息，整顿，治疗一下伤病员，准备再作长途跋涉。

一个月以后，也就是一九四〇年八月初，在地方党的直接帮助下，我们侦察好了行军路线。省委也派人从香港送来了一批衣物鞋子。我们便告别了难忘的海丰，向西踏上了归程。

我们从大安洞出发，晓宿夜行，沿着地下党秘密地布置的交通线行军，一路上都比较顺利。我们躲开了人多的乡村，避开了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很快就穿过白芒花，渡过淡水河。

我们回到了坪山，象是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地方党和群众早几天就安排好了我们的住地，买好了粮食、油、盐、青菜，还杀了一条大猪等着我们。他们说，当我们部队向东突围时，他们日夜提心吊胆，特别是几个月来听到了不少有关我们的谣言。虽然他们不会轻信“曾生大队已经全部消灭”，可是听得多了，又总不见亲人回来，也就将信将疑，现在他们的心事才算放下来了。

在坪山，我派何通先到宝安去，把东移时留下的曾鸿文带到山子下村，准备过几天回宝安时让他当向导，因为他对龙华、布吉一带的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山头 and 村庄都很熟悉。我们刚回来，对情况不清楚，很需要一个象他这样的好同志。

就在这个时候，周伯明带来一位生面人，向我介绍说：“这是钟林同志，从东江特委来的。”

钟林操着江西口音对我说：“我是省委派来的钟林。”说着，便拿出一封介绍信，上面写着：“现派钟林同志来兼任曾生、

王作尧两个大队的政治委员。”下面署名的是省委李大林。

“钟林？”我望着眼前这位新来的政委，忽然记起来了，他就是东江特委书记林平同志，一年前我在坪山曾见过他。钟林是林平同志的化名，他是江西兴国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某独立团的团长。一九三七年他从福建转到广东来，协助开展广东党的工作。一九三八年省委成立，他在省委任军事委员会书记，现任东江特委书记。他的到来，使我们十分高兴，对今后的斗争更加充满信心。

我和林平商量着回宝安之事。何通带着曾鸿文来了，我就把曾鸿文介绍给林平，说：“这是宝安的活地图，真正的地头蛇。”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依约到三洲田等待曾生同志。

天亮不久，曾生带着一批同志从香港回来了。他们背着一个个大包袱，从盐田那边爬上来，山很陡，爬得气喘吁吁的。

大家高兴得跳起来，一齐拥上前去接过包袱。包袱里面装的是我们急需的军需品。

九月上旬，我们终于回到铁路以西的布吉、龙华一带，抗日之火又将在我们活动过的地区燃烧起来！

## 二

初回宝安，我们住在游松、杨美、南坑一带。这一带是个死角，它的南面是一列大山，其中最高的叫鸡公头。在鸡公头山南面有上坪、下坪两个距离很近的小村庄，合称“上下坪”。因为这村子的位置很高，路又不好走，很少有外村人到来。日军占领深圳后，虽然距离这里只有二十多华里，却从未来过。

国民党军却怕它离深圳较近而又没什么油水可捞，也不到这里来。我们选择了这地方召开了部队的干部会议。

在上下坪这只有十几家人的小村子里，我们两个大队的干部林平、梁鸿钧、曾生、我、周伯明、蔡国梁、邬强、卢伟良、阮海天、黄高阳等同志都到齐了。会议的目的是总结东移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在惠东宝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

会议由林平同志主持。他首先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同志们接着坦率地发表了许多意见，倾吐了自己的心里话。经过认真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次东移受挫，如果就那一次行军该怎么走，那一仗该怎么打这些具体问题而论，固然可以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来。但是，基本的经验教训究竟在哪里？这是必须弄清的首要问题。在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大军出动，妄图将我们一举包围歼灭。如果我们为了脱出重围，而转移外线作战，待打破顽军围攻之后，再回到原来地区坚持抗日，那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东移是认为国共两党必然分裂，全面内战必然再起，没有前线后方之分，东江不能立足，必须东移海陆丰才能生存，这就大错特错了。中央向我们指出，全国尚是拖的局面，国民党当局还要保持抗日面目，同时进行反共，对日则准备投降。在这样的局势下，我们的部队不向敌人进攻而向后方行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军事上也必然失败。中央的英明判断使大家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痛切地领悟到，东移蒙受重大牺牲，根本原因是这次行动犯了政治上的错误。

今后怎么办？中央又明确指出，我们只要回到东宝惠地区，在日占区与国民党地区之间，大胆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同时不怕摩擦，在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时敢于打摩擦仗，那就能生存与发展。中央的指示极大地提高了我们斗争的信心。在会议

上，我们把今后斗争的方针概括为一句话：长期打算，埋头苦干，积蓄力量，深入敌后，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争取最后胜利。

会议决定把我们部队的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下面编成第三、第五两个大队。决定由曾生任第三大队大队长，鄔强任副大队长，卢伟良任政训室主任；由我任第五大队大队长，周伯明任副大队长，蔡国梁任政训室主任。林平兼两个大队的政治委员。梁鸿钧负责两个大队军事上的指挥。

会议还决定，第三大队开赴东莞大岭山客家洞一带活动。为争取迅速打开局面，把部队大部分力量，包括熟悉东莞情况的干部和战士编入第三大队。第五大队留在宝安，在铁路东西两侧活动。林平、梁鸿钧也随第三大队到东莞去。

会议开了一个星期，胜利结束了。在党中央的指示下，经过这次会议，我们的队伍虽然力量还弱，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坚强起来，这就为开创一个新的更大的局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在东江人民抗日斗争史上，上下坪会议起到了扭转局面、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

### 三

上下坪会议之后，曾生同志率领主力开赴东莞去了。我和周伯明、阮海天等三十多人留在宝安。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扩大队伍和解决队伍的给养问题。

那时，当地人民在日、伪和国民党的掠夺下，十分贫困。我们不愿意再加重群众的负担，就把经济的主要来源放在向进出边境的商人征收捐税上。我们派出了短枪队，在梅林坳、

乌石岩、布吉三个路口设立了税站，打出护路的旗子，上面写着“自愿捐助抗经费”的字样，向过路商人收税。由于我们采取薄收乐捐政策，商人们因此可以得到我们沿途保护，免遭土匪抢劫，都乐意捐助我们。这样，基本上解决了我们部队的供给。在税站，我们还通过过往客商把宣传品带到国民党后方去。

陈前当时是税站站长，主要的税站设在梅林坳。这一带本来是土匪出没之地，自从设立税站以后，陈前他们就把周围的小股土匪都赶跑了。消除了土匪之患，不仅过往客商乐意捐款，连一些地主、富农也乐意借“抗日粮”给我们了。

在建立税站的同时，我们还建立了民众运动工作队（简称“民运队”），调卢克敏同志负责，不久转由刘宣同志负责。他们深入到各个乡村，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动员贫苦农民参军。周伯明同志率领一个十多人的小分队到坪山、龙岗一带，收容东移时失散回到乡下的同志归队，并且动员坪山、淡水一带的青年参军，很快就发展到五十多人，成立了一个中队，叫惠阳队，中队长陈力辉，指导员杨凡。清溪、塘沥一带是以前我们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在地方党的大力协助下，我们的工作进展也很快，动员了将近一百人参军，充实了“石龙队”和组成了“铁路队”。石龙队中队长阮海天、指导员沙克；铁路队中队长沈鸿光、指导员卢克敏。我们在龙华阳台山上建立了游击队的第一间军械所和医院。这间军械所开始时只能修理枪支，后来逐渐可以自制地雷、手榴弹和步枪。

林平同志是东江特委书记，为加强地方党的工作，经他决定，成立了宝安县工委，由我兼任书记，刘汝琛为副书记，刘宣为宣传委员并兼民运队队长。当时我的事情多，县工委的工作主要是刘汝琛、刘宣同志负责。这时，赤岭头、弓村、杨美、

雪竹径、山厦、平湖等地都建立了党支部。四月间，成立了龙华区委，由赵学任区委书记，杨德元任副书记。龙华有一批积极活动的党员，很快地在龙华、布吉、乌石岩一带组织了八个民兵中队。这些民兵中队是由各乡村支部掌握的，打仗时则由部队统一指挥。

在部队和地方党互相配合下，地方安定，群众普遍有建立政权的要求。我们便首先成立了龙华和民治两个乡政权。龙华乡长是卓凤康，民治乡长是刘鸣洲。卓凤康曾跟随孙中山闹革命，是同盟会员，五十多岁了，在地方上很有威信。乡政权成立，龙华一带群众情绪很高。

在望天湖、乌石岩一带，我们进行了锄奸肃特活动，铲除了不少狐假虎威欺压百姓的汉奸和特务。

我们还争取了一些伪乡长、伪村长为我们服务，把日军和国民党内部的情报提供给我们。

在香港，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办事处兼后勤机关，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联系，担负对海外宣传、动员华侨捐款、筹办供给等工作。有了这个机关，我们就可以把东江抗日游击战的讯息，传到全国，传到海外。有了这个机关，我们的战士就能穿上部队发的衣服，换上车胎底的凉鞋，夏天有头帐\*挂，冬天有棉衣穿了。

薰风送暖，山花吐艳。经过大半年的工夫，我们在建党、建政和扩军等方面都已蓬勃发展，有了根据地的初步基础。这时候，为了加强宣传群众和指导工作，我觉得很需要立即办一个报纸。早就有这个打算，但总觉得条件还不成熟，现在应该

---

\*头帐：一种只罩着头部的小蚊帐。

是时候了。

这时，为了办报，我想起了李征同志。李征原是马来亚的共产党员，一九四〇年在马来亚被当局反动派逮捕，坐了半年监牢，同年秋被驱逐出境，回到香港，经我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参加了部队。他在马来亚时办过党的地下刊物，对办报是挺内行的。我决定让他担任报纸的主编。报纸定名为《新百姓报》。

抽来办报的人不多，只有李征等四个人，我也参加这一工作。我们几个既是编辑又是记者，既当校对又当印刷工人。条件也很差，只有一部破旧的滚筒油印机，几张蜡纸和几迭马兰纸，几盒印油开始变质了。

我找到一部破旧的收音机，作为新闻消息的来源。于是，大家进行分工，采访的采访，撰稿的撰稿，刻钢板的刻钢板，忙乎了两天，我们就着手印刷了。

困难来了，首先是油印不清，原因是油印机的纱网都被陈旧的印油塞死了。眼看着功亏一篑，大家急得眉头都皱起来。我便写信求教于何鼎华同志。他是我们部队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办报纸他是内行。果然，他很快就托人把我们所要的东西送来了，还在回信中给我们介绍了一种调油墨的方法。我们一试，的确很好。

《新百姓报》带着油墨的清香问世了。第一期为两个八开版，第二期改为四个版。头版是国际国内新闻和战事动态，二版和三版是地方新闻，四版是文艺副刊，里面有“讲新古”，“诗画”等园地。在开始那几期，我曾用章回体，给“讲新古”园地写过《神台村青年起义》等抗日斗争故事。

《新百姓报》开始是周刊，后来缩短了时间，改为不定期出

版，每期三百至五百份。

报纸发行以后，深受战士们和老百姓的欢迎。它象长了翅膀的广播筒，把来自党中央的声音，把东江地区抗日斗争的喜讯和国民党破坏抗战的丑闻传遍了各个小队、各个游击区，并通过了层层封锁线，散发到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起到良好的作用。

#### 四

我们刚在宝安地区立下脚跟，大大小小的战斗就接着来了。一九四一年的初春，日军把魔爪伸到上下坪来了，以往他们是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一带的。

他们先出动小部队来上下坪抢东西。第一天，我们为了不暴露目标，避过了他们。他们一路畅通无阻抢去了老百姓的一些鸡鸭。第二天早上，十几名敌兵又出动到上下坪来了。他们见鸡捉鸡，见猪赶猪，见人追人。上下坪的老百姓飞跑来向我们报告。眼看上下坪的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同志们怒火中烧。

周伯明同志立即带一个小队前去袭击敌人。命令刚下，同志们就一股风地冲出去了。一会儿，我们只听见几声枪响，一阵呐喊，不多久，就看见出击的同志背着几支三八式枪，唱着歌回来了。他们高兴地说，冲出去的时候，说来也巧，一个小队长模样的日军手里提着鸡从树丛里跳出来，正好和周伯明面对着面。周伯明喊：“缴枪不杀！”那个日军不理，正要开枪。周伯明已经扣响了扳机，把敌人撂倒在地。敌兵一时慌乱了，同志们乘势喊杀追去，捡了几支步枪。

我想，我们干了这一下，他们马上就会来报复。于是，我



叫同志们立即组织老百姓撤离村子。

不出所料，正午刚过，一百多日军就气呼呼地赶来了。我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便正面出击，就隐蔽在山坑、丛林中与敌周旋，不时向日军射去几枪，搞得他们晕头转向。闹腾了半天，他们寻不到目标，也抢不到东西。最后，烧掉了几间屋子，恨恨地离开了。

日本仔在上下坪挨了打的消息传开以后，国民党顽固派才发现“共匪已经肃清”的美梦破灭了。这些被老百姓叫做“呵呵鸡”的国民党军队，打内战却很内行。他们从后方派遣了一千多人，向观澜、龙华游击根据地扑来。我们发挥了机动灵活的战术，利用当地有利地形和群众的掩护，与他们在纵横交错的群山间周旋。国民党顽固派的兵进到龙华、布吉一带，就象一群瞎眼的野马，在山沟里团团乱转。为了愚弄他们，我们还派了一些战士分散潜入梅林那边的日军驻地，开了几枪就躲起来。炮楼里的日军摸不清我们的底细，不敢轻易出来，而国民党顽军却以为我们全都进入了日军占领区，他们畏日如虎，不敢贸然翻过鸡公头山。无可奈何，只好望洋兴叹，草草收兵。

半个月后，他们又纠集部队再次向我们进攻。清溪区委黄克派人来通知说，国民党部队这一次是倾巢而出，要我们提高警惕。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我们决定来一个将计就计。

当顽固派的军队还未迫近雪竹径之时，我们已经轻装出发，迂回到敌人背后的大坪、白花洞一带了。在此同时，由周伯明率领沈鸿光中队和杨美一带的民兵几十人，飞兵奇袭顽军在清溪苦草洞的武器库。他们在地方党的配合下，迅速解决了

敌哨兵，接着突入了敌营，打开武器库，冲了进去，一下子就忙开了。

顽军在雪竹径找寻不到我们的踪影，感到诧异，万没想到，这时候，他们后方的武器库已经被我们袭击。游击队员正抬着乌黑发亮的重机枪、步枪，扛着一箱箱沉甸甸的子弹，高兴地唱起了《游击队之歌》：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

我们的部队扩大了，给养费用增加，必须扩大税源，增加税收。陈前真是个聪明人，正当我考虑这事的时候，他就主动向我请缨，说：“王同志，你让我带一个武工队到宝太线公明圩开设新的税站吧。”

宝太线上的公明圩、沙井一带属于沦陷区，是宝安比较富裕的地区，在那里设立税站，收入将是十分可观的。但沦陷区情况十分复杂，公明圩的吴东权就是一个不易对付的地头蛇。他既是土匪，又是汉奸，日军封他为护沙队\*，国民党又和他有联系。我想到陈前此去，将会危险重重，就问道：“那边有吴东权横行，公明圩、黄松岗还有许多地主武装与他勾结，你能在他的鼻子下收税吗？”

“怎么不行？”陈前眉毛一扬，高声地回答说：“他们的人来得多，我有两条腿可以跑，他人来少了，就得尝尝我的驳壳枪的利害。”

“老王，让我去吧，你放心好了，我一定完成好任务。”陈

---

\* 护沙队：盘踞沙田的伪军。

前见我犹豫不决，又一次恳切请求。

陈前把我说活动了，在他许诺不冒险，不过于深入敌据点之后，我就让他带领一个武工队往沦陷区去了。陈前他们到了公明圩附近，很快就传来佳音，他们在永和、黄田赶走了小股土匪，已经建立起两个税站。

于是我又派孙冰率一个民运组去加强那一带的群众工作。可是过不了几天，陈前同志却由于一时轻敌，在一次与土匪的战斗中，不幸牺牲了。

事情是这样的：陈前他们设立税站的事被驻梅塘的伪军刘光一伙知道了，一天，刘光派了手下一个小土匪头带人到了公明圩，要铲掉陈前的税站，他们先到圩里的一间茶楼“饮茶”。陈前决定要惩治惩治这帮家伙，立即带了苏光等三个同志赶到了这间茶楼。二楼上，在临窗的几张四方茶桌旁，土匪头正和十来个土匪嘬茶抽烟聊大天。陈前艺高人胆大，想以少胜多，一举歼擒这帮土匪。于是，装着找座位的样子，与苏光他们分头占了堂内四角。“不许动！”陈前他们“唰”地掣出手枪，对准了土匪们的心窝。土匪们吓得乖乖地举起双手。眼看一场袭击就要成功了，正准备缴下他们的枪，这时候，楼下突然出现了十多个土匪，一窝蜂地提着手枪冲上楼来。陈前喝一声：“打！”抡起手枪“砰砰”两声，撂倒了冲在前面的两个家伙。一场混战开始了，土匪们两面夹攻，陈前同志终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了。

噩耗传来，引起我心头一阵阵的痛楚。陈前同志是我们建立东莞武装的第一批同志，几年来，他一直跟在我身边，东闯西突，患难与共。我们曾一同赴香翰屏设下的“鸿门宴”，东移时一同拼杀突围……每一个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刻，我们都形影

相随。他总是把最艰苦的工作承担下来，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这一次，也是他自己要求到最危险的地区去。日积月累的革命情谊，已经把他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永难忘怀！他的牺牲，怎不使我潸然泪下！

一九四一年七月，我们连续打退了日军两次进攻，取得重大胜利。

七月一日，驻深圳、南头、沙头的日军出动了几百人，分两路包围望天湖、白石龙一带。迫击炮弹落在梅林坳下面的望天湖上，卷起了黑色的烟柱。我们早有准备，在敌人炮轰之前，已经悄悄地把队伍转移到龙华、游松坳一带，让敌人扑了个空。当敌人放火烧望天湖圩的时候，我们却从游松坳突然出击，打倒了好几个敌人。他们不明虚实，仓忙抬着伤兵和尸首跑掉了。

一个星期后，日军又出动从梅林坳、白芒、布吉分三路包围龙华和望天湖。敌人从梅林坳下来，沿途烧杀抢掠，望天湖圩再次遭殃，霎时火光四起，浓烟滚滚。我们的石龙队和铁路队，已经埋伏在游松坳。同志们满怀愤恨，焦急地等着敌人钻出来，打他个片甲不留，为望天湖众乡亲报仇！

敌人往回撤了，草丛上露出了一排排黄泥色的帽子。不到一刻钟，敌人的队伍全部暴露在距离望天湖二百米左右的平地上。中队长沈鸿光一声喊“打”，仇恨的子弹一齐射过去，平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个日本伤兵和尸首。日军打仗有这样的规矩，非万不得已决不扔下自己的伤兵甚至是士兵的尸首。于是，日军的指挥官挥着指挥刀叱喝着他的士兵，要他们在机枪掩护下，拚死抢回伤兵和尸首。在这片开阔地上，他们抢回一个，我们就要他们付出几倍的代价。

这一仗，从上午打到下午三、四时，敌人仍然无法撤出望天湖。入侵白芒的那一路敌人，在赤岭头附近阳台山脚下，也受到了我们另一路伏兵截击，脱不了身。约莫黄昏时分，日军几百援兵赶到，三路敌人入黑后才在龙华圩会合，龟缩了一夜，天亮以后才经乌石岩撤回南头。

打了这一仗之后，日军和国民党顽军都不敢轻举妄动，我们赢得一段安定的时间整训了部队。

一九四一年中秋，日军又纠集了千余兵力，一路从南面梅林坳，一路从西北面乌石岩出动，夹击我们龙华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我们在民兵的配合下，布下天罗地网，等待来犯之敌。西路进犯的日军到了乌石岩圩，给周伯明率领部队咬住，几乎不得脱身，不得已退回南头。南路的日军主力进至龙华附近，给阮海天他们截住，激战一场，敌军无利可图，只好撤走。日军的兵力比我们多四、五倍，但在人民战争面前，束手无策。我们龙华抗日根据地在战火纷飞中巍然屹立。

这一年冬天，国民党独九旅一个排因为对顽固派勇于内战怯于抗日十分不满，由思想进步的军官徐荣光、陈实棠等同志带领，毅然脱离了独九旅，跑到增城敌后。他们一路上抗击追兵，爬山涉水，历尽艰辛，伤亡很大，从三十多人减为十二人。在增城，他们终于找到了增从番游击大队，在卢伟良、鲁风同志率领下，参加了一次抗击日本军队进攻的激烈战斗。以后，他们由增城转到东莞，又来到宝安。他们到来，还带来了两挺轻机枪，又给我们增添了力量。我们在雪竹径开了个晚会，热烈欢迎他们。山间丛林里，洋溢着一片战斗情谊。

后来，这十多位同志都成了我们部队中能征善战的干部。

经过了连续对敌作战的胜利，我们的部队越战越强，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我们五大队有了三个中队：铁路队、惠阳队和为了纪念何与成烈士而取名的“与成队”，另还有两个独立小队。我们又成为名符其实的大队了。从上下坪会议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底，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第三大队和我们第五大队总共有一千五百多人，控制了宝太线和广九线以西的大片土地。东、宝两个地区连成一片。抗日的烈火，又以燎原之势，在惠、东、宝大地上燃烧。

## 第九章 风云变幻

### 一

在东莞，林平、曾生等同志以大岭山为中心重新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也很快发展起来。

大岭山区的人民，是富于革命精神的人民，自从华南抗日战争开始以来，这里就从未停止过对日军的斗争。他们热爱抗日的“老模”，组织起自卫队配合“老模”作战。当我们编入第四游击纵队，开到宝安以后，特别是东移海陆丰之后，他们的心情沉重，象思念远游的兄弟一样，日夜祝福我们平安，盼望我们早日重返这个战斗的家园。一九四〇年十月，曾生率领第三大队返回东莞活动的时候，大岭山的人民看到这支百多人的武装，经过东移归来，作风仍如当年，抗日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争先向部队报告这一带的情况，拿出人力物力支援部队，配合部队行动。

为了掌握时机，更快地开辟大岭山根据地，第三大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立即向莞太线展开出击，连续袭击了厚街、桥头、赤岭、篁村等地的日伪军，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日伪军受到打击，企图报复。十一月的一天，莞太线日军出动精锐部队一百多人向大岭山进攻。他们以步兵十多名先

行，作为“征发队”潜入横岗、黄潭、大径一带，步兵主力及骑兵则埋伏在河田一带待机而动。这时，有老百姓到我们部队来报告说：“日军有十几个士兵出动抢粮了。”大队部便派翟信带短枪队去收拾他们。

战斗打响了。接火以后，发现敌人有一百多，火力也很猛。短枪队队长翟信中弹负了伤。三大队的领导决心要打下敌军的气焰，并且掩护短枪队从大径撤出，就立即派出两个中队夹击敌人。彭沃中队出击黄潭左侧，迅速占领大径后面的松山，居高临下，压住大径的敌人，掩护短枪队撤出。另一个中队从黄潭右侧用火把日军钳制住，双方展开激战。我们在杀伤敌人之后，见到敌军增援，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就从大径后面的高山安全撤退了。这次战斗，小队长陈定安同志牺牲了，翟信、鲁风等同志负伤，我们伤亡了十多人，但是，日军却死伤了几十名。

黄潭之战，意义很大。在东移受挫之后，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竟能抗击强敌，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护了人民的利益，这就大大提高了部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在日军铁蹄下的东莞人民，莫不欢欣鼓舞，争相传说：“‘老模’又回来啦！”

黄潭战后，三大队在大岭山乘胜展开群众工作，打汉奸、肃土匪，配合地方党进行建党活动，在连平乡建立了民主政权，成立了民兵组织，部队又立住了脚。

一九四一年初，杨西乡以牛头村地主刘德为首的反动势力，勾结东莞水乡大地主汉奸刘发如，企图乘我们大岭山部队立足未稳之际，和我们较量。刘发如派其弟刘棠率领伪军一个团来到杨西，纠集土匪及各地地主武装合共四百多人，出动向我们驻大岭山的部队进行攻击。我们立即予以回击。林平、曾



生同志亲自指挥，激战终日，把刘棠这个团打垮了，缴了敌人几挺机枪，将这次地主暴动压下去了。

日军通过伪军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勾结，基本上摸清了大岭山区的情况，就组织了对大岭山百花洞一带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歼灭我们的主力，摧毁大岭山根据地。

六月，日军以主力四百多人，纠合一部分伪军，由大队长长濑指挥，分两路进犯，一路由东莞城经杨西山门方向直扑百花洞，一路从厚街向伯公坳、大环进发，与进攻百花洞之敌配合。当时三大队几位负责人正在和负责民运工作的同志开会。敌人一进大环，部队就接到地方工作人员的准确情报，连夜做好部署并且撤出了百花洞。由主力三个中队会同连平乡附近的各路民兵一齐出动，形成一个包围圈，引诱敌人进去。敌人接近连平圩了，民兵首先打响，战斗愈打愈烈。天亮以后，满山遍野都是我们的兵。大沙这些地方的民兵也有机枪装备，敌人摸不清哪里是我们的主力，哪里是民兵。敌人放出信鸽，让它带着示意图要求增援，信鸽飞出就让民兵打下来了。战斗到下午，敌军几次向连平突围未成，分散逃窜。一小股敌人从大环跑到大径，被民兵包围在稻田里，打死了三名。这天夜里，敌人被围在原地里不敢动弹。第三天，战斗仍在继续，敌人出动飞机空投粮食弹药，却被我们的民兵和群众捡了去。敌人派出骑兵增援，又施放烟幕弹掩护突围。当日军大队长长濑率队突围逃窜的时候，我们的部队立即追击，把长濑从马背上击落毙命。其余的敌人仓惶逃走了。

这次战斗一共毙伤敌人五、六十名。我军伤亡了十多人。

日军在百花洞战斗遭到沉重的打击，哀叹“这是在华南登陆后最丢脸的一次战斗”。

经过一连串战斗的胜利，部队壮大，民心振奋，大岭山区成立了八个民兵中队。部队民运人员协助东莞县委，建立了大岭山中心区委，成立了八个乡的民主政权，还设置了联乡办事处。根据地迅速扩大。以大岭山为根据地的东莞游击区，与以阳台山为根据地的宝安游击区连成一片。

## 二

这一年，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广东的顽固派军队于九月份疯狂地进攻大岭山根据地。他们派出保八团和挺进第六纵队徐东来支队的刘光、杨参化两个大队，刘发如、李潮等土匪，大规模出动，加上反动地主的武装，共约三千人，向大岭山区全面进攻。敌人分兵两路：一路从连平出大环直趋张家山，控制大岭山西麓；一路以刘光为主力，纠合李潮、李积仓匪部，由徐东来亲自指挥，以大王岭、牛牯岭为目标。开始时，我们摆开阵势，正面迎击。战斗四天，敌人增兵，并炮击我方阵地。相形之下，我部队民兵力量悬殊，退入大岭山中。敌人占领了大王岭、牛牯岭、瓮窑、百花洞一带，大肆抢掠、焚烧、屠杀、强奸。盘踞三天，被杀的地方党员、民兵、妇女达数十人。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和日军的烧杀抢掠同样凶狠。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小队长杨仰仁和王声秋、陈广志、陈荣、颜金榜同志牺牲了。杨仰仁、颜金榜是从泰国和马来亚回来的华侨，为了民族的解放，他们牺牲在祖国的土地上。

我们派出地方工作的优秀干部刘荫、谭家驹、陈伯昌、黄坚等同志在绒旗墩被反动势力残酷杀害了。

曾生同志率领彭沃、谢阳光两个中队从大岭山到宝安来集中，同我们第五大队会合，在外线找寻战机，留下邬强带着翟信一个中队在大岭山坚持。这时已是一九四一年十月，正是秋高气爽，宜于夜战的时候。两个大队的主力集中在宝安，我们筹划着打一次大一点的战斗，消灭驻守在广九铁路线上石鼓车站的张林大队，以解除东莞地区的压力。

这一仗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张林有一个大队部和两个中队，分住在两个炮楼。结果我们攻下了一个炮楼，大队部住的那个炮楼没有攻下，只消灭了一个中队，缴获了两挺轻机和三十多条步枪。总算打了个胜仗，拔除了国民党在广九线上的一个据点，使我们铁路东西两侧的交通线不受威胁。

这时，两个大队集中在宝安，曾生、梁鸿钧等同志都在这里。我们就在一起开会，作出部署。

我们觉得不应该局处在广九铁路以西一隅，要恢复和扩大铁路以东原来“新编大队”的活动地区，成为犄角之势，便于各方互相支援，做成更有利于我们发展的条件。会后，曾生同志带着一个大队到铁路以东去了，我和梁鸿钧留在宝安。这时林平到了香港，找负责同志联系工作。

在此之前，阮海天带一个武工队到增城县的仙村、雅窑一带活动，已经站稳了脚跟。这也是伸出去的一支角，这支角也必须加强，此时我们也派了几个干部去加强这支武工队。

### 三

打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初开始，日军便在宝安境内源源不断地增兵。除了沿九龙边境驻满了军队外，沿广九铁路线、宝

太线、惠深线等铁路、公路上，每一条村庄都驻满了日军。各村的井水、塘水都被汲至枯竭了。这些军队都是从北往南运的。沿着九龙边界布置的是步兵，沿铁路线、宝太线、惠深线布置的则有骑兵、炮兵、辎重兵。这么大的兵力（我们估计它有两个师团）集结在九龙边界，进攻方向是对着香港无疑了。进攻香港，那就意味着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我们所处的地位和任务，也将随之而引起变化。

在敌人增兵的过程中，我们的周围都是敌人。不管敌人兵力多强大，只要它进入了我们的地区，我们就必须给以打击。我们沿着敌人的行军路上，以小部队进行伏击，选择有利的地形，对着他们的骑兵和辎重兵进行袭击。

敌人运动的兵力，是有一定的行军和集结计划的，它们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到达一定的地点，完成它的战役部署。因此，在遇到我们伏击的时候，它只能选择有利的地形掩蔽着，护送的步兵展开还击一下，就又继续前进了。所以，在敌人运动集结的过程中，我们利用小分队沿途打伏击，缴获了二十多匹骡马，还有不少弹药、饼干和罐头食品。

日军经过一个月的调动和集结，看来已经完成它的战役组织，进入了进攻出发地，等待命令夺取九龙、香港。

从十一月开始，国民党军队都远走高飞，离开我们这个地区了。

在这紧张的时刻，曾生同志到宝安这边来，我们和梁鸿钧三人共同研究了当前的情况，认为敌人对香港、九龙的进攻已经迫近。日军出动的兵力估计有两个师团，有二万多人；而英军在新界那边只有五千印度兵和尼泊尔兵，战斗力很弱。看情形，英军没有什么抵抗能力，日军对九龙是唾手可得，港九陷

入日军手中的局面即将形成。几年来的斗争经验教育了我们，提高了我们的智慧。敌人打到哪里，我们就应该把游击战争发展到哪里。我们决定组织一些精干的小部队，只要日军进攻一开始，立即跟随日军后面进入九龙。曾生那边由黄冠芳、刘黑仔从海上直达西贡村一带，开辟西贡那边的工作。我们这边则以曾鸿文、林冲组成一个短枪队，进入元朗、沙头角一带建立据点。我们下定决心，作好准备，在港九地区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十二月初，已经是剑拔弩张的时候了。曾生和我们谈妥，就回坪山去布置那边的工作。

十二月八日凌晨，一阵撕裂长空的飞机尖啸声在太平洋上悲鸣——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早上，我们在宝安听到隆隆的炮声，飞机轰炸声，还有密集的机枪声。不一会，飞机的轰炸声便越来越低沉，机枪声没有了。我们的情报员回来报告，沿边界的日军都向九龙前进了，边界线上只留少数日军驻守。

入夜，传来消息：九龙英军全部投降，日军已经进入九龙市区。

## 第十章 紧急抢救

### 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拂晓，日本陆海空三军用闪击战方法，在太平洋同时进攻香港、珍珠港、马尼拉、暹罗、新加坡。

在港九地区，日军早已陈兵边境，一阵炮击轰炸后，步兵、骑兵便从元朗至荃湾的一条荒僻的山路直趋九龙市区。日军看准了英军这疏忽的地带，抄到英军大雾山防线的背后。于是英军不击自溃，几千士兵弃阵而逃，漫山遍野都是英兵丢弃的枪支。日军开炮扫清了英军在路上布下的层层地雷，就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进。九日，日军占领九龙，在九龙的英国兵、印度兵、尼泊尔兵都成了俘虏。

接着，日军从海上把香港包围起来，每天炮轰一阵，威迫英军投降，香港也危若累卵。

在日军进攻港九的时候，第三大队的黄冠芳、刘黑仔和第五大队的曾鸿文已随日军之尾相继进入九龙。曾鸿文从元朗派林冲、苏光两同志回来，向我汇报了他们工作的情况：他们进入港九以后，通过曾鸿文的社会关系，很快就和当地的一些老朋友联系上了。英军逃跑的时候，他们拾得了一些枪支弹药，

组织起一支武装，进入新界山区活动。新界山区不同于市区和交通要道，日军暂时无暇顾及，是我们开展活动的好地区。但是，由于战争动乱，许多土匪、流氓地痞趁机起来，在这一带到处趁火打劫，闹得人人自危。曾鸿文说，在那个复杂的环境里，要使我们的力量得到发展，首先要赶跑或消灭那班东西。林冲从身上取出曾鸿文给我的一封信，又说：“现在我们已赶跑了一些地痞流氓，但是新界大雾山有一股大土匪占据着，为首的叫黄慕容，粉岭一带也有一股土匪，为首的叫肖天来。要赶走或消灭他们，我们的力量还不足。”曾鸿文信中的意见是要我派人前去支援，逼走黄慕容。

曾鸿文到元朗才几天，就初步站稳了脚跟，我心里非常高兴，立即找周伯明一同商量，决定由他和黄高阳率领二十多名精干的武工队员，往新界支援曾鸿文，并和第三大队那边派去的黄冠芳、刘黑仔取得联系。

周伯明他们到元朗后，马上就曾鸿文带着全副武装的武工队员陈兵于大雾山下，派钟清同志单身赴匪巢，与黄慕容交涉。在大雾山上，钟清见到了土匪头黄慕容，作了个揖，便说，曾鸿文是本地老一辈的“大哥”，现在为了抗日，重新“出山”，要在此地立足，请他委屈一下，暂时退出大雾山。黄慕容一听有人争夺他脚下的宝地，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但又慑于曾鸿文的威名和山下武工队的来势，在权衡了利害关系之后，只好摆出一副讲义气的神情说：“既然曾大哥要用这块地方，我们只好让出来了。希望日后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道。”说罢，收拾细软，带着人马，怏怏地离开了大雾山。

曾鸿文他们进据大雾山之后，积极开展工作，影响很大。老百姓支持他们，一些商人为了免于土匪抢劫，也前来要求保

护。曾鸿文他们见时机已到，就在元朗十八乡的大庙里召开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大会，号召大家支持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一个举动很得人心。肖天来也不得不服，主动派人找曾鸿文联系，订立君子协定，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他们又肃清了一些小股土匪，为开辟港九游击区扫除了障碍。于是，在新界、沙头角、大埔各地都迅速打开了局面。

黄冠芳、刘黑仔的武工队也在九龙城以东的西贡村、沥尾一带打好了群众基础，迅速站稳了脚跟，并且深入到了九龙城活动。

经过了在港九开展斗争的同志们的努力，很快地打通了大陆和香港之间的水陆通道，使我们在香港陷入日军手中之前未及撤退的干部、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一批批通过秘密交通线回到根据地来。

日本侵略者万万想不到，正在他们节节胜利，骄横跋扈之际，抗日的游击队已将一把把锋利的尖刀，悄悄地插向他们的

## 二

一九四一年圣诞节前夕，港督杨格宣布投降，香港被日军占领了。

在这紧急的形势下，党中央指示我们：由于国民党反共倒退政策，对进步人士和一些著名的新闻、文学、艺术界人士残酷迫害，致使几百知名民主人士及文化界人士留在香港，处境危殆。要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将他们抢救出来。中央将送一部分经费给我们，但限于交通不便，暂难送到，要我们先设法筹措，克服困难，完成这光荣的任务，同时



争取抢救一些国际友人。

任务是艰巨的。一月上旬，林平同志从香港及时地赶回来了，不久，梁广、连贯、曾生以及省委派到我们部队负责工作的杨康华同志等也都先后来到龙华，共同开会研究紧急抢救的工作。

会议决定利用我部队与港九地区原有的两条主要交通线进行：那些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元老等，将从西贡村坐船到上洞，由彭沃大队接应送到坪山，然后到淡水坐船往惠州；其他绝大部分的进步文化界人士，为免受国民党迫害，则走宝安这条交通线，即从荃湾到元朗，与难民一起通过沦陷区的日军封锁线到白石龙根据地来，然后再设法分散送到后方去。为此，我们决定把领导机构设在白石龙。荃湾到元朗，是我们三年来与港九联系的路线，现在作为最重要的一条交通路线。为了保证这条交通线上的工作顺利进行，我把我们部队中最能干的交通员沈标、谢懋照、麦容、赵林等调来专门负责接送的工作。

从香港到白石龙有一百多里路，沿途有日军的封锁线，有大大小小土匪的山头，必须派出足够的警戒人员才能确保安全，而那时我们进入九龙的武装队伍还很少，不得不借助一些稍有正义感和民族感的绿林好汉，这就需要我们做通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在部队经费不够开支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几百位著名文化人沿途不挨饿？他们有人病倒怎么办？路上走不动又怎么办？许许多多的问题，每个细小的环节都得周密地考虑。我们作了明确细致的分工：在香港组织好文化人，从香港用船送他们偷渡到九龙，这段路线由刘少文同志负责布置，潘静安、李健行、何鼎华、吴济生、何竺、何启明等同志执行；我负

责布置九龙到白石龙沿途上的警戒，设法筹款，解决吃饭问题。

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必须趁日军在香港立足未稳，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九龙正在不断疏散居民的情况下，把那些影响最大的知名人士首先抢救出来。因此，我们明确分工后，立即分头行动了。

当时，筹款是最伤脑筋的。战乱期间，行商减少，我们部队的经费主要来源——税站，收入自然也少了。因此，我发动同志们向附近的商人、地主借粮借款，并把税站收税的地区和范围扩大。同时，让港九地区活动的部队也承担起搜集物资、借粮借款的任务，帮助解决九龙新界地区交通线上的食宿供应。但是，这样也只能勉强维持。为了节约粮食，我们部队的生活更艰苦了，战士们每天只能吃粥和番薯、野菜，有时一天还只能吃上一顿。另外，由于战乱，梅林坳这个交通要地，不但停止了税款收入，还要担负救济每天路过的成千上万难民的工作。

### 三

敌后紧急抢救的工作开始了。在港九地区活动的武工队员、交通员们接受了任务，意识到时间紧迫，刻不容缓，立即化装分头摸进了市区。

在香港担负组织抢救工作的同志们，很快地和一批著名的文化人联系上，帮助他们化装成客商、海员、医生、太太、工人、小贩等，反复转移住地，避开敌人的耳目，摆脱敌人的监视追踪。一月九日夜晚，当交通员进入市区后，就马上带着第一批化装成难民的文化人来到铜锣湾上了小船。在月光朦胧的江面上，小船绕过密密麻麻的大小船只，停泊到铜锣湾最外

头，静候着偷渡的时机。第二天拂晓前，当铜锣湾出口处守卫的日军哨兵换岗时，小船就飞快地冲出了湾口。小船上的船工都是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他们让文化人们藏在舱板下，沉着应付各种突然出现的情况，终于不失时机地把小船划出敌人封锁线。天蒙蒙亮，小船就到达九龙红磡了。上岸后，再掏出钱来应付一下那些专向偷渡者索取“买路钱”的“烂仔”<sup>\*</sup>，“偷渡”就成功了。就这样，几天之内，在香港的几百名文化人，安全地转移到九龙我们部队的交通站来了。接着，交通站的同志便负起带他们来白石龙的任务。十一日清晨，第一队文化人离开九龙向青山道出发，这一队有茅盾、邹韬奋、戈宝权、叶以群、于伶等数十人。青山道是难民们的必经之路，他们化装成难民的样子，有的身上背一小袋米，有的带些简单的包袱，把眼镜、钢笔这些知识分子用的东西都收藏起来，在我们最好的交通员谢僊照、赵林的带领下，经荃湾出元朗。我们设有茶水站，休息、用饭站。其中一大段荒无人烟的山路有土匪出没，但我们在事前已经打好了招呼，他们都不敢妄动。有些地方偶尔跳出几个拦路打劫的“烂仔”，都被我们的警戒人员缴了械。因此，这段路还是比较顺利地通过了。

在赤尾过了河，要通过日军的一道封锁线，这是比较危险的一关，因为这些文化人中有象邹韬奋这样的著名人士，不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密令“就地逮捕与惩办”的对象，日军对他们也是恨之入骨的。在这段路上，就由我们的“白皮红心”的伪维持会长出面掩护，替他们办理证件，证明他们是回石龙镇去的难民，在维持会长的照应下，通过一段七里路的沦陷区到达梅林

---

\* 烂仔：地痞流氓。

村，接着登上梅林坳，走下山坡就到了望天湖村。这时候，领路的交通员轻快地哼起大家熟悉的《游击队歌》，文化界的同志们立即醒悟到这是到家了！他们欣喜若狂，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疲劳，直奔上前面林木茂密的山岗上大声欢呼起来，就连在路上扭伤了脚的邹韬奋同志也不例外。

他们象一群冲出了牢笼的自由鸟，无法抑制脱险后激动的心情。前面，在密密的林荫下，出现了一间小小的两层的白色楼房，那就是我们设在白石龙的指挥部，我们就在这间小楼里迎接了第一批脱险的文化人。

就这样，在这一条秘密交通线上，我们的同志冒着生命的危险往来穿梭般地奔走于其间，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一批接一批地把文化界人士安全地送到白石龙。

在抢救文化人的过程中，我们的战士遇到了很多困难，如经费不足，敌情发生变化，与外省的文化人之间语言不通等等。但是，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他们都想尽办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一路上，文化人为了减轻负担，往往把行李一件一件地丢掉，战士就一件一件拾起来自己背着，一直送到目的地。他们的一举一动，使许多文化人为之感动。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姓郑的小交通员，在大鹏半岛一个秘密交通站掩护两位作家，等候接应的同志到来。可是，出现了意外情况，日伪军开始了连续三天的扫荡，他们三人被困在一个山洞里，无法出去取粮食，小郑把身上仅带的五条番薯全给了两位作家，自己推说吃过了。待到第四天，他刚刚把两位作家交给来接应的同志，就眼前一黑，饿昏过去了。许多著名的作家拿起笔来，热情赞颂了这些平凡的战士。

一批批文化界的同志接踵而至，僻静的白石龙变得热闹非凡。山坡下、竹林里，盖起了一间间草寮。在这里，安置着我们国家的瑰宝。敬爱的同志们，你们遭受国民党的迫害和日本侵略者的摧残，饱经忧患，请在这里稍事休息吧！这里一切都那么简陋，只有忠诚的战友守卫着你们。

就在这小小的山村之中，我们接待过三百多位名闻中外的作家、艺术家、名记者，以及各方面的民主人士。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张友渔、胡绳、沈志远、宋之的、金仲华、刘清扬、杨刚、胡仲持、胡风、廖沫沙、周钢鸣、张铁生、黎澍、蓝马等。

第一批文化界名人到来的当天晚上，我们请他们吃了一顿美味的狗肉。饭后，篝火在山腰上点燃起来，大家围着篝火席地而坐，一个野外联欢晚会就开始了。篝火映红了战士们的脸庞，晚风传送着战士们悠扬的歌声。

那高谈阔论，吸引了好几个战士围在身边的是评论家，那即兴朗诵的无疑是诗人了。但那又会唱京戏、又会说大鼓书的，谁也料不到是剧作家于伶。

给战士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当然是一个年轻美丽、表演出色的姑娘，她获得了全体同志最热烈的掌声，虽然很少人知道她就是当时的名演员凤子。

白石龙的绿水青山，留下了爱国文化名人纷至沓来的足迹。白石龙的清风明月，又伴随着他们的笑语欢声渡过东江，转移到内地去了。谁会想到这满山荆棘的白石龙，偏僻荒凉的阳台山上，曾经住过这么多闻名中外的名流学者呢。

#### 四

邹韬奋、戈宝权、胡绳、沈志远等几位著名的文化界人士由于身分比较暴露，不容易通过国民党统治区，因此，他们在我们部队逗留了两个多月，直至四月份，才陆续秘密地回到内地去。他们几个人可以说是几百脱险的文化人中受苦最多的。在他们到达白石龙不久，国民党就配合日军两面夹攻白石龙，被我们打退了。接着，国民党又使出谈判的花招，在布吉要与我们谈判，说与我们合作反攻香港。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贼眼老是往国内外有名望的文化人士身上溜。邹韬奋他们呆在部队的时间越长，经受的风险就越多。不久，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我们就带他们转移到龙华的阳台山。在阳台山上，情况好一些，但也不时要跟部队在夜间行动，以应付突变的情况，这样，他们就得和战士们一起跋涉于山路溪涧之间，出没于荆棘草丛之中。碰上无星无月的风雨之夜，那就更艰苦了。要知道，他们都是从未有过这种训练的知识分子啊。但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们却是那样积极愉快，真令人钦佩！他们在部队逗留期间，对部队的政治工作帮助很大，经常到政治部和附近单位写传单、标语，给战士们上文化课，教唱歌，讲故事，介绍文化界人士在蒋管区的斗争等等。戈宝权、胡绳、黎澍等同志还直接协助了政治部的工作。他们不但适应了游击区的艰苦生活，而且还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游击区的活动，向我们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在他们和许许多多从香港回来参加我们部队的知识分子的帮助下，我们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许多文化界著名人士都很

喜欢我们的战士，经常与战士们一起促膝交谈。特别是邹韬奋同志，他非常关心我们部队的《新百姓报》的工作，翻阅起那张小小的报纸来总是爱不释手。宋之的同志说：邹韬奋同志有“办报瘾”。真是一点不假。有一次，邹韬奋一口气读了几段《新百姓报》的报道，激动地翘起大拇指说：“真不简单，你们四处为家，艰苦创业，为民族解放而大喊大叫，真是可喜可嘉。只有共产党员才有这样的胆识和远见！”接着又说道：“我在二十年前想做个新闻记者，在今天我还是想做个新闻记者，提起自己的秃笔与黑暗势力作斗争。唤醒国人，奋起救亡御侮，是我平生之愿！在你们的报纸上，我看到了我应该学习的东西。”

谁都知道，在抗战初期，邹韬奋先生主办的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刊物，在全国杂志中是声望卓著的。他这样夸奖我们的报纸，真使我们办报的同志受到莫大的鼓舞。他还经常为报社写稿改稿，在他热情的帮助下，办报的同志在稿件写作、版面编排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的教益。

临离开白石龙的时候，邹韬奋同志又建议我们集中人力、物力把报纸质量办得更高些。他说：“《新百姓报》和《团结报》都是你们游击队总部领导的，我看把它们合起来，叫做《东江民报》，可能更好些，这样更有地方的特点和色彩。”

他的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在同志们的请求下，邹韬奋同志欣然挥毫，写下了“东江民报”几个清秀隽丽的大字，茅盾同志在到内地去之前也为这份报纸的副刊题了刊名。

两个很有名望的作家为我们的报纸题了字，《东江民报》自此影响也更大了。后来这个报纸为适应军队的性质，又改名为《前进报》。

四月上旬，戈宝权同志接到周恩来同志的通知，与沈志远

夫妇一道下山，往重庆去了。接着，邹韬奋同志和胡绳同志也最后离开了东江游击区。

人离情在，他们对我们部队的帮助和鼓励，是每个东江游击队员永难忘怀的！

这次规模宏大的敌后抢救工作，前后经历了三个多月时间。被从日本占领军统治下的香港抢救出来的，除了著名民主人士、知名文化人三百多名以外，还有数千名工人、学生以及英印军官和各国留港人员。同时，还救济了难胞一万人以上。在全国，在海外华侨中，以至在国际上都很有影响，成为举世瞩目的事情。为此，我们得到了党中央来电嘉奖。



## 第十一章 犬牙交错

###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我们党在东江建立的部队地位更加重要了。队伍也有一个新的发展，在香港工作的一批党员骨干以及大批进步工人和知识青年到了东江，扩大和加强了我们的队伍。党为了加强对广东武装斗争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加强东江游击队的建设，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二是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

广东军政委员会是遵照中央指示，在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同志直接指导下组成的。张文彬同志在我们抢救文化人的时候，从香港通过秘密交通线到部队来。他在部队停留了两个多月。

成立军政委员会，是为了统一东江和珠江三角洲敌后斗争的领导，并使两个地区的斗争能够互相配合。珠江三角洲武装部队负责人之一的罗范群同志，越过重重险阻，来到宝安参加会议。会议在张文彬同志主持下举行，决定军政委员会以林平同志为书记，梁鸿钧、曾生、杨康华、林锵云、罗范群同志和我为委员。自此以后，我们东江部队与活跃在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带的珠江游击队，取得了行动上的互相配合，直接建立了交通线。

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四月初，相继召开了军政委员会会议和干部会议，总结了惠、东、宝武装斗争经验，决定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建立总队司令部和政治部。总队由梁鸿钧同志任总队长，林平同志为政治委员，曾生同志和我任副总队长，我兼任参谋长，杨康华同志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东明为政治部副主任，邬强为参谋处长。在内部，总队军事工作由梁鸿钧同志负责；对外公开出布告，则由曾生、王作尧署名为正副总队长，以适应政治需要。总队下面成立四个地方大队和一个主力大队：东莞大队，曾生兼大队长，陈志强为政治委员，翟信为副大队长，陈鸣为政治处主任；宝安大队，曾鸿文为大队长，何鼎华为政治委员，阮海天为副大队长，陈坤为政治处主任；惠阳大队，彭沃为大队长，谭天度为政治委员，高健为副大队长，叶锋为政治处主任；港九大队，蔡国梁为大队长，陈达明为政治委员，黄高阳为政治处主任；主力大队，由我兼任大队长，卢伟良为政治委员，周伯明为副大队长，卢克敏为政治处主任。此外，还成立了干部训练队，名为“华南队”，由谢阳光任队长。

张文彬同志在部队期间，认为我们部队担负的任务重要，所起的作用也不小，必须加强部队的建设。他对建立和健全部队的政治工作制度很重视，除了坚持在中队以上单位配备政治干部以外，还在排一级单位配备政治服务员，班设政治战士。这一来，大大加强了整个部队的政治工作。

在军事上，张文彬同志和我们一起研究，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坚决采取游击战为主，避免打硬仗和消耗仗，要避实就虚，击敌弱点，逐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要研究爆破技术，解决攻坚问题。

张文彬同志还带来了专门为我们部队培训的电台工作人员。在此之前，党中央已经拨给我们一部收发报机。从此，我们可以直接向在延安的党中央以及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请示和汇报工作了。

总队成立，部队经过整编之后，制度健全了，各种工作都逐步走上了正轨，为后来成立东江纵队莫下了基础。

张文彬同志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反复指出：东江地区的战略地位很重要，一定要紧紧掌握武装，坚决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国民党是要来打摩擦仗的，我们的斗争十分艰苦复杂，但是熬过困难就是胜利，熬过困难就会迎来大发展。

这时候，我们所处的是犬牙交错的环境，斗争是复杂艰苦的。避开日军的锋芒远远逃遁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看到我们的力量发展了，又回师来对付我们。在敌伪、顽两面夹击之下，虽然内战迫在眉睫，我们还是坚持以抗日为主，积极打击日军。铜锣径伏击战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铜锣径在梧桐山下，是夹在两条长长的山梁中间的一条山谷公路，路两边尽是悬崖峭壁。因为谷深，人在路上走，在山顶上面听来当当作响，有如击铜锣之声，故名铜锣径。铜锣径是横岗至坪山、龙岗的必经之地。当时，横岗驻扎着日军的一个炮团，他们常常经铜锣径往我们惠阳大队的活动地区坪山、龙岗骚扰抢劫。曾生派出了彭沃的主力队挺进离横岗三公里的山子下村，寻机把敌人狠狠地揍一顿。

五月十五日，日军一个骑兵连又到坪山抢劫。部队闻讯后，在彭沃同志的指挥之下，迅速插到铜锣径南面的山梁上埋伏下来，准备痛击回程的敌人。

太阳爬上了东山，又慢慢往西山移去，战士们埋伏在芒草

丛中，满身大汗，又饥又渴。约莫下午三时左右，静寂的山谷响起了嘀嘀嗒嗒的马蹄声，这才等到了回师之敌。只见敌人的队伍零零乱乱，马背上驮着一袋袋的粮食，日军提着鸡鸭，牵着猪牛，拖着疲倦的步伐，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当敌人离我们前头部队约三十米的时候，战士们再也按捺不住了，纷纷扳动了枪机。象是晴天的霹雳骤起，山谷中顿时响起了雷雨般的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敌人毫无准备，吓得赶忙扔掉了抢来的东西，随后组织起马队向我前头阻击部队冲来。这时，我们埋伏在水沟里的突击队一阵排头火，扫下了几个敌人。受惊的马匹发出了凄厉的嘶鸣，在山谷中乱奔乱窜，日军的阵脚全乱了。他们匆匆后退，连人带马跌在一个洼地上，架起一挺机枪死命地封锁着公路。我们的战士居高临下，又打死打伤了不少日本兵。战斗打了半个多小时，彭沃见伏击的目的已达到，考虑到此地离横岗不远，敌人炮团的大部队会赶来增援，就果断地撤出了战斗。果然，横岗的敌人出动了十辆大卡车，拖了四百多援兵赶到。这时，彭沃已经带领同志们全部撤离铜锣径了。敌人架起野炮，向两侧山头轰击。炮声隆隆，只不过给我们增添战斗胜利的气氛罢了。

这一仗，我们毙敌十五名，伤敌二十多名，毙伤战马三十余匹，缴获四匹。

## 二

从一九四二年四月至一九四三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发动了长期、残酷的进攻，逼着我们打了一场艰苦的摩擦仗。在日军进攻香港、九龙时远走高飞的国民党部队，这时看到日

军主力转移，我军大发展而未巩固之际，妄图将我们彻底消灭。内战风云在东江上空翻滚达大半年之久，而斗争的结果则以顽固派的阴谋破产告终！

在这一年中，国民党顽固派使用了正规军一八七师、独九旅、独二十旅以及保安第八团、挺进第六纵队的杨参化、黄文光大队等地方团队。他们的进攻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集中兵力向我们的根据地进攻，企图消灭我们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第二阶段是施用反革命两手，搞“和平谈判”，企图麻痹和分化我们，并在这个烟幕掩蔽下搞突然袭击，消灭我们；第三阶段是“和谈”阴谋失败后，发动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军事进攻。

一九四二年四月，国民党顽固派首先通过各种渠道，使用多种手段，散布所谓要同我们“合作抗日”、“联合反攻香港”的空气，随即以阳台山为主攻方向，进攻我们总队部和主力部队所在地——宝安。

四月十四日，国民党军挺进第六纵队司令邓其昌，指挥其所属部队向我们宝安地区木古、甘坑、青湖、岗头仔、板围、象角塘等处进攻，这些村庄被洗劫一空。十七日，国民党一八七师以三百人由青湖出发经山咀头到龙华，当晚即向赤岭头、窑夏附近山地搜索。

十八日起，顽军集结了更多的兵力，以一八七师两个营加上黄文光大队，向我们阳台山地区进攻。我们大部分部队撤出到敌占区附近分散活动，留下主力大队副大队长周伯明带领小部分部队驻扎在阳台山，并掩护在焦窝的民运队撤出。当时我们部队刚刚经过迅速的发展，不少从港九来的工人、学生编入了部队，缺乏作战经验。部队面对着数十倍于我的顽军，一面奋战，一面转移，有三十几位同志牺牲了，令人非常痛心！这

时，黄业、何维第二中队遇到顽军的进攻，他们立即抢占有利地形，经过激烈的战斗，及时进入地形复杂的山坑隐蔽。这次战斗，双方各有伤亡，我们损失了十多位同志。接着，顽军又出动至望天湖、樟坑、白石龙等地，我们的部队在樟坑、望天湖一带与敌人激战，人员和武器装备又遭受了损失。以后敌人即以龙华、观澜为中心，不断向我们根据地出扰抢劫，屯兵扫荡，枪杀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

国民党顽固派这时早已收起“合作抗日”的幌子，露骨地狂叫“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在东江的部队”了。

为了给来犯者以有力的回击，打退顽固派的猖狂进攻，总部决定把主力大队从顽军主攻的宝安转移到外线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打击盘踞在东莞大岭山的顽军杨参化大队，夺回大岭山的老根据地。总部派梁鸿钧和我前往东莞，参谋处长邬强调任主力大队大队长，率队开到东莞，会同东莞大队以及惠阳彭沃大队共同作战。六月底，几支部队集中到大岭山，掩蔽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大王岭、百花洞、大环一线。然后，由原来留在这一带的翟信中队故意暴露目标，引杨参化部队出来。果然，杨参化从金桔岭据点出来了。按照原定作战计划，邬强率领主力大队在大环一带拦截，彭沃率队迂回到顽军侧翼。敌人接近我们的部队，打响了！狡猾的敌人发现是我们的主力，不敢接战，马上后撤。敌人逃得太快，我们还未能达到前后夹击的目的。梁鸿钧和我都认为，良机虽然错过，但决不能轻易放过他们，于是下令穷追。彭沃部的六〇炮开始射击，“轰、轰”几声，在敌人阵地上冒起了几条烟柱；轻重机枪也一齐打响。游击队使用炮，使敌人更加慌乱了，逃得飞快。敌人逃回金桔岭，我们追到金桔岭，他们又向大朗逃去。

由于未能掌握到最好的战机，这一仗仅毙伤了敌人十多名，我们两位中队长符东和沈鸿光受了伤，符东同志不久就牺牲了。

这一仗，我们虽然没有能够大量消灭顽军，但是，把他们从大岭山区赶跑，恢复了我们的老根据地。多年来同我们血肉相连的老区群众看见我们的大队伍回来了，就象久旱的禾苗遇到雨水，脸上绽开了笑容。他们把刚刚长熟的荔枝从树上摘下来，摆在路旁，队伍经过，每个战士塞给一挂，不收下不行。

国民党独九旅知道我们的主力到了东莞，七月初，又率领杨参化、刘光部一共八百多人，向我们反扑。我们往南转移到红山上。

红山是一列不太高的山，与大岭山、莲花山相连，一直延伸到莞太路边。我们把队伍放在红山上面，居高临下。敌人发动了几次进攻，都遭到我们的打击，每次进攻，都有死伤。他们踌躇不前了，逐渐退到山脚下，朝山顶乱放枪，间中也打几发炮弹，枪炮弹削去了山顶上的树枝杈，在山坡上溅起了一阵阵赭红色的尘土。

战斗打了一天，黄昏时候，顽军已经伤亡了六、七十人，不敢再战，在我们的呐喊声中跑回了常平。

这以后，我们分头行动，打了几个小胜仗，逐步控制了整个大岭山区。我们的民运队又深入到村村寨寨，大岭山上，到处又响起了抗日的歌声。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罪恶内战的第一阶段，就是这样被粉碎了。

### 三

我们回师宝安。

八月间，国民党一八七师和独九旅共六个团的兵力已逼近铁路上的平湖、布吉。

在龙华，林平同志召集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目前的形势以及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

林平同志说：“国民党谈判代表黎樾廷来到平湖已经好几天了，他是通过我们宝安大队的后方办事处主任张作铭与我们取得联系的。他声明不是代表国民党而是代表蒋光鼐和王若周来的，要亲自与王作尧谈判，以消除过去的误会，免使东莞桑梓遭难。”

明底细的人都知道，这个前来谈判的黎樾廷，大革命时期曾经参加过我们党，“四·一五”事变后，他叛变投敌，换得了军统少将的职位。

林平同志征求了我们的意见后，冷静地分析说：“国民党派人来谈判，居心当然不良。但是，我们处在抗日战争的敌后前线，环境很复杂，虽然内战打了几个月，统一战线还没有破裂，既然他们来谈，我们还是谈。我们必须严阵以待，随时防备他们发动武装进攻。”

在会上，大家商量了一些对策之后，决定由我与何鼎华出面与黎樾廷谈判。何鼎华在东莞中学念书的时候，黎是该校的校长，与他有过师生关系。

谈判地点设在甘坑村外的一个沙梨园中，甘坑是顽军据点平湖与我们游击区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为了避免在谈判中遭敌人暗算，我们选择了这个地点。

我们通过张作铭去通知黎樾廷，约他晚上到来，不得带枪，只能带一名助手。我们派出一个小队，迫近平湖进行警戒。我和何鼎华走到沙梨园，在沙梨园东头一间守园人夜宿的



小泥屋里，静候黎樾廷的“大驾光临”。

黄昏，黎樾廷和原王若周第五大队的大队长黄醒中，在张作铭和两个卫兵的陪同下，慢步走进了沙梨园。这时天还未黑，我招呼他们进屋就座。松仔、林佳等几个警卫员，散开四方观察周围动静。

黎樾廷头发灰白，戴着金丝眼镜，他圆滑世故地和我们拉家常，说：“我也是东莞人，大家都是乡里”。十几年前，我在东莞中学当校长，那时候，何鼎华是我的好学生。今日师生相见，又有机会认识作尧兄，真是喜上加喜呀。”

“我们还是开始谈谈正事吧。先生不怕危险，亲临战地，定有高见指教，我们洗耳恭听。”我笑了笑。

“哪里，哪里。”黎樾廷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道：“如果不是老兄名扬远近，小弟又何至受蒋、王二公差遣，冒风险前来拜会呢？”他见我们不感兴趣的样子，赶忙又补充说：“我这趟来，确实不是代表官方，只代表我们东莞众乡亲，作为乡里和你们谈谈罢了，大家不必存有戒心。前几个月我在重庆，见到我们的前辈蒋光鼐先生和王若周先生，他们要我回来找你，设法和解和解。现在是抗战时期，不要互相阋墙了，共御外侮嘛。”

何鼎华同志冷不防地将他一军：“恐怕谈不上什么兄弟阋墙吧。我们在前面打敌人，国民党在后面打我们，谁不痛心？黎先生既然代表东莞众乡亲而来，忍看自己的学生挨打、自己的桑梓遭受摧残吗？”

这下子，黎樾廷有点慌了手脚，连声说：“是呀，国民党

---

\*乡里：同乡。

腐败无能，不积极抗日，这谁都知道。不过，我们在东莞这几支部队都是一家，之所以关系紧张，有时发生一点半点摩擦，多数由于误会，是误会之过而已。”

“没错，”坐在黎樾廷旁边的黄醒中这时候插话说：“主要是误会，现在团结抗日，但是你们没有合法的番号，就难怪有时候大家动‘家伙’了。我就不明白，作尧兄为什么要死抱住共产党的招牌不放。你们这样，于桑梓无益，于自己无利。其实嘛，抗日也是捞世界，我看还是——”黄醒中说得眉飞色舞，口沫四溅。他原是莞中学生，比何鼎华低两班，现在紧跟黎樾廷，挂上了个上校的牌牌。我拿话刺他一下，说：“醒中兄真是见多识广，想当年共事之时，我就看出老兄和别人不同，隔别两年多，老兄果然飞黄腾达，想必是会捞世界之故吧。”

“哈哈，过奖，过奖，小弟算得什么。如果你们愿意重新得到番号，小弟一定从中帮忙。目下，老兄挂个上校的牌牌是不成问题的，至于将来，小弟自然是望尘莫及的了。”黄醒中得意地回答。他的话说出了黎樾廷的意思，黎樾廷满意地笑了。

我正色回答说：“为了团结抗日，重新要番号问题可以谈判，但是必须以我们的条件作为基础。”接着，我根据我们事前商量的意见，向他们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我和何鼎华同志来谈判，是代表整个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我们是个总队。如果要给我们番号，得要包括我们所有的部队，不能单给在东莞或宝安的部队。第二，我们受编不受调。广九铁路以西整个地区应划定给我们活动，国民党在这个地区的武装必须退到广九铁路以东去。第三，要与国民党正规军队一样待遇，要定期发饷、发枪支弹药。

黎樾廷从金丝眼镜里露出了奸狡的眼光，他表示愿意接受我们第二、第三个条件，但不愿意接受第一个。他说：“我是了解你们部队的情况的，曾生他们在惠阳那边，与你们不在一起嘛。再说，蒋光鼐、王若周只是为东莞弟兄着想，你是他们的同乡，他们可以替你说话，可以担保你。惠阳那边，因为蒋、王二公不认识曾生，替他说话就不大方便了。”

我坚持曾生和我们是同一个总队的。黎樾廷又说道：“这样吧，曾生他们的番号问题，我可以回去反映。你们先出来，编成一个支队，曾生他们将来再编作一个支队吧。”

我一再申明，我和曾生是一支部队，决不能分开。为此，两方相持不下，谈判就这样僵持着。从黄昏谈到第二天早晨四点多钟，一直没有结果。这时候，林平派人悄悄告诉我，国民党一八七师已经到达平湖，并准备随时出动。我想，事情已经十分清楚，国民党是假谈真打。谈是想借此麻痹我们，还妄图分化我们，以便各个击破。于是，我向黎樾廷说：“时间已经不早，大家都累了，改天再谈吧。”然后客气地派张作铭送他们回去。

黎樾廷他们一走，我和何鼎华赶到龙华，向林平汇报谈判的经过。看样子，黎樾廷回到平湖，顽军就可能出动袭击了。于是，我们立即动员群众收藏物资，离开村庄到山上去，通知所有的机关和部队，立即进入紧张的战斗准备。

黎明，东方刚泛出了淡淡的鱼肚白，顽军就从灰蒙蒙的天幕下出现了。龙华、布吉附近，到处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枪声。枪声掠过长空，一阵比一阵紧迫，国民党顽固派出动了，早有预谋的进攻开始了。

我们立即展开了还击。

部队避开敌人十倍于我的进攻锋芒，分散打麻雀战，并在游松、大船坑、石坳，布置了几处小伏击，以减弱敌人的进攻速度。非战斗人员往南面日军占领区边缘麻苴一带疏散——这是我们习惯的做法，越是靠近日军占领区，国民党顽军越是奈何我们不得。日军一时不摸底细，也未敢轻举妄动。我们到这里掩蔽，反而比到其它地方安全些。

顽军这次突然袭击，扑了个空。我军有所准备，没有遭受什么损失。国民党顽固派交替使用政治谈判和军事进攻，同样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 四

一九四二年十月，国民党顽固派以一八七师师长张光琼为代表人物，对我们宝安地区采取了十分恶毒的“勤剿、穷追、杜绝”的作战方针。从这时候起，连续三个月，顽军几乎天天出动，采取分进合击、拂晓进攻等战术，妄图将我们在宝安的领导机关和作战部队一举围歼。他们还深入我们的基地，切断交通要道，实行分区清剿。他们到处扑击我们的税站，妄图断绝我队经济来源。他们还在我们的活动地区建立乡公所办事处，实行联保连坐法，妄图切断我们同群众的联系。总而言之，他们采取一切凶残狠毒手段，务必消灭我们才甘心。在这期间，我们的队伍经常处于分散隐蔽状态，斗争十分艰苦。但是，宝安地区的人民群众，正如东莞、惠阳的群众一样，尽管国民党顽固派的屠刀时刻架在脖子上，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他们出生入死，不顾杀头烧屋的灾祸临头，掩蔽我们的非武装人员，救护我们的伤病员，拿出仅有的粮食油盐哺养我们。我们就在英勇的宝安人民群众支持之下，度过了这段艰苦的日子。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唯一的回答是：我们是东江人民的子弟兵。几年来，在日伪、顽两面夹击中，我们的一切行动证明：我们无愧于这个称号！这样的队伍，任何强大的敌人也消灭不了！

在国民党顽固派疯狂进攻的时候，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使我们遭受了损失。一个名叫张作铭，原是宝安大队后方办事处主任。黎樾廷来谈判，是通过他找关系来的。谈判那天，由他把黎送回去。在顽军大举进攻之时，他带了顽军一个团直奔雪竹径和龙华，捕捉、杀害我们地区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放火烧了曾鸿文、周吉和乡长卓凤康等同志的家。另一个名叫陈白玉，原是雪竹径北面岗头仔村的党支部书记。岗头仔有个不知何年挖下的小山洞，我们用它作为秘密仓库，存放武器、弹药、衣服等物资。顽军进攻时，陈白玉吓破了胆，在威迫利诱下叛变了革命。他首先拿这个仓库作为向顽军进见之礼，接着供出了我们地下党组织的名单，致使我们税站总站站长黄国平同志和白芒的党员张金洪同志遭顽军杀害。两位烈士的头颅被割下来，挂在乌石岩圩场上示众。在洪田村及凤凰山一带，他们又枪杀了朱金玉等同志。

陈白玉叛变后，当上国民党的乡长，平日躲在顽军据点中，不敢外出活动。一九四三年大年初三，陈白玉回岗头仔村家里过年。我们的武工队担负着政治部保卫科布置的锄奸任务，一直监视着这个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叛徒。陈德和同志带领两个武工队员，就在夜里潜进岗头仔的乡公所，处决了这个叛徒，为死难烈士报了大仇。

在顽军大举进攻期间，日伪军也不时出动夹击我们，黄田战斗就是一例。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宝安大队一中队卢耀康小队刚

从乌石岩打伏击得胜，回到咸田基围掩蔽。总队部的参谋陈炎和政治部的组织干事李天赋同志也来到他们这里。清晨，顽军一八七师黄营前来袭击，卢耀康小队马上投入了战斗，以密集的火力压住强敌，立即甩开敌人，撤到村东面几里远的一个土坡上。这时，附近的日、伪军闻声，也赶来追击。小小的一支游击队三面受敌，只好退到黄田以西的围垆。这里是一片平坦的沙田，无险可守。他们且战且走，忽然，一道大堤锁住他们的去路，浩瀚的珠江口横陈在眼前。他们依堤抵抗，战斗到中午，陈炎、李天赋同志以及这个中队的正副指导员王密、王天锡等同志一个接一个牺牲了，连最后一颗子弹也打光了。

敌人见我们小队子弹用尽，就疯狂地压过来。坚持到最后的卢耀康等十一位同志大都受了伤，他们砸烂了枪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英雄们的鲜血洒在珠江口上。

黄田战斗后，我们在尖岗山同顽军打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彭沃的主力部队小队长邱特，带了八个战士，八条英国步枪（战士们叫它“红毛十”，因为它一夹可装十发子弹），分成四个小组，仗着各人一双飞毛腿，在尖岗山、牛城一带和入侵的顽军打麻雀战，使敌人疲于奔命，困扰不堪。政治部警卫排的排长沈标，自己用一条手提轻机，带着四、五个人，四、五条步枪，分两个小组，发挥神枪手的本领，也杀伤了不少敌人。顽军一八七师派兵再度进攻尖岗山，沈标一个排在前面山上顶住，主力部队守在山顶。敌人强攻，大叫：“缴枪吧！”沈标答道：“看我缴一梭子弹头给你！”说着，就准确地扫射过去。打到天黑，顽军只好撤走，已经被我们杀伤了四、五十人。这一仗，使顽军知道，经过三个月的“勤剿、穷追、杜绝”，我们

的部队没有被压垮，仍然保持顽强的战斗力，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于是，尖岗山一役，就成了张光琼退兵前的一战。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沈尔七指导员英勇地牺牲了。

## 五

我们部队通过电台直接向延安党中央汇报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向我们疯狂进攻以及我们坚持斗争等情况。

十二月下旬，林平派港九大队的交通员来叫我和梁鸿钧、杨康华立即启程到港九地区开军政委员会会议。

从东莞到港九，路程是遥远而曲折的，一路上的情况又很紧张。我决定从水路走，多绕几个弯，经宝安会同梁鸿钧一起，再到三洲田与曾生会合，然后一同渡海过九龙。

我从东莞的乌沙乘船出珠江口往南走。船很小，只能坐下我、两个警卫员、一个交通员和一个撑船的。这一夜，半边新月挂在中天，向四野洒下淡淡的清光，两岸是一人多高的蕉树，我们的小船在河涌上滑行，就象一片浮动的蕉叶。四处静悄悄的，只有竹篙抬起来时，水珠顺着竹篙滴进江中，响起一串串轻柔的水声。

河岸渐渐宽阔，天蒙蒙亮的时候，小船划到了沙井，只要过了沙井就安全多了。这时候，前头忽然响起了“哒哒哒哒”的汽艇轮机声。坏了！一定是日军的巡逻艇来了。

警卫员林佳、叶松着急起来，叫我赶快上岸躲避，这时小船离岸边还远，巡逻艇的旗杆已经在河面上出现，来不及躲了。我心中暗暗着急，幸好撑船的机灵，他一看前面几十米的河面上有一片灰蒙蒙的东西，是一片半人高的水草，他就拚尽

全力往前撑去，小船一下子钻进了茂密的水草丛中。

“哒哒哒哒”，日军巡逻艇的声音越来越响了，一道探照灯光柱掠过我们的头顶。同志们都憋住气，紧握手中的枪。这时我心里反而踏实多了，因为我知道，日军的巡逻艇怕搁浅，不会靠近长满了水草的河床。再说，天色尚早，灰暗灰暗的，只要我们不声不响，敌人是不容易发现我们的。

果然，日军探照灯的白光在我们头顶上晃了几晃，就从我们前面滑过去了。不久，震耳的马达声就象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低下去了，巡逻艇慢慢地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过了沙井，一路顺风顺水，快到晌午时分，小船在黄田拐了几个弯，就碰到了梁鸿钧派出警戒的战士，把我们接进一片水草丛中。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梁鸿钧和刚从中山赶来的罗范群。我们三人一道继续从水路向南进发，经和平、福永到西乡，然后改行陆路，沿着边界线，翻过梧桐山，到三洲田与曾生同志会合，杨康华同志从陆路也到达了，最后在红石门村的海边见到了林平同志。我们就在海边的一个石洞中开了军政委员会会议。

林平同志重新传达了中央的电报。电报是周恩来同志签署的，他指示我们：余汉谋对我们东江部队是“势在必打，志在消灭”，不能对余汉谋存有和平幻想，只能依靠群众去取得胜利。我们认真地研究了 this 指示，回顾了前一段的反摩擦斗争。我们认为，东移受挫后，经过中央指示的教育，我们要在敌后地区坚持斗争和求得发展，必须在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准备同国民党顽固派打摩擦仗，这一点已经认识到了。但是，对余汉谋的认识就还不够清楚。余是广东军阀，就全国范围来说，属于地方实力派，是可能争取团结抗日的人物。然



而，就广东来说又当别论。广东是余汉谋长期控制的省份，对于我们在他眼皮底下生存和发展是绝不能容的。所以，中央指出的“势在必打，志在消灭”，这就是余汉谋对我们的基本方针，这一点我们都认识不足。记得张文彬同志在部队的时候，告诉我们要准备应付国民党的进攻，不怕打摩擦仗，同时，又指示我们以曾生、王作尧名义上书余汉谋，提出制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发给番号枪械，划定地区。这作为政治上的斗争策略是可以的，但由于对余汉谋要消灭我们认识不透，因而对顽军出动那么多的兵力，发动规模那么大、时间那么长的进攻也就估计不足，这是我们在顽军大举进攻时消极防御，以致陷于被动、遭受损失的主要原因。在军事上，当敌人分进合击时，我们还未能掌握集中兵力，击其一路，逐个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术。临战指挥上也有缺点，当敌人缩进炮楼驻守时，我们又缺乏攻坚的能力。

会议检查了这些问题，作出了决定：第一、在全军开展政治教育，干部进行整风学习，肃清对国民党的幻想，增强团结，鼓舞斗志；第二、对顽军的进攻，坚持针锋相对、坚决还击的方针；第三、精兵简政，巩固原有阵地，建立外围武装；第四、军政委员会成员分头领导，曾生到惠阳，梁鸿钧在宝安，我和杨康华到东莞。

尽管我们存在许多缺点，都在逐步认识与改进之中。所以，余汉谋对我“志在消灭”之“志”终成泡影，不论是张光琮还是邓其昌，都精疲力尽，铩羽而去。我们历尽万苦千辛度过了难忘的一九四二年，却迎来沉重打击日伪、胜利辉煌的一九四三年。

## 第十二章 胜利发展

### 一

总结一九四二年反摩擦斗争经验的军政委员会会议结束后，我按照会议决定，返回东莞地区。

大岭山的西南面，是东莞至太平、太平至霄边的两条成九十度角的公路。一九四二年，这两条公路都控制在日军手中，相隔五、六里就有一座碉堡，戒备十分森严。但这两条公路相夹形成的三角区却是敌人的真空地带，日军守备力量薄弱，国民党军队也不敢进入，是我们开拓敌后活动地区的好所在。我们看中了它，就从大岭山根据地抽出一部分同志，挺进三角区中的北栅、厚街、赤岭等地，组织了一个莞太敌后工作委员会。莞太工委由卢克敏任书记，方兰、陈鸣同志任委员。

一九四二年底，李东明同志带领后方政治部来到东莞的时候，我们就把政治部和莞太工委一并设在厚街。

厚街是一个人口众多、村庄稠密、物产丰富的地方。它处在珠江、东江交界的水网出口地带，依山傍水，是莞太线上的交通孔道。厚街的群众基础较好，一九二六年就有过我们党的组织，大革命失败后，曾经沉寂数年，到了一九三五年又开始有我们党的活动，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蓬蓬勃勃。东莞党组织重

建的时候，厚街成立了第一个支部。这是我们在敌后活动的一个好据点。

厚街是我的家乡，我家就在镇东头几百米远的一棵粗大的紫荆树旁。一九四三年初，莞太工委的领导中心，部队的电台、医院等都设在我家的周围。总队政治部也在这里设立后方政治部，由政治部副主任李东明、宣教科长黄文俞等在这里工作。后来杨康华同志到了东莞，把《前进报》带到这里来出版。杨康华还亲自主持办了一期整风学习班。这时候，厚街有一批老年妇女和青少年担任交通员和筹措款项、护理伤病员等工作，我母亲也参加了。厚街一带成了深入敌后战斗的堡垒。当时，厚街有伪军第三十师一个团以及土匪汉奸驻守，但因为我们在外面有神出鬼没的武工队活动，里面有广大群众掩护，因而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活动，他们也不敢动弹。厚街的伪乡长花名叫“豆皮松”，是我小学时的同学，是一个顾点后路讲点“交情”的人。在莞太工委进驻厚街之前，我单独与他会过面，对他作了启发。他答应保证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并答应协助我们一些同志打进驻厚街的伪军中去做策反工作。

我们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很快就在双岗、涌口、宝塘下、赤岭、桥头、河田、沙塘仔一带发展了不少抗战积极分子。还在厚街一个叫王南长的医生的热心帮助下，在他宽敞而又僻静的家里秘密地设立了一间医院。王南长家有一片沙田，我们也在那里潜伏了一支小小的武装队伍作掩护，安置了一批重伤员，并且在沙田开展群众工作。

莞太工委的工作展开了，我们活动地区逐渐地宽广起来，我们就大力向敌人发动进攻。

首先，东莞大队对莞太线的篁村、赤岭、桥头的伪军进行

袭击，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大岭山区。然后，派出部队挺进莞龙公路，在莞城、温塘一带打击日、伪军，派出小部队深入到东莞水乡江城州、中堂、望牛墩等地发展武装力量。此外，还派出了一个锄奸队潜入莞城进行活动，处决了几个汉奸。

一九四三年春季大旱，灾情严重，象南海的九江、顺德的陈村、番禺的市桥、新造等重灾区，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东莞的灾情不算太重，但也是哀鸿遍野，路有饿殍。田野上焦黄的农作物低低地垂着头，许多水田都裂成蛛网。灾荒也影响到日军的供给，他们更加频繁地出动抢粮。伪军更吃不饱，他们到处偷东西吃，厚街一带田里的花生、番薯差不多都给挖光了，人们愤恨地称他们做“番薯兵”。趁敌人困乏之际，我们出击更加频繁，使日伪军四面楚歌，坐卧不宁。驻在莞太线上的伪军更是军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

这时候，日军为了摆脱困境，正集结着伪三十师的兵力，准备到我们地区大肆抢粮。我们则与敌人针锋相对，向莞太线伪军展开政治攻势，瓦解伪军。

五月间的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距厚街五、六里外的塘面新村一间破旧的祠堂中，我和邬强、黎崇勋等同志正在商议军情。忽然，黄琴同志拎着一把水淋淋的雨伞，匆匆走了进来。

“太好了，真是风雨无阻！”我高兴地向他打招呼。黄琴同志活动于莞太线上，专门负责对敌伪军的工作。我们请他来，是要交给他一项策反伪军的重要任务。

“怎么样？”我把任务向黄琴同志口述一遍，“我们东边是广九铁路，敌人较强。西边是莞太路，只有伪军第三十师及少数日军防守；厚街住着伪军一个团部和一個营以及一个机炮

连，我们就从这一营伪军埋手\*，怎么样？”

“向梁德明埋手？”黄琴盘算了一会以后，领略地点了点头。

梁德明是伪三十师八十九团的代团长、第一营营长。团部和第一营都在厚街。他看到我们的力量不断壮大，曾有过向我们靠拢的表示。他是我在燕塘军校时的同学，争取他反正，这也是个有利的条件。

我把写好的一封介绍信交到黄琴手上，对他说：“你拿上我这封信去见梁德明，千万要小心在意，随机应变。”

黄琴激动地接受了任务。他一把拉开衣襟，把信藏在衫角缝口里面，郑重地向我们行了一个礼，转过身，打开蓝布雨伞，冒着雨往厚街去了。

几天以后，黄琴同志带来了梁德明的回信，信中写道：  
学兄如晤：

来信敬悉，所称之事容当深思。

弟明复

梁德明的回信，表明他有反正之意，但犹豫不决，我们还必须抓紧进行争取工作。为此我们又派黄琴再度返回伪营，继续做他的工作。

梁德明优柔寡断，对于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情，未能马上下决心。但他向我们保证了两件事：第一，不与我军作战。万一被迫打起来，枪口朝天。第二，把日伪军活动的情报及时报告我们。

黄琴同志在促进梁德明思想转变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他

---

\*埋手，东莞话，着手干的意思。

还取得了梁德明夫人的信任。一个月以后，梁德明答应跟我见面详谈。

依照约定的时间，梁德明换上便衣，由黄琴带领，在黑夜里绕过几个伪军的哨兵，来到了厚街桥头的塘面新村。我的警卫员林佳把他俩领进祠堂里来。

“久违了。”我迎上前去跟他握手。

“惭愧，惭愧。”梁德明连声回答。他身材高大，背有点驼，过多的忧虑使他比几年前消瘦，棕黑色的长脸孔显得更长了。

林佳端来酒菜，我邀请梁德明入座，边吃边谈，共叙燕塘军校别后的情况。

酒至半酣，我按着他的手说道：“老梁，想当年我们同习军事，都抱着忠贞报国之志。日本侵占东北三省，长驱入境，窥伺中原之时，记得你曾气宇轩昂地说：‘大丈夫应学戚继光、岳武穆，为国家建功立业，马革裹尸沙场，幸也。’几年风雨之后，想不到我们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梁德明把头低下来，满面羞愧地回答说：“小弟半生庸碌，为衣食所迫，有负于国人，深为内疚，深感吾兄俯念旧情，得以自新，敢不从命？无奈……”我见他没说下去，就进一步对他说道：“老梁，你过来算了，何必留恋那么个汉奸差事呢？”

“学兄，”梁德明的声音有些颤抖：“我误入歧途，对不起父老兄弟，但我目前处境甚为困迫。俗话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真是难以自拔。妻子儿女嗷嗷待哺，又有何法可想呢？”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只要掉转枪口，共同对敌，谁还计较过去的事呢！你若过来，我们还是按原职相待，至于家

属，我们一定设法安置，不必担心。”

梁德明沉思一阵，抬起头对我说道：“好吧，我回去做做下边的工作，等待适当时机，定当揭竿而起。”

我与梁德明痛饮了几杯，深夜二时左右，才尽欢而散。

打这以后，梁德明也曾经有过一些反复，想两头都不干，跑到广州经商。黄琴抓住他的思想，向他说，只有将功赎罪，才能洗刷他汉奸的罪名，并且指出日军是决不会轻易放他去经商的。对于他带全营起义的困难，我们也明确表示尽力解决，筹备了一笔钱准备给他们安置家属和给那些不愿干的人发放回乡路费。在我们热诚争取下，梁德明终于下定了起义的决心。

深秋时分，时机成熟了，在十一月八日那天，梁营伪军起义。

起义前一天，梁德明挥笔草拟了一份命令：

兹奉上级命令前往横岗，为了防备战斗并壮盛军威，特令第一营带上最佳枪支，士兵穿着全新衣服，于明(八)日上午九时在厚街园森树林集合，候令出发。此令。

代理团长梁德明

十一月七日

第二天早晨，园森树林中人声鼎沸，初升的太阳探出头来，兴冲冲地给树叶枝头镀上一片金色的光芒。准九时正，梁德明大步走进树林子，集合起士兵，一声向右转，朝横岗方向大踏步而来。

在此同时，彭沃一个大队正朝相反方向开去，他们配合东莞大队攻打厚街伪军王柏林部，利用梁营起义这个时机，一举将厚街的伪军全部消灭。

我和邬强、卢伟如等同志在横岗的一间祠堂前静候胜利的

消息。

一个提着篮子的年青嫂子匆匆走过，说道：“几位大哥呀，那些该死的番薯兵在那边集合了，不知哪个村今天又要遭殃啦！”

我们心里明白，暗暗高兴，一切正在按计划进行。我把警卫员林佳、李云飞派到横岗茶亭去迎接梁营，要他们紧跟梁德明，注意保护，以防万一。

前面大路上腾起一片黄色的烟尘，烟尘中，渐渐出现了一支黄色的队伍。队伍前头，有人打着一把蓝色布伞，在阳光下格外显眼，那是黄琴。

梁德明兴冲冲走进祠堂里来。我问道：“整营吗？”他精神百倍地说：“对！还有重机一挺、轻机三挺。”

“好极了！”我当即把一支45号大左轮枪送给他，表示我衷心的欢迎。

梁德明经过几个月来的思想斗争，终于站回到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参加到抗战的行列来了。他喜形于色，黝黑的脸庞焕发出光彩，走起路来也显得威武多了。他大步流星地走出门口，向投诚士兵发出口令：

“立正——！”“搭枪架！”“向后转！向前十步走！向后转！坐下！”

士兵安静地坐了下来，梁德明就和我一同走到队伍前中央，他激动地向士兵训话：

“各位弟兄，我们都是中国人，过去给日本鬼卖命，当汉奸，这是我们的耻辱。为了将功赎罪，我们反正了！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战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抗日救国！”

我接着他的话说道：“官兵们，欢迎你们回到人民的队伍中



来，抗日是每一个有民族正义感的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职责，人民欢迎你们掉转枪口，一致对外。我们是抗日游击队，活动在敌后，斗争很残酷，生活很艰苦，但我们是官兵平等的，都是为了全中国人民而共同奋斗，大家都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服。你们当中，如果有不愿意加入我们部队的，我们可以发放路费让他们回家。留下的人，和我们一起同甘苦，进行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有人民支持我们，胜利最终必定属于我们！”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汪精卫卖国贼！”

除了极少数军官，全体士兵一致要求留在游击队。他们紧握拳头，高呼起抗日的口号。

正在这时候，东莞大队和彭沃的大队正向厚街王柏林部发起了进攻。敌炮楼响起了轰天动地的爆炸声，黑色的烟柱直冲云霄，就象是节日的礼炮，在欢庆我们新的胜利。

## 二

在这一段时间里，捷报频传，令人欢欣鼓舞。

十月份，我们出击塘厦国民党顽军徐东来支队队部的通讯队，缴获敌人一部无线电报机、电话总机和枪支弹药，俘获副大队长以下三十余人。

在莞太线上，我们伏击了陈璧君，打了伪军据点篁村等地。

陈璧君是大汉奸汪精卫的老婆，她自己也是个大汉奸。一九四三年十月，她为了给主子效劳，给伪军打气，跑到太平、东莞城和石龙沿线巡视，慰问驻东莞的日军和伪三十师。我们部队从情报中得知她的行踪，就在她必经之路上设下一个

中队的伏兵。

这一带尽是一些矮墩墩的小山包，座落在公路两旁。时值初冬，山包周围的甘蔗已长得一人多高，七十多伏兵钻在蔗林里，敌人就算长上千里眼，也不容易发现我们的行动。

阳光驱散了山间的霞雾，高低起伏的公路横在眼前，就象一条沉睡未醒的长蛇。

太阳懒洋洋地爬上山头，时间过得好象特别慢。“肥婆怎么还不来？”战士们趴在蔗林中，花斑斑的山蚊在头顶上嗡嗡地叫着，扰得人心里焦躁不安。

“唰唰——唰唰——”，一队伪军从西南面走来了。

“嘟嘟——嘟嘟”，汽车喇叭声打破了山间的寂静。同志们向远处望去，只见公路尽头，果然出现了两个逐渐扩大的黑色小点。两部小汽车象两只硬壳甲虫一样慢慢地爬过来，后面还跟着两辆大卡车。

“准备战斗！”同志们轻轻地打开了枪保险片，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

伪军走到山坳，却从公路上走开，爬到岭上来搜索，和我们隐蔽在前面放哨的战士遭遇了，双方接起了火。两辆小汽车戛然停住了。

“放！”喊声刚落，我们的轻机枪、步枪子弹飞射过去。爬上来的伪军往公路那边逃走。公路上，前面那一辆小汽车被穿了好几个洞，尖叫一声，窜到路边，车头架在小土堆上，一个车轮空转着，喷起一股烟尘。

第二辆汽车显然吓疯了，一个急转弯，没命地逃跑。

可惜啊，受伤的汽车已经压平它身下的土堆，退了出来，喘着粗气，象只受伤的狗一样也往前逃跑了。

后面两辆大卡车开过来，车上有一个中队的日军跳下来，架起机枪，分头搜索。

蔗林里的战士们歼敌心切，跃跃欲出。中队长见埋伏的山头前面是一片平地，冲下去不利于作战，陈璧君这个大汉奸已经逃走，情况有了变化，于是及时下达了命令，撤出战斗。

后来，我们才知道，狡猾的陈璧君在第二辆车上，她只受了点轻伤，我们打中的只是她的替死鬼。这一仗影响很大，远近伪军听到后，无不为之丧胆。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初，东莞大队在民兵配合下，在赤岭附近击溃伪军刘棠一个团，俘敌一个排，缴获机枪一挺，击沉敌船两艘，击毙了刘棠的“左先锋”张雄。随后，又一次夜袭厚街，活捉了伪军中队长王柏林。

我们两次袭击了篁村的伪军。第一次是七月十五日，歼灭了伪三十师的一个整连。

第二次是农历大年三十晚，这里驻着伪军联防队中最强的一个中队，是一支有一百多人的恶霸武装。他们住在篁村的大祠堂里，门前筑有土垒，有重机枪防守。这个伪军中队长名叫张玉章，生得脑满肠肥，绰号“肥仔张”。

寒风凛冽，行人绝迹。三个中队集中在犬眠岭附近，派出一个中队警戒莞城方向，少数人监视厚街那边，一个小队作预备队，一个半中队进行突击。

突击队用大刀劈开了竹制的栅栏，土垒里面的重机枪达达地扫射过来，我们用一排步枪把它压住。爆破班炸开了祠堂，突击队在激战中冲进了敌人的据点，解决了伪军将近一百人。我们一位优秀的短枪队长爱国华侨叶凤生同志是这次战斗的突击队长，在敌人重机枪扫射下牺牲了，一同牺牲的还有班长李锋

和副班长李福。副班长张锦标扑上去抱住那条重机枪，和敌人拚搏，缴了那条重机枪，战斗后就把它命名为“凤生号”重机枪。

与东莞地区打击日伪军取得胜利的同时，在惠阳、宝安地区传来了一连串捷报。其中，我觉得意义最大、最令人兴奋的是福永之战。

福永是宝太公路线上伪军的一个重要据点，驻着吴东权部一个中队，他们凭着炮楼固守，经常威胁着我们的活动。福永炮楼有两层墙壁，十厘米厚的铁门，外面还围有铁丝网，十分坚固。不久前敌人曾经连续抵挡住我们部队的两次进攻。

一九四三年三、四月间，港九大队给总部送来了一批炸药。这些炸药是渔民冒着生命危险，从海里捞起水雷，再从水雷中取出来的“TNT”高级炸药。总部派参谋处长周伯明专门研究用炸药爆炸炮楼的方法。根据彭沃同志当渔民时用鱼炮炸鱼的经验，大家动手做爆破试验，做了两个小炸弹，由小队长邱特点火线引爆。试验成功了，于是做了三个将近十斤重的炸药包作攻打福永之用。

强攻福永的任务，由彭沃、卢伟良的主力大队承担。行动之前，先后派了邱特等两同志潜入福永侦察。五月二日黄昏，主力大队从黄田佛庙出发向福永前进。第三小队担任攻击，第一小队作预备队，由宝安大队一个中队担任警戒，邱特打突击，赵超当爆破手。

突击队摸索前进，快要接近炮楼了，忽然，赵超摔了一跤，敌人的哨兵发觉了，一声吆喝，马上开枪。邱特立即命令机枪开火，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去。赵超在机枪掩护下迅速冲向炮楼，把火点着，立即转身翻滚到炮楼右边墙角。猛然一声巨响，炸开了炮楼的铁门。

“冲啊！”浓烟未散，突击队员们冲进炮楼，打死了企图顽抗的敌人。

逃上第二层楼的伪军刚站住脚，正想抽掉楼梯，张新带领战士们捷足先登，向敌人射出一排子弹，几个负隅顽抗的伪军顷刻间丧了命，其余的都在喊杀声中做了俘虏。

福永攻坚战告捷，俘虏伪军三十余人，缴获轻机枪六挺、步枪四十多支。这是我们部队在战术上采取爆破攻坚歼灭战的开始，是一个夜袭攻坚的典型战例。我们全军推广使用这一战术，取得了多次歼灭驻敌的胜利，军威大振，敌人丧胆。

接着，这个主力大队乘胜又在五月二十六日攻打了沙井。沙井驻有伪军三十师一一九团，配备迫击炮和轻重机枪，战斗力比较强。我们决定袭击其中一个连并尽可能消灭另一个通讯排。战斗开始了，我们的主攻部队向那个连的驻地匍匐前进，摸了哨兵，冲进敌营房，解决了那个连。另一支部队牵制住附近那个通讯排，掩护了主攻部队，而且连通讯排也解决了。敌团部和其他连队则由我们警戒部队封住出路，不能增援。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就解决了战斗。我们毙敌二十余名，包括连、排长各一名，伤敌十余名，俘敌二十余名，缴获步枪六十支。我们的小队长何恩俊同志英勇牺牲了。当敌团部指挥炮兵打过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安全转移。

七月份，我们袭击了伪军据点公明圩。越过敌人几重铁丝网，炸开炮楼的大门，重创了吴东权的伪警察队。

十月，我们部队出击观澜大埔巷，严惩这里的顽军。这次战斗，我们一位勇敢机智的小队长刁亮同志负了伤，不久就牺牲了。

黄松岗是宝太路上一个重要据点，伪军麦永中队盘踞在这

里，勒收苛捐杂税，残害群众。这一带人称麦永为麦老虎，要求我们严惩他。我们预先派人做好伪军内部的工作，十月二十六日深夜，通过内应带路，我们把炮楼和麦永的住处包围起来。原来打算生擒麦永进行公审以更好地发动群众，但是，打响以后，麦永拚命顽抗，上了屋顶边战边逃，我们只好把他打死。这一仗，击毙伪军七人，伤四人，俘虏二十八人，反正过来的有十二人，缴获轻机两挺、重机一挺、长短枪四十支。这次战斗瓦解了伪军，鼓舞了敌占区人民的斗志，群众拍手称快，一些老年人谢天地，放鞭炮，庆贺我们为人民除了一害。

### 三

我们部队迅速发展壮大，一连串主动进攻敌人的胜利，瓦解伪军、争取伪军起义的成功，震惊了敌人，使敌人感到我们已经成为心腹大患。日军为了适应太平洋战争的需要，力图打通华南铁路干线，我们活跃在广九铁路两侧，对他们的战略部署是个威胁。因此，当他们占领了广九铁路中段沿线据点，打通了广九路以后，随即发动对我们的大规模扫荡，妄图消灭我们的主力，以保证广九线的安全。这就是日本侵略者曾经大肆宣传的所谓“万人大扫荡”。他们出动了久留米师团的一部，加上原来据守在东莞县城、石龙、虎门等地的日军和伪军第三十师，还有其他地方伪军，一共八千多人，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开始进攻大岭山地区，在东莞、宝安两地进行了持续将近一个月的扫荡。

日军扫荡前夕，驻厚街伪军梁德明部光荣起义。我们把梁营送到宝安整训后，决定从大岭山地区分兵，除留东莞大队在

大岭山以东和以西活动外，我和杨康华同志以及彭沃的主力大队都先后分头返回宝安总部。

十一月十七日晚上，我和彭沃带着队伍离开大岭山起行。下半夜，我们到达了莲花山，就在莲花山的一个山窝里宿营，准备歇歇再走。

才合上眼不久，忽然山梁上响起了炒豆般的枪声，接着“轰”的一声，一颗炮弹落到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阵雨点般的泥土洒在我的身上。

这时天刚拂晓，我从望远镜中看到，莲花山南面小山的棱线上，黑影憧憧，有的已接近莲花山顶。彭沃立即命令第三小队从正面登山，自己带一个小队登上左侧的高地，形成交叉火力，把敌人压下去。敌人不能继续前进，展开了部队和我们对峙。

右边的山头被敌军抢占了，他们的机枪从右侧扫来，子弹“哒哒哒”地在我们耳边作响。

“张新带队把他们压下去！”彭沃一声令下，张新带着一个小队的战士飞速从左侧前进，借着棱线掩护绕到敌人背后，一轮密集的射击，把占领山头的敌人打得全部滚下山沟，夺回了那个山头。

战斗激烈地进行着，在地形上我们占优势，在我们火力控制之下，敌军无法向我们进迫。

天色大亮，我们才看清进犯的敌人大约有两个团的兵力。这时，我们毙伤了十多个敌人，牺牲了两名战士，彭沃同志的脚扭伤了，卫生员李玉珍也中弹负伤。考虑到敌众我寡，要向南冲出包围，按原路线前进是不可能的了，我们被迫退回大岭山。

回到大岭山大王岭，郭强的东莞大队和黄布的中队也相继退了回来。我们三路兵马五、六百人，连同杨康华同志都被困在大岭山上。

敌人占领了大岭山脚下的每一个村庄，把守着每一条路口，把大岭山围得密密的。看得出来，他们正在加紧部署作战，计划着如何把我们全部歼灭。

一架日本军用飞机向大岭山飞来，在我们头上“嗡嗡”地盘旋着，丢下来的却不是炸弹，满天飞着的是红红绿绿的劝降传单。上面写着“王作晓已经投降了，共军快快投降吧！”我们看了，又好气又好笑。从飞机散传单这一事看来，这次扫荡，无疑是广州日本南支派遣军直接指挥的。敌人的反扑，扫荡，我们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是来势这么大，行动这么迅速，我们却估计不到。

我们从大王岭转移到大岭山的马山上，指挥所就设在这里。敌人七、八千兵力，要包围这方圆七、八十里的大岭山，兵力显然是不够的。从山东麓往下看，虽然山脚周围都有敌兵把守，每条村也不过是一排人左右。再往后看，各条路上都不见敌人增兵。由此看来，敌人对我合围之势已成，但漏洞仍然很多。根据多年游击战争的经验，只要在黑夜突围，是冲得出去的。郭强同志建议说，从敌人的动向看来，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敌人合围后，马上向山上进攻；二是到第二天拂晓才发起进攻。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应该利用地形边打边撤，坚持到夜间再突围；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我们待到黄昏后立即分成多路突围。大家同意他的意见，并且决定黄昏后分三路突围：

第一路向东：由卢伟如负责，从牛牯岭、金桔岭附近插出



去，不走大小路，只走田埂，穿过莞樟路到达温塘一带。

第二路向西：由黄布负责，沿大径、张家山之间的小河下白泥坑经莞太路，到桥头、白沙间隐蔽待命。

第三路向北：我和杨康华、邬强带领彭沃大队，翻过水帘山，通过大雁塘附近，进到大进埔村周围的甘蔗田中隐蔽。

其余机关人员，由黄业、何清率领部分武装人员护送，出治平乡沿小河沟向杨西地区青竹笋突围，到大进埔村与第三路会合。

十多个伤病员走不动，不能跟队伍突围，就安排一个班带上枪支、粮食与他们一道隐蔽在大岭山上的一个山洞里。这个山洞很深，洞口在马山上，里面曲曲弯弯，从来没有人走到过尽头。

天齐黑，开始行动了，我们突围的方向，确是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敌人估计他们这样一合围，我们一定会向南突围跑到宝安，已经部署伪三十师在宵边到梅塘一线堵截。可是，我们向东、向西、向北走，唯独不走南路。当晚，我们和主力大队由大岭山的一位地下党员带着，走一条无路之路，从水帘山斜插下去，绕过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预定的地点，在大进埔村的一片蔗林中隐蔽了起来。卢伟如等也顺利地到达温塘。黄布中队在天快亮时，发现敌伪军已占领水口庙、桥头一带，于是就在塘面新村至水口庙之间的一片起伏地中，利用几条旧的战壕隐蔽下来，虽然离敌伪军过往的大路很近，但没有被发现。

由于在行动前侦察好了道路，行动时巧妙地从小路从敌人合围的空隙中突了出去，突围成功了！

第二天拂晓，日军向大岭山发起总攻。他们派来了飞机，狂轰滥炸，一排排山炮的炮弹飞射上山顶，一个接一个地爆

炸，简直要把山头削平。密集的枪弹呼啸着，激起山鸣谷应。

一阵猛烈的火力攻击以后，敌人不见回击，就在飞机的掩护下从四面八方分路搜索而上。他们咆哮了半天，跑到山顶上一看，才知道扑了个空。

正当日军疯狂地向大岭山发起总攻之时，我们正在大进埔的甘蔗林中隐蔽休息，望着日军源源不断地从蔗林边的公路上向大岭山开去。也是这个时候，卢伟如率领的大队已经顺利到达温塘，向温塘东面的茶山据点发起了袭击，经过一场奋战，全歼守敌伪军一个中队。我们三路人马，除邬强、卢伟如一路仍留东莞地区外，其他的就按原计划转回宝安地区。

扫荡东莞的日军，被我们甩开了以后，又把锋芒转向宝安。十一月下旬，在宝太路、宝深路（南头至深圳）、广九路、莞樟路上，对我们发动了“十路围攻”。

我们在宝安有梁鸿钧带着宝安大队，刚从东莞过来的部队和刚起义过来的一个营，加上脱产民兵，总计有近一千兵力。这时候，日军扫荡锋芒已有所减弱，我们决定就在宝安地区与敌人周旋，选择其薄弱之处，集中力量予以打击，并且进行外线出击，牵制敌人。

十一月二十二日，日军出动五百余人，分三路进犯布吉、龙华，我带领宝安大队和起义部队坚决还击。第一路敌军沿布龙公路向龙华推进，我们在坂田附近设下伏兵，杀伤了不少敌人。敌军不敢沿公路走，只好绕山道前进，在快接近龙华时又被我们的伏兵打得晕头转向。他们发动了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最后，丢下十几具尸首狼狈而逃。第二路敌军沿乌石岩和大船坑向龙华进攻，我们占领了乌石岩、龙华之间险要的石坳山口，居高临下，截击敌人。敌人几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

了，无法通过，徒劳而返。第三路日军由梅林坳冲进了龙华，大肆抢劫。黄昏时候，敌人想撤走，被我们到处阻击，只好龟缩龙华待援，直到深夜才分路溃逃。

十二月四日，日军五百余人又分头由南头、布吉、深圳、天堂围、塘厦五路出动，以乌石岩为中心，对我们进行扫荡。上午八时左右，一百多日军配有机枪、钢炮及骑兵由天堂围经观澜圩、白花洞、大水坑向乌石岩推进。我们选择险要的大水坑进行伏击。敌人的先头部队小心翼翼地摸过来，我们把他放过去了。敌人的后续部队见前面的部队顺利通过，就放胆继续开来。待他们走进了射程之内，我们猝然一阵射击，打得日军人仰马翻。敌军慌乱之际，组织骑兵向我们冲来，又被我们的火力压了回去。敌人冒火了，架起钢炮，没命地向我们阵地轰击。“轰——轰——”，炮弹在我们身前身后爆炸，被炮弹削断的树枝、土块、石头腾空飞舞。其中有一颗炮弹就落在我刚刚离开的指挥位置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弹坑。敌人的机枪更象急风骤雨一般，直打得我们抬不起头。但是，我们的战士坚决顶住了，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炮火连天，硝烟蔽日，激战了一整天，到下午五时，敌军不得不从白花洞越山逃走。而快要到达乌石岩的日军那支孤零零的先头部队，既不敢打进去，更不敢撒回头，只好绕过乌石岩匆匆而去。

就在同一天上午十一时，布吉方面的日军两百余人，沿公路进犯龙华。他们到了雪竹径，分兵两路，一路由坂田推进，一路转向岗头仔。向岗头仔来的日军，遭到我军迎击，无心恋战，向青湖窜逃。我们立即派出一部分兵力，运动到青湖附近去截击。敌人处于开阔地带，无可掩蔽，被迫进入河中，沿河岸向龙华方向溃逃，直到下午才集中起来，经阳台山逃回

南头。

十二月五日，日军在乌石岩集结后，出动至麻布一带，试图寻找我主力部队决战。但我们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使敌人到处奔突，整日扑空。在他们精疲力尽往回撤退的时候，我们又派出部队在黄田伏击他们，毙伤日军三十余人，战马六匹。

敌人对宝安的“十路围攻”，为时半个多月，来时汹汹，去时匆匆，缩回南头、深圳去了。

在这期间，惠阳沿海前线，我队也击退了日、伪军多次蠢动，进行了大小战斗三十多次，给敌人以重创。

我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指引下，运用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终于取得了粉碎日军“万人大扫荡”的胜利，敌人原定广九铁路年底通车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 第十三章 东纵战旗

### 一

粉碎了日军的“万人火扫荡”，说明我们的部队越战越强。回顾建立人民武装的五年来，我们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中间经过东移挫折，又由大到小。重新回到敌后以来，在东江人民的爱护、支持下站了起来。一九四二年，我们历尽千辛万苦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残酷进攻，一九四三年，我们英勇作战接连取得抗击日伪的辉煌胜利。这支东江人民子弟兵成长壮大了。

党中央根据全国革命斗争的需要和我军成长的状况，决定公开宣布华南抗日游击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命名我们的部队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指令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我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梁鸿钧为军事特派员。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是东江纵队成立的光荣日子。这一天，坪山镇内，红旗在朔风中猎猎招展，万人空巷，欢声雷动。广场上，聚集了一千多战士和不计其数的群众。庆祝会上，政治委员林平同志宣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宣言书》，并通电全国。宣言书和通电迅速飞遍了东江两岸，飞向全国，在国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华侨报刊登载了

宣言书，引起了世界的注目。宣言书中这样写道：

“从五年来艰苦的抗日自卫斗争中，使我们全体同志一致认清：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救星。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历次制止了内战危机与投降危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在任何困难面前都不畏缩后退，总是有办法克服困难，向前迈进。我们东江子弟兵能够坚持敌后抗战就是由于有共产党正确的政治主张作指导，以及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与各界的援助。因此，我们全体同志一致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内战投降，坚持抗战，坚持团结进步的一贯政策，更一致热烈的接受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认为我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能够获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全体同志的无上光荣，是东江同胞的无上光荣，是广东同胞的无上光荣！”

“……我们坚持抗战，坚决反对投降，我们坚持团结，坚决反对内战，我们坚持进步，坚决反对法西斯‘一党专政’，坚决反对官僚资本的垄断、剥削。我们主张各界同胞在团结抗日的目标之下，互相帮助，互相忍让，以解决一切纷争，改良人民生活以增强各阶层的合作。我们保护一切爱国同胞的人权财权，我们欢迎伪军反正，欢迎绿林豪杰参加抗日。……我们希望各界同胞对我们多多批评与指教，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对团结抗战有利，无不虚心接纳。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也就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队伍，我们除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之外，并无其他利益。”

“我们又掬诚向国际人士宣告：我们坚决拥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以无限忠诚与各盟邦及国际友人密切合作。过去港九方面，我们曾经这样做，今后仍这样做。我们希望能与

国际友人在互相尊重密切合作下共同完成打倒日寇的任务。

“同胞们！同志们！今天敌人已经占领了广九路，逼近惠博，并对我敌后游击区开始疯狂扫荡，而惠淡指挥部的军队却依然在惠宝前线进行反抗战的行为。在这新的重大局面之下，我东江前线敌后的抗日军民必须千百倍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坚决自卫，保护东江前线敌后抗日基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国土，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东纵正式成立的这一天，我在宝安大船坑指挥破坏敌人广九路通车计划的战役，没有参加庆祝大会。夜深了，我心中无比激动。这是华南抗战史上有着深远意义的时刻，我的思绪有如长河奔流，滔滔的浪花把我带回到几年来的峥嵘岁月。

我想起了三八年春，自己满腔热情出发到东莞的夜晚；想起了在东莞打响了抗日枪声的峡口榴花塔；想起了和曾生同志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想起了我们两支部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的许许多多场面。将近六年了，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们有过几乎全军覆灭的东移，一个个亲如手足的战友流血牺牲，我们的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几起几落，斗争是多么艰苦啊！但是，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在毛主席游击战争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在重重困难中不仅没有倒下去，相反地，我们发展、壮大起来了。今天，我们公开举起了党的旗帜，让它高高地飘扬吧，它将指引我们走向胜利！

东纵，这是多么令人兴奋、激动的名字！经历过东江抗日烽火洗礼的战士，提起这个光辉的名字，谁不是心潮澎湃，豪情满怀的呢？

窗外，皓月当空，群星璀璨，我惦记着坪山的同志们，想象着庆祝会上的热烈场面。这时，我仿佛听见了《东江纵队之

歌》\*，歌声伴随着战士们沉实的脚步声，声声回荡在我的耳边：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我们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兄弟。  
五年来我们驰骋于东江战场上，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已奠定我们的胜利，  
今天，我们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领导，  
用我们英勇无双的战斗，  
一定把敌伪反动分子彻底消灭！  
同志们，前进吧，  
光明来临了！  
今天，我们是民族的英雄，  
明天啊，是新世界的旗手！

## 二

东纵战旗在炮火硝烟中飘扬，在这鲜明的旗帜下，我们乘日军万人扫荡后伪军驻防立足未稳之际，以水银泻地之势，纷纷向日伪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开展了一个杀敌立功竞赛。

我军向广九铁路这条日军在华南的战略动脉开刀！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出击广九线常平站，全歼伪军三十师八十九团一个连。二月三日，彭沃的大队向林村车站守敌进攻，歼灭了日军驻林村看守物资仓库的一个分队。二十五日开

---

\* 东江纵队之歌，林翥作词，史野作曲。



始向广九线全线展开破击战。二十九日在常平解决广九路护路队、伪区署。

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三月，伪四十五师调来接伪三十师的防，开了一团人到东莞、宝安边上的黄獠坑。我们的第三大队把他们诱入口袋，第五大队赶来支援，把成团的伪军打垮，消灭了他们两个连。五月，我们纵队领导机关把东、宝两地的一些部队集中到东莞梅塘地区整训，驻广九路樟木头一带的日军侦得情报，立即出动奉安师团加藤大队约四百多人，远道奔袭。凌晨，敌人摸到梅塘附近，我们巡哨的同志发现敌情，开枪射击。第三大队独立中队政委李中、中队长黎汉威立即抢占村前的马山，阻击敌人，掩护机关撤出。敌人用密集的炮火和机枪轰击扫射，李中（钟若潮，归侨）同志中弹牺牲。邬强、彭沃同志分别带领部队增援配合，一直打到黄昏时分，敌人从小路撤退了。敌人这次进犯，死伤了五、六十人。我们也牺牲了二十几位同志。

在广九沿线，我们军民间传诵着机智的“仲夫队”袭击常平的新闻，还有“老虎山下的英雄”黄友小鬼班的动人事迹。“仲夫队”显示了我们战士机智、大胆，黄友小鬼班则显示了我们战士英勇、顽强。

常平是敌人的一个主要据点，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团，伪警察一个大队以及几个联防队。但是，这个水泼不进的据点，却让我们以卢仲夫名字命名的“仲夫队”打得它焦头烂额。“仲夫队”曾经夜袭了驻常平圩伍贞祥当铺的伪警察大队，不发一枪生俘了该队的大队长，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手枪百余支。他们曾两次日间化装潜入常平解决了两个联防队，其中一次，我们的手枪组在敌人营房附近生擒了日宪兵队长

山本少佐和他的翻译官。东纵《前进报》报道常平的战况时，用了一个风趣的标题：“打常平实在平常”。

黄友同志是何通独立中队“小鬼班”的班长，他这个班素来以战斗英勇顽强著称。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独立中队袭击广九线上的平湖，全歼伪军一个连。当中队押着近百个俘虏，带着缴获的八十多条枪，在风雨泥泞中撒返时，途经老虎山下，断后的“小鬼班”遇到日军的追击，走在队伍中间的伪军俘虏伺机哗乱。黄友立即主动请缨带领全班就地阻击敌人，掩护部队前进。敌人愈来愈多，炮火愈来愈猛，小鬼班的同志们坚决顶住，使敌人无法前进。全班的小英雄在尽力杀伤敌人之后，大部分都壮烈牺牲了，只剩下十七岁的共产党员、班长黄友。他的头部负了重伤，还竭尽生命最后的力量，抱着枪滚到泥潭旁边，把枪推下了泥潭。牺牲以后，他的武器始终不落入敌手。

纵队司令部为表彰黄友同志，授予他“抗日民族英雄”的光荣称号，授予全班以“黄友模范班”的集体荣誉称号。《前进报》上登载了《老虎山下的英雄》的报告文学，介绍了黄友和他的“小鬼班”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延安新华社也向全国发出了广播。黄友和黄友“小鬼班”是东纵的英雄，东江的英魂。他们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激励了东纵全体战士向敌人展开更坚决的斗争。

广九线在东江纵队的频繁出击下，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敌伪军迫得只能局处于东、宝县城和铁路线上几个较大的据点之中，缩在乌龟壳里不敢出来。

在港九地区，我港九大队象一把尖刀似的插在敌人的心脏中，有效地牵制住了敌人后方的这个中转站和补给站。

日本侵略军在港九重兵驻扎，布防严密，巡逻队穿梭似的

来来往往，这给我们的港九大队一定的威胁。但是，港九大队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充分运用游击战的特点，制定了一套在城内和市郊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的战术，使敌人象瞎了眼的巨兽一样，处处挨打，受袭击，惶惶不得安宁。其中，最使敌人伤透脑筋的是我们的短枪队，特别是刘黑仔的短枪队。

刘黑仔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孤胆英雄。在香港刚刚陷入日军手中的时候，他就给未站稳脚跟的日军来了个“满天神佛”的打击：他的短枪队在香港的筲箕湾、铜锣湾、中环，九龙的尖沙嘴、深水埗到处张贴传单和标语，使敌人军警四出，如临大敌。敌人指挥部的电话响个不停，这里报告说发现刘黑仔，那里也报告说发现刘黑仔，几乎天天都如此。在敌人放松警惕的时候，刘黑仔他们就化装成做买卖的商人、西装笔挺的绅士、捕鱼刚回的渔民，四处活动开了。一会儿，九龙某处站岗的敌兵给打死了，过一会儿，尖沙嘴的日军营房爆炸了，接着，某汉奸在大街上被枪毙了，尸体上放着一张给汉奸们的警告书……刘黑仔短枪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使敌人吃尽苦头。自此，他们听到刘黑仔的名字，无不谈虎色变，不寒而栗。

现在，在东纵战旗下，涌现了更多刘黑仔式的英雄，港九大队如虎添翼，在敌人的心脏中纵横驰骋。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一日，他们抢救美军十四航空队失事飞行员克尔中尉出险，十二日日军立即动员海陆空军千余人向九龙地区进行扫荡。港九大队与敌周旋于九龙山区，炮击沙头角以钳制敌人，并派出短枪队深入九龙散发传单，使敌人恐慌地回师港九，胜利地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接着，从四月中旬起，又对港九地区的敌人进行了全面出击：抢救被俘印度士兵；袭击吉坳敌伪军；深入九龙市区炸毁亚皆老街的第四号火车大铁桥；消灭沙田第四号

地窟警卫队；处决汉奸特务头子陆通译；活捉日本南支派遣军高级特务头子东条正之；短枪队在大埔秘密登陆，解决日军岗哨，在梁洲海面截获敌船……在连续战斗中取得胜利。港九大队还在香港、九龙市中心大量散发、张贴胜利捷报及告香港九龙同胞书，使港九日军日夜不得安宁，港九同胞拍手称庆。

当敌人因广九线被我切断，开辟了一条从香港到台湾，一条从香港到菲律宾的海上运输线时，我们也相应地在大鹏半岛两侧成立了两支海上游击队。东侧一支是刘培护航大队的海上中队，中队长是吴海，活动范围是澳头港的外围。西边一支由港九大队组织，中队长是陈志贤，活动于大鹏湾上。

敌人开辟了海上运输线，认为游击队在海上奈何他们不得。他们没想到，我们东江纵队不仅是“旱地老虎”，而且是“海上蛟龙”。

两个中队刚成立时，都只有二十多人，装备也很差，但他们怀着对民族解放事业无比忠诚之心，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积极想办法，与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在海上活动的队伍，最初是挑选一些渔民出身的战士组织起来的。他们出过海，经过大风大浪，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当地渔民有密切的联系，军民骨肉相亲，能更好地展开工作。那些朝夕出没在风浪之中的渔民，熟悉海上的一切，就象熟悉他们自己的手指头一样。他们知道海的深浅，懂得海的脾气，也熟悉过往的一切船只。在茫茫的大海中，凭几叶风帆，便可辨认出哪是渔船，哪是商船，哪是“捞家”<sup>\*</sup>船，哪是汉奸、日

---

<sup>\*</sup> 捞家：帮土匪。

军的船。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我们就象多了一双“千里眼”。

在四十年代的初期，海上只有敌船是机动的，渔民的船都是帆船。三挂帆的船一般是渔霸出租的或是比较富裕的渔民自用的，普通渔民多用一挂帆。一挂帆的船比较小，象个半月形，航行时，扯满帆，船就侧向一边，尾巴翘得老高，成“之”字形行驶。渔民们把它叫做“槽仔”。“槽仔”灵活，目标小，速度快，不管是顺风还是逆风都能使用，这样的小船就成为我们海上队的“战艇”了。

海上队用的还是陆上的武器装备，象战防枪（防坦克步枪）、手提机枪、手榴弹等，大多是英军从九龙溃逃时留下的，武器十分简陋，就连渔民使用的鱼炮也是我们海上队的主要武器之一。

清晨，太阳从海面上露出半个脑袋，我们的战士们便化装成渔民，扯起风帆，与渔民一道出海了。

远处，忽然出现了陌生的船只，富有经验的渔民报告说是敌人的船只，于是，海上队的“槽仔”便赶在其他渔船的前面，缓缓地向敌船驶去。

日军看见了渔船，总想捞点便宜，大声叱喝让渔船向他们靠拢。这一来，真是正中下怀！“槽仔”不声不响地鼓满风帆，向敌船驰去。一百米，五十米，三十米，二十米，突然，“打！”一声令下，冲锋枪的子弹、手榴弹便象刮风似的扫向敌船，“轰、轰——”，浓烟从敌船上冒起，毫无准备的敌人在浓烟中倒下去了，敌船就象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欲坠，成了海上队的俘虏。

用这样的装备和战术，海上队击毁过日伪军、海匪的机帆

船和“大眼鸡”<sup>\*</sup>十多艘。在香港到菲律宾的那条航道上还俘获过日军三艘运输船。

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在大鹏半岛上的鹤藪村养病，有机会接触到大鹏湾上的海上队，听到了不少有关海上队战斗的情况。

“老虎仔”是海上队的小战士，他是我的警卫员松仔的好朋友。一天，我正在屋里教松仔识字，忽然，“老虎仔”提着个挂包飞也似地闯进来，说：“王同志，给你送战利品。”说着，就从挂包里拿出一捆黄澄澄的烟叶。

“这么好的烟叶！”松仔跳起来说。

“这是真正的菲律宾吕宋烟，烟味醇正芳香，听说吸起来舒服极了，正好给王同志养病用，还有烟纸呢，这是上等的宣纸。”他又从挂包拿出一迭已经剪裁好的宣纸，举在头顶夸耀。

“哪来的？”

“敌人‘送’的呗。”

“那不成，”我对“老虎仔”说，“你们把战利品分了吗？缴获不归公啦？再说，我们的《前进报》正缺纸张呢。这么好的宣纸剪来当烟纸，多可惜。有时候一张纸可以抵得上一颗炮弹。”

“放心好啦——”小鬼狡黠地笑起来，“我们都交给政治部了。这是给我们海上队的奖品。我不抽烟，没派上。挂包里的东西是同志们叫我送给你的。”

“除了烟叶和纸，还有什么？”松仔心急地问。

“嘿！多着呢！有人参、洋参、中药、西药……一箱一箱

---

\* “大眼鸡”，这本是一种三帆到五帆的大渔船，伪军和海匪往往把它作为武装船出海巡逻和抢劫。

的，数也数不清。”

“怎么弄到这么多的东西！”松仔十分感兴趣地问。

“嘿，两军相遇——勇者胜！有胆量就行！”“老虎仔”眉毛一扬，俨然象一员虎将的样子。

“那你就讲讲这次怎么得胜的吧。”我说。

“好——”他一屁股坐在竹椅上，咕咚咕咚地喝下一大盅凉开水，然后摆开一副说书的架势讲起来。

“前天下午，有三艘日本运输船在大鹏角抛了锚，七、八个日本兵坐小船上岸。渔民看见了，马上向我们报告。当时，我们一部分‘槽仔’出海去了，只剩下两条。小队长王锦说，不要放过这机会，两条船也要去打！于是，我们就立即登船出发，沿海岸悄悄地向日本船靠去。

“越来越近了。这时，我们看到那三艘船，两条木的，一条铁的。木船是货船，铁船是护送的炮艇。炮艇上有不少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有七、八个上了岸，正在沙滩上脱得赤条条地洗澡。

“队长叫我们沉住气。我就拿起一把鱼叉，装着看鱼。

“敌人瞧不起我们这两条破‘槽仔’，一点也不作防备，这更好。队长说，‘别投炸药，捉活的！’于是，我们两条‘槽仔’便顺流直插到敌船中间，敌人正叫骂着，我们一抛缆绳，索住敌人那艘铁船，十几个战士便分头跃上去，敌人慌忙开枪，没有打着我们的人，却让我们一下子打死了好几个，其余的全作了俘虏。

“岸上的日本兵见船被劫，从沙滩上拾起步枪就向我们打来。我们人少，怕打久了船上的俘虏趁机造反，就一面还击，一面拔锚撤退。我们把俘虏放到装满物资的木帆船上，扯起风

帆和‘槽仔’一同向东走。那艘铁船要押送回大队部，就由我和一个大同志负责押送向西，我们用枪迫着日本驾驶员开船。

“哒哒，哒哒，机器发动了。这时，日军驾驶员呱哩呱啦地说一个人开不了船，用手势比划着要轮机兵帮忙。我们不知是敌人的诡计，就让木船上的一个自报能开船的俘虏前来当他的助手。谁料船刚离开大鵬角，这两个开船的日本兵趁我们那位同志不注意，冷不防从侧面夺过他的枪，猛地把他们推下海去。我连忙冲上前去，和他们拼。‘砰’的一颗子弹飞来，我侧身一躲，他们猛扑过来，要夺我的枪。我抱着枪就势一个筋斗，就跳到海里，潜水躲开了敌人。游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岸上来。”

“好险呀。”松仔吐吐舌头说。

“只是便宜了那条船，回来后，气得我饭也吃不下。”“老虎仔”站起来，叹了一口气，又说：“唉，铁船拉回来也没用，我们没那么多电油（汽油）喂它。”

“老虎仔”讲完就要走了。我说：“多呆一会，再讲讲我们第一个海上队的故事吧！”

“没时间啦，我要去拆水雷！”

“拆水雷？”我和松仔不约而同地问。

“啊，王同志，是这样的，”“老虎仔”止住脚步，向我们解释说。“我们炸药不够，正想法找的时候，刚好海上漂来了许多水雷。有人说这些水雷是美军空投下来的，也有人说是英军过去布下的，遇上刮台风，拴着水雷的铁索被海浪打断，水雷便一个一个地浮上水面，漂到沙滩上来。日军对这些水雷，一个办法是用炮击引爆，另一个办法是把它拖到岸上拆卸。渔民们偷看过日军拆卸水雷，现在我们就如法炮制：先把水雷顶上伸



出来的六个角拧下来，卸下雷管。然后用锤子敲，用凿子凿，把顶上的大盖子撬开……”

“弄成功了吗？”松仔着急地问。

“差不多了。嘿！真够瘾，一个水雷就有几百斤炸药。”

后来，水雷自然是弄开了，炸药也补充上来了。大鹏湾上的这支海上游击队，在几十个象“老虎仔”这样机智、勇敢的指战员的努力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沿海打击了敌人，保护了当地渔民的利益。渔民们送粮送船支持他们，不少年青的渔民还报名参加了部队。海上队不断发展壮大，到一九四五年初，就成为海上大队了。

大鹏半岛东西两侧的两支海上游击队，就象两条翻江倒海的蛟龙，扰乱了日军的海上交通线，有力地配合了东纵陆上游击队向敌人的出击。一九四四年九月间，海上游击队还直入大亚湾敌军巢穴，歼灭伪军海军陆战队一个大队，生擒伪大队长，在东纵传为美谈。

这一年夏秋之间，华南日军出动配合进攻湘桂线。我们纵队向日军展开了秋季出击，一方面钳制日军北犯，另一方面尾追日军，开辟新区。

邬强和何维同志各率领一支部队挺进北江，在博西地区连续打击敌人，给北犯的敌人以很大的困扰和牵制。他们跟着敌人的尾巴，一直追击，渡过大、小北江，经过东莞、增城、龙门、博罗、番禺、清远六个县，历程二千五百多里，创下了一度收复清远县城的光辉战绩。

东莞水乡地带，土匪割据，地形复杂，但是抗战前后许多党员都在这一带活动过，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我们乘着军事出击节节胜利的东风，派出谢阳光、何清大队挺进水乡，在土匪

刘发如、李潮部之间插足，并且派了以沈标、李少清为首的主力猛豹大队，配合开展斗争。他们紧密地依靠群众，多次粉碎了刘、李部的合击，解放了高埗、低涌、凌屋村等地。其中攻打冼沙一役，全歼守敌，活捉了李潮的哥哥匪团长李女。我们在高埗、低涌一带建立了坚固的水乡据点。谢阳光、何清这个大队不久即发展为三个大队。

在广州市郊，我们也派出部队展开活动，散发了大批的宣传品，并不时地对敌人的站岗巡查队进行袭击，打到了广州市郊的龙眼洞、罗岗洞，直迫白云山脚。我们独立第二大队攻入罗布洞，消灭敌人一个连。大队长肖光生同志就在这里光荣牺牲了。

东纵战旗在胜利中高高地飘扬！

### 三

经过了半年多的主动出击，我东江纵队在军事上与政治上都获得了胜利，部队和地区有了更大的发展。

这时候，铁路以西已经没有国民党顽军，东宝两县联成了一片敌后根据地。为了将路西地区统一起来，军政委员会决定，路西的部队统一成立东江纵队第一支队，先后以卢伟良、黄布为支队长，陈达明为政治委员，李征为政治处主任。经过地方党和各界人士协商，建立了路西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了路西行政督导处，以谭天度为主任，何鼎华、王士钊为副主任。颁布了施政纲领，建立了四个区政府和三个联乡办事处，实行“三三制”，

• 三三制：抗日战争中，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上实行的政策，即在政权机构上，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制度。

选举了区乡政府的领导成员，并积极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征收抗日公粮。路西成为我们巩固的根据地了。

路东地区，我们的活动范围也比以前广阔了。东江以南直到沿海各地区，东起淡水河，西至广九铁路，除惠州和淡水两个大据点以外，基本上为我们所控制。为了便于领导，在路东也成立路东新一区、新二区区政府和惠阳前线五乡的联乡办事处，为不久以后成立路东行政委员会打下了基础。路东部队统一起来成立东江纵队第二支队，以蔡国梁为支队长，张持平为政治委员，叶锋为政治处主任。不久，蔡国梁调北江开辟新区，由叶锋任支队长，黄高阳任政治处主任。

彭沃的主力大队扩编为东江纵队第三支队，仍保持为跨地区性的主力部队，以彭沃为支队长，陈志强为政治委员，陈一民为政治处主任。

此外，还有四个独立大队，分别活动于港九、增城、博罗以及沿海地区。

阮海天的大队一九四五年初扩充为第四支队，阮海天为支队长，黄业为政治委员，谢阳光为副支队长，陈坤为政治处主任，活动于增城，并向从化、番禺边境挺进。

刘培的大队扩编为第五支队，刘培为支队长，卢伟如任政治委员，韩继元任政治处主任，主要活动于博罗及增城、龙门边境。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东纵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编制：纵队以下设支队，支队下为大队，大队下为中队，中队下为小队。至于各级编制的单位数目则不一一规定，有些小队管辖四、五个班。战斗单位基本上是中队或独立小队。战斗单位有一个地雷班，大队有爆破班，独立大队或支队初时设作战、训练参谋各一，后来则设参谋长。

各单位在战斗后二十四小时要向司令部上报战斗简报，三天内上报战斗详报。司令部及时总结战斗经验，印发至各部队参考。

东江纵队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成立起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这一年之中，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依靠全体指战员的努力，无论在军事上与政治上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年来，我们纵队的发展正如那滚滚东江，一浪高似一浪，汇合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大海之中。

曾生同志在东江纵队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总结东纵一年来斗争的成果时说：

“一年来斗争的结果，毙伤及俘虏敌伪军合计二千七百八十九人。敌伪士气大为削弱，对我甚为惧怕，稍为突出的据点都放弃了，只能固守沿铁路线及沿海的几个大据点，每个据点都要配置两个营的兵力，而且深沟高垒，不敢外出。一年来，我们收复了清溪、观澜、乌石岩、黄松岗、霄边、北棚、罗岗洞、三江、鸾岗等二十三个据点，扩大了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我们的部队还进出在香港、九龙，活跃在广州近郊。我们的队伍扩大了六倍，提高了战斗技术和指挥艺术。我们逐次的营救盟国人员脱险，盟国对我已有了新的认识。这一切力量的发展，这一切条件的存在，就使我们在国内外的政治威信大大提高。现在我们的地区已成为中共领导下十五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将来对日反攻，我们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 第十四章 东江干校

### 一

东纵成立之后，发展得更快了。为使部队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迅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这时候，党中央向我们作了两点指示：第一，要大批培养干部，准备更大规模的发展。在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的同时，集中进行政治整军和军事训练，举办各种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并指示东纵准备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第二，要开展大练兵运动，象华北、华东地区抗日队伍一样开展“三大技术”（射击、刺杀、投弹）的练兵。中央的指示使我们纵队领导更加明确了培养干部的重要性。当时又考虑到，立即办一个抗大分校的条件还未成熟，因而经会议决定先成立东江干校，由我兼校长，待条件成熟再改名为“抗大七分校”。

如何培训干部，我是不怎么在行的，但是，我们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在长期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较为系统的培训，肯定能够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我相信，东江干校是可以办好的。

回想起部队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没多大战斗力的。主要是靠了党的领导作用，靠了同志们的革命精神和群众的支

持，但我们还不能算是一支坚强的队伍。我们缺乏干部，缺乏熟悉当前党的斗争路线和方针政策，懂得军事知识和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干部。

一九三九年初，我在坪山见到梁鸿钧同志，他比我懂得培养干部的重要性，第一次与我谈的就是干部问题。那年五月，梁鸿钧到宝安呆了半个月，这半月间，他详细了解我们部队干部的情况。临走时，他对我说，我们的干部都很年青、勇敢、坚定，但缺乏军事知识，要发展成为一支正规的大部队是很不够的。他还说，准备在曾生那边办一个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我抽调至少三分之一的干部去参加学习。不久，第一次的训练班就办起来了，由当时在部队的老红军干部李从和邬强同志负责。但可惜得很，第二期训练班还未结束，东移就开始了。在东移的过程中，我们损失惨重，送去学习的干部也只剩下鲁风等几位同志。东移归来后，部队重新发展，但干部人数很少，要抽调干部进行训练也就不可能了。

直到一九四二年我们成立了总队部以后，干部训练班才又重新开始。当时，梁鸿钧来到宝安，一面充实总队部的干部，一面办一个干部训练队，取名华南队。但华南队也只办了一期，就因国民党顽军的严重进攻而中辍了。

我们还办过高干班和党训班，训练部队的骨干。

日军占领香港后，从香港回来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参加部队，是部队的新鲜血液。他们满腔热情，有很高的积极性，但要投身于激烈的对敌斗争当中，还必须首先懂得一些必要的军事和政治常识才行。因此，我们就从原来训练干部转为训练新参队的青年，由政治部办起了一个青年训练队，也叫“新生队”。军事和政治训练各占一半，使这些青年受训后能够

到战斗部队去担任政治干部，个别愿意担任军事工作的，也可以担任初级军事干部。训练队由李东明负责，其中有个“女子队”，由李静、方兰两同志负责。

林鹞同志一直主持青训队各期的工作。他是潮汕人，到部队以前，曾在潮汕任过中学校长，也曾在新加坡当过教员、校长等。他博学多才，讲课绘声绘色，十分生动，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林老师。

青训队在我们部队中起了不少作用，它培养了一大批基层的政治干部，使连队配上了正副指导员和文化教员，排里也配上了政治服务员，为部队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还活跃了部队的文化生活。

我们把青训队坚持了下来。当一九四二年冬，国民党一八七师全力扑向宝安的时候，我们转移到东莞时也把青训队全班人马带走，让他们在莞太路以西双岗村的咸草田中继续上课。双岗村的咸草长得一人多高，在珠江边上，一望无际，就象一片绿海。里面没有田界，只有一些纵横的小水沟，别说是外人，就算是当地的农民，在里面转几个弯也会迷失方向。林鹞他们就隐蔽在这南方的“青纱帐”的小草棚里。当地的群众基础很好，积极分子陈官妹一家、王映南、林娇等进步青年每天替他们送粮送水。煦煦和风夹着潮湿的咸草味，好安静的一个学堂。

到一九四三年初，为了着重提高军事技术的训练，我们准备把青训队改称为军政训练班。一天下午，我钻进密密麻麻的咸草田中，找到了林鹞同志。

“肥林，我要替你增加学生了。”林鹞长得矮胖敦实，我们都习惯这样亲昵地称呼他。

“好啊，加学生可以，但话说在前，教文可以，教武我可不行。”林鹗好象猜透我的心思一样。

“正是要你教武。你培养了那么多的政治干部，还是不够的。现在要换换胃口，把青训队改为军政训练班，你就要培养文武全才了。学了回去，既能做政治工作，又能打仗，还能作参谋。”

提到改变训练班的性质，林鹗显然有点踌躇：“我的基本课程只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军事课，要靠肖光生、徐荣光他们的，至于战略战术、参谋工作就要你来讲了。”

“你想得很周到，把责任都推卸干净了。”我半开玩笑地说，“但是，无论如何，战略战术还得让你讲一部分。”

林鹗摊开双手，说：“我懂什么战略战术？叫我讲《三国》、《水浒》还可以。”

“正是要你给战士们讲古仔。象火烧赤壁、三打祝家庄、淝水之战、官渡之战等等。你着重于分析这些战例如何能够取胜，那不就是很好的战略战术课吗？”

林鹗终于答应了。

末后，我对林鹗说，有空我还是会来讲讲课。我还准备把训练班带到大岭山去，实地分析各种作战方法。碰到战斗的机会，就让同志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军政训练班的学习很有效，两个月一期，结业出去的同志，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战术，懂得了游击战的袭击和伏击的方法，也学到了一些绘图测量、识别方向、战斗文书等知识。训练班培养的干部，回到了实际斗争中去，大部分都成为军事指挥员或参谋干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宝安，周伯明、黎崇勋也办了一个军事训练班，解决了



爆破技术等问题。福永炮楼攻坚战的胜利就是其中成果之一。

我们决定在原有的几个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合并成立东江干校，待办到相当规模即改为“抗大第七分校”。

## 二

一九四四年夏天，正当迅速发展的形势需要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工作的時候，很不巧，我病倒了，心里十分焦急。

医生江风说我染上了副伤寒，这种病是由细菌侵入肠胃引起的。据说是细菌把人的肠子吃薄了，所以病人只能喝流质食物，而且躺着不能动。那时候，部队对这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只能喝些稀盐酸水杀菌，慢慢地调理。开始几天，我发高烧，又病又呕，神志模糊。高烧退后，又持续地发低烧。组织上决定由邬强同志临时代我处理工作，让我到大鹏半岛最南端的一个叫鹤藪的小村里养病。

这时，东纵领导机关已经转移到路东的坪山和大鹏半岛的王母圩一带，并且成立了路东新一区民主政权，由赖仲元同志任区长。我征得组织上的同意，把林鸷负责的军政训练班也带到大鹏半岛去，边养病边做点工作，不负这大好的时光。

早在这一年四月间，梁鸿钧同志到珠江游击区去，筹备成立珠江纵队，梁鸿钧的一些工作由我承担，我的工作更重了。我的病好些以后，就立即把军政训练班转移到大鹏城。大鹏城东面小山上有座东山寺，东江干校就在这座寺里诞生了。那是一九四四年七月。

东江干校校长由我兼任，李东明任政治委员，林鸷任教育长，饶卫华任秘书长。

干校第一期的学员有排、连级干部二百多人，成立了军事队和政治队。

李东明同志是从新四军来的。他的军事和政治工作的知识都比较丰富，所以，主要课程都靠他主持。军事教员由徐荣光、赖祥、韦伟等担任，我也勉为其难去讲些基本知识。政治课则由洪韵、关秀负责。学习的方法，主要是发动学员发挥集体智慧，互教互学。这是得到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启发，学习走群众路线的结果。

训练课是很多的。我们从最基础的方面着手。首先从战术思想出发，确定部队的编制，并使学员搞清楚战斗、战术、战役、战略等概念。

技术训练包括射击、刺杀、投弹“三大技术”的训练，一方面要求提高技术，一方面要求增强体质。这也是一个主要课程。

战术课程包括包围、迂回、伏击、袭击、攻坚、打援等，着重点是攻坚和伏击。方法主要是根据我军自己的战例在沙盘上显示，由学员自己加以讲评，然后再由教员评比。这样的教学方法，学员很有兴趣，提高得比较快。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司令部把各支队在战斗结束后上送的详报加以评论后印发给干校和各支队，这对提高战术思想有很好的效果。

此外，我们的干部虽然打过一些仗，但是军事常识还很缺少，所以又规定必须学一些军事常识，包括地形、地物的识别和利用，简易测绘，方向识别，旗语指挥等。

队列教练是简单的，但又是必须的，由队上的干部执行就可以了。

训练的课程很多，学习生活很紧张。但是学员们的兴趣很

高，劲头很足，进步很快，摸爬滚打，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

这时候，张江明等同志组织了在粤北的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参军，还有从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撤回部队来的党员。政治部又办起了规模较大的“青干班”，从一九四四年八月在大鹏城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在罗浮山一共办了七期，每期一百多人。第一期八月份开学，就设在大鹏城里，由黄文俞、张江明、蔡子培同志负责。曾生、林平、杨康华、饶彰风、林鸷和我都去讲课、讲话。东江干校和青干班的学员们互相访问，互相学习。联欢会上，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同台演出。每当曙色初现，威武的出操口令声、刺杀声响彻大鹏城；暮色四合，嘹亮的歌声此起彼落，这边是雄壮的军歌，那边是悠扬的男女声四部合唱，一派生气蓬勃的景象。在频繁的战斗生活中，同志们倍加珍惜这宝贵的学习机会，自觉地勤学苦练，期望早日成为羽毛丰满的大鹏鸟，展翅长空，搏击万里风云。

三个月过去了，第一期学员毕业了，我们除了留下一部分学员作第二期训练班的骨干外，其余全部分到战斗部队去。他们出去以后，反映很好，许多人很快就提升为中队的主要军政干部，个别的还提升为大队干部。东江干校第一期教学的效果证明，我们是有能力办一个正规的军事学校的。

在举办东江干校第一期训练班的同时，我们部队也掀起了一个学“三大技术”的高潮，开展了一个空前的大练兵运动。

在这个运动的筹备阶段，我抽空从大鹏城来到了坪山圩。

邬强同志这时又担任司令部的参谋处长，他正召集一个会议，讨论部队的大练兵问题。我到坪山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议决定把第三支队和惠阳大队作为练兵的重点，由司令部训练科直接抓，集中在坪山进行“三大技术”的练兵比武。同

时，将全军各个支队的训练参谋集中起来，成立一个练兵委员会。练兵委员会的人全部参加到在坪山集中练兵的两个部队中去，从中取得经验后再展开全军大练兵。

当时我们的小兵工厂造出了一批三棱刺刀，我们把它全部装备到第三支队去。第三支队在“三大技术”的练兵中，要以白刃战为重点。因为当时的刺刀不多，只装备了张新大队。这个大队经过了三个月的训练，成为一支勇敢顽强的硬战队伍，后来在路西沙井袭击伪军吴东权部一个中队加一个小队。他们以少于敌人的兵力，不费一枪一弹，无一伤亡，将敌一百多人全部缴械俘虏，首创了东纵的白刃战纪录。

一九四四年底，东江干校续办第二期，招生的对象为班长、排长，学习时间延长为半年。预定招收学员五百名，后来因为我们部队要向江北和海陆丰发展，抽不出那么多班、排干部，只招收了三百多人。这一期实际上由林鹗一人主持。

干校第二期开始时与政治部一道驻在清溪铁场一带。不久，东江以北的局面初步打开以后，干校就转移到罗浮山。后来，这一期的学员全部随挺进粤北的部队奔赴五岭山区，成为开辟五岭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日本投降后，东江干校就此结束。因为内战爆发，“抗大七分校”始终没有办成。但是，东江干校还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东纵的发展史上，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 第十五章 四海英雄

我们东纵的同志多数来自本乡本土，也有不少来自祖国南北各地，还有远渡重洋专程回国参加抗日的华侨。为了解放我们苦难的民族，许多同志的鲜血汇流在东江这块土地上了。

曾生同志在组织惠宝人民游击队时，和海外华侨就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不少爱国华侨青年回来参加了部队，其中人数比较多的是：新加坡、吉隆坡、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的华侨。这些华侨青年都是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多数要求去战斗部队，在战斗中，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由于整个抗战时期，东纵都是处在两面夹击当中，有时甚至是国民党勾结日、伪军同时对我们进行围剿，斗争非常残酷。在长期的战斗岁月里，有许多华侨青年英勇地牺牲了。除了上文提到的以外，还有南洋两才队队长黄志强，吉隆坡队的陈剑雄，陈现、陈显兄弟，马来亚归侨王密，曼谷的女工王丽等同志，他们都为了祖国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令人深深景仰。

外省来的同志为数也不少。特别是在日军占领香港以后，不少在香港的外省青年工人、知识分子，回来参加东纵，其中有不少同志也牺牲了。这些同志多半是改名换姓，没有说出具

体的籍贯，如指导员颜庆增，只大致知道他是上海人；指导员沈尔七是福建人，菲律宾的归侨；支队政委陈志强是江西兴国人；大队政委李少清是安徽人。只有他们英雄的形象、动人的事迹，永远留存在同志们的心里。

李少清同志十五岁就参加郭沫若同志在武汉办的儿童剧团，后来到了重庆，皖南事变时重庆的“报童事件”中，他也参加撒传单，暴露了，周恩来同志把他送到香港，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送他到部队来。初时他任排的政治服务员，以后任中队指导员，一九四五年他已是第一支队主力猛豹大队的大队政委。大队长是勇敢善战的沈标（即沈剑光）。沈标原是香港的苦力工人，参军后作战勇敢，从战士、班、排长一直提升为大队长。李少清与沈标团结合作得很好，两人亲如兄弟，他们这个队战斗是非常顽强的。一九四五年六月，他们在莞樟线活动，与日军百余人在大朗与寮步之间相遇，日军被我们狠狠打击之后，退到竹山村，踞守在炮楼上顽抗，李少清和沈标决定强攻。在离炮楼约有八百米的一个小高地，他们两人正伏在棱线上判断敌情，突然，从炮楼顶上射来一响枪，打中李少清的脑门。沈标抢前一步将他抱住。正在这时，炮楼上密集的火力射过来，打中沈标的左臂。我们部队立即用机枪封锁炮楼，沈标不顾自己伤痛，和同志们一起将李少清抢救下来。李少清已经牺牲在指挥员的岗位上了。沈标在日本投降之后对伪军的一次战斗中，也英勇牺牲。

## 二

在游击队中，必须有几条战线的同志在同时进行工作，除

了直接和敌人战斗的武装队伍之外，另外的大约可以分为几个系统：政工系统、情报系统、通讯系统、交通系统、后勤系统。在这几个系统里的同志，也都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没有他们勇敢顽强忘我地工作，部队要打胜仗，要发展壮大都是不可能的。

先谈谈情报系统。情报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要得到敌人行动的意图，敌人兵力的分布，兵种、装备和战斗力等情况，往往非深入到敌人内部不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同志，必须胆大而心细，沉着机智，还要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要打入日军内部，就更不容易了。我们利用伪维持会也得到一点日伪的情报，但是敌人往往对维持会不信任，时时用假行动来测试他们是否忠诚，声东击西，真假难辨，我们也曾经上过当。我们需要懂日语的同志，打入日军去充当翻译，以取得可靠的情报。

香港被日军占领后，大批的青年回来参加我们部队，里头就有一位叫郭杰的大学生。当时他是个二十二、三岁的青年，面孔端正白皙，眼睛又大又亮，个子矮小但很灵活，性格活泼，能唱歌演剧，又懂日语和英语，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我们选定他来做情报工作。

我找了他谈话，他一口就答应了。

深圳的维持会会长是我们自己人，郭杰就先到那里当翻译。那时深圳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中队长叫村上，身边只有一名略懂中国北方话的日本人翻译。他发现郭杰说着一口流利的日语，又是广东人，就问维持会长，郭杰是个什么人。会长答道：“他是在香港大学读书的，皇军占领香港，他失学了，疏散到这里来，是个大大的好人。他日语英语都说得很好，为了方便和皇军接洽，我就把他留下来了。”村上听了，竖起大拇

指说：“大大的好！”随即用日语问郭杰愿不愿意到皇军那里工作。郭杰说：“这要问会长，我是很高兴替皇军服务的。”不用问，会长当然喜笑逢迎，日军也就高高兴兴地带着郭杰走了。

为了与郭杰联系，我们派一个布吉村的人在深圳摆摊卖香烟，约定郭杰每天去买一包烟，付钱时便将每日的情报交给卖烟的同志，我们再派人到香烟档取回情报。这样，深圳周围的日军兵力分布、军官姓名、装备、战斗力等都清清楚楚了。这样继续工作了约两个月。

我们在布置上有个疏忽，没有在郭杰和香烟档之间再加一个联系人。如果那样做，郭杰就不必每天去买烟了，何况郭杰原来是不抽烟的，突然学着抽烟，也不太象。日军多疑，郭杰每天去买烟的行动，终于给他们注意到了。

一天早上，敌人突然出动到水径、杨美一带扫荡，郭杰在随军出发前急忙到香烟档说了一句话：“到杨美扫荡”。卖香烟的同志来不及收档，赶忙就跑，日军到杨美当然又扑了个空。郭杰回到深圳时，一看那香烟档，不好！人不见了，家具被打成碎片。

郭杰意识到危险马上要到来，一刻也不能停留。他立即绕道出来，一直往鸡公头山上跑去，翻过上下坪，到南坑，天黑时到雪竹径找到了交通站。小交通员连夜把他带到我处，他向我报告了暴露及逃出来的经过。这是深圳情报站的过失，几乎送了郭杰的性命。

一九四〇年，部队东移海陆丰的时候，我党打进国民党惠州指挥所香翰屏的司令部内当作战科长的秘密党员李一之同志，在李燮邦同志被杀害后，秘密地雇作\*把他埋葬了，还

---

\* 作作：以埋葬死人为职业的人。



立了碑。这事走漏了风声，香翰屏知道了，又是生气又感到为难，因为早年李一之曾经救过香翰屏一命，平日香翰屏经常在别人面前夸奖李一之能干，是他的得力助手，如果一下子作为共产党处决了，岂不是于自己面上过不去？香翰屏为了显示他“爱才惜才”的风度，只将李一之软禁起来，想以“三民主义”感化他归顺。这样，我们赢得了援救李一之的时间，在地方党的秘密活动下，终于使他脱险，回到我们部队中来。

住了几天，李一之提出要回自己的家乡去组织武装队伍。他说，经过几天来的考虑，觉得留在大队部工作插不上手，什么都不熟悉，而熟悉的却又用不上。想来想去觉得回到家乡江城洲（离莞城很近的村庄）去，还可以发挥点作用。虽然离开家乡已经三年了，但对家乡情况是了解的。而且小时候的同学都在，关系也很好，自己在家乡有一定的威信，相信回去一定能组织起一支小游击队。再说，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很受压抑，如今冲出牢笼，希望能在广阔天地里一显身手，争取为抗日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理解他的心情，同意他回家乡去活动，并把他的组织关系转给了在东莞的曾生同志。

他回去半月后，就传来了已组织起一支二十多人的游击队的消息，我感到很高兴。可是又过了半个月，曾生同志派人告诉我，李一之同志被汉奸勾结日军谋害而牺牲了，这使我十分悲痛。

### 三

交通和情报，是两个紧密关连的系统。要传递情报，就必

须建立一个交通网，而这个交通网，又必须由许许多多的交通站联接组成。交通员除了传递情报以外，还要负责运输物资，带部队或干部通过封锁线。交通站秘密地设在老百姓家中，如果你不是交通站直接联系的人，你就不知道这些站的所在。部队依靠群众，群众视我们为亲人，大力支持我们工作。

到这些交通站去送信送情报的多数是农村中的小孩、大婶、老人，最小的只有十岁，特别是小女孩占多数。这些小鬼有的还是拖着一把鼻涕，扎条小辫，光着脚丫的乡村小孩，由她们也担当这项工作。不究且引和致上的注意。这些特工站止

我又把懋照调来当这条线的交通员。俗话说：“上得山多遇着虎”，有一次，他在执行任务中就被国民党杂牌军刘光的部队在金桔岭据点附近抓到了。敌人通过拷打审讯，得不出什么结果，就把他关在一间破屋里，派一个哨兵守着。

夜里，哨兵坐在门口打瞌睡。时值深秋，天气有点凉了，哨兵穿着单衣，蜷缩着身子。懋照移近前去，小声地对他说：“何苦呢？当这样的兵。”

“不要说话！”

“唉，听口音还是老乡呢！你何苦难为我这乞儿仔？”

“长官的命令，有什么办法？你是哪里人？”

“东坑人。”

“那倒是同乡，我是寮步人。哎，你知道那边的情况吗？”

原来，哨兵是被抓来的“猪仔兵”，家中还有老母亲。

懋照见机会难得，便向他讲述了日本兵如何烧杀抢掠，国民党顽固派如何不抗日，专打抗日游击队，欺负老百姓等等，耐心地启发哨兵觉醒。

“人家都叫你们‘呵呵鸡’，为当官的卖命真不值得。”懋照说。

“那有什么办法呢？日求两餐夜求一宿，长官发财兵仔食粥。说不定哪天打仗就死在战场上了。唉！我和你差不了多少！”

“你和我就差得远啦，乞儿胜过皇帝，自由自在。在你们这边乞不到食还挨打，可是在那边可好呢，他们叫我小同志，吃饭叫我围在一起吃，看不出哪个是官哪个是兵。你既然当

---

• 乞儿仔：小乞丐。

兵，怎么不到那边去当呢？”僂照越说越入路，那哨兵越听越神往。

“怎么去呢？我们是打他们的，捉住了就没命了。”停了一下，那哨兵说。

“人家不是到处贴标语：‘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吗？何况……你不要小看我这乞儿皇帝，他们都认得我，我带你去，保管他们鼓掌欢迎，叫你同志。”

“果真这样？”哨兵高兴起来。

“不信，勾手指，对天发誓，我们结为兄弟，同生共死，患难相扶。”

就这样，僂照带着那个哨兵，背着枪，走回部队中来了，不单自己脱了险，还为部队发展了一个战士。

在横过广九铁路的交通线上，我们还有一个人人称赞的“女交通王”杨少珍同志。人们见这个小姑娘瘦小得象个老妈妈，因而都叫她杨嬷。

广九线是日军的动脉。敌人占领了香港以后，做梦都想着在南边修复广九路，在北边打通粤汉线。这对他们来说，是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的。我们东江纵队对于广九铁路当然也不放松，于是它就成为我们破坏的目标。

日军在铁路线上的兵力很强，五里一碉堡，还派出巡逻队来回巡逻，工事也很坚固，此外还有相当的伪军配合。我们当时的力量无法将它彻底破坏，那就只有不断地袭击、小规模地破坏，使铁路不能畅通，以达到牵制的目的。这条铁路刚好把东莞和宝安都划成两半，我们在广九铁路东西两侧的交通来往，调动兵力和运送人员物资等自然是频繁的了。敌人的严密布防使我们感到极大的不便。

在平湖车站到布吉车站之间，是我们横过广九铁路最安全的地段。这并不是由于敌人防守较疏，而是因为这一个地段由我们的“女交通王”杨嫫负责。她在地方党的同志和情报工作人员配合下，工作做得很出色。无论是个别人员或是部队，只要听从杨嫫的带引，一定能够安全通过敌人这一段封锁线。从一九四二年直至抗战胜利，她所负责的交通地段，连同她领导之下的几个女小鬼，从来没有出过事故。

杨嫫有一段悲惨的经历。她是贵州人，因为家穷，十三岁就给人家当童养媳，捱打受骂。她走到大路口啼哭，拐子佬骗她说带她找父母，卖到一个姓陈的军阀地主家，做陪嫁丫头跟小姐去到上海。女主人对杨嫫百般折磨，夏天要她在床边打扇到半夜。上海沦陷，那个女人又把杨嫫带到香港，住在六国饭店。正当杨嫫捱打受饿走投无路的时候，饭店里有个女工劝她逃走，把她带到一个进步女工的家里。从此，杨嫫的生活有了依靠，进步的思想逐渐滋润着这个苦孩子的心灵。一九四一年底，何炎同志把她带到部队来。这时，她已经是十七岁的大姑娘了，由于苦难的折磨，她长得又瘦又小。

杨嫫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到部队当交通员以后，很快就学会讲一口流利的广州话和客家话，初步懂得了抗日和革命的道理。她带着满腔激情，不知疲倦地去熟悉道路，了解敌情、地形，摸清了敌巡逻队的活动规律，很快就成为一个出色的交通员。什么人应该走什么路，人多人少，在什么时间内通过铁路最合适，她心中都有个计划。有时她带着你就擦着敌人碉堡旁边过，你紧张得出冷汗，她却说这样走最安全。到了铁路边她经常是先叫人隐蔽起来，自己一个人走到铁路上，用耳朵贴着铁轨，听清楚了没有声音才带人过去。有时到了铁路附

近，她把别人隐藏好，自己也藏好不动，果然过一会敌人的巡逻队就来了，敌人过去后，她又抓紧空隙，引着人跑步通过。一次，杨麻带着一份写着三个“+”号的紧急文件，刚好碰上敌人扫荡，杨麻临危不乱，装作害怕跌倒，翻到路旁的稻田里，迅速地将文件埋好，然后爬回路上。敌人对她进行搜查，扣留了一晚，杨麻说自己是个童养媳，被婆婆赶出来，无家可归，敌人找不到可疑之处，便放了她。杨麻又把文件挖了出来，赶快送到了部队。同志们都称赞她是个胆大心细、智勇双全的小交通员。

杨麻是在战斗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记得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一开始她可把人难住了。路西部队押送着刚捉到的几个俘虏，要从她这里通过封锁线送到路东司令部来。她对这些战俘满腔怒火，提议把他们枪毙了算数。她说：

“我参加部队就是为了打日本鬼，把这些禽兽枪毙了为同胞报仇吧。不然我死了也是不闭眼的。”她一边说一边流下泪来。

押送的同志向她解释说，这是党的政策，优待俘虏是为瓦解敌军，削弱敌军的战斗力，正是为了早日取得抗战胜利，替全国人民报仇雪恨。在押解俘虏的同志反复的解释说眼下，杨麻终于明白过来了，她同意带路。

快到铁路边了，杨麻说必须将俘虏反绑手腕，将眼睛蒙住才能过铁路。押送的同志说：

“有这个必要吗？现在是绑着的了，又是一个人牵着一个。”

“你们只绑着上臂，他们的眼睛是看得见的，到了铁路上他一挣脱，沿着铁路不管往南往北，走两三里路就到了敌人据

点。黑夜里，你的子弹不容易打中他，何况离敌人据点近，开枪会引起大事，这多危险啊！我们的同志流血牺牲捉来的俘虏，给他跑了多不值得啊！”

“对！”同志们十分佩服杨嫵的见解，依照她提出的办法将俘虏重新捆绑，用手巾将眼睛蒙住。杨嫵指挥着队伍先在距铁路二、三百米远的地方等着，待敌人的巡逻队过去以后再跑步通过铁路。杨嫵还要求每人相隔十多步，为的是万一出了意外，也可以尽量减轻损失。果然，一踏上铁轨，一个日军俘虏就躺倒下来，赖着不走，押送的战士立即拉下一条毛巾捂住他的嘴，两个战士象抬猪一样把他抬了过去。

杨嫵，这个年青的姑娘，与许多出色的交通员一道，用她们的智慧和勇敢，保证了广九铁路东西两侧的交通畅通无阻。

#### 四

在通讯系统中，全体电台人员和机要人员，从早到晚，通宵达旦地工作，使部队保持对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系。同时，还收抄新华社新闻，使部队及时得到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指示，了解时局的发展。他们埋头苦干，不为人知，他们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在后勤系统里，也有许许多多勤勤恳恳地工作着的无名英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分工：缝纫组躲在敌人心脏地区不分昼夜地大批缝制衣被、米袋、军鞋、五角帽。要是给日军或是给国民党军发现，他们就会牺牲性命的。在九龙，我们就有大批的女同志，以及当地的老头、老太太为了革命做着这些危险的工作。

军械所则又是另一个特点，他们的工作是叮叮当当响的，

运进去的是旧武器、钢条、废铁、火药，造出来的是步枪、地雷、手榴弹、刺刀、子弹，还修理各种武器。因此，它只能设在根据地内较小的山村，或在大山沟里盖几个小草棚，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象周玉同志，大革命后，彭桂在海丰打游击时，他就做过修械工，在抗战八年中他也一直在我们部队做修械工，从来不提什么地位和待遇。从新加坡回来的工人严瑞仁、廖荣等许多工人同志，长期做着这些艰苦的工作，直至胜利。

日军占领香港以后，我们拾回来英军埋在山上的一些磁炸地雷，样子象菠萝，它的保险装置很差，不安全。为了使用地雷，我们有些队配备了地雷班，有时一个小队出外打伏击也带上两个地雷。虽然普遍都教会了使用这种地雷的方法，可是由于保险装置不可靠，往往发生事故。有一次一个班在室内准备睡觉时，不小心将一个地雷拉响了，全班十二人牺牲了八个。此后，我们决心抛弃这种铁菠萝，自己制造地雷。当时的《八路军杂志》介绍了各种样式的地雷，我们就照着仿制。制造地雷必须摆弄雷管，雷管使用的装药是雷汞，在装药中也出了不少事故，付出了不少的代价。我们的参谋卢杰同志，就是在一次爆破试验中负伤，医治无效而牺牲的。后来从粤北来的大学生唐强，是学化学的，他摸索着制造出比较安全的雷管，解决了爆破问题，并且造出了自己的手榴弹。

在医务战线上工作的同志，如张惠文，莫银尚、林杰是模范壮丁队的第一批卫生员，周昆、招励真、梁国莲、叶萍、邝爱莲等是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第一批卫生员。这些同志跟随着部队出生入死，救死扶伤，参加过东移，经受过种种战斗的考验，有的同志还负过伤。后来部队扩大，江风、马烈、冯慕贞、麦雅贞等一批医务工作者陆续参军，随部队战斗。他们在



缺医少药的艰苦条件下，在频繁的战斗和行军中，救治了大批伤病员，默默无闻地对广东的抗日战争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卫生员莫福娣同志，一九四二年在宝安阳台山带领伤病员掩蔽时，不幸落入国民党顽固派手中。她痛斥敌人，高谈抗日救国，敌人把她绑赴圩场示众，她乘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为革命献出年青的生命。

炊事员、运输员绝大多数都是女同志。她们肩挑负重，行军作战，都及时到达，有时还打前站，别人休息她做饭，吃完饭还要收拾炊具，装发米袋。在火线上，保证做好饭就是保证打胜仗的必要条件。

跟随我的一个女运输员肖盘娣，一直替我挑着一担七、八十斤重的行李、书籍和地图，从江南挑到粤北、赣南，又从粤北挑到沙鱼涌上船北撤山东。她从来不掉队，不叫苦，下大雨走夜路也紧紧跟在我的身后。

女同志中也有当指挥员和政治干部的，如政治处主任赵学、政工队长欧巾雄、女连长李玉珍等。欧巾雄是马来亚回来的华侨，李玉珍则在香港的马戏班做过工，她们在东纵是人人都皆知的好同志。

在战争年代里，我们有许许多多以上所讲那样的好同志。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一起走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下，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而英勇战斗。在这里，写的只是我比较熟悉的几个。我殷切期望东纵的老战友们都动笔为自己所了解的烈士们、英雄们做传。

## 第十六章 抗日盟军

早在香港战事爆发以前，林平同志曾经把廖承志同志传达毛主席对党内的两个指示的精神转告我们。一个是：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人要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我们坚决执行这些指示，进行了复杂而艰巨的斗争，也获得了可喜的成绩。

### 一

日本侵略军队受法西斯“武士道”的教育，自以为天下无敌，它的士兵只知道效忠天皇，战败则自杀而死，不当俘虏。这种情况，在抗战初期是很突出的，这个时期我们开展对敌反战工作遇到了不少的困难。

日军侵华初期，我们没有俘获过日本兵，直到一九四一年五、六月间，在上下游松的一次战斗中，才俘虏了一个日本伤兵。他在腹部受伤后，昏迷过去。我们为了提防他醒过来后蛮

横乱闹，给他上了药包扎好伤口之后，就把他的手脚捆了起来，带到驻地的一个炭窑里，在窑洞口钉上几个木桩，安上一扇门，派两名战士看守着。

那时，我们部队中略懂日语的只有一个同志，名叫孙冰，原是新加坡的一个教员。我吩咐他守在旁边，待俘虏醒后与他搭话。

一会，俘虏醒过来了，就拼命挣扎，想把绳索挣脱。孙冰用日语和气地对他说：

“兄弟，你伤了，不要乱动，我们是优待俘虏的。”

“呸！”他一口唾沫就吐过来，大概是听到“俘虏”两个字就恼火了吧。

孙冰一侧脸，躲开了，然后扶正眼镜，强忍住气对他说：“你不要乱动，我们可以解开你的绳索。你饿了吧？一会就吃饭给你吃。你腹部受伤了，可不能乱动啊。”

俘虏不答话，象头犍牛一样在地上滚。孙冰没办法，只好叫卫兵注意看守，走向部队向我汇报了情况。我吩咐把门加固，留一个窗口观察，非必要时不要开门。

过了一会，卫生员来替俘虏换药，我叫两个大汉陪着她去，意思是要他放老实一点，如果不听话，两个大汉就会强制他服从治疗。

俘虏这时比较安静，闭上眼睛让卫生员换了药。我们也就解开他手上的绳索，然后把门关上，让他独自在窑洞里。

又过了一会，忽然从炭窑里传来一阵阵杀猪似的嗷嗷叫声。战士们仔细一看，原来这个俘虏的手解缚后就自己脱光了衣服，把伤口上的纱布都扯开，任它流血。不知道是痛得难受

还是故意寻死，他象野兽一样在地上乱滚乱撞。我们一走近门口，他就张牙舞爪，要与我们拚个死活。为了让他安静下来，免得弄坏了伤口，我们的人只好暂时不靠近他。

夜，万籁俱寂，炭窑那边的吼叫声渐渐地低弱下来。

天亮时哨兵来报告说，俘虏因流血过多，已经死在炭窑里了。

虽然我们对这第一个日军俘虏作了很大的努力，想把他争取成为反战的盟友，但没有成功。

东江纵队成立前后，我们展开了广九铁路两侧的争夺战。炸铁路、攻炮楼、拔据点，使日军睡不安席，草木皆兵。从一九四四年初开始，在港九地区、宝安地区相继俘虏了一些日本兵，也有一些在日军中的朝鲜兵和台湾兵，但每次战斗都只俘虏几个人。直到这年四、五月间，日军进攻粤北和赣南，又从北到南向沿海扫荡过来，在博罗、惠阳地区沿途遭我截击伏击，俘虏才逐渐多起来。

这时，纵队政治部成立了敌军工作科，由林华、林展负责。俘虏的敌军由敌工科管理。这时日军士兵厌战情绪已经大大增长，不象过去那么顽强了。经过教育，俘虏们的觉悟提高了，认识到过去受法西斯利用，屠杀中国人民是罪过，都希望能将功赎罪，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做点事。这时候，再没有出现过俘虏自杀的事了。于是，我们请示中央，成立“日军反战同盟华南分盟”。

经过一个时期深入细致的工作，逐个发动，条件成熟了，便于一九四四年七月中旬在东莞、惠阳交界的铁岗正式成立了“日军反战同盟华南分盟”。

成立的时候，日本反战同盟负责人冈野进从延安发来了贺

电。日军俘虏欢唱跳跃。我和杨康华当时就在附近，便也赶来祝贺。

我们素来优待俘虏，平时他们吃得都比我们好。这一天我们特地给反战同盟的朋友们杀了一头猪，买了许多鱼。他们说要自己动手做“日本料理”，请我们参加他们的会餐。这一顿吃得很高兴，我们尝到了日本鱼生、酱油汤的味道。会餐后，他们围成一个大圈，拍手顿足，跳起了捕鱼舞，跳罢，哈哈大笑。

日军反战同盟华南分盟成立后，不久又成立了台湾人民解放同盟和朝鲜人民独立同盟华南支部。反战同盟的成员积极反对法西斯战争，并参加我军的瓦解敌军工作，为反侵略战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反战同盟成立不到一年，日本就投降了。此时，日军反战同盟的人印发了对日军宣传的传单，还分散到各部队去做阵前喊话劝降的活动，起到了一些作用，曾经有过一个班的日军携械来降。后来，朝鲜独立同盟和台湾解放同盟的成员，跟随我们挺进粤北，我们布置朝鲜朋友经南雄、大庾绕道回国，有个别的朝鲜人则跟随我们北撤山东然后回国。那些台湾人，在日本投降台湾归还我国之后，也回到台湾省去了。

## 二

香港在鸦片战争以后，被英国侵略者从清朝政府手中强占了。受帝国主义欺凌最早的广东人，特别是沿海的广东人，很自然地对外国人怀着憎恨的心理，把白种人叫做“番鬼佬”，把印度人叫做“摩罗差”，把英国人叫做“红毛鬼”。

在日军占领香港以前，“红毛鬼”的确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他们在香港对中国人的压迫、剥削极其残酷。但直接管理中国人的还不是“红毛鬼”，而是他们的爪牙“摩罗差”。这些“摩罗差”也是有恃无恐，无恶不作。此外，还有一些“华差”，他们的地位比“摩罗差”还低下一等，但懂广东话，熟悉办事门路，善于取得英国主子的欢心，因而也更狐假虎威了。港九劳动人民在这重重的压迫下，生活苦不堪言。“福佬”（潮汕人）绝大多数是拉黄包车，而东莞人则结帮在码头当“咕喱”（苦力）。他们食不饱肚，衣不掩体，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因此，他们对英国人及其走狗充满了仇恨。

我们队伍中有不少来自香港的工人、青年，对于在这场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要联合盟军，协助盟军作战，必须有广阔的胸怀，站得高，看得远。他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

日军占领港九后，与中国人肤色不同的“红毛鬼”不能化装，不会说中国话，躲不进下层社会，逃也逃不了，都让日军一个个抓了起来。英军被囚禁于七姐妹、深水埗和亚皆老街三个集中营，印度兵则囚禁于马头围集中营。

日本人瞧不起英国人，用铁丝网围一圈，把他们围在一平方公里的大圈子里，任由日晒雨淋，只派两个哨兵巡视。日军骄傲地说：“让英国人跑也不敢跑，跑出来也逃不到哪里去。”日本兵虐待他们，比虐待“摩罗差”还甚。印度兵集中营还每天按时发两顿饭，对英国人这边则等高兴时才扔几把发酸的、发霉的面包进去，看着他们为几片面包争抢，看着他们在雨天把沾满泥水的面包填到肚子里。日本兵在网外手舞足蹈，拍手取乐。

刘黑仔率领武工队潜入九龙市区了，他们打扮成各式各样

的人。除了暗中保护、抢救著名文化人以外，还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抢救国际友人。

“国际友人”这个词，许多游击队员还是第一次听到，特别是一些小同志。他们说：“日本仔进攻香港时，‘红毛鬼’向我们求救，我们要求他们支援武器，他们不给，现在全都给了日本仔。他们一点好处也没给我们，而我们倒要顶风冒险给他们干这干那。”看得出来，许多同志都很不乐意帮助英国人。

尽管心里不舒服，口里唠唠叨叨，但是，听了政委作的时事报告后，知道了在反法西斯的力量中，英军和美军都是我们的盟军；知道了多救出一个盟军中的人也就是多一分反法西斯的力量；同志们也就心悦诚服地去执行任务了。

小鬼谢德照头一次就把四个英国的下级军官带回到我们宝安驻地。他们脱险以后，又摆出了一副绅士的架子。我们的翻译谭天向他们介绍我是游击队的队长，他们向我打量了老半天也没说话，显然是看见我穿着一身农民的便衣，心里起了疑问：“这是队长吗？”开始，他们满不在乎，慢慢就局促起来，到后来甚至面色也变了，大概心里有点害怕。我向他们点点头，微笑着给他们解释说：“我们是人民的游击队，请放心。你们先休息一会，吃过晚饭就送你们到惠州去。我们游击队处在敌后，条件很不好，你们将就一点好了。”

谭天翻译了我的话。这几个英国军官心里才算踏实下来。一个戴少尉军衔的军官站起来，用半咸半淡的广州话向我们说起他们脱险的经过：

“我懂广东话，我是做翻译的。日军进攻得太快，真是想不到呀。军队向后跑啦，我们四个人跑得慢，追不上部队，就只好向水塘山上爬。在山上躲了两日，没饭吃，下山的时候幸好

碰到你们部队这位小朋友，他说带我们过边界，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就来了。这是什么地方呢？”

我见他们已经消除了顾虑，也就没工夫跟他们闲扯，把僂照拉到一旁问：“你去过集中营吗？那里的情况怎样？”

“去过了。那些‘红毛鬼’的确很惨，他们没法逃，走出来也没人带路，没人收留。日本兵看守得不严，我们干脆把他们全带到这里来吧。”

“傻仔，九龙离我们这里太远了，要走两天才能到。你们应该从罗湖过界，在梧桐山歇息一天，然后再把他们带向坪山那边，从坪山送去惠州就近得多了，而且白天也可以走。”

僂照搔搔脑袋，又说：“把‘红毛鬼’带出来容易，可是他们不会讲本地话，又不能化装成中国人，很容易给日军和汉奸发现……”

“就因为这样，”我接着僂照的话说道：“你们一次不能带得太多，几个人一组，夜间行动。另外，逃出来以后，要找个隐蔽的地方给他们化化装，把脸涂黑，穿上唐装，戴顶大笠帽。歇一个白天，第二晚走一夜路就可以到梧桐山了。”

我把跟僂照说的，写信转告港九大队的黄高阳，叫他们尽力营救。

我们先后救出了军职、民职的高级官员有三十多人，其中有赖特上校、京中校、谭臣警察司、祁德尊少校和英军某舰队的司令等。在营救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提出任何报答的条件，对他们很客气，这使他们很感动。他们转移到惠州以后，纷纷写来感谢信说，如果没有东江游击队的帮助，能否安全脱险是一个极大的疑问。并说，如果集中营里的人知道东江游击队的真诚帮助，许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跑出来的。他们在游击区看



到我们的生活很艰苦，到了后方，除了来信感谢外，有的还寄了药品给我们。

在抢救出来的外国兵中，有八、九个印度兵表现得特别好。他们是一个重机枪班，在日军进攻时，他们带着武器、弹药，爬上一个山头上隐蔽起来，直至见到我们的部队，才从山上下来。到我们部队后，说什么也不肯离开，他们的班长用半通不通的广州话说：“朋友们，收埋（下）我地（们）吧，我地一定好好打日本仔。”其他的印度兵也带着恳切的神情，比划着双手请求留下来。为了处理好国际关系，我们只好反复耐心地说服了他们离开。临走时，他们把所有的枪支弹药统统送给我们，才依依惜别。

经过这种营救工作，东江游击队的地位和作用受到英国的重视。一九四二年七月，英国在惠州成立了英军服务团的前方办事处。该处的主任祁德尊少校致函我们，要求我们派出代表和他们讨论合作问题。并派出柯礼文上尉找到港九游击区来，要求我们部队调查和摄影集中营的情况和位置，并协助营救。

在日军占领区的天罗地网之中，我们的战士在极困难极危险的情况下，供给英军服务团情报，布置秘密交通线，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英军还不满足，要求派人来与我们的港九大队一起工作，我们就不得不拒绝了，因为他们在后方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搞在一起，他们之中就难免混有国民党特务。果然，不久我们就发现他们与九龙一带的土匪、特务都有联系，还瞒着我们在大鹏半岛的山上偷偷地设了一部秘密电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得不把他们连同那部电台一起“请”了出去，不准他们在我们的地区活动。

### 三

合作时间较长的是美国盟军。

一九四四年初，东纵一个小鬼在日军眼皮底下援救美国空军飞行员克尔中尉脱险，这是一段神话般的故事：

克尔中尉是十四航空队中的战斗机驾驶员。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一日，航空队以二十架战斗机保卫十三架轰炸机从桂林飞袭香港启德机场，在香港上空，与日机遭遇，展开了激烈的空战。克尔中尉的飞机中弹起火，他急忙跳伞逃生。这时，机场旁边的日军正在他下面奔走，盯着上空，张开罗网准备生擒他。克尔绝望了，用手蒙住了自己的眼睛，心里头一个劲地向上帝祈祷。

出乎意料之外，吹来了一阵南风，他顺着风向降落到新界慈云山北面，此地与九龙是一山之隔。正当他不知如何摆脱敌人的追捕时，突然有一个少年奔跑上来，用手势招呼他，意思要克尔跟他跑。日军的枪声愈来愈近了，克尔也顾不得多想，拔腿就跟少年跑起来。他们跃过小溪，穿荆棘，钻树丛，跑着跑着，碰见了另外一个少年和一个妇女，克尔大惊失色，正要掏手枪，少年忙制止了他，用手势向他说明来的是自己人。原来少年在发现克尔降落的时候，已经告诉另一个少年去找当地工作的女同志李兆华，带着她急急忙忙地赶来了。这两个少年原来都是刘黑仔短枪队的人，一个叫陈勋，一个叫李石。李石是本地人，李兆华就住在他家里。

李兆华来到之后，和两个小鬼商量，现在是跑不出去的，先要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他们找到一片密密的树丛，钻了进去，留下李石陪着克尔，陈勋立即去报告武工队长刘黑仔，李

兆华负责送干粮和茶水。

刘黑仔当机立断：“立刻带他们转移到石龙仔的山洞里。”

石龙仔的山洞，在半山腰的一个险要的悬崖上。他们刚刚隐蔽好，敌人就从四面八方前来搜索了。日本兵布满山头山脚，在附近的村围、田野上走来走去，呱呱地乱叫。

第二天敌人出动了海陆军一千多人在九龙地区扫荡，还用飞机向新界南北一带搜索，对慈云山以北包围和封锁，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星期，反复搜查扫荡，飞行员全无踪影。

在敌人包围之中，刘黑仔使用麻雀战的办法，经常转移，声东击西，将敌人引了开去，保证了克尔中尉的安全。

游击队的两个小同志，也给了克尔中尉不少的勇气和安慰，替他敷药治灼伤，给他找食物，还拿出身上仅有的五角钱，买了糖给他吃。

几天以后，在一个黑漆漆的夜里，刘黑仔带着克尔中尉，穿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到达了新界的深涌村，然后由港九大队派来的谭天等同志接送克尔回纵队司令部。

克尔中尉是个性格很开朗的年轻人，整日蹦蹦跳跳的。他把这次脱险说成是“人生第一次的探险旅行”。

克尔中尉对救他的游击队员感激不尽，把刘黑仔称为再生的恩人，把两个小鬼称为“世界上少有的神童”。可惜他到底也不知道我们的两位小游击队员的名字：陈勋和李石。

克尔中尉在司令部住了不久就转送到大后方去了。分别时，他十分激动，一一拥抱我们的战士，还把身上的手枪、小刀、海上救生用具等等全送给我们留作纪念。我们对他说：“我们的战士固然机灵，但最重要的还是靠人民的掩护。为了把你救出来，许多中国人在敌人的包围扫荡中牺牲了，你的生

命是中国人民用生命换来的。”克尔感动地流下了热泪。

克尔参军前是一家美国杂志的美术编辑、记者，他转到大后方之后，就把自己被游击队抢救脱险的经过画成连环画，印刷好后还特地送了一套给我们，以表示“永久的感念”。我们也把这套连环画登在《前进报》上。

自克尔中尉脱险以后，同年五月二十六日，我们又从大亚湾救出了五个美国飞行员：列夫柯中尉、拉维里尔中尉、沙克上士，康利上士和爱利斯上士。以后又救护了美国十四航空队的依根中尉和美国第三舰队飞行员克利汉少尉。他们脱险后寄来的感谢信中写道：“我们美国人也曾从历史记载中谈到了并研究过那些坚强的军队，但是在全部历史中和在全部我们的学习中，却从来不曾知道过有象你们游击队这样英勇的军队。终有一天，全世界都将传颂你们伟大的工作——而我们对于你们所做了的和正在做着的工作，仅只知道一点，就足以认为：能够向你们致敬，能够称你们为兄弟，是我们的光荣和特有的权利。”

由于我们实际地做了好多工作，在国民党顽固派长期严密封锁下的东江纵队，得到了盟国人士的承认和尊重。我们所处的战略地位和我们与国际友人合作的声誉，引起了在华美军总部的重视。这时，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胜利已经指日可待。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曾意图在我国华南沿海登陆反攻日军。为此，在延安的美军联络组提出要派出联络员到我们东纵来。中央电告我们，可以接纳一名美军联络员，允许他们携带电台一部，并向他们提供登陆反攻所需的资料 and 情报。但对他们要注意保守我军的机密。

前来的联络员是欧乐尔少校，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高个子中年人，一个“中国通”。他带来了一部手摇马达式的电台和一个中国报务员。我们配备了翻译员黄作梅同志，报务员江群好同志，同他们在一起工作。我们司令部成立了联络处，为他们收集、整理所需的资料 and 情报。

美军在国民党地区的龙川县老隆镇设有一个工作组，欧乐尔受这个组领导。我们不准他们直接来往，就在河源设立一个联络点，每月一般联系两次。欧乐尔的情报信件由我们派人送到河源；龙川的工作组每月发给欧乐尔的经费食物也只送到河源，由我们派人取回。不久，我们从电波上发现，欧乐尔带来的报务员，除了用特定的密码向美军发报外，还用另一种密码发报。显然，这是给国民党特务机关发报。我们对这个报务员早有警惕，事情暴露后，我们对他多次审问，最后他不得不招认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借欧乐尔需要报务员之机，潜入我部队中活动，偷取情报。对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这种险恶手段，我们气愤之极，当即把他驱逐出我们活动地区，报务工作改由江群好同志担负。

欧乐尔在东江工作有大半年，后来由戴维斯来接代，直至抗战胜利。

为此，美军曾多次写来感谢信，并赠送我们两部电台和衣服、军毯等物。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在华美军总部和华盛顿方面都向我们表示感谢，认为我们的情报“在质与量上都非常优越”，帮助他们指挥当局“取得更好的结论和计划”，“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的贡献”。

## 第十七章 江北斗争

—

一九四四年八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广东军政委员会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土洋会议。按照中央指示，揭开了东江以及全省抗日游击战争的新的一页。

广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是一九四二年省委被国民党顽固派破坏、中央决定广东地下党停止组织活动之后成立的。按照中央指示由林平、梁广和连贯三人组成。土洋会议举行之前，省临委和东纵的主要负责干部讨论了形势和任务问题，向中央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请中央予以指示。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电复林平转军政委与临委，对东江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作了具体指示。土洋会议就是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而召开的。

土洋的正名是屯洋，那时候人们把它叫作土洋，座落在大鹏湾之旁，背靠群山，面临碧海，左侧是大鹏半岛，右侧是九龙半岛。大鹏湾是华南著名的美丽的深水海湾，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日本侵略军进攻华南就是在大鹏湾东边的大亚湾澳头登陆的，此后大鹏半岛便成了国民党军队、伪军、土匪各方势力争夺的要地。我们地下党也于一九三八年开始在此进行武

装斗争。到现在，这里已经成为我们的根据地。参加这次重要会议的各地区负责同志来到这里，看到大鹏湾风和日丽，浪静沙平，顿觉胸怀舒畅，心旷神怡，对这大好景色赞不绝口。

参加会议的，除南路特委因交通阻断不能成行以外，前后东江特委、前后北江特委、珠江特委、中区特委等各路负责人都赶来了。

会议由林平同志主持，他是省临委书记，也是军政委员会书记。

会议就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央向我们指出，日本侵略军打通粤汉铁路势在必行，指示我们应本着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加紧进行工作。敌人向北侵占到哪里，我们的武装斗争就开展到哪里。同时，敌人北侵还将使珠江三角洲及其以西的敌后地区扩大，因而我们的武装也应该扩大。中央要求我们把广东的武装力量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

这个令人振奋的指示怎样具体执行呢？大家一致认为，这就是要把游击战争扩大到全省所有的敌后地区，要放手发展自己的部队，要向北、向西发展，主要的方向是向北。向北发展的任务由东江纵队负责。决定由东纵派出两支部队挺进北江。一支由郭强、李东明负责，称北江支队，向英德、翁源方向推进；另一支由蔡国梁、邓楚白、陈志强带领，称西北支队，开往清远、四会，并向小北江连县方向推进。为适应新的形势，东江纵队的领导机关要渡过东江，设在江北地区。这时，珠江三角洲的部队已经壮大，决定成立珠江纵队，并由珠纵派出部队向中区方向推进，局面打开后以地区性的人民抗日武装的名义出现。由东纵抽调参谋处长周伯明到珠江三角洲去加

强领导。会议还决定，连贯同志随挺进中区的部队活动，准备前赴南路，指导当地武装斗争，发展壮大南路纵队，向粤桂边前进，并设法建立交通线同海南岛的琼崖纵队联系。林平同志与韩江地区联系，恢复韩江的武装斗争，准备成立韩江纵队。

土洋会议掀起的波涛涌向四面八方，广东武装斗争的局面迅猛发展了。

梁鸿钧到了珠江以后，与罗范群、谢立全带着几百人的队伍，向广东中部挺进，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很快就进入新会、高鹤、开平一带，亮出了中区人民解放军的旗号。

珠江纵队在珠江三角洲正式成立了。

连贯到达了中区，也顺利地同南路的部队接上了关系，着手建立南路解放军。

邹强和蔡国梁两支部队出发后，先在增城、龙门、博罗一带和阮海天的独三大一起打开江北局面，然后向北挺进清远、英德。沿途艰险重重，到处都有反动的地主武装，国民党的杂牌军“挺进纵队”围攻堵截。他们地形不熟，兵力也不多，但是他们敢于和日伪顽作斗争，还曾经一度解放了清远县城。他们沿途展开了广泛的群众性宣传，使东江纵队在当地人民中留下了良好的政治影响，为我们部队以后再次挺进粤北打下了群众基础。

张江明与粤北地方党接上了关系，把原来在余汉谋十二集团军政工队工作的我方人员抽调回来，并且把在粤北大、中学校里的许多党员和大批知识青年动员前来东江参加部队的工作。不久，几百名新战士来到部队，其中好些是党员，他们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有写作的，演剧的，唱歌的，懂日



文、英文的，真是人才济济。土洋会议一结束，政治部就办起了较大规模的“青干班”，连续办了七期。一九四四年十月，成立了一个比较充实的政治工作队，代号叫“拖拉机队”，取开垦耕耘的意思，由夏洪、欧巾雄同志负责。后来又成立了鲁迅文艺宣传队，以李门、乔毅、游波、韦丘等从十二集团军政工大队回来的同志为骨干组成。原来活跃在铁路西的东流剧团也充实了。这一来，我们部队的文化工作大大地活跃起来。

## 二

按照土洋会议的决定，扩展东江河以北地区，准备把东纵的领导中心从江南转移到江北，这个任务交给我和杨康华负责。

江北地区的工作已经有了多年的基础。早在一九三九年，阮海天同志已在增城一带组织起一个中队的武装，合并到我们惠东宝边抗日游击队二大队来。部队东移海陆丰回来以后，经常派出武装到增城、博罗一带活动。卢伟良、何维、肖光生、鲁风等同志曾先后带领队伍在这里活动过。一九四四年初，谢阳光、卢克敏同志率领的铁东大队打下了东江河南岸企石一带以后，曾拨出韦伟、曾文一个中队，由阮海天带领，在江北博罗西边一带活动。

到了一九四四年七月，纵队司令部决定成立独立第三大队，由阮海天任大队长，原籍博罗的韩继元任大队政委，赖祥任副大队长兼中队长。江北韦伟那个中队编进去，另外还配有一个独立小队。这支部队从大鹏半岛开出，经过行军作战，又打开了企石，过了江北，在博罗城西的联和圩以及四星坪一带开展了活动。

九、十月间，我们又从司令部调邱特去接替赖祥，任副大队长，陈江天任政治处主任。当时，李潮部盘踞在东江河两岸，自称“抗红义勇军”，是伪军中最反动、势力最大的一股。我们认为，在领导机关过江北之前，一定要狠狠地打击李潮这股反动势力。为此，我们曾经向在东江两岸的部队下通知作了布置。邱特过江后，即率领部队强攻伪军占领的鸾岗。鸾岗是一座小城堡，有六个炮楼，周围有坚固的城墙，外面是水田和鱼塘。这时晚稻将熟，田里一片金黄，李潮却派一伙伪军把鸾岗的六百多户人家驱赶出外，要抢割他们的稻谷。我们的部队与当地民兵配合，经过了三夜的侦察，奋战了三天，逐屋争夺，用炸药炸开了五座炮楼，终于攻下了鸾岗。李潮部退到苏村去了。这是一场硬仗，敌人死伤五、六十人。最后顽抗的敌人从地洞逃跑了，我们只缴到二十几条枪。但是，最大的战果是赶走了李潮，保卫了群众的利益，使他们能回到自己的家园，开镰割禾。

在这次战斗中担负主攻任务的是第一中队，中队长陈庭禹是一九三九年从泰国回来参军的，一个月前他的爱人张绮芝在攻打福田的时候牺牲了。陈庭禹在争取担任主攻时，明知任务十分艰巨，曾经说过：“如果我牺牲了就和张仔葬在一起吧！”他勇敢机智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可是，在战后集合队伍时，不幸中敌人的冷枪牺牲了。这一对革命的伴侣，就长眠在东江河的北岸上。

这一仗，在博罗影响很大，新区的各阶层人士对我们党和部队有了正确的认识。

这一年十二月，日本侵略军为了防备美军在华南反攻，就抢先运兵再次从澳头登陆，又占领了惠州和博罗城。盘踞在博罗

城的国民党顽军梁桂平支队照例不战而走。他们丢了福田，撤到长宁，我们独三大就进入福田，开赴长宁。梁桂平支队反共则是很坚决的，他们对我们开火，又打不过，于是退到横河、响水。独三大占领了长宁，进入罗浮山最大的道观冲虚观，再前进到横河一带。

博罗的地方党有县委书记黄庄平同志等艰苦深入地开展工作，与韩继元等配合，在东江河北岸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

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我结束了东江干校第一期的工作，准备过江时，一天，有个人从博罗来到了我们坪山司令部，说要拜见曾大哥，有要事商谈。我们正在司令部里头开会，曾生示意我先去见见他。

一个矮小的老头，嘴边留着两撇八字胡，身穿黑胶绸衣，脚踏草鞋。来者究竟是什么人呢？我正揣测间，只见老头跨前一步，用右手三个手指横在胸前，躬身施礼，亲热地叫道：“曾大哥。”

我想起了这是“三点会”的礼仪。我就向他点点头，算还了礼，说：“我是曾大哥身边的人，曾大哥现在没有空，你有什么事先跟我说吧。”

“我有天下大事，军机大事，非见曾大哥不可。我是从博罗来的，代表我们‘三点会’数千人马而来，请你务必通报。”

我心里不禁嘀咕起来。这老头说他有军机大事，有几千人马在博罗，我们为什么从来没听说过，韩继元也没说过。不过人既然来了，我正准备过江去，打听一下那边的情况也好。想到这里，我就把曾生同志请了出来。

曾在船上搞海员运动的时候加入过“三点会”，在“三点

会”中威望很高。

曾生用“三点会”的暗语，与老头对上几回话以后，老头才把来意说明。他叫黄梅仙，是博罗“三点会”的首领，闻说曾大哥势力已近博罗，特来求见。他说，假若我们有意于博罗境地，他愿效犬马之劳。

黄梅仙究竟有没有几千人马呢？他的来意是否象他所说的那样呢？这就难以令人相信了。这时候，曾生把我介绍给黄梅仙，说我将要带大队伍过江去，希望黄梅仙到时与我联系，协助我行动。

黄梅仙满口答应。我们请他吃饭，他几碗酒下肚后，越发飘飘然了，提出给他枪支弹药，说要组织兄弟们为我们开路。他说，只要他一号召，就可以成为一支十万大军，夺取天下，犹如探囊取物而已。

第二天黄梅仙便高高兴兴地回博罗去了。走时，我还送了他一程。

在这个老于世故的黄梅仙身上，我们并不寄太大的希望。正象曾生同志在他走后跟我说的：“我们要开辟一个新区，任务艰巨，为此，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黄梅仙的‘三点会’，争取他们不干扰我们，可能的话，利用他们协助我们做一些工作，那就更好了。”

要把东江纵队的领导中心移到东江以北，不是一般的转移驻地，而是带战略性的转移。要把整个领导机构渡过江去，还要进一步使江南、江北连成一片，必须首先把东江的某一大段河道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上。

日军占领惠州、博罗以后，差不多整条东江都在他们手上。后来，日军收缩防区，撤出了某些地段，但顽军和土匪乘

虚而入，所以东江河两岸，不是日军占领就是顽、匪控制。我们要夺得一段河道，除了打，别无他法。

我和杨康华研究，由我先带一部分部队过江北，续继打开局面，杨康华带领大批干部，在南岸迅速开展黎村、铁岗、南坑一带的工作。这一带的国民党顽军已经跑了，成了广阔的敌后，我们亟需把这一片广阔的江南地带变成巩固的根据地。这样，东江南北才好彼此呼应。

东江干校这时候正在招收第二期学员，因为大多数部队都在江南，干校便先转移到清溪圩附近的南坑去，等招生完毕然后过江。

关于过江地点的选择，我们决定从东莞的石排中坑至博罗苏村这一段五十多里长的东江河道入手。

控制这段河道的是两股土匪，一股是李潮部，一股是陈禄部。李潮的祖辈是当地的土霸，凶残霸道，老百姓无不恨之入骨。李潮继承祖业，不仅独霸一方，而且与日伪、蒋顽勾结，他的土匪队伍有日伪军的番号，也有国民党的番号，是代表两方面反动势力专与我们作对的急先锋。陈禄，花名“大鸡六”，就是过去在王若周部时，曾编为我们第二大队的第二中队的那股土匪。几年来，“大鸡六”与李潮一样，也倚仗日伪顽的势力，横跨东江两岸，设下大小据点，敲诈勒索，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我们选择这个地段过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耍趁机消灭这些祸国殃民的土匪。

一九四五年一月下旬，我带着司令部一部分人，从彭沃的第三支队抽调来吕苏的一个大队，又调了何通到我处当参谋，我们一行轻装向北进发。白云嶂山坳北面是黎村、谢岗，从谢岗到桥头只有二十多华里。我们翻过九百米高的白云嶂，很快

就接近桥头了。

经过三次冲击，使用炸药将桥头最坚固的炮楼炸开。可是，狡猾的李潮乘混乱之际跑掉了。

经过几次奋战，终于扫清了李潮、“大鸡六”在江边的据点，占领了桥头、石排，控制了石滩到苏村这一段，为我们部队过江铺平了道路。

李潮、陈禄逃窜后，石排、企石、中坑一带的土匪和黄家山的顽军也被驱赶干净。这里的人民饱受伪军、土匪的欺凌，现在重见天日，对我们十分热情，到处杀猪慰劳我们，许多青年前来报名参军。

独三大政治处主任陈江天同志从江北过来，汇报了情况。我们做好了渡江的行动计划，安排了鲁风率领黄锡良、黄国大队以及张苞的独立中队活动于南岸桥头、古洲、东山、石排一带，保证江南江北的交通安全。我们便从企石附近乘船渡过东江河，到达博罗境内的司马、马嘶。这是一九四五年农历正月。

### 三

博罗县除东江沿岸比较平坦之外，其余地区都是丘陵和高山，占博罗总面积八成左右。从东江河向北看，有象头山、白马山、徭排山、罗浮山等大山，其中罗浮山最高。由于这些大山的阻隔，往北的交通险阻，只有两条山路，一条经横河镇向龙门方向，一条从响水出柏塘、公庄等地。不走这两条路就得沿东江河，迂回曲折而上了。

过江了，这只是迈开了第一步，我们的目标是往北面的山区去。占据博罗北面的是国民党惠州游击指挥所的梁桂平支

队，我们赶跑了梁桂平支队，控制了北面，南面的土匪就容易对付。如果一直从南面打上去则既拖延时间，又消耗兵力，还会引来个腹背受敌，得不偿失。

我们布置好东江沿岸建立交通站和搞情报工作，其余人马都往东北方向的山区进发。出响水，到柏塘附近折向西，然后经横河进入罗浮山。

从新作塘出发，绕出平安圩，前面就出现了一片连绵的丘陵，查地图一看，已经到达鹅头寨地面。“鹅头寨？”黄梅仙的家乡到了。

我看到村前站着个老人，便走上前去，熟落地问道：“梅仙大哥在家吗？”

老头一怔，仔细地打量着我皮带上挂着的左轮枪，连忙点头哈腰地说：“啊，长官，你找黄梅仙吗？我也好久没见他了，他经常不在家的。”

“老伯，不要怕，我和梅仙大哥是朋友，这次来，是特地来拜访他，决不会扰乱地方的。”

“啊，啊，我不怕，不怕。”老头抖着胡子说。“我确实不知道，等他回来，我告诉他吧。”说完掉头就走了。

“见鬼！”我心中暗思量，“黄梅仙搞什么鬼名堂？约好了我来找他，怎么避而不见？”

村前是一片小开阔地，我走前几步，向警卫员松仔要过望远镜，向山北那边望去。

山下二十多里之外，有一条大约二百多户人的大村庄，村庄四周矗立着好几座炮楼，根据位置看，这肯定是柏塘圩了。村前靠我们这边，有一个黄土山岗，从望远镜中看，黄土山岗现深黄色，而深黄色中有条黑线，黑线前又有一条浅黄色的

线，我睁大眼，仔细观察了一会，才看清楚是敌人在修筑工事。

“柏塘敌人在修工事。”我对韩继元说道。

“王同志，趁他们未修好，打一下怎么样？打起来，情况就好弄清楚。”韩继元跃跃欲试地说。

“不，现在不要打，敌人修工事，说明是有准备，而我们还没有个立脚的地方。还是按原计划路线前进。从这里向西折，翻过白马山坳到横河去吧。”

我回到村前找到刚才见到的那老头，老头已经不象刚才那样慌张了。我告诉他说，我们这支部队是抗日的队伍，专打日本鬼与汉奸、恶霸，保护人民的。我们初到此地，人生地不熟，请他转告黄梅仙，说我们在横河等他，有要事商量。

当我们到了横河以后几天，黄梅仙终于应约而来了。

言谈之间，我才知道了黄梅仙找曾生以及前几天避而不见我的真正原因。黄梅仙的“三点会”，过去在博罗曾经风行过一时，但是好景早已衰落了，手中剩下没几个人。他之所以跑到惠阳找曾生，是想借我们的声势，希望给他个什么番号，配给他点枪支，以此招兵买马，恢复他的势力。他原来夸下海口，说他有千把人马，这一下子露了馅，所以不敢露面，直到我们离开鹅头寨以后，才敢出来见我。

黄梅仙见到我以后，还是鼓吹他的号召力，说只要发给他枪，一千几百人就立即可以召集起来。

我说：“我们部队的枪支也多不了几支。如果能攻下柏塘、公庄，枪支问题就好解决了。梅仙大哥，麻烦你先把这两个地方的情况给我们了解清楚吧。”

黄梅仙答应了。我就派了三个侦察员协助他侦察，后来他



们回来汇报的情况是比较准确的。

横河是罗浮山北面的门户，我们开往罗浮山之前，把邱特的大队留下，在这一带开展群众工作。这一带有个习惯，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耕田、打柴、做家务都是妇女们干，男人只在家里干些零碎家务活，抱抱孩子。所以我特别把司令部几个能干的女同志留下来，让她们在这里开展妇女工作。

在横河，了解到梁桂平支队占据着龙门边境的麻榨圩。但在此时要打麻榨兵力不足，我便决定先到罗浮山。

横河往南二十里是澜石圩，到了澜石圩，我们已经在罗浮山麓了。

罗浮山海拔一千三百多米，山势雄伟，山上古木参天，溪水长流，风景清幽，历来被称为游览、隐居圣地。山上有古老的庙宇，有留下美妙神话传说的“会仙桥”、“大仙脚印”、“葛仙炼丹炉”、“朱明洞”等古迹。罗浮山脉延绵数百里，地处博罗、龙门、增城的交界处，俯瞰东江，背靠粤北，是一个很好的游击回旋之地。

从澜石圩往上走，是一片密密的森林，那些高大粗壮的树木，叉干纵横，枝叶茂密，遮天蔽日。顺着山林小路往上走七、八里左右，在那万木丛中便现出了红墙绿瓦的庙宇冲虚观。

冲虚观是罗浮山的主观，据说罗浮山有三十六个观。观是道家的庙宇，里面住的是道士。冲虚观中有四百多个道士，其中还有一些女的。听说道家是允许成婚的，他们有的是成双修道。

冲虚观很大，前面一排都是招待香客的客厅客房。现在打仗了，没有人来烧香，这些厅房便都空着，我们几百人，住进

去还绰绰有余。

道士们对我们驻在此地，没有表示恶意，也并无好感，对我们总是不冷不热。我们在这里想了解一点情况十分困难，道士们对我们的问话，总是问一句答一句，决无半句多余。比如我们问：“道友——”我们不知怎样称呼，这样称呼不会得罪他们吧。“借个大锅煮煮饭可以吗？”

“那边有一排大锅，你们用吧。”对方无表情地回答。

“我们不煮荤菜，请放心。”我们的战士说。

“没关系，道家斋心不斋口。”

“我们算还柴火钱给你。”

“柴火不要钱，到门外拾拾就有了。”

“道友——”战士们还想再交谈两句，只见那道士已经掉头走了。道士们全都留着长头发，长胡子，他走到道士群中，你就再难认得出来了。有时我们问起附近的情况，他们更是闭口不答，有的推说“山人不问尘世事”，有的干脆横你一眼，一声不响，拂袖而去。

到了这个有几百道士的冲虚观里，我们象到了荒无人烟之地一样。

一天，我看到客厅旁的一间房子里，住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女道士。言语间听出了她的东莞口音，我便跟她谈起话来，女道士姓何，石龙人，她是童女修道的，家中尚有父母，自从日本人侵占东莞后，她一直没有回去过，家中情况全不知道了。

我说：“何道姑，”我想起小说中对女道士好象是这样称呼的。“我们还有部队驻在东莞，有机会可以派人帮你打听打听。”

何道姑把左手掌竖起靠近胸前，弯了弯腰，向我行了一个道家礼，高兴地说道：“我们是乡亲，你叫我大姑好了。先生，你真好人事，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王者之师’，秋毫无犯，跟北伐时的学生军一样。那时——”说到这里，她突然止住，不往下说了。

“那时，大姑一定是个读书人吧。”我顺着她的话问道。

“唉，那时，我的确是个大学生。”何道姑叹了一口气，说：“不过，山人又何必问出处呢？我们山蒲弱柳，比起壮士你，真是相形见绌呢。”

“哪里，哪里，”我向她躬躬身，说：“大姑你是老前辈了。我们初到此地，还望指点。”

“修道人本不应问世事，但是现在世道乱离，你又是一位舍身救世的壮士，你有什么事就问吧。”

“烦问大姑，罗浮山上的景况如何？”

“罗浮，据说有三十六观，我没走遍，不知确凿与否，只知道许多观已经坍塌，无人居住。冲虚观是最大的，有四百多道士，其次是白鹤观、黄龙观、苏夔观等。山下面有些小寺庙，住着些和尚，但道佛不相往来，不清楚他们的情况。”

“那么，冲虚观之内又如何呢？”

“冲虚观现在的道长原是国军的一个团长。这里还有国民党的师长、旅长呢，当过官的不少。此外还有破产的商人、地主、失恋的青年，什么人都有。道中人历尽人世沧桑，但求清静无为而已。不过，有没有‘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青鸾’的呢？这我就不敢担保了。修道人都只顾自己，谁也不过问外事，你们多加小心就是了。”

我们召集干部开会，分析从各方面得来的情况，大家都认

为把冲虚观作为司令部所在地是可以的，但必须严防观内与国民党、伪军、土匪勾通的人。有的同志主张干脆把冲虚观彻底搜查一遍，我说不行，我们还是要尊重教门。我们规定了纪律，大家严守：不要进入观后道士们住的地方，特别是不准到三清殿上妨碍他们念经。至于观中如果有奸细，我们只要密切注意，日夜派兵把守冲虚观进出的各路口，是可以防范的。后来，有一天夜里，我们的潜伏哨兵果然捉到了两个潜来冲虚观的特务，经审讯，便查出了观内与国民党、土匪勾结的道士。这以后，我们的司令部驻地便干净多了。当然，这是后话，且不提。

我们在罗浮山立下足来。为了控制住这个地区的局面，我们派出部队，分别向南北两面活动。

我带着独三大过罗浮山北麓，进攻龙门麻榨。麻榨位于增江河畔，地势很重要，有国民党顽军王同仇大队驻守，号称“前哨大队”。我们部队接近麻榨隐蔽后，由邱特和地方党派来的人员亲自入圩内侦察。圩内警戒森严，他们刚刚看了圩内地形，就被乡公所拉去查问。他们一口咬定是去做煤油生意的，不露半点破绽。敌人查问他们时，他们也乘机弄清了敌情，知道了王同仇大队部的所在地。当晚回到部队，便连夜兼程而来，拂晓即包围进攻。但是，王同仇犹如惊弓之鸟，听到半点风声就带着队伍撤走了。我们只缴到乡公所一个排的十多条枪。占领了这个重要圩镇，控制了进入龙门的隘口之后，我们便出布告安民，欢迎各阶层人士和我们合作抗日。

部队与当地的群众武装王达宏中队配合，攻打永汉。这个圩内原来只有国民党顽军一个中队，但是，当我们到达时，恰遇驻龙门的顽军保八团开到永汉，企图以压倒优势消灭王达宏

中队。双方遭遇，我们使用了小炮，敌人也用炮迎击，激战终日。敌人力量强大，情况变化了，我们决定撤出。这一仗，我们勇敢善战的副大队长、泰国归侨林文虎膝部受了重伤。

我们把缴获的一些枪支交给龙门县委，成立了龙门独立大队，以龙门北边古岭农民起义反对国民党和敌伪斗争中的坚决分子为骨干，王达宏为大队长，陈江天为政治委员。

罗浮山南面的斗争开展得也很快。彭沃率领三支队于三月二十日渡过东江，到达博罗的龙华一带。邱特那个大队暂归彭沃指挥，他们在博西南一带展开斗争，四、五月份连续多次打击礼村、马嘶、晋村、福田一带的日、伪军，迫使李潮部伪军退到石龙一带。我们在这一大片地区发动群众退租退息，建立了乡政权。

我们经常在东江河上打日、伪军的船只，时常缴获大批的物资。在惠博、增博等水陆要道，我们设立了税站，保护过往客商，也解决了我们的经济收入。

这时，该是江北地区大力开展工作的时候了。

#### 四

我又遇到了意外的事情。在罗浮山上，我得了点小病，江医生要我打针，护士消毒不严，注射时带进了细菌。我左手臂肿胀起来，粗如小腿，身上发高烧，昏迷不醒。正当病危的时

我们在江北的力量已经充实起来。除了三支队在罗浮山一带活动以外，阮海天那个独三大已经和独二大合编成第四支队。刘培的第五支队调过江北来，驻在罗浮山北面横河一带展开活动。曾春连大队编入五支队。这样，我们在江北实力雄厚，基本上控制了博罗的局面。

这时，几个支队联合行动，梁广和杨康华等同志参与指挥，又进攻了麻榨和永汉。随后，北江支队和西北江支队就分别向北、向西北挺进。

军事局面打开以后，在政治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就成为迫切的任务了。

长宁、福田是增博公路上的重镇，也是罗浮山下的东、西两个门户。我们决定要打击两个镇上的恶霸，发动农民进行退租退息，成立各种抗日组织和民兵，建立政权。

大好的机会很快来到了。五月十三日这一天，我们驻在福田的三支队，侦察到日军从增城开来的消息，立即派出部队向西面警戒，发现日本炮兵约有成千人从增城调防博罗城，我们部队迅速占领山头向敌人开火。敌炮兵给我们一打，停了下来，我们就分散骚扰他们，他们架起炮，我们就走，待到敌人又集合前进的时候，我们又打。敌人炮兵经过福田一路向长宁开去，我们和他们打了一路。敌人进入这两个空镇，放了几把火走了。当晚，我们三支队就回到福田，接着又进入长宁。

这样一打，把群众的抗日热情发动起来了。我们政治部的“拖拉机”队、《前进报》社、东江干校立即在福田、长宁开展工作，成立农、青、妇等抗日群众组织，开展减租减息。因为这时农民已经交租完毕，便改为退租退息。我们打开了几个恶霸的仓库，救济贫民，组织起民兵。不久，就建立了乡、镇的政

权。

福田、长宁的工作比较巩固了，我们的战斗部队和工作队，又迅速向龙华、湖镇、响水方向发展。

五月，曾生、林平同志先后率领纵队领导机关人员过江来了。司令部仍然驻在冲虚观，联络处驻在观后的朱明洞，电台设在黄龙观，政治部和“拖拉机”队驻在白鹤观，报社则驻在朝元洞。罗浮山四面都驻满了我们的部队。

到了五月下旬，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梁桂平支队又进攻我们罗浮山根据地。二十日，他们进攻横河，第二天进攻响水，我们部队坚决反击，三支队张新大队把敌人从响水赶到派美。六月初，我们主动出击，连续战斗，占领显村，进驻公庄。顽军退到杨梅水，三支队政治处主任陈一民带领邓发、王彪大队袭击杨梅水，从拂晓打到下午两点，用炸药包攻下敌人据守的炮楼，消灭敌人一个中队，毙伤将近一百名，缴获机枪两挺，步枪几十支。我们牺牲了五位同志，负伤九人。接着，顽军又凑拼力量向我们进攻，纵队集中了三支队和五支队与敌人反复较量，进行了多次战斗。为了配合攻打壁垒森严的柏塘圩，王秋同志的一个班在一个只有三棵松树的小山上，和敌人战斗了一整天，最后剩下三个人，也都负了伤，却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

我们终于占领了公庄、柏塘，把梁桂平支队赶出了博罗。鲁迅艺术宣传队由李门同志率领立即开赴横河这一带开展宣传、组织、建立政权的工作。

我们将博罗县的民兵升级编成县大队，由林道行任大队长。

六月底，我们在罗浮山白鹤观邀请博罗各界人士开了规模较大的国事座谈会。

七月，博罗县成立了人民的政权——博罗县抗日民主政府，通过各阶层代表人士民主协商，选出韩继元为县长。抗日民主政府颁布了临时施政纲领，废除了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实行“二五减租”。广大农民和开明绅士、中小地主以及罗浮山上各寺观的和尚道士，都积极拥护，因为他们的利益也得到了保障。同时，废除保甲制和不合理的征兵制，代之以民主选举的乡村政权，在自愿原则下成立自卫队保卫家乡等等。人民群众都乐意支持我们的工作。

这时，博罗呈现了一派蓬勃新生的气象。

博罗境内，大部分地区已为我们所控制，连日军的两条大动脉，东江河和增博公路也包括在内。我们控制了这两条交通运输的要道，日军的小运输队走进来，就象掉进了我们的口袋一样，连人带物资全让我们缴获。这样，日军要强硬通过，就不得不加大运输队。他们在水上运输要几十条船一齐出动，两岸还要派上千把步兵护送。陆上运输，每次也要用数百匹马，有千把人保护。对这种大运输队，我们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跟日军硬拚，采取小伏击的办法，埋地雷、打冷枪。总之，令日军的运输队日夜不宁，瞻前顾不了后，运输量大大减少。为此，日军大动肝火，曾经组织部队向东江沿岸扫荡。但是一九四五年日军已经每况愈下，日薄西山，他们的战线太长，兵力奇缺，捉襟见肘，对我们奈何不得了。

趁此时机我派何通大队由黄山洞、回龙直出新丰，从新丰西面向英德活动，与邬强的北江支队取得联系。

至此，博罗已成为我们在江北的根据地，广东省临委和广东军政委员会设在罗浮山，罗浮山成了全省的党和军事工作的中心。



## 第十八章 挺进粤北

### 一

进入一九四五年，国内外形势正朝着胜利的方向迅猛发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都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在这重大转折关头，我们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六月十一日，在延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在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和《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在欧洲，希特勒快要被打倒了；在东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也接近胜利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要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有充分的准备，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他号召解放区的军队向一切被敌伪占领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与此同时，他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说，蒋介石的国民党早已准备发动内战，“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这段期间，中央十分关切着东纵这支远离中央、处境复杂而又力量还不够强大的部队，给我们发了几次电报指示工作。

一九四五年春，美国军队要在华南登陆的声浪甚嚣尘上，国民党也对此作了相应的部署，伺机向沿海我们活动的地区伸手。如果美军在我们这一带沿海登陆，这里就成为敌我顽争夺的场所，我们就将碰到异常复杂的矛盾。为此，中央三月间两次指示我们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局面，给我们规定了明确的工作方针。与此同时，中央通知我们，决定将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军政委员会合并改为广东区党委，领导一元化，领导广东除潮梅地区和琼崖以外一切党政军民工作。到了五月份，德国法西斯已经覆灭，日本侵略者败局已定，而蒋介石的国民党还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这时，中央就建立华南战略根据地问题给广东省临委发来指示电报。中央给我们指出，华南战略根据地，应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中央已派王震、王首道、文年生率部南下，开辟五岭根据地。中央命令我们应派有力部队，由负责干部率领，随带大批干部，挺进粤北，以便与王震部队会合，把大庾岭山区建成华南的主要根据地。这是最主要的一着，这样，我们就能够全面地大规模地发展广东解放区。

接到中央关于成立广东区党委的指示后，我们决定在罗浮

山召开广东省党代表会议，派出交通员通知分处各地的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各地特委负责同志前来开会。林锵云、冯桑同志来得较早，由于交通阻隔，中区、南路的同志未能按时到达。梁广同志来不了，连贯同志到来时，会议已经结束，他带来了中区人民解放军受挫、梁鸿钧同志不幸牺牲的噩耗。罗范群同志也因为要整顿中区部队不能前来开会。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党的二十四周年诞辰，会议正式开始了。会议庄严宣布广东区党委成立。

会议就挺进粤北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决定由东纵主力的大部、珠纵主力一部挺进粤北，同时对如何坚持和发展东江南北地区作了相应的部署。为此，会议决定东纵成立四个指挥部：

江南指挥部。以卢伟如、黄宇、叶锋为首，指挥第一支队、第二支队以及东江南岸的其他部队，活动于惠阳、惠东、东莞、宝安一带。

江北指挥部。以周伯明、陈达明、饶璜湘、梁奇达为首，指挥第四支队以及曾文大队、黄柏大队，活动于博罗、增城、龙门、河源、番禺一带。

东进指挥部。以卢伟良、张持平、黄布、李征为首，指挥主力四、五团及第六、七支队，活动于紫金、海陆丰一带，并与韩江纵队建立联系，准备与韩江纵队会师。

粤北指挥部。由我和杨康华以及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负责，指挥东纵主力西北支队、北江支队、第三支队、第五支队和珠江纵队第二支队。为了统一领导地方党和部队的工作，成立粤北党政军委员会。

区党委及东纵司令部决定在一切布置就绪后，移往粤湘赣边与中央南下部队会合，建立五岭根据地。会议决定我和杨康华

带一支部队先行北上，到陈毅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帽子峰和油山梅岭一带，与王震部队会合，为领导中心转移作好准备。

形势发展得很快。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八月十日，蒙古政府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迅速击溃了日本的主力关东军。

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

八月十日、十一日，朱德总司令对全军发出了对日作战的七道进军令，命令各地我军立即向日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令日军缴械投降。

八月十三日，朱总司令命令曾生将军代表我军接受华南日伪军投降。

在此之前两天，八月十一日，我们又接到中央催促我们北上的电报，要我们“以最大主力，用极大速度”向粤北推进，与即将到达湘粤边的王震部队会合。

显然，同迅猛发展的形势相较，我们北上的行动缓慢了。这时，我们北上部队的冬衣还未做好，王震部队要求我们带的粤北等地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还未收集齐，珠纵北上部队的准备工作还刚刚开始。因此，我一方面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來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为如何加速启程北上而焦虑不安。

## 二

八月十五日凌晨，日本于八月十四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从广播中传来，同志们拥到冲虚观前，唱呀跳呀，“抗战胜利啦！”欢歌喜舞驱散了夜雾，迎来新的曙光。

阳光灿烂，绿水青山显得格外明艳。

战鼓催征，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又摆到了我们面前，在这大变动的形势下，再也不能等待了。

曾生同志立即率领部队直下东江河以南地区受降。八月十五日下午，我和杨康华、林锵云同志离开了司令部，急如星火地赶到北上部队的集合地点——罗浮山东北面的横河圩。

除彭沃第三支队因要卫护曾生同志到东江以南受降，临时决定暂不随我们北上之外，由刘培、黄业率领的第五支队与东江干校共一千三百多人早已整装待发。北上的还有政治部的部分干部和政治工作队、艺术宣传队。八月十五日黄昏，挺进粤北的部队士气昂扬，在沿途群众欢送中，告别了根据地。一路上浩浩荡荡，出博罗，跨龙门，两天后便进抵从化山区。

时虽八月，但秋天的脚步好象特别勤快，早早就来到了这丘陵峡谷。出发前，我们的后勤机构正在赶制冬衣，但我们等不及，部队只好穿着单衣走上征途。晚上，凉风飕飕，越往北，越觉得战士们衣衫单薄，非设法解决不可。

侦察到沿途有国民党军队的两个物资仓库，我们决定打下它们来解决寒衣问题。在地下党和当地群众的协同下，我们经从化的吕田、新丰的梁坝时，分别向这两个仓库发动了出其不意的袭击。守兵望风披靡，我们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衣服、被帐和粮食，解决了部队的急需。

到了英德、翁源，我们会合了邬强的北江支队，他们这支挺进粤北的先遣部队，几个月来，经过频繁的战斗，已经站稳了脚，部队扩大了两倍多，解放了英德东部和佛岗、新丰、翁源一部分地区，成立了铁路东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我们大部队挺进粤北奠下了基础。

取得邬强支队交来的地图后，留他们坚持在原地展开活

动。于是，我们加快了行军的速度，部队就象滚滚的铁流，冲破层层险阻，穿进了粤北的崇山峻岭之中。

一座高山横在我们面前，莽莽苍苍，山顶终日半隐在紫青色的雾霭中，这就是海拔将近二千米的天平架。

天平架山势十分险要，我们当中许多非战斗人员爬到半山就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爬上山顶，一个战士指着脚下的白云说：“真是腾云驾雾了。”话音刚落，突然“砰砰”几声枪响，子弹穿过云雾，打在那战士头上的树杈上。后卫部队正在吃饭，一颗迫击炮弹刚好落在他们的饭箩里。“呵呵鸡，好让老子来收拾你！”同志们迅速散开迎战，一边打，一边气呼呼地骂着。我们派出一部分战士迂回到敌人背后，前后夹击。“劈劈啪啪”一阵枪响，一顿饭的工夫，这小股国民党兵就被我们赶跑了，他们原来是始兴县枫湾镇的保安队。

过了山顶，进入始兴。国民党军队一个营扼守着隘子这个地方。我们派出了一支先头部队，任务是：一、赶跑国民党这一营军队；二、联系地下党；三、寻找王震部队。先头部队赶跑了国民党这一个营，我们顺利地通过了隘子。

天平架北边是清化地区，这里是国民党将军张发奎的家乡。在热水村口有一股翻滚不息的温泉，老乡说，这温泉水是引到张发奎家里去的。我们顺着温泉水走，果然找到了张发奎的老家。他家在一个小山脚下，房屋建造古色古香，屋前屋后，林荫竹影，曲径通幽。每个房间都安了水管，把源源不断的温泉水引入屋内。真有世外桃源的景象。

在这个地方，却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战斗。我们的先头部队和他们联系上了。

一九三九年，始兴的党就着手组织武装。到了一九四五年

五月，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风度自卫大队”，以吴新民为队长，周耿光为政委，邓文礼为参谋长，陈培兴为政治部主任，下属五个中队。这支部队的主要成员都是风度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干部都是党员。他们弄到三、四百条枪，有机枪、冲锋枪和长短枪。部队在南北山各地发动群众成立抗日自卫队，组织起有成千人。

风度队成立后，国民党顽固派立即调集大军进行围攻。日军进攻赣南时，占领了始兴城，风度队不断地袭击敌人，后来日军撤出，风度队于七月份占领了县城。这时，顽军一六〇师来争夺始兴城了，风度队在外营村与顽军激战三天，遭受到很大损失，以后就分散在南北山一带活动。

我们来到清化地区和风度队会合了。大家高兴万分，互祝胜利，互道仰慕之情，在风度队的帮助之下，我们很快便了解到始兴南北山一带的情况。

战士们在张发奎的老家得到了休息，但他们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住了三天不走。原来我们的报务员总听不到王震部队的呼号，只能经过东纵司令部转发电报保持联络，但经这么一转折，电报转到我们这里来，一般都迟了两三天。在这种日夜兼程急行军的情况下，不随时掌握王震部队的位置，我们就很难确定行军的方向。在清化休息，就是想利用这个安定的时间，让电台同王震部队联络上。我们架起了天线，一连三天向王震部队发出了连络的信号。我和杨康华、林锵云三人，日夜守在发报机旁，心情十分焦急，眉毛都快拧在一道了。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第三天也在失望中过去了，还是没联络上。在这三天里，我们同始兴县委书记黄若潮同志等开了会，布置了工作。同时，向当地群众作了宣传，并且和一些有

名望的上层人士见了面，开展了统战工作。

部队按原定路线，继续前进。从清化往北是瑶山和滇江。滇江平日水流浅缓，过江不用船，但近日大雨，可能水深流急，使人难以徒涉。风度队的同志们便与我们相约：他们先到滇江的江口村，寻找渡江工具。

风度队走后，我们就到达了瑶山。

瑶山，因为山上居住着瑶族人民而得名。这里海拔一千二百多米，山峦重叠，树林茂密，人烟稀少，没有什么道路可走。这几天大雨瓢泼，山洪暴发，翻山就越发困难了。

跨过一道道的山涧，踏着泥泞往山上走，走几步，滑一跤，加上横风横雨，前进十分缓慢。我们一千多人的队伍拉成长长的一列，互相搀扶着，足足爬了两天，才望见瑶山山顶。

快到山顶，雨渐渐小了。同志们全身湿透，又累又饿，大家找到一个避风的山窝，就商量起怎样生火做饭。

事务长可头痛了，我们原来估计过瑶山只需两天，仅仅带了两天的粮食，没想到这场大雨拖住了我们，光上山就用了两天多，粮食早就吃光了，上哪里去买呢？这座方圆几百里的瑶山，稀稀落落的只住着那么几户瑶民。这些隐设在树林深处的少数民族，生活非常贫苦，靠着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法，在山坡上烧荒种上几棵包谷为生，他们确实没有剩余的粮食卖给我们。再说，我们这样大队人马，就算把他们的粮食全吃光也不够，更何况这时瑶民们都慑于兵祸，走的走，躲的躲，整个瑶村没见着几个人，语言也不通，很难接近他们。

事务长就发动大家四出采野菜，然后和几个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同志一道，好不容易动员了两户瑶民，用高价向他们买得几个包谷，把包米剥下来放进大锅水里煮野菜汤充饥。



一阵阵包谷的香味从锅盖里钻出来，散发在丛林中，惹得同志们饥肠辘辘。

夜幕降临，把瑶山盖得密密实实，伸手不见五指，走在高大的树丛下，我们就象钻进了墨汁瓶里一样。

“金脚印！”忽然大家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原来是山地上的腐草、落叶潮湿后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小虫，踩在它上面，就会发生萤光，留下一个发亮的脚印。

“简直和走在仙境一样。”同志们打趣地说。踏着这些闪亮的脚印，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往山下走去。

越往下，路越陡、越滑，一不小心就会撞在高大的树干上，撞得你头上起个疙瘩。不知道谁在黑暗中摔了一跤，滑下去好几丈远，同志们就顺势学他“坐飞机”的样子，一碰到坡上铺满树叶树皮的地方，就干脆坐下来，借着雨后的潮湿，往下滑它三、四丈，来个“滑远”比赛。

茂密的原始森林里，扬起战士们爽朗的笑声。

就这样走一段，滑一段，下半夜两点多钟，我们就到了山脚下。

前面就是滇江。只要渡过滇江，飞速前进，就可以和王震部队会合啦。

### 三

滇江横在瑶山山脚，混浊的激流带着哇啦啦响的急浪，向西奔腾。

江水平日只有过膝深，清澈可鉴，象个文静的姑娘。但连日大雨，江水暴涨，水深流急，现在就象个暴躁的大汉了。

在我们到达江口之前，风度队已经在东西两头布置好警

戒，横江拉了一条大缆绳，帮助我们渡江。他们人少地方熟，行动方便，因此绕过了瑶山赶在我们前面了。

我们派了几个熟水性的在前面引路，其余的同志就都跟着手扶缆绳，走进了水流湍急的江水中，缓缓地向对岸移动。

水淹到脖子深，湿透了我们的军毯、衣服，冰凉的江水冷得同志们直打寒颤。急湍的流水就象一双无形的大手，要把我们往下游拉去。

同志们咬紧牙关，一面紧紧抓住缆绳，一面紧紧护着身上的武器，一个接一个，谁也没说话。一千几百人的队伍，在快天亮时便都渡过了湍江。

这时候，司令部来电告诉我们：王震部队已到达南雄县百顺圩，叫我们立即赶往前去。

百顺就在帽子峰西边，离我们大约有两天的路程，但司令部转来的消息已经是两天前的了。当我们赶去时，会不会转移了呢？要是象捉迷藏似地找来找去，岂不误了大事？

我们再一次通过电台向王震部队发出联络信号，同样没有联络上。

我们另外打主意，派支队长刘培和参谋长邱特率领曾春连大队往北去百顺一带先行武装侦察。

他们寻不着王震的部队，又侦察到附近没有国民党正规部队，而在水源圩有一个官僚、恶霸，开一间当铺，他的儿子是在国民党中当什么大官的。我们决定攻打水源圩，目的有二：一是同王震部队起配合作用；二是解决一下我们的经济问题。

刘培他们迫近水源圩后，大白天用炸药把当铺前的炮楼炸开，打了一个下午，战斗顺利结束了，我们缴获了不少金器、现款、粮食，并且开仓放粮，分一批财物给当地贫苦老百姓。

第二天清早，从南雄开出一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来，我们马上开火，打了两个钟头，敌人赶紧退回南雄了。

这时候，由于在瑶山、浈江的艰苦行军，有几十个同志病倒了，特别是非战斗人员，象文工团员、女同志等，不少人发着高烧。还有些同志，在过浈江时被水冲走了鞋，又经过这一天的行军，脚烂了。这一来，大大影响了我们的行军速度，为了战斗需要，我们决定把病员暂时留在奇心洞这条村里，留下曾春连、洪韵带一个中队照顾他们。奇心洞村旁，有一片连绵不断的小山包，山上长满茂密的竹林，很适合隐蔽。我吩咐他们住到山上的竹林里，不要留在村上，以免发生意外。

没想到，第二天曾春连和洪韵外出活动的时候，国民党军队疯狂地向奇心洞发起进攻。短枪队长王育南同志率领十多个武装的战士奋起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全部牺牲，三十多名病员也全部惨遭杀害或被捕。奇心洞事件又一次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凶残面目！

我们北上的队伍一共约一千三百多人，其中非武装人员将近三分之一，新参队的同志较多，是比较罗唆的。从博罗的横河出发到始兴的清化这一段，几乎都是白天行军，走的是大路，浩浩荡荡，大摇大摆，那还顺利。清化小休以后，估计到国民党部队正从赣南南下，抢占广州、韶关等城市，一个北上，一个南下，碰面打起来于我不利，所以派出一支部队去寻找王震部队以后，我们的大队伍就开始沿着南(雄)始(兴)边、南(雄)仁(化)边、(南)雄(大)庾边这个大山区前进，每天都是夜行军，走小路，往往是从这边的一个三家村，翻了一座大山头，到达另一个三家村。山村人烟稀少，加上是贫瘠之地，无法买到粮食，只得向群众买些南瓜、辣椒，煮一锅水，每人

分得半口虚便算是“开饭”。山里长满野蕨，群众把蕨的茎部加工成蕨粉，我们也就向群众买了回来煮成糊吃。尽管在半饥饿状态中夜行军、爬大山，整个队伍士气却越加旺盛，因为大家以为同老大哥王震部队会师已经是眼前的事了。这段艰苦的行军持续了十多天，在九月上旬，农历中秋节那个微风细雨的晚上，我们北上部队到达帽子峰下的大小流坑。

我们打算在这两个小村子歇歇再走，可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当天晚上接到广东区党委的电报，王震部队经已回师北返！

区党委的电报是转发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两次来电，说王震部队到达粤赣边的仁化、崇义地区后，因情况变化，已转进遂川以西地区，并准备继续往北，仍回湘鄂边执行新任务。来电勸勉我们，依靠群众，独立作战，开创五岭根据地。

看到电报时，已是深夜了。开头感到愕然，从感情上觉得不理解。会师就在眼前，为什么匆匆北返？我拿着电报仔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心情又回复了平静。我知道，这次南北会师开辟五岭根据地的行动，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亲自部署的。在离开罗浮山之前，区党委收到几份电报，都由他们亲自签署。王震部队南下，沿途受国民党薛岳部两个师追击，这次回师北返，执行新任务，同时也将薛岳的部队引开，减少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北上部队的压力。这当然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决策，肯定是正确的。我又想起，中央曾经叫我们乘日本投降的混乱之中，蒋介石、余汉谋军队忙于进入广州、韶关等城市之际，迅速向粤北发展。这就是给我们指出，只要抓住这个时机，我们就可以在粤北山区立足，而这个时机，我们没有错过。

“好吧！自己干！”我们肩负领导责任的几个同志下定了决心，大家商量决定：“明天开干部大会，动员！”

## 第十九章 在粵贛边

### 一

一个头戴斗笠、脚穿草鞋的人由张江明同志带着进来。他脱下斗笠，露出了黧黑的脸庞，一双眼睛闪烁着快乐的光芒：“嘿！可找到你们啦！”

一问，原来是南雄县特派员陈中夫同志。陈中夫说，自从张江明同志代表指挥部和他取得联系以后，他找我们有好几天了，从浈江找到奇心洞，又从奇心洞找到百顺圩、白云圩，后来，县委的交通员在路上碰到我们夜行军的队伍，知道我们向帽子峰这边走，他才找到这里来的。

找到了地方党，我们就象见到亲人一样高兴，迫不及待的向他问起这一带的情况。

“王震部队来过这儿吗？”大家关心地问。“你们派人跟他们联系上没有？”

“派是派人去了，可是，他们行踪不定，刚听说到了百顺，一转眼又拐向北去了，我们昼夜兼程，也没法追上他们。”

我告诉他说，王震部队已经奉命北返。现在只剩下我们留在粤北，准备展开活动。最后我说：“我们人生地不熟，到了这里，就非得依靠你们县委不可了”。

陈中夫爽朗地笑着回答：“好不容易把你们盼来了，我们要好好地听你们的指挥才是呢。”

炊事班的小张给陈中夫端来了一碗野菜煮南瓜，陈中夫就边吃边给我们汇报了这一带的情况：

“自从一九四二年粤北党组织被破坏以后，我们南雄县工委直到最近才恢复工作，还不到半年。全县不到二十个党员，并且都集中在县城附近，王震部队到过的百顺圩一带，一个党员也没有。党组织的力量很薄弱，而老百姓在强大的反动势力下，也是敢怒不敢言，所以我们的工作很难开展。”我们听说陈中夫他们已经组织了有三、四十人的武装，利用联防队的名义，叫做“十二队”。看来他们的工作开展得还是很快的。

“你们要在这里迅速开展活动，就必须首先打击恶霸地主和反动势力，使人民抬起头来。”陈中夫继续说。“百顺的伪区长叫邬锡金，是南雄有名的大恶霸地主。他拥有三、四十条枪的自卫武装，又兼任区联防主任，横行四乡，鱼肉百姓，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老百姓称他为‘北山虎’。听说王震部队经过百顺时，有个别落伍的伤病员，给他捉起来杀害了。你们要打开局面，首先应该铲除这只拦路虎。”

铲除邬锡金，这是毋庸置疑的。陈中夫说，他明天就派两个向导来。我们又向他提出了部队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部队一些走不动的女同志该怎样安排？前些时候，我们疏散隐蔽的人员有一部分被国民党一五七师捉去了，该怎样营救？以及部队的粮食、冬衣怎样筹措等等。

陈中夫一一应允，说一定想法办理。

“我这次来，是要建议你们立即转移到油山去，那里地形复杂，山上有十几条小村，便于活动。”陈中夫恳切地说。

“目前最重要的还是打邬锡金。我不能耽搁时间了，这就给你们找向导去。”说着，戴上斗笠下山去了。

陈中夫走后，我们召集了领导干部开会。针对目前的情况，认真地讨论起来。找到了南雄县委，工作可以马上开展了，可是存在的问题还有千头万绪：珠江纵队北上的第二支队现在还没消息。蔡国梁的西北江支队不知道到了哪里？彭沃的第三支队也不知到达九连山没有？纵队司令部交他们带给粤北指挥部一笔费用，但是至今我们联系不上。粤北部队中有二、三百非战斗人员，按照中央的精神要派回大城市去工作，而目前我们与广州市地下党失去了联系，怎么办？我们要坚持在粤北、赣南，部队该怎样部署？……

必须当机立断，快刀砍乱麻。我们决定立即把队伍展开。

由刘培、黄业率领五支队的大部分队伍留在原地，以帽子峰为基点，在南雄与江西的大庾交界处上北山一带开展活动，并且由他们带叶昌大队，到百顺官田村去打邬锡金。我与林鏊云、杨康华带着干校的人员以及肖德青、李谭桂大队到油山去，把粤北的领导中心设在油山上。另外，以高固为队长、刘建华为政委，组成一支武工队，准备插到大庾至南雄的公路沿线活动，建立税站，以尽快解决部队的一部分供给。我们还派张江明率领干校邱才的军事队，配备了一批政治干部，与派出在外执行任务的邱特会合，组成一支精干的武工队，到九连山去和彭沃支队联系，一路开展工作，万一到九连山找不到彭沃支队，就在当地坚持斗争，开辟根据地。

九月中旬，刘培部厉兵秣马，正在作战前的动员，我们指挥部、干校和武工队、警卫队在一片高昂的口号声中，走出了帽子峰。曾经跟随陈毅同志在这里坚持游击战争的刘建华同志

在前引路。

帽子峰下，一个个山窝隐藏在密密的橡树林里，十年内战期间，这里曾经驻扎过朱总司令和陈毅、项英带领的红军。想当年，有国民党的多次“围剿”，在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有AB团的破坏和陷害，斗争是多么艰苦卓绝啊！

今天，我们踏着革命前辈走过的脚印，心里十分激动。我们是从东江两岸发出来的火星，我们决心学习当年红军的革命精神，让星星之火，点燃起熊熊的烈焰。我们有胆量，也有能力坚持在粤北山区，哪怕再坚持它十年！

走到梅关道，前头出现了一个宽十米左右的石牌坊，铭刻着“梅关古道”几个笔法遒劲的大字。抬头看梅岭，上面长满茅草，奇怪的是，岭上连一棵小树也没有。

我问刘建华：“当年红军打游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吗？”

“也是这样的。”刘建华回答说，“陈毅同志当年遇险就在右面的山窝里，那山窝长着很高的茅草，也没有树，所以陈军长被大火所困，也无法从茅草丛中脱身。”

哦，这就是当年陈毅同志遇险的地方。我不禁再次深情地凝望着它。

帽子峰连着梅岭，回头望去，尖尖的峰顶象高帽子似的直插云端，象有一只巨手在擎着它，频频地向我们挥手告别。

## 二

我们部队驻在油山廖地、谢龙、潭龙、黄地和信丰上、下坪一带。

油山在广东的南雄，江西的大庾、信丰三个县交界处。这



一带山地不算高，但林深树密，有竹林、油茶林和橡树林，而且地形复杂，在这百里相连的山脉之间，迂回曲折的山沟蜿蜒交错。山上的村庄就在这些山沟里，大多是十几户到几十户的小村，这里的老百姓讲客家话，和南雄、始兴一带的语言是相通的。

初到油山的几天，老百姓大都惶惶不安，因为按规定他们得向上报告。我们的同志就对他们说：“不用怕，在甲、保、乡、区都有我们的驻兵，报告不报告都无所谓，反正‘上头’是已经知道的了。再往上报是县、专署，他们也拿我们没办法，我们是打不垮的共产党的队伍。”但是，老百姓还不敢接近我们。家家户户的门口经常有一、两个老大爷在“巴哒巴哒”地抽长烟袋，对我们保持缄默。

至于乡、保、甲长，倒是对我们装起笑脸。这也难怪，这时日本投降后才两个多月，国民党忙于受降，争发胜利财，把兵力都往大城市调，余汉谋北调衢州，国民党一五四师、一六〇师、一八七师随之而走，又来了个一三一师“进剿”我们，这一带是红、白争夺的偏僻山区，所以我们的到来，县以下的反动政权虽然惊惶失措，也无可奈何；乡、保、甲长在上头的压力下，对于三家连保不得不执行，但他们也不敢得罪我们，就只好施展出两面应付的故技来。

为了打击反动势力的气焰，争取中间派，减轻人民的害怕心理，我们决定使用“虚张声势”的办法，以壮大军威，迷惑那些地主恶霸，我们把干校及一部分战斗部队以排为单位分开，每个战斗单位加进几十个工作人员，分开进驻每一条村庄，而且要住进村子里的每一家去。我们用这办法驻进了十几条村庄。这一来，我们的消息就四处传开了：“油山住满了红军，条条村庄都满了。”“有几千人呀，有北方人，也有南方人，恐

怕不只是一个师。”“听说师长姓王，是从北方来的。”“这一回又要闹革命啦。”消息传开后，果然收到了效果；人民心中暗暗高兴，地主恶霸、杂牌武装则吓得鸡飞狗走。

消息还没有传到百顺一带，刘培、叶昌等打邬锡金的战斗也打响了。

“百顺又来了红军啦！他们有大炮，轰的一声巨响就把区长的炮楼轰崩了。区公所和区长的全家都被抄了，邬锡金这只老虎跑得没影了！红军真好啊，替我们除了大害，还分了粮食、衣物给贫苦百姓呢。”人民更加高兴起来。

几个老大爷试探着悄悄问我们的同志：“你们住到几时？”

“我们不走啦。抗战胜利了，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的了，还走？走到外国去？”战士们笑着回答。

“你们为什么不住到大地方去？”

“大地方要去，小地方也要来。”

“‘白狗子’又要打来，怎么办？”老大爷很自然地用了“白狗子”这个名称，可见他们是分清红白的。

“他要打，就让他来，量他们不敢！”

老百姓听到战士们的回答，心里就踏实多了。

这个时候，黄业带领的一支队伍，在江西南部也积极地打击反动势力，开展群众工作。

赣南，那里曾经是蒋经国的直接统治区——“赣南模范区”，搞得一片白色恐怖。群众怕受牵连，对我们部队表示疏远，坚壁清野很彻底，有时，村中连一个中年人也难找到，无论到哪一条村，想要买几斤粮食都极端困难。后来他们就采取了远距离奔袭的方法：以闪电般的速度突然包围村庄，把守住所有的路口，然后要保甲长出来面谈。这样，保甲长也来不及

逼着群众坚壁清野了。说来也巧，他们第一次奔袭一个大村庄，就碰上了红军时期留下来的一个地方党支部，支部书记是黄时光同志。

这个支部，现在只有三个人。几年来他们与上级党失去联系，可是从不间断他们的组织生活，王震部队经过时他们没机会取上联系，但是他们把反动恶霸地主所做的坏事都记在帐上。现在，黄业带部队来了，他们就告诉黄业：王震部队经过这一带往南雄去时，有一个后卫班在这个村歇息、煮饭，保甲长看见了，就纠集了反动武装，趁他们分散做饭时，突然围上去，缴了他们的枪，然后挖了几个大坑，惨无人道地把他们活埋了！

听到这件事，战士们义愤填膺，坚决要为死难的烈士报仇，就把保长和两个最坏的甲长捆起来，捉出去当众枪决了，没收了保长的全部家财，把官仓打开，救济当地的贫穷农民。在地方党的帮助下，我们部队还查出了另一条村的一个保长曾经纠集了几个爪牙，捉到王震部队一个战士，活活地剖开了胸膛，把心肝吃了。这样的吃人魔鬼，当然不能轻饶。我们当场宣布了他的罪状，也当众正法了。

不久，我们又组织了一支短枪队，以刘黑仔为队长，苏光为政委，一共十二个能征善战的老短枪队队员，派他们到南雄信丰公路这一条国民党的重要交通线上去，设立税站，并收缴附近乡公所枪支。

这支神出鬼没的武工队出发以后，第二天便挑了二十多条枪回来。刘黑仔过去活跃在九龙城中，是威震敌胆的孤胆英雄，现在，在粤北山区，他又是一个勇于打击反动势力、善于团结人民的优秀战士。他的武工队为部队在新区扎根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些事很快就传开了，人们奔走相告：为穷苦老百姓谋利益的红军又回来了！

我们又陆续组织了几个武工队和短枪队，扼守着粤北的几条要道，积极展开活动，设立税站，没收过往的军事物资，打击反动首恶分子，为民除害。除了著名的刘黑仔武工队之外，由东江干校一部分人员与始兴的风度队会合组成了南山大队，由曾春连、洪韵带领，活动于始兴浈江以北。下北山一带的工作，由何维、刘智明负责，并带领武工队进行活动。由陈子扬、高勇负责的武工队，活动在南韶（南雄至韶关）公路上。

红军回来了，打倒了恶霸地主，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人民终于敢抬起头来了。不少老百姓向我们检举了陷害王震部队伤病员的坏家伙。广泛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时机到来了，于是，我们就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其中以雄庾线以西上北山吕良、河洞等地，以及杨梅坑、邓坊、大小流坑、龙头一带搞得最好。军爱民，民拥军，在人民的支持下，我们终于在粤北赣南的山区扎下根来。

### 三

早在一九四五年“双十协定”刚发表的时候，我们在油山上，曾经有过一场思想上的波动。

“国民党反动当局有可能与我们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吗？”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他们的反动本质决定了：不可能。我们面前的国民党一六〇师刚刚调走，一三一师就调来“进剿”我们部队。因此，我们绝不能稍有松懈。目前我们处在粤赣边境山区的特殊环境之中，必须加倍小心。

区党委指示部队说：和平不是等得来的，是斗得来的，打得来的。这正说中了我们的心意。

区党委还指示我们，要将一些能回城市工作的同志，尽量送往城市去。在抗战刚胜利、到处还动荡的时候，把一部分非战斗人员转移到大城市，是必要的。因此，杨康华就负责起这工作，夜以继日地了解可以到城市去的同志的情况，并指示他们回去该怎样地隐蔽、联系和开展工作。

当时，我们在粤北的部队，除了指挥部及直属的部队、第五支队、邬强支队、何通大队、西北江支队、珠江纵队的第二支队，还有九连山彭沃的支队。

为了打通与九连山的交通线，并与粤北的几个部队取得联系，邱特与张江明同志率领武工队，从油山到九连山。他们从上北山穿过下北山，途经始兴、翁源、新丰、连平，路途曲折、遥远，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到达目的地。

他们此行真是立了大功，经过上北山时，见到了得重病而又失去联络的何维同志，他们就把何维送到帽子峰的刘培部队中去。经下北山时，见到了风度队的同志，把我们油山粤北指挥部关于坚持斗争的决议告诉了他们，黄若潮、邓文礼知道情况后，很快就联络上当时困在瑶山的珠江纵队郑少康，以及西北支队的邓楚白、陈志强等同志。到了翁源坝子，又与李东明、邬强联系上了。

沟通了分散在各个地区的部队的联系，各支队、大队的负责同志先后到油山上聚会，统一了对目前形势的认识，鼓舞起信心，加强了团结，从而更好地统一部署、统一行动。

北上部队中，蔡国梁的西北江支队和珠纵郑少康的第二支队损失最大。他们在挺进粤北途中，与我们取不到联系，被困

在人烟稀少的瑶山上，人员严重散失。

邱特、张江明一行，历时将近两个月，春节前，才从九连山回来了。他们受尽艰辛，找到了彭沃和曾源率领的第三支队，使我们指挥部与三支队取得了联系。此外，他们还带回了纵队司令部交三支队辗转送来的黄金和现款。

我们经受了损失，我们也正在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正在这时候，王磊同志受曾生、林平的委托，风尘仆仆地从江南来到了粤北。

王磊告诉我们说，全国停战令下达后，国民党军队并不因此而停止向我们进攻，相反，他们企图在第八执行小组到达广州之前将我们全部消灭。在江北，已响起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枪声，他们以一五四师为主，另有保十团、梁桂平部及一五三师一部，还有伪军李潮部配合向我们大规模进攻，企图截断我们粤北与东江的联系，实现其各个击破的阴谋。在江南、海陆惠紫一带，国民党军队也对我们重兵“围剿”了。王磊说，曾生、林平正在指挥东江两岸部队与敌人周旋，他们十分关心粤北的情况，并问我们在目前的形势下，应付敌人的进攻有什么困难。

曾生、林平同志的关心，使同志们很感动。我握着王磊的手，请他回江南转告同志们：我们不缺钱，吃穿也可以解决，要对付敌人一两个师的进攻不成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提高警惕，加强活动，积极发展，壮大队伍，准备在粤赣边的崇山峻岭中开辟地区，长期坚持斗争。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旧历年到了，油山一片欢腾，老百姓纷纷请同志们上他们家吃团年饭，油山的耆老前来相访，非要我们去赴席不可。

这是一个气氛多么融洽的春节。

油山耆老用招待贵客的酒席——江西人的“二十四簋”招待我们。菜是八盘，酒是用大壶装的水酒，酒碗是蓝花大碗。

盛情难却，我们举起酒碗一饮而尽。酒很香，但并不浓，大概就是旧小说中古人一坛一坛地喝的水酒吧。好客的主人说，这酒不容易醉人，我们心里也高兴，大家就一碗一碗地对喝起来。

收菜盘了，我以为酒席要结束了，谁知道八个盘子刚搬走，新的八盘菜又端了上来，每人面前还放了一大碗白米饭。主人这回说，喝了酒不吃饭会伤身体。我其实已经很饱了，但乡亲们这样热情，却之不恭，只好吃了一大碗饭。

掌灯时分，该告辞了吧。没想到又换了八盘菜，还添上四壶浓度高的陈酒。这时主人站起来，举起酒碗，宣布这会儿才是真正的喝酒，一定要我们吃个饱喝个够，林锵云和我面面相觑，他摊开双手笑着说：“这回上了个大当，江西‘老表’真是热情啊！”

酒席尽欢而散。乡亲们说，这是他们多年来第一个太平的春节。我们说，这也是我们挺进粤北以来最愉快的一天。

#### 四

我们并没有错误地估计国民党反动派。果然，“停战协定”签订后，广东国民党当局不把“协定”当一回事，张发奎对外不承认广东有共产党部队，对内依旧执行他们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两广绥靖会议上布置的限期二月肃清“土匪”的计划。

在东江两岸，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他们封锁交通、反复搜索，实行了“填空格”、“分进合击”

及多路交叉穿梭的巡逻扫荡。在海陆惠紫则采取远道奔袭、紧缩包围、稳打稳扎、反复穿梭等战术。“扫荡”的锋芒主要在江南地区，国民党出动新一军的三十师、五十师，四十五军的三十六师，六十五军的一五四师以及伪军、保安团等不下七万人的兵力，进攻我们的根据地和我们从日军手里解放出来的地区，企图紧缩对我们地区的包围，断绝我们的经济收入，置我们江南部队于死地。一时间，在澳头港、大亚湾沿海，在大鹏半岛，内战的枪声密集，烽烟四起。

在粤北，驻韶关的国民党一五七师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春节过后不久，南雄、始兴一带又增调一个师，声称要荡平油山。

一天，侦察员报告说，国民党军已向油山移动。我们想，不必跟他们作正面冲突，就决定把机关和部队都转移到梅岭、帽子峰一带。

当时，我们部队经过精简机构，已经是一支十分精练的队伍，说打能打，说转移就能转移。很快地，我们下了油山，上了庾雄公路，便到达了梅关。

翻上梅岭，我拿起望远镜往南雄方向望去，忽然看见在雄庾公路上，有一队国民党军，大约一个营的兵力，正匆匆向前赶来，到了山脚下，一下子又分成三路，往山上爬来。

国民党哪来的消息，这么快就追上来呢？我对他们来搜索梅岭的行动感到有点诧异。这时候，林锵云也上到山顶来了，我赶忙招呼他卧倒，共同商量对策。

由于我们从油山转移时兵力太分散了，身边只留有邱特、欧巾雄带领的一个大队担任警卫。而这时要很快调动其它兵力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利的一面；有利的一面是，梅岭有它特殊



的地形，它处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从江西境内上梅岭，只须翻过几个小山包，但是从广东境内上梅岭，却是六、七百米高的陡坡。古人说，天时、地利、人和，是战争胜败的关键，今天，我们众志成城，又处在有利的地形中，这一仗，还是有把握取胜的。

我向刚上来的邱特说，梅岭上的三个山头，只要各放一个排就行，关键是要占领公路和梅关古道之间的高地。

邱特的身旁是教导员欧巾雄，她是我们部队中不可多得的女干部之一。我想让她在实战中多锻炼一下，就向她说：“今天要看你这个穆桂英的本事，占领高地的行动让你带一个连去执行，行吗？”

“没问题，保证敌人上不来。”欧巾雄飒爽地回答。

我们的兵力迅速地展开了。远处，只见欧巾雄带着一个中队战士，已经飞插上高地，邱特带着三个小队也分别在梅岭的三个山头上架起了机关枪。

敌人在蠕动，象蚂蚁一样的在山坡上爬着，不久，又改变了方向，逐渐向中路收缩。“怎么搞的？”敌人的行动有点令人费解。过了一会，当三路人马集成一路时，大概是一声令下吧，只见他们一个向后转，就沿着原路匆匆而逃了。

“原来敌人给我们吓跑啦！”同志们此时才明白过来。

“敌人帮我们作了一个防御演习。”一个戴眼镜的同志风趣地说。

“集合——”我大声喊，把队伍集中起来。为了防备敌人下一步采取行动，我把队伍立即又转移到信丰边界的山地去。

此后，敌人虽然变换各种手段，向我们发动了频频攻击，但我们避其锋芒，不作正面冲突，以少数部队开展游击战争，与

敌周旋，袭击其后方仓库以及区、乡政府所在地，使敌人顾此失彼，难以应付。我们主力部队则乘势出击地方土顽及地方团队，连续取得胜利，一直坚持到部队南下。

在我们准备南下集中、下令停战的时候，国民党南雄县长耍弄阴谋，用一个大队的兵力包围袭击我们刘黑仔短枪队的五位同志。在这次被袭之中，政委苏光同志当场牺牲，我们优秀的武工队队长刘黑仔同志双腿被敌人机枪扫射成重伤，抢救出来之后，于五月四日牺牲了。

我们在粤北坚持了一共十个月。在这艰苦的岁月中，粤北山头 and 东江两岸一样，掠过了无数风风雨雨，然而，我们这支东江河水哺育的部队，就象一株株强壮的树苗，在粤北贫瘠的山坡、高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任凭风雨如晦，山岭上的青松总是这样的苍翠、挺拔。

## 第二十章 新的航程

自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起，蒋介石的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全力部署发动全面内战，妄图消灭我们的军队，把解放区人民八年奋战取得的胜利果实一概没收，回复到旧中国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欺凌压榨的苦难日子。但是，他们的部署一时还未完成，便交替使用和同时使用政治谈判和军事进攻的反革命两手。蒋介石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二十日和二十三日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党中央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真面目，使他们胆敢发动全面内战时输了理，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陷于孤立，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前往谈判，于八月二十八日抵达重庆。谈判进行了四十三天，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双方签订了《会议纪要》，又叫做《双十协定》。这次谈判，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我们党所提出的和平建国和政治民主化的方针。为向全国人民表明我们党争取和平、制止内战的真诚，我们党也作了让步，让出了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北、湖南、河南八个根据地，把部队从这些地区往北撤。这样，我们东江

纵队就在北撤之列。

《双十协定》达成后，毛泽东同志立即向我们指出，全国人民渴望实现的和平民主的方针是写上了，但那是“纸上的东西”。果然，协定的墨迹未干，局部内战之火到处烧起。只不过，蒋介石国民党占不了什么便宜，他们想消灭我们，却到处给我们消灭。在广东，他们使用了几十个团的兵力，包括新一军、新六军等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想以泰山压顶之势消灭我们东江纵队，同样达不到他们的罪恶目的。由于他们的全面内战部署还未完成，于是被迫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同我们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双方下了停战命令，并组成了有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面的代表参加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北平的军调部派出一个“第八小组”到广东来执行停战协定，处理华南中共武装的北撤问题。

军调部第八小组我方代表是方方同志。这个小组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到了广州。那时，蒋介石国民党是一心要消灭我们才罢休的，于是由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出头，声称广东只有土匪，没有中共武装，没有东江纵队，给调处工作设置了严重的障碍。就这样，军调部第八小组在广州呆了一个多月，国民党发动内战却天天在延续。我方代表方方同志在会议上同国民党开展斗争，由于他们蛮横地阻挠，无法达成任何协议。

事情只好回到重庆。

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东纵政委林平奉周恩来同志电令，秘密乘机飞抵重庆山城。

遵照周恩来同志指示，林平同志在重庆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招待会在曾家岩举行。会上，林平向记者们详细介绍了广

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八年抗日的经过和战绩，介绍了我们在日本侵略者占领香港以后营救大批民主人士、著名文化人，多次救护美国空军人员、被俘的英军人员和其他国际友人脱险等事迹，严词斥责国民党当局制造“广东只有土匪，没有东江纵队”的反动谬论，揭露他们阻挠谈判、坚持内战的罪行。这次谈话，震动了重庆，震动了全国。

接着，周恩来同志亲自出马，同张发奎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张发奎被迫承认广东存在中共武装力量，接受北撤谈判。

事情又回到了广州。经过十多天的争论，终于迫使广州行营同意签订了广东中共武装人员北撤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我们东江纵队北撤到山东解放区。北撤路线是由广东宝安县的沙鱼涌出发，由我方租用美国三艘登陆舰作运送工具，从海道北上烟台登陆。北撤人员名额为二千四百名。部队集中的时间，从开始调查之日起，以一个月为限。

五月二十五日，第八小组派出了几个支组，往江南（东江南岸）、江北和粤北等地，开始执行北撤的工作。江南支组的我方代表是曾生同志，国民党方代表是罗绮浩少校，美国方面代表是比利少尉；江北支组我方代表是黄坚同志，国民党方代表是曾广燮中校，美方代表是琼斯少尉；粤北支组的我方代表是杨康华同志，国民党方代表是黎国熹中校，美方代表是纳尔逊上尉。

从这一天开始，就意味着说，我们散布在一千几百里广阔地带的部队，只能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必须赶到沙鱼涌登船北撤了。

## 二

“真是岂有此理！”刚接到粤北支组颁布的集结条例，我怒不可遏。

粤北支组是六月初到达南雄的。在杨康华未参加支组工作前，支组中的我方临时代表是李大熊。集结条例就是他向我们指挥部转达的。他对我们说，蒋美方代表相互勾结，不放过任何一点一滴的机会，千方百计地给我们的集结制造困难。他要我们做好一切准备。

“要我们三、四天内集中的是什么地方？”我们问他。

“他们指定第一个集结的地点是浈江以北的一个小村庄总埔，离始兴城很近。”

林锵云同志手指地图，气愤地说：“这小村庄只有三十多户人家，地处一角，前面是水，三面是山，如果我们全部钻到这小山坑中，岂不是象掉进陷阱里去，好让他们一网打尽？再说，我们的部队大多数分散在浈江以南一带，为什么不在浈江南集中，而要倒回去浈江北，这说得过去吗？”

他的话使大家震惊，谁都记得，闽南的红军游击队何鸣部在集结整编准备开赴前线抗日时被敌人全部缴械，就是中了这样的埋伏。

此外，条例还规定我们宿营时不准派警戒和搜索部队，行进的路线是国民党指定的，行军路上两旁驻扎的国民党军队撤离五里，让我们只能在这条狭窄的走廊通过，等等。这些不都包含着很险毒的阴谋吗？

“不！决不能任由他们摆布！”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我对杨康华说：“我们不全部到滇江北去集中。这理由好找，你可以跟他们说，我们部队很分散，赣南、英德、翁源都有，三天内无法全部到达滇江以北。而且北撤的日期只有一个月，不应该这样浪费时间，有些部队应该直接在南下的路线上归队。”

杨康华说：“这可以办到，我去和他们争。”

最后，我们决定派一个精干的部队到总埔去，事先作好战斗的准备。其余部队向南移动，到指定的总集结地点——英德县的龙口。在军调支组里，就说我不在油山，正在三南一带，部队的调动要听我指挥，滇江以南的部队没有我的命令是不能前来的，所以无法在三、四天内按规定在滇江以北集中。

这次北撤烟台，总人数二千四百名，粤北部队只能撤八百名。余下的人员怎么办？就地复员吗？这是送入虎口。枪支呢？能交给国民党吗？不！革命的武器，一支枪、一粒子弹也不能交出去！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指挥部对此早就作了部署，一条是把能够到城市工作的同志陆续送了出去；一条是留下精干的部队，留下最好的枪支，隐蔽下来，以待时机。决定留下的几百同志，组成五个武工队：

由黄业、刘建华带一百多人，组成最大的一支武工队，活动于江西大庾一带。

由南雄县委特派员陈中夫带四、五十人，组成南雄武工队，活动于南雄北山一带。

由邓文礼带四、五十人组成始兴武工队，活动于瑶山、天平架一带。

何俊才率领他的一个大队，活动于翁源、新丰一带。

由王彪带五、六十人组成九连山武工队，活动于九连山区一带。

这几百位同志，经历过艰苦斗争的考验，都是优秀的革命战士。我们相信，只要他们紧握手中枪，密切地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讲究斗争策略，就会象红色的种子一样，在人民的土壤中生根、开花、结果，在更艰苦的狂风暴雨之中，屹立不倒！

我们北撤的同志除每人留下必需的弹药应付意外之外，所有的弹药和最好的枪支都留给武工队，我们还给每个武工队都留下三个月伙食，让他们先隐蔽三个月，待时机成熟，再行活动。

安排就绪以后，我们指挥部和邱特的警卫大队由澄江往南走，到翁源坝子圩会合了九连山的彭沃支队，然后往西走，在翁源的龙仙圩会合了从始兴下来的曾春连、黄秀以及风度大队等。

到了龙仙圩是我们南下路线的第一站。这时，我便叫发电报通知南雄的粤北支组：我已在龙仙圩，等候南下。

第二站便是英德的龙口，这时，邬强、李东明、郑少康、何通等部队都同时到达龙口，东江纵队粤北指挥部八百人完整地走上了南下的征途。

### 三

龙口圩是指定的最后的集结地点。村里有一间阴森森的大祠堂，我们指挥部就准备驻在这间大祠堂里。

他们指定的地方难说没“鬼”。俗话说，有备无患。进村后，我们便派出搜索部队在村子四周搜索，并封锁了村口。

走进大祠堂，正准备安排铺盖，这时，警卫员带了一个农



民急急走进来，说有要紧事告诉我。

来人是我们的地下党的同志，看到我，他着急地说：“祠堂后面有三个外地人，穿便衣，带手枪。他们下午来到，就鬼鬼祟祟地打听‘王作尧是什么样子？个子多高？常穿什么衣服’，看样子可能要暗杀你们。”

我们向他道谢之后，邬强立即派短枪队的同志封锁了祠堂，里里外外严密搜查，终于把三个刺客捕获了。

三个刺客在审讯之下，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国民党谍报队的，受黎国熹的派遣来暗杀我和林锵云；他们还想使用钢笔枪行刺杨康华。这三个人都招了供，画了押。

我们派曾福等几位同志押送三个特务给支组处置，要当着美方代表的面，揭露国民党破坏北撤的丑恶行径！

“走！”曾福喝令那三个特务，他自己首先跨出门槛。

一行人熙熙攘攘地拥到粤北支组的屋前，正要进去之时，黎国熹闻讯抢先冲出来，他看到面前令他难堪的场面，气得脸色紫涨。突然，他举起手中的手杖，对准走在前面的曾福猛敲下去，击破了他的头部，鲜血直流。这时，早已有所准备的国民党军队突然跑来一个班，个个上好刺刀，强行把三个刺客抢走了。

曾福怒不可遏，一手按着流血的脑壳，一手就要拔枪，在旁的同志也愤怒地掣出了刺刀，把黎某围在核心。

正在这箭弩将发之时，我方代表杨康华出来制止了这场冲突。他大声地向同志们喊道：“同志们！千万不要陷落别人做好的圈套之中。这件事我们一定会处理！”

粤北支组的美方代表纳尔逊上尉带同有关人员也闻声赶来了。就在祠堂的大厅里举行支组会议。我方代表拿出黎国熹打

人的手杖，曾福同志的血衣，三个刺客的供词、证物。在人证、物证面前，黎国焘无法抵赖。我方代表严厉谴责国民党一方破坏北撤，指出他们必须承认错误，并保证不再搞阴谋。警告国民党方面，如果要动武，我们绝不客气，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杨康华同志义正词严地说：“如果你们要打，可以再打几年，最多不过六年，人民必胜！”接着便向纳尔逊上尉质问：国民党方面不断破坏协议，美方代表为什么不进行监督？纳尔逊最后接受了我方建议，由他签署电报发往广州军调第八小组，报告国民党方面破坏协议的情况，要求他们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第二天，我们没有出发，在龙口与姓黎的僵持着，一直到第八小组发来了调解的电报，说：国民党方保证不再出现此类事情。

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我们才继续向南进发。

国民党的破坏行为是层出不穷的，他们总是想在我们南下途中消灭我们，起码想把我们打散或大大地削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使然。他们想利用总埔集结的机会，聚而歼之，可是，我们以小部队到总埔集中，大部队在旁策应，使他们的阴谋破了产。接着是龙口事件，国民党企图把我们指挥部的三个负责人刺杀，使我们的队伍“群龙无首”，以为这就可以把我们消灭或打散。龙口事件的失败，甚至连美方代表纳尔逊也不值其所为，同意发电报告军调第八小组，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完全孤立。可是，他们会就此罢休吗？不，这些人，阶级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于是又在我们南下到龙门县的永汉圩时布下网罗。

永汉是龙门县的一个大圩镇，再往南是博罗县的横河，那里就是不久以前东纵领导中心所在地的罗浮山麓。这一带的地形，我们的指战员都很熟悉。当日行军至傍晚，黎国熹坐着轿子走的，却说太疲劳了，提出大家提前休息算了。我们马上觉察，这是企图将破坏行军规定的责任加在我们头上，是一个阴谋，我们没有理他。这时，担任后卫的刘培发现国民党军队迫近来，离我们只有一二百米。这显然又是一个阴谋，刘培部队立即严阵以待，我们又一次向支组提出，在支组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我们的邓发大队包围了支组。黎国熹理屈词穷，恼羞成怒，打了那个追着我们的国民党军连长一个巴掌。纳尔逊被迫挥动了军调粤北支组的旗子，命令国民党部队撤退。国民党袭击我们的阴谋宣告破产了。

六月二十三日，我们踏进博罗县境，随即渡过东江。

刚过江，忽然有人向我高声打招呼：“作尧兄，久违啦！”我顺着声音望去，见是几个国民党的军官，仔细一认，才认出是十年前军校的同学。

“他们来干什么呢？”我心里打了个问号，跟他们寒暄几句以后，就问起来意。

“啊，啊，这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嘛。我们途经此地，看到有队伍过江，没想到会见到你。”他们支支吾吾地说：“唉，毕业后，各奔前程，宦海沉浮。还是作尧兄有魄力，十年八年就荣任纵队副司令，我们这些当同学的一方面觉得面上有光，一方面也深自惭愧呀。”

听到这些不值钱的恭维话，我心里很不舒服，就说：“诸位日后见，军务在身，我还要兼程前往，恕不奉陪了。”

“那好，那好，我们决不耽误仁兄。”其中一个说，“来，

来，我们赶快合照张相片，作为这次邂逅相逢的留念吧。”说着，从挎包中取出一部照相机，不由分说地拿镜头对准我，另外几位同学也象早已排练好似的靠到我两侧。

“原来是这么回事。”知道他们的来意，我倒轻松了许多。他们一定是奉了主子的命令，要拿到我已从粤北撤回的确凿证据。日后，要是我还留在广东打游击，他们就可以靠这张照片大作文章了。

“真是鼠辈的见识。”我心里笑道。就让他们“嚓”、“嚓”地照了几张，算是尽了“同学之谊”，帮他们完成了一个“任务”。

就这样，我们粤北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阴谋，终于在限定日期的前一天——六月二十七日，胜利到达了大鹏半岛上的葵涌。

#### 四

大鹏半岛上，早已云集各路兵马，江南、江北、粤北、东进，几个指挥部都来到了。此外还有南路、潮汕、粤中几个部队的干部一百多人，珠江纵队七十多人和全省各地的一些地方干部，真是千里相逢，战友云集。但是，在这个大忙的日子里，谁也没工夫多谈，见面紧握双手，说声“啊，你来了，一路辛苦了吧？”又赶着去忙各自的工作了。

司令部中，大家更是行装未脱，征尘未洗，许多同志因为熬夜，眼睛都布满了红丝。

我向同志们汇报了粤北部队集中和南下的情况。曾生说，在部队集中的过程中，江南、江北部队也碰到了不少困难。江

南支组在五月二十五日出发到惠州后，惠州的国民党当局故意刁难，弄出许多麻烦的手续，拖延了几乎半个月的时间，才让支组与江南指挥部联络上，江南部队在六月十一日才集中到葵涌。江北支组五月二十八日到达博罗横河，三十日与江北指挥部联络上。但国民党反动军队趁我们江北部队分散的机会，以一个营袭击了我们驻在增江河畔沙塘圩的部队，打死我们战士八名，抓去七名，并抢去机枪、步枪以及现款二十几万元。为此事，我们向支组提出抗议，要求释放被捕的人员，但蒋方代表推置不理。因此，集中的时间也延迟了好几天，在江南部队到达后的第五天才到达葵涌。

这时候，我才知道，三个月前，东进指挥部曾经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袭击，卢克敏、王农、林冲等同志受伤后被捕不屈，已经壮烈牺牲了。

国民党当局不择手段地阻挠我们集结，也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北撤。曾生同志告诉我，六月十七日，即江北部队刚到达后的第二天，忽然发现在距离半岛不到一天路程的横岗圩，驻进国民党独立团一个营，又在距大鹏城仅二十里的霞涌，突然增兵，大有以重兵从北面山地向海边压过来之势。我们粤北部队到达之后，又传来了消息：国民党又集中了三个团兵力，准备袭击我们，广州行营开了作战会议，准备对我们“一网打尽”。这个消息是由我们的秘密党员得到，委托民主人士萨空了由广州带到香港《华商报》转到我们手里的。我们连夜开会，准备敌人进攻时以一部分力量坚决反击，大部分作三路突围，还准备了一些船只，以便必要时疏散一部分非武装人员。我们日夜加强布防，严阵以待。

与此同时，在已经进驻大鹏半岛的军调部第八小组的会议

桌上，我方代表方方同志对国民党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广州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以及香港的惠东宝等地同乡会纷纷发出制止内战，保证华南抗日武装安全北撤的呼吁。于是，国民党广州行营不得不通过他们的中央社，发出“保证中共人员安全北撤”的声明。

正当国民党军队对我们虎视眈眈之际，美国登陆舰因受海上台风影响，推迟了行期。为了随时准备打击胆敢来犯之敌，我们马上将部队重新调整，决定由我和杨康华、谢斌等同志指挥第一线，林鏊云、罗范群、刘田夫、谢立全等同志负责后方事务，曾生同志继续负责与第八小组接触。

我刚到葵涌的当天傍晚，方方同志拉着我的手，边走边说：“有一个人很想见你，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我觉得很奇怪，但半天也没猜着。后来，他带我走进屯洋村的教堂中，把我领到第八小组的美方代表面前，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美方代表和我的军校同学一样，都是在“关心”着我，只不过后者是要照相，而前者是要我“亮相”罢了。这次会面，仅仅增加了一些笑料，但也无端地耗费了我们不少时间。

第二天，在这间天主教堂的门前，美方代表还设一个“鸡尾酒会”，邀请我们司令部的同志参加，说是给我们送行。美方代表把杂七杂八的酒混和好后，我拿起酒杯，呷了一口，喉咙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当他高谈阔论、大讲什么和平友谊的时候，我侧过头，眺望着深蓝色的海湾。

这是我们部队生长的地方，多少同志的血流在这一带的海岸上，多少同志长眠在这一带的山丘之中。海边的那块大岩石旁，曾经停泊过我们海上队从日军手上缴获的舰艇。那金黄色的沙滩，曾经留下了东江干校的同志们操练的脚印。现在开着

“鸡尾酒会”的这间尖顶的教堂，两年前正是那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土洋会议的会址……古人说：“时至将离倍有情”，我们即将北撤了，我更加留恋我们战斗过的这个地方。

说实在的，北撤的同志谁没有留恋之情呢？

二十九日，在沙鱼涌海滩上，方方同志对集中在这里准备登船的二千多名北撤人员的讲话，道出了我们全体指战员的心情：

“你们打了八年日本鬼子，解放了大片国土，挽救了千百万同胞的厄运！然而日本鬼子投降了，你们却不能不离开家乡，一想到这里，令我禁不住流下眼泪……。然而，你们为了全省、全国的和平，坚决执行人民领袖毛泽东的训令，毅然冲破一切困难，不怕牺牲，不怕艰苦，义无反顾地集中北撤。我以悲痛而又兴奋的心情，欢送同志们，去为和平而努力，去为民主而努力，去为创造新民主主义的强盛繁荣统一的新中国而努力。”

这一天的白天，开欢送会，搞清洁卫生，与乡亲们道别，一天忙过去了。

傍晚，夕阳在海天之间只剩下一个金黄的半圆，天边泛着一片淡淡的红光。这时候，三艘灰色的登陆舰，在淡红的天幕中缓缓地向沙鱼涌开来。

“来了，来了，来了三条登陆舰。”眼尖的同志说道，“585号、1026号、589号，前面还有一条驱逐舰。”

船未到之前，第八小组已分配好各船上人的名单和每条船的负责同志。我们粤北部队八百人坐第三条船，由我、林锵云负责；其余两条船由曾生、罗范群、刘田夫、谢立全、杨康华

等同志负责。总的指挥机构在第二船。

“呜——，呜——”几声汽笛长鸣，三艘美国登陆舰已在离岸边几十米的海上抛锚了。船长们开出小汽艇，请我们负责的同志上船检查。

上船的时候到了。

“××——”，“到！”“××——”，“到！”沙滩旁，响起了点名上船的声音。点过名的同志背着枪，顶着行李走下沙滩，涉着齐腰的海水，陆陆续续地向登陆舰走去。

海岸边，送行的人们簇拥着，向战士们挥手告别。海风轻拂着人们的头发，送来了一阵阵深情的告别之声：“再见吧——”“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一路平安！”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

平静的海湾掀起了浪涛，闪动着片片金色的波光，就象是亲人们千百双手在向我们挥动。

此情此景，与我们离开油山时的情景多么相似！

当北撤的消息在油山传开以后，许多老百姓都惶惑不安了。他们向我们投来期望的眼光，还不相信这可能是真的。后来，他们就用依依惜别的眼光看着我们了。一个老阿婆向我们的战士说：“同志，听说你们部队要开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咳！我们以后也就没太平的日子过啦，你们刚来的时候，我就怕有一天你们会走。苏维埃时期的红军走了；打日本仔的时候陈毅军长的游击队走了；赶跑了日本仔你们又要走。唉，只怪油山的风水不好，我们福份薄，留不住你们。”那些天来，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彷徨而又依恋的面孔，听到这些充满忧伤感情的叹息。现在战士们的行李中，还带着群众临别时赠送我们的东西，一双草鞋，一顶竹帽。睹物思情，我们就象离开了自己的



亲人一样难过。我们与留下坚持的武工队同志们分别，虽然没有半句伤感的话，但是多年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斗情谊织成了一根根剪不断的丝线，时刻牵动着我们的心。

大鹏的海浪，油山的泉水，掀起了我感情的波澜。回首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想起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同志，我更是感慨万分，不觉轻轻地念着他们的名字：梁鸿钧、何与成、黄高阳、卢克敏、肖光生、卓凤康、卢仲夫、陈前、李天赋、黄国平、李少清、沈标、莫福娣、黄友、谭家驹、刘荫、李一之……

海水涌上沙滩，舔着岸边的礁石，发出“沙沙”的声响，象诉说不尽的临别赠言。

忽然，好象刮起了一股台风，海浪“哗哗”地波动起来。我急忙望去，只见在苍茫的暮色中，岸边的秩序乱了，一批不愿解甲复员的战士跟北撤的同志们一道冲下海滩，向舰艇拥来。一百多名复员的战士又回到了部队的怀抱。这一批战友拥上船来，给舰艇上带来了一阵热烈的气氛。

“呜——，呜——”汽笛拉响了，大家拥在船旁，一个劲地挥动手臂，最后一次高声地喊道：“再见了，东江！”

“再见了，广东！再见了，故乡！”在浪涛的回应中，舰艇缓缓地离开了大鹏湾。远处，海平线上，海燕在追逐着天边的余光。

夜色笼罩着大鹏湾，海面上飘起了悲壮的《北撤进行曲》：

为了广东的和平呀，  
我们要离别战斗的家乡。  
我们要走上新的路程，  
飘过海洋到遥远的北方。  
当无数群众送别我们，

好似母亲掉下眼泪，  
当多年战友送别我们，  
好似兄弟说不出话来。  
让我们继续战斗吧！  
让我们牢牢地各守岗位！  
不管反动派疯狂挣扎，  
我们要战斗到胜利的明天！

难忘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在浪涛和歌声中，我们二千五百多名战士，踏上了新的航程。

好似母亲掉下眼泪，  
当多年战友送别我们，  
好似兄弟说不出话来。  
让我们继续战斗吧！  
让我们牢牢地各守岗位！  
不管反动派疯狂挣扎，  
我们要战斗到胜利的明天！

难忘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在浪涛和歌声中，我们二千五百多名战士，踏上了新的航程。